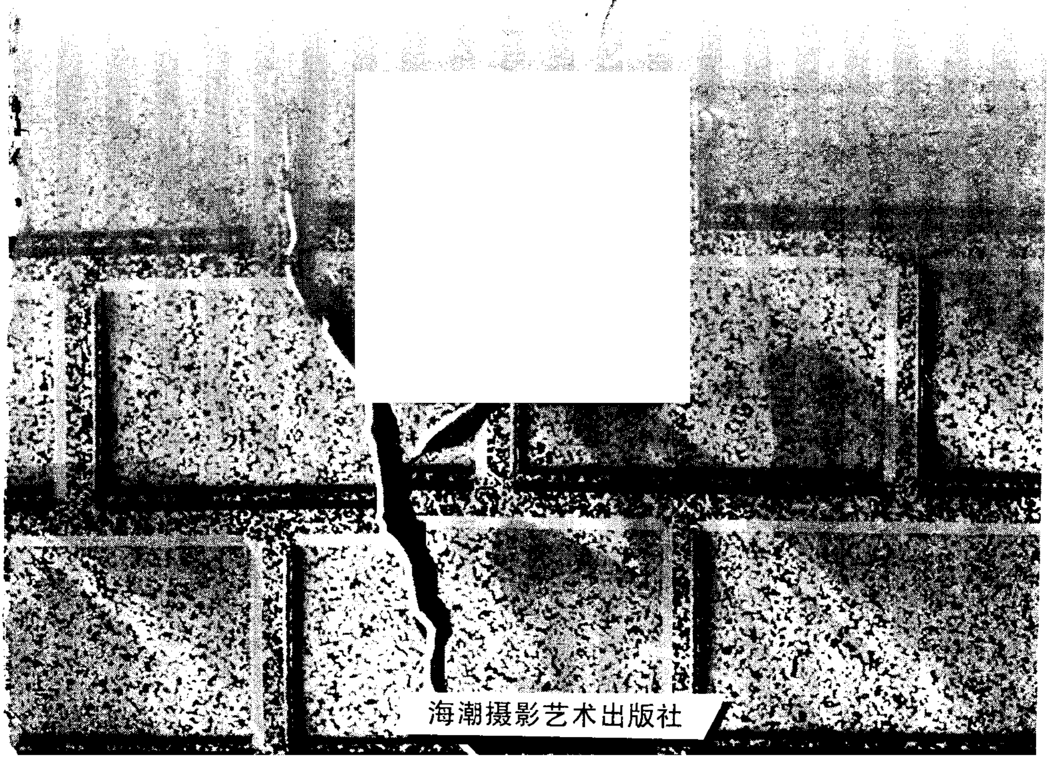
第四次转折

——世纪末的美国预言

[美]威廉·斯特劳斯
尼尔·豪　　著
杨立平　刘　亮　张建立　译

GF13/26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E FOURTH TURNING: AN AMERICAN PROPHECY
Copy ©1997 by William Strauss and Neil Howe, All right reserve
©1998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Published by Bantam Doubled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闽字 13－1998－28 号

第四次转折

[美]威廉·斯特劳斯　尼尔·豪　著
杨立平　刘亮　张建立　译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福建出版中心　邮编:3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　※　※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字数 37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199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ISBN 7－80562－413－5/G·22　定价:24.90 元

“我读完《第四次转折》时，又恐惧又兴奋……当我想到即将到来的20年中将会发生某些天启事件（我出生时就笼罩着这种阴影中，而且我一生都在阅读研究这些它们）时脉搏就加速起来……如果斯特劳斯与豪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预言家之一。”

——大卫·凯瑟《波士顿周日环球报》

“著名历史学家威廉·斯特劳斯与尼尔·豪向我们展示了根据历史循环理论所预测的未来有多么令人吃惊。”

——《美国周末》

斯特劳斯与豪抛弃了主张社会永远进步论的现代直线历史观观点，采取了一种古老的周期循环论。他们将历史划分为一些长度在80－100年的周期，并称之为“百年周期”。当代美国的处境是这样的：在经历了大约在1984年结束的第二次转折（“意识革命”）之后，美国人正处于第三个转折期（“文化战争”）。目前这一周期将在2005年左右结束。第四次转折所带来的危机已经不太遥远了。考虑到上个百年周期中的第四次转折期内发生了大萧条与二战，因此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危机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按照两位作者的要求从现在开始准备，即使哪些否定循环理论的人也会发现该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该书对世代关系的真知灼见让人称道：例如认识到里根执政时期人们迷恋于个人利益的现象代表了“60年代的“自我一代”的态度走向了成熟的人能有多少人呢?

尽管该书的主题非常沉重，但斯特劳斯与豪充分利用他们渊博的通俗文化知识使全书始终给人一种妙趣横生的感觉，创作出一种超历史，供我们在走近新世纪的过程中系细细咀嚼。

《科克斯评论》（1997年1月1日）

目 录

第一部分：周 期

第一章 严冬来临 ……………………………………（3）

◎美国感觉到自己好像正在解体，无论美国人身在何处，都会发现美国正以一种大多数人不喜欢的或让人迷惑不解的方式发展

◎在2005年左右，一个突然的迸发的火花将点燃一种危机情绪。旧秩序的残余力量将分崩离析

◎发生大灾难的可能性很大，届时，美国可能会发生起义或爆发平民爆乱，国家将四分五裂，或者成为独裁的统治对象。如果爆发战争，那将是一场危险与规模达到极至的战争，换言之，是一场全面战争

◎“未来无非是过去的重复，只是未来之门与过去之门有所不同而已。”

◎最不相信循环的美国现在已经陷入有史以来最不祥的循环之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感到下一扇历史之门离他们越来越近

第二章 时间周期 ………………………………… (35)

◎世界上各地区的古人早就对太阳与春夏秋冬四季的周期有所觉察，在预言与谜信的深刻影响下，他们相信自己的历史也要经历一种类似的周期——生长、成熟、熵与死亡

◎无论百年周期在古代世界有何影响，它必将在现代世界中变得更加活跃，因为在现代世界中，它隐含着一种历史周期性循环

◎时代重复自己——上天的时代重复非常精确，而人间的时代重复率大体上接近。在古希腊语中，periodos 的意思是“转圈，圆圈”。几乎所有非西方文化都接受时间周期性这一观念

◎在西方——从斯多葛学派到伊比鸠鲁学派，从利比奥斯到伊本·哈拉顿，从马基亚维里到维柯，从叶芝到艾略特，从施本格勒到汤因比——时间循环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主题。哲学科林伍德指书，“历史循环是各种历史思潮的永久性特征。”

◎“人类的内在时间单位相当于个人有意识生命的平均值。”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世纪一直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交替

第三章 生命周期 ………………………………………… (73)

◎在现代,人生循环四阶段仍是文学、哲学与心理学中的一个恒久的主题

◎社会学家丹尼尔·列文森说过:"打个比方,每个人都懂得一年四季与人生阶段的关系,每个阶段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并在整个循环中独树一帜。它是整个循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并将两者包容在其中。"

◎卡尔·荣格同样认为"生命之弧"可划分为四个阶部分。"

◎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周期与自然界的周期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有二:一是将我们个人的历史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二是在一部分更大的社会戏剧中寻找自己的生命角色。人生每个阶段都会赋予进入这个阶段的人一生全新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形象。在人类历史上,世代循环从来未像在美国那样有力地推动着时间之轮前行

第四章 历史循环 ………………………………………… (125)

◎在拉什莫尔山的花岗岩上雕刻着四位美国伟大领导人的巨像。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

·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到亚伯拉罕·林肯，他们的出生时间相隔126年

◎他们分别代表了四个不同的世代（自由、共和、进步与超越）。但是那巨石雕像刻画的远不止这些：从左向右，参观者可以看到四个世代最受人尊敬的总统，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原型。这些原型不是按照时间先后而是按照百年周期的顺序排列的：游牧者、英雄、艺术家与预言家

◎原型神话的力量在这些巨型石像的雕刻者古茨昂·伯格鲁姆的想象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意识到，这座丰碑以最完美的形式表现了他们国家的历史，美国要发展、繁荣，要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需要的不只是原型中的一种或两种，而是四种缺一不可

◎这种四位一体的完美结合并非偶然，它反映了源于人类开始追求美好社会时就已存在的动态平衡

第五章 老年预言家 …………………………………（197）

◎当古代的世代经过这些伟大的历史之门时，他们在老年预言家身上看到了一种老人

——他们是预言家原型在老年的表现。他们的老年时期则是新世代里产生的前奏

◎我们也许更愿意把自己视作自然界的主人,可以控制各种变化与进步,免受历史周期的影响。然而人们越是在自然周期面前表现得缩手缩脚,我们越想根除它,我们的时间观与未来观就会变得越可怕

◎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好像是一个原始民族,当感觉到干燥阴冷的深秋正在走来时,开始怀恋温暖潮湿的春天,不知道它可否重来,许多美国人希望“现在重现一个百年周期的春季”。但一如自然界的一年四季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百年周期的冬季可能匆匆而过,也可能姗姗来迟,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它一定会来到

第二部分:转 折

第六章 第一次转折:美国高涨(1946–1964) …… (205)

◎两个里程碑——日本投降与肯尼迪总统遇刺——圈定了一个历史时代,人们分别称之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好时代”、“最佳岁月”、“幸福日子”与“美国高涨期”

◎由于艺术家拍摄了一些怀旧电视节目与电影,几十年后人们对那段美国高涨期仍难以

忘怀。在那个时代，美国人变得更富有、更具有集体观念，美国将变得更加美好(也许更乏味)。犯罪率与离婚率下降，美国进入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青年人举止文雅有度的时代

◎从1946年到1963年这段时间内，美国在许多领域获得了成功(如公共合作等)。而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却失败了。当然，当时的美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得也不很成功(如个人发展)，而今天我们却在这些方面自以为非常成功。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奇：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即在高涨期的巅峰期，美国的情况与现在恰好相反，形成了当前这个百年周期的两个极端

第七章　第二次转折：意识革命(1964－1984)……（244）

◎约翰·肯尼迪遇刺后，美国表面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一场不可逆转的内部变革已经悄悄开始了。在美国民族的灵魂中正在形成一道新的伤痕

◎在1964年，随着几次新运动的悄悄发生，在人民与领导者的情绪之间出现了隔阂。美国已经进入觉醒时期，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意识革命

◎美国经济的继续飞速发展，人们似乎已

经能够控制经济周期。美国的领导者开始鼓吹什么“经济快速增长科学”，并逐步放慢财政与货币的增长速度。人们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是：美国人能否下定决心，去尽情享受生活。大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良心与不同政见等问题。觉醒开始成为可能

◎随着岁月的流逝，觉醒精神越来越深入到主流文化之中。许多美国人不再相信(或者关心)经济进步，开始更多地从精神角度去审视未来

◎美国高涨的国民情绪就像历史长河中的泡沫一样难以长久。无论刺杀、越战与水门事件是否发生，百年周期会进入觉醒时期

第八章　第三次转折：文化战争(1984－2005?) … (289)

◎民众的心态已走向高涨期的反面，人们不再像往前那样关注国家政策与计划，但由此形成的真空正逐步为一种新的政治所填补，即个人己见，内在价值和决然姿态

随着“有意义政治”的发展，美国人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认为每项社会计划都经不起长期考验，只能在短期内为个人所利用。社会生活缺少一种主导方向，美国人却在更为狭窄的范

围内寻找它

◎现在"解体"时期已经过半，它以任何人都未预料到的方式暗淡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像其他时代一样，解体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自然阶段，从许多方面讲，第三次转折都可称为百年周期中个人尽情享受的季节

第九章　历史上的第四次转折 …………………… (365)

◎第四次转折是极至黑暗的一个冬至期，社会秩序的供给仍在下降，但要求却已开始上升。它是百年周期中的冬眠，考验的时刻

◎一旦危机被引发，社会将获得一种再生——一种重新统一和振兴公共生活的新格局

◎再生的社会向高潮推进——确定旧秩序死亡和新秩序诞生的关键时刻

第十章　第四次转折预言 ………………………… (387)

◎在2000—10年代中期，美国将成为与20世纪20年代上次危机爆发时截然不同的一个社会。国家将更加富足，人民更加健康，技术更加卓越，人口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武器更加强大——但与以前的时期相比，还是具有解体时期

社会的相同之处。他们逃脱不了百年循环，我们也不会

◎新的状态和突然的新问题将自然成为解体时期公共信任下降的一个终点。很快，美国旧的公共秩序就将看起来陷入废墟，无法拯救。人们感到已从社会硬盘驱动器中取走，社会契约作废，旧的交易取消，大量未能兑现的诺言帐薄被清帐。社会经济到达一个低潮，看上去萧条就要开始。当美国显露虚弱时，外国威胁将虎视耽耽

第三部分：未雨绸缪

第十一章 为第四次转折做好准备 ……………… (429)

◎预言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绵有定时。如果你希望橡树果在春天落地，郁金香秋天开放，一定会大失所望。这种季节性原则也适用于百年周期。时间的循环往复不仅教会你接受历史的发展节奏，而且指导你寻找利用这些节奏的方法，尽你所能实现你在这些节奏中所扮演的角色。你和你所在的社会有能力去影响历史，但这也需要努力，而且你的努力必须恰到好处

◎如同人生或自然一样，对付百年周期的

正确方案是顺其自然,而非逆风而行

第十二章 永久的回归 …………………………… (464)

◎现代社会经常抛弃圆圈,追求连接开始与结束的直线。仍为直线时间论的信徒,我们认为必须不断向前发展。人们越想战胜自然,越会受到其深层规律的束缚

◎下一个第四次转折可能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它可能成为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阿米吉多顿,这场战争将毁掉一切。如果人类可以毁灭自己的话,这可能发生在其占主导地位的文明触发一场恐怖而告终的第四次转折之时

◎第四次转折可能不会结束现代历史,却标志着美国的灭亡。它可能会合上那部论述美国这个词所代表的政治宪法、通俗文化与道德立场的书

致 谢 …………………………………………… (474)

第一部分　周　期

第一章　严冬来临

美国感觉到自己好像正在解体

尽管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对安静与舒适的时代，但对未来却充满了悲观情绪，担心我们这个超级大国正以某种方式从内部开始腐朽。

我们的经济高涨期得以延伸，然而这都无法激励大众的精神。冷战与罗斯福新政业已结束，我们却毫无心思去回味往日的辉煌。从本质上讲，今天的美国给人的感觉要比我们大多数人记忆中的那个美国糟糕得多。昔日领导美国的据说是一些思想落伍者。而现在，无论你身在何处，从洛杉矶到哥伦比亚特区，从俄克拉荷马到太阳城，满目都是通向未来的不祥之路。我们赞赏遵纪守法、品性高尚的人，同时却津津乐道于各种形式主义与社会名流的滑稽演出。在领导者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卓越之处，也许我们的要求过于苛刻了。无怪乎每次换届选举都会引发一次震荡，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新的失望。

不久之前，美国还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但是，今非昔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我们为我们的民族倍感自豪，而个人却非常谦虚。那时，如果有人问：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吗？十个人中回答是的不到两个，而今天十个人中会有六个以上的人回答

是。以前我们强调集体的强大，现在却认为个人同样重要。

我们在大力鼓励个人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到：千百个成功者相加并不等于一个成功的社会。大众对美国所有公共机构——从商业、政府到教会与新闻——的信任度正在持续下跌。公债飞涨，中产阶级人口在减少，靠救济生活的人口越来越多，有关文化的争论日趋激烈。在世界各大民主国家中，美国的犯罪率最高，公民参加选举的比率最低。统计结果显示，许多不良社会风气（犯罪、离婚、堕胎、墨守成规）现在可能已经降至最低点，对此，我们不敢认同。

乐观主义仍与个人关系密切，但不再与家庭或团体相关。与对自己的儿女——或对整个民族所抱的信心相比，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的前途更为信心十足。作父母的普遍有一种忧虑：他们的父母（肯定）拥有美国梦，他们也（勉强）拥有，而他们的儿女就彻底没有了。35 岁左右的年轻持家者从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步入过正轨。中年人看着自己少得可怜的存款与微乎其微的退休金，不禁对虚无缥缈的社会保险信托基金大加嘲讽，并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思考老年时生活的艰辛。年轻人的道德沦丧让老年人胆战心惊，他们只好退守到自己的休闲世界中，尽量不去思考未来。

我们将来自公民的挑战视为一个巨大的魔方，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每个问题后面都隐藏着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依此类推，无穷无尽。要惩治犯罪，必须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为此，我们应该首先改善社会福利，那意味着要修改预算，而这又进而意味着要培养公民精神。但是为此我们必须修订道德标准，也就是说要改革学校与教会体制，这又意味着要搞好城区的社会治安；要搞好社会治安，必须惩治犯罪。政策的杠杆缺乏必要的支点来支撑。各个年龄段的人

们都感觉到，要改变这种消极悲观的局面，必须发生一场席卷整个美国的大风暴。然而，我们却要压制这种意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已经陷入否定的深潭之中。

我们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时，有时也会怀疑过多的分析和推断会不会将我们的直觉挤掉。就像焦急的父母一边仔细研究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图，一边服用17种药物一样，很难让他们停下来，问一下自己：真正的内在病因是什么？我们如何使各种自然的原始力量为我所用？难道在完全控制与彻底绝望之间没有一种中间选择吗？我们猜测，在繁杂的外部世界下面，历史、生物学或人类本身一定有某件简单而重要的事情要对我们述说，然而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我们以前曾经知道，但现在已经忘记。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会发现美国正以一种大多数人不喜欢的或让人迷惑不解的方式发展。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力崇尚个性、集体意识淡薄的社会中，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走向深渊。

是这样吗？

所有这些以前都曾发生过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探索历史进程中重复出现的模式与发现社会经验的自然节奏。

事实上，在现代历史的核心之处就存在这种模式：在过去五个世纪中，英美社会大约每隔20年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次新转折。每次转折伊始，人们对个人、文化、民族与未来的认识都会发生改变。四次转折构成一个周期，每个周期的时间跨度相当于一个长寿者的寿命，约80至100年。古人称这种时间单位为saeculum（拉丁文：世纪）。这四次转折分别与一个历史发

展周期中的生长、成熟、熵与毁灭相对应。

●第一次转折是一个高涨时期。这是一个上升的时代，国家机构得以加强，个人主义受到削弱，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旧的价值体系正在走向崩溃。

●第二次转折标志着觉醒。这是一个精神崛起、充满激情的时代，社会秩序受到了新价值体系的攻击。

●第三次转折是一个解体过程。这是一个下降的时代，个人主义得到张扬，国家机构受到削弱，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走向解体，而新的价值体系正在形成。

●第四次转折是一个危机时期。这是一个世俗世界发生巨变的决定性阶段。在价值体系的推动下，旧的社会秩序被新的社会秩序所代替。

每次转折发生时都带着显著的情绪色彩，而这种情绪变化总是给人以惊奇。

本世纪的第一次转折是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三位总统执政时期为代表的美国高涨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谁也没有想到美国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得信心百倍，国力强大，自鸣得意。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第二次转折是意识革命，从60年代中期的学生运动一直延续到80年代早期的抗税斗争。在约翰·肯尼迪遇刺之前，谁也不会想到美国将进入一个个性解放时代，跨越一个思想与文化的分水岭。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第三次转折可称为文化战争，始于里根执政的80年代中期，将在下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距现在还有8至10年的时间）结束。人们沉浸在里根上任早期所取得的辉煌政绩之中，谁也不

会想到这个国家正在步入一个民族分裂、机构腐朽的时代。我们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以前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民族情绪大变动？出现过，而且出现过多次。美国人以前有没有体验过现在这种解体的感觉？体验过，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体验过许多次。

80多岁的老人不会忘记以前也有过类似今天这样的情绪。他们可以回忆一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1918年）到1929年经济危机之间的那段岁月。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胜利所带来的欢乐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以前人们对未来发展所持的乐观态度为爵士时代对崇高理想所表现出的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态度所取代。老板们在贫民窟中大摇大摆，三K党在南方横行霸道，黑手党在中部工业区活动猖獗，而美国精神的辩护者在无数个米德尔顿似的小镇中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各种团体在萎缩，政府功能在削弱，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外的各个党派极为活跃，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迎来了许多新技术产品（汽车、收音机、电话、拔音盒、自动售货机），使人们觉得生活又增添了几分复杂与疯狂。"迷惘"的青年一代玩的那些冒险游戏让中年道德改革家感到震惊，而这些中年改革家中许多人属于"疲惫的激进派"，青年时代（19世纪90年代）曾从道德角度对"黑暗的十年"间的各种社会黑暗面进行了反驳。人们大都将目光集中在无法做出妥协的文化问题上，诸如吸毒、家庭与"体面"。同时，父母在努力保护自己童子军似的孩子（他们今天已经步入老年）。

虽然那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深层的情绪却与当今美国人的感受非常相似。请看华尔特·李普曼在一次大战期间写下的一段话：

我们从头到脚缺乏一种安顿感。所有的人情关系，无论

是父母与儿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还是工人与雇主之间，无不受制于一种奇怪的境况。我们对一种复杂的文明感到不习惯；当个人交往与永久的权威已经消失之后，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没有历史先例可供借鉴，所有的智慧似乎都是为一个更简单的时代所准备的。

我们再看一下现在仍健在的美国老寿星们记忆中那个类似于现在的时代。那时，今天的老年人还都是玩童。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这段时期，美国被一种非常糟糕的新情绪所控制。广受大众关注的墨西哥战争获得了令人振奋的胜利，然而领土扩张给国人带来的兴奋持续时间并不长。城市居民变得卑鄙起来，而政治则让人觉得可恨。出现了移民热潮，金融投机活动猖獗，而铁路修建与棉花出口所释放的巨大市场潜力给社会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由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与民主党）逐步走向解体。南方人与废奴派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将奴隶制向西部推广的争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中年唯心论者，曾在更加振奋人心的 19 世纪 30 年代与 40 年代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超验主义运动、乌托邦公社及其他充满青年人激情的改革活动。由于更注重实际的年轻一代纷纷涌向西部淘金，各大学在招生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在许多西部小镇至今还流传着许多这些年轻人的暴力故事。同时，又一代孩子成长起来，他们的团队精神让欧洲游客大感惊奇。这些欧洲人在 10 年前还对美国孩子的粗鲁举止颇有微词。这些事情，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

再将时钟拨转到 18 世纪 60 年代。刚刚结束的法印战争为长达 80 年的冲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划定了各殖民地的边界。然而，当英格兰试图通过税收的方式补偿战争的损失之时，各殖民地开始躁动起来，尽管这种躁动没有一定的目标。在此期间，

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潮、美国人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进运动以及殖民地的贸易纠纷达到了高潮。随着债务人监狱的爆满，中年人对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谓的青年人的“白色野蛮”满腹牢骚。中年演说家们（与发生在大约1740年左右的“大觉醒”运动中那些充满火一样激情的年轻鼓吹者是同代人）呼唤公民意识，发起了广受欢迎的生活节俭运动。这些青年精英是第一批到纪律性很强的殖民地教会学校而非腐朽的英格兰求学的人。殖民者逐渐分化为两个相互仇恨的阵营，一个拥护王政，而另一个反对王政。这听起来是不是也很耳熟？

在上述各个时期，美国人都在歌颂以绝对个人主义（人们是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这个词的）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时也对社会分裂、暴力泛滥以及日新月异、超出社会吸收能力的经济技术革新感到焦躁不安。

在上述各个时期，美国人在抗击外来威胁——来自日尔曼帝国、新西班牙帝国（又称墨西哥）或者新法兰西帝国——方面取得了巨大胜利。然而，人们逐渐将这种胜利与一种过时的集体观念联系在一起，进而产生一股悲观的洪流。

在上述各个时期，侵略性的道德教育使人们对国家前途感到渺茫。文化战争激烈异常，政治话语日渐粗糙，本土主义（地域）情感得以强化，移民与财富浪费受到指责，人们对孩子倍加保护。

在上述各个时期，美国人个人价值观念的根基比较牢固，但是对社会腐败充满了敌意。几十年来比较稳固的国家机构变得岌岌可危。那些甘愿以生命效忠国家的人们年岁已大，许多人已经离世。对新一代成年人来说，国家一点也不重要。整个合众国似乎已经到了解体的边缘。

在上述各个第三次转折中，美国人感到自己好像正在走向一

场大灾难。

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确实经历了一场大灾难。

18 世纪 60 年代之后发生了美国革命，19 世纪 50 年代之后爆发了美国内战，本世纪 20 年代之后发生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这些解体时代都伴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危机。危机过后，美国社会又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每次变革到来之前，几乎看不到任何征兆。在 1773 年 12 月、1859 年 11 月与 1929 年 10 月，美国人对即将降临的大灾难一无所知。然后，突然迸发的火花（波士顿倾茶事件、约翰·布朗起义未遂被处决、黑色星期二）迅速而永远地改变了公众的情绪。在随后 20 年左右的时间中，社会发生了巨大动荡。紧急事件要求公民将集体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做出巨大牺牲。领导者带领人民，而人民也信任他们。随着新的社会契约的创立，人们战胜了那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种种挑战。例如，美国人民利用经济危机将自己与国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18 世纪 90 年代，他们创建了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美国人民虽然经受了战争的煎熬但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缔造了一个真正享有自由与平等的国家；本世纪 40 年代后期，美国人民创建了有史以来最具独创性的超级大国。

第四次转折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终结期。它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开启一个新时代。

历史发展犹如一年四季，周而复始，而现在严冬的脚步已近。像自然界的冬季一样，百年周期中的冬季可以提前，也可以推延。第四次转折可能漫长而难熬，也可能短暂而严峻，当然（也许）也会非常温和。然而就像冬季一样，它无法回避，定会

应时而至。

下面，现代历史发展节奏就美国未来的发展之路提出了几点警告。

现在，这个周期中的第四次转折将在新世纪开始后不久发生，大约在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在2005年左右，一个突然迸发的火花将点燃一种危机情绪。旧秩序的残余力量将分崩离析。人们对政治与经济的信任度将一落千丈。这个国家将面临真正的困难，由此带来的巨大创痛可能涉及阶级、种族、民族与帝国等问题。然而这种历史的创痛将为社会的再生撒下种子。美国人对新近的各种错误将会后悔不已，并就下一步怎么走达成坚定的共识。美国的生存将受到威胁。在2025年之前的一段时间中，美国将走过一扇宏大的历史之门，就其重要性而言堪与美国革命、美国内战、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

发生大灾难的可能性很大。届时，美国可能会发生起义或爆发平民暴乱，国家将四分五裂，或者成为独裁者的统治对象。如果爆发战争，那将是一场危险与规模达到极至的战争，换言之，是一场全面战争。历史上，在每个周期中的第四次转折到来期间，都会在毁灭技术的研制与使用方面发生一次飞跃。如果在美国内战期间人们掌握了一种先进的毁灭性武器，南北双方的首府一定会被夷为平地。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发明了一种新的毁灭性技术，并迅速将它应用于实战中。在美国即将进入的第四次转折期间，将会产生一种可怕的杀伤武器，其威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想像，而其对手也同样拥有这种武器。

然而美国人在经历此次转折过程中，也会获得独特的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许多人失望地说，在今天，本世纪60年代的价值观念已经与社会功能失调和文化腐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不会再有积极的作用。在目前的解体时代，这也许是正确

的。但是在危机时期的严酷考验中，将有所变化。随着旧的社会秩序逐步走向灭亡，美国人必须创造一种新秩序。为此，需要有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为管理新的社会秩序，必须创建一个强大的政体。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可能会出现公民信任的复兴，而且目前人们在第三次转折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如同魔方一样难以解决的犯罪、种族、货币、家庭、文化与伦理问题——将在第四次转折中得到解决。美国在危机过后提出的解决方案将井井有条，而不像危机爆发之前出现的各种问题那样纠缠在一起，毫无理清与解决的希望。按照今天的标准，到 21 世纪 20 年代，美国可能会演变为一个美好社会，一个富有生机的社会。

这样，下一个第四次转折也许会以灾难或光荣而告终。整个国家可能毁于一旦，其民主制度也将消亡，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将被驱散或惨遭杀害；也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像胜利者那样利用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来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没有揭示即将到来的危机的后果，而只是向人们提示的危机发生的时间与范围。

我们无法阻止历史的发展周期，只能为之做好准备。从 1997 年算起，我们还有 8 年、10 年或者 12 年的准备时间。对此后发生的一切，我们将无法做出选择。是的，严冬就要到来，但是如何度过严冬取决于我们自己。

历史发展像排山倒海的风暴，可以将社会的各个层面，最好的与最坏的，一并展现在人们眼前。下一个第四次转折可能会使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遭受灭顶之灾，让我们成为那些劫后余生者诅咒的对象。当然也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可能，这次转折将为我们的生命增添几分高贵，将我们这个社会提高一个层次，激发人们做出一些高尚的英雄主义事迹——这些事迹将演化为神话般的传说，成为后人不断歌颂的题材。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在经济大萧条的高潮阶段这样说："人类活动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循环。某几代人可能会获得许多。另外几代人则需要付出许多。这一代人需要面对命运的挑战。"这种循环一直非常神秘，但到来时又不会完全出乎意料。尽管过程与结果无法确定，但时间表已经排定：下一个第四次转折——美国下次与命运的搏斗——将在大约 10 之后开始，30 年后结束。

我们在做出这一预言时为什么这样自信？因为所有这一切以前曾经都发生过，而且发生过许多次。

时间论

从基督教中残酷的"狰狞的持镰收割者"（死神）到印度教中满身血污的"时母"①，人类传统上一直持一种悲观的时间观。我们知道，时间将导致人生命的分解与死亡。其所到之处注定要消灭我们当前所熟悉的一切——从早晨喝咖啡这样的日常习惯到规模宏大的艺术品、宗教或政治。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指出，"时间及其让万物变老的功能将战胜一切。"

在过去几千年中，人类产生了三种时间论：杂乱无序论、循环论与直线论。第一种是原始人的观点，第二种是古代与传统文明社会的观点，第三种则是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观点。

杂乱无序时间论认为历史无发展轨迹可寻。事件之间的关系很随意，任何试图给这种陀螺式的接续方式添加一种意义的努力都是徒劳。这是土著人的第一直觉。在他们看来，人类根本没有能力控制或理解自然界的变动。这与儿童的生命观及时间观极为

① 时母，印度教女神，性嗜杀，喜吃恶魔，其像黑面獠牙、口吐红舌、身带血污——译者注

相似。然而无序的时间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目标，即许多东方宗教所谓的“大智”。佛教教导个人借助宗教仪式从时空及自我中脱离开来，以达到涅槃。上个世纪，各种杂乱无序派思想——从不注重后果与未来的通俗文化到学术界的解构式虚无主义论等——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造成了一定影响。

杂乱无序时间观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大缺点在于，它消解了社会的关系。如果因果在时间上没有任何联系，人们就不必为自己的选择负道义上的责任了。这样，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也就无从成为一种法定关系了。基于上述原因，所有社会或宗教都非常忌讳杂乱无序时间观，甚至佛教也是如此。因为根据佛教的教义，所有没有达到涅槃者将接受因缘的有序控制。

当古人第一次将行星活动的自然周期（每日的旋转，阴历月份，阳历年份，十二宫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睡眠与醒来；怀孕与生育；种植与收获；打猎与美餐）的周期联系在一起时，就产生了循环时间观。循环往复的时间通过重复，通过父母、猎人或农民在永久的循环中的适时而为（非常像人类发展的第一个神秘阶段中神的行为）征服了无序的状态。最终，人们用一些大的周期区分王国与预言的持续期、英雄与巫师的到来、人生的衰老、世代的更替与文明的衰落。循环时间永无止境，同时也是不断的结束与开始，推动其运行的是类似于现代周期性假期的复杂宗教仪式。与杂乱无序时间论不同的是，循环时间论赋予某些古代社会一种道德准则。根据这一准则，每代人都可以将其行为与祖先进行比较。那些信仰循环论的人可以从事人类学家列维·布鲁尔所谓的“参与神秘”，即通过神圣的方式再造自然界的永恒性轮回。这种思想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可以从许多古代社会为纪念重复性时间而建造的巨型纪念碑（石塔、古埃及金字塔、古亚述与巴比伦的金字塔、巨石）的遗迹中得到印证。虽然循环时间战胜了

原始的杂乱无序时间论，但是现代人认为它还缺乏独特性与创造性。“对传统社会来说，生活中所有重要活动从一开始就是由诸神或英雄揭示的。人类只能永远重复这些榜样与模式般的活动。”宗教学家米尔西亚·埃利亚代认为，“如果从如下意义上来看，这种趋势显得自相矛盾：传统文化中的人认为只有在消除自我（对现代观察者而言）并满足于模仿与重复另外一个人的活动时才能实现真正的个人价值。”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种选择：直线时间论——时间是一个有着绝对开端与结尾的独特（通常是处于发展中的）故事。这样，人类第一次渴望进步。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时代，时间循环观中也不时伴随有人类的进步。希腊人有时希望一种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富有独创性的理性把人类从永久的贫困中解救出来；而罗马人相信一个强大的政体可以为公民带来好运。最重要的是，西方一神论的兴起与传播使人们产生了这种希望：人类的将来并非单由命运转盘来决定。古波斯人、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宇宙论从根本上说都包蕴着这样一种新的观念，即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是一部情节单向发展的戏剧。时间始于人类的不幸；然后努力向前发展，历经尝试、失败、启示、神的干预；最后以人被赦免与重新进入天国而告终。

人类理解直线论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一旦人类理解了它的内涵，这种观念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在中世纪的欧洲，早期基督教徒总结出来的单向时间观还是一种相对神秘的思想，只有一小部分神职人员中的精英才能全面理解它的奥义。然而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与福音书印刷品在普通人中的传播使直线式历史迎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普通人开始思考耶稣二次（最后）转世的历史迹象，并根据各自的观点创建了一些新的宗教派别。两个世纪之后，启蒙运动把基督教的直线时间论转化为世俗

信仰的一个补充部分，出现了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所谓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堂之都”——一种认为科学、经济与政治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信仰。

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西方的历史进步论发展到了极至。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信条、一种实证主义教条还是作为一种进化科学理论，都没有人对它提出质疑。1902年出版的《剑桥现代史》中这样解释：“我们势必将人类活动的进步作为一种编写历史的科学假设。这种进步一定是有目的的。”艾克顿勋爵后来在描述维多利亚时期这种流行的观点时，称“进步是天意。没有进步，历史上就没有上帝。”

英格兰在新世界的第一批定居点是作为激进的加尔文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前哨建立起来的。因此，说美国是进步直线时间观的最极端表现并不奇怪。第一批来美的欧洲探险者在这片新鲜的大陆——这个新的亚特兰蒂斯、黄金国或乌托邦——上找到了一个重塑自我、终结历史的真正机会。随后大批涌入的移民同样将自己看作是新耶路撒冷的缔造者、具有革命意义的理性时代的发起者、“上帝选中的国度”的辩护者与追求一种命定论的先驱。本世纪初，赫伯特·克罗里与詹姆斯·特路斯洛·亚当斯分别用“进步的民族主义”与“美国梦”两个词来指代这种大众对直线发展的信仰。他们暗示，时间是世世代代的自然结盟。这样就产生了美国例外论，即这个国家及其公民已经以某种方式摆脱了任何循环后退的危险。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直线时间论战胜了循环时间论。而在很久以前，循环时间论征服了杂乱无序时间论。但在近几个世纪中，征服者的手脚受到了束缚。直线时间论的胜利既不是即刻完成的，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基督教的核心仪式——一年一度的死而复生的救世主纪念仪式——与基督教取代的古宗教在冬季举

行的再生仪式非常相似。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循环时间论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信仰已经逐步被人遗忘。

这种镇压活动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徒：他们努力根除历法异教，公开指责古典循环论，把非直线学的各个分支（例如炼丹术与占卜术中的遁世派）打入地下。圣奥古斯丁警告说："只有邪恶的人走路兜圈。"在世界现代史的黎明阶段，这种攻击变得更加猛烈。宗教改革不仅引发了对异教节日（砍倒五朔节花柱）的新一轮攻势，而且把时钟、日历与日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普及开来，使人们可以有效利用时间，达到一个直线目标，无论这种目标是神圣的，还是与财富或征服有关。最近，西方开始使用科技手段消除自然循环的物理证据。人造照明设备使我们相信自己战胜了睡觉——醒来这一循环；气候控制技术的采用打乱了季节循环；借助制冷技术，人类征服了农业循环；人类还通过先进的医学技术攻克了休息——恢复这一循环。

获得胜利的直线时间论塑造了西方与（尤其是）美国文明的风格。以前，当时间循环论盛行期间，人们注重耐心、仪式、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自然界内在时间的医治作用。今天，我们急躁，反对崇拜偶像，主张化整为零并注重自然界外在时间的力量。

以前，人们在表示变化时大多采用四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在大多数国家的文化中象征着女性。在主要的四位一体的组合——季节、方向与元素——中，第四个部分总要返回来重复另外三个部分。今天，这种主要模式变为三位一体，这象征着男性。在基督教与现代哲学的主要三位一体中，第三部分总是要超越另外两个部分。

以前，人们特别注重认识自然与利用自然的能力。今天，我们则强调抗击并战胜自然的能力。

战胜直线时间论

直线时间论的最大成就是赋予人类自我完善的自信。一个直线社会界定明确的道德目标（正义、平等）或者物质目标（舒适、富裕），然后有目的地去努力实现它们。达到这些目标后，人们有一种胜利的喜悦。如果未能如愿，会采取新的战略。无论何种方式，这一进程永远不会重复。每一次行动都是独特的，给人一种真正的创造感，那些只会重演过去的人们不会懂得这种感受。在美国，正如马克·吐温所指出的那样，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只有我们称所有东西为新事物的习惯有些陈旧。

然而直线时间论的最大弱点是，它抹杀了时间的重复发生性，从而割断了人类与永久主题——无论是自然界中的、互相之间的还是我们内在的——的关系。当我们认为社会命运的指向完全是自我控制的，我们的个人生活是自我创造的，就会失去参与一种超越我们自我的集体神话的感觉。我们无法以宗教仪式与先行者或后来者取得沟通。直线时间论将我们定位于某一中间时刻，远离了历史的开端与结束；使我们孤独；烦躁不安；没有勇气岸然独处，恐怕因此发现我们自身的某些可怕之处。大多数美国人同意玛丽·麦卡锡的那句话——“幸福的结局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信仰”，但是我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我们达到了上述目的，我们会做些什么。

在一帆风顺时，这种缺点不会成为问题。但是不顺利时，直线时间观就会崩溃，暴露出时间作为一种陌生真空的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就是这样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投下一片绝望与相对主义的阴影。这种阴影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重新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仰。但是今天，这种信仰重又陷

入危机之中。进步一词增添了某些贬义——机器人技术、官僚集权主义与充满偏见的文化。它不再描述我们希望历史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越坚信时间直线论，就越害怕社会在未来会出现直线式倒退。

面对这种对进步的信心日见下降的境况，许多美国人采取了强烈的否定态度。在最近几十年中，公众又开始团结在另一个三阶段胜利宣言周围。1960年，出版了华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几个阶段》(结论是向一个寓言般的大众消费社会“起飞”)；1967年出版了赫尔曼·卡恩的《2000年》(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工业与后工业三个阶段)；1970年出版了查尔斯·赖克的《重振美国》；1980年出版了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二、三次浪潮)；1992年出版了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对黑格尔理论的新阐释；黑格尔总是将全部历史分割为三个阶段)。直线时间流派将人类的全部历史看作滑雪中的跳跃动作。人类在默默蹲伏几千年后，现在就要进行最后一次光荣的飞行。

对直线主义者来说，未来经常被简化为对新近历史的直线式预测。由于他们看不到以往历史中的曲折或挫折，因而也看不到未来发展中的各种不利因素。《大趋势》一书的作者约翰·纳斯比特写道：“如同骑马一样，如果你要加入潮流之中，顺流而下，非常容易。”新旧直线时间论在预言历史这部大型戏剧中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幕时也是如此。就像聚集在宗教改革鼓吹者周围的人群一样，几句恭维话就使今天忠实的信仰者相信：他们恰好生活在一个千载难逢的重要时刻——人类就要经历最后一次改革。

尽管直线时间论不屈不挠，更多的美国人的信仰已开始返回到杂乱无序时间论——这种信仰认为生活由许许多多碎片组成，事件的发生非常随意，历史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通俗文化

中，过去主要是好莱乌电影，阿甘之类的影片以及奥利弗·斯通寓教于乐的电影。在政治与商业中，过去仿佛是一个装满了各种战术图画的工具箱。在学术界，许多历史学家对过去向人们提供教训的说法不敢苟同，他们看不到任何内在的与统一的故事，进入他们眼帘的是一个个装满行将过时的社会理论的细节或脚注的杂物袋。的确，现在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根本没有单一的历史——只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地区史、语言史、家族史、行业史、阶级史与种族史。许多学者认为过去从属于政治，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武器。

这种从学术角度否定时间的内在逻辑的做法导致整个社会历史的贬值。长春藤联合会下属的各大学不再要求本科生把历史作为一门单独学科学习了。在公立学校的教材中，有关过去的花边新闻与地理、政治及美术混杂在一起，构成一种大杂烩式的社会研究。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觉得历史这门课程最无趣，最没有价值。在普通人的话语中，“那是历史”已经与“那毫无关系”等同起来。由于现在的学生们无法通过学习历史来汲取一些教训，因此不愿意记忆那些重要的名字与日期。然而，如果他们的历史老师的话没错，学生们才不会在乎美国内战是哪一年爆发的。它爆发于 1861 年、1851 年或 1751 年，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时间是混乱的，像内战这样的事件可能永远不再发生，将来也不会重复。如果时间呈直线发展，整个 19 世纪的重要性与一个废弃的导弹助推器就没有什么两样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相关性将逐步消隐。

今天的美国人害怕直线时间论（又称美国梦）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许多人欢迎有人就历史发展模式与节奏提供某些新启迪，但是今天知识界中的精英们几乎没能提出任何有用的东西。陷入杂乱无序时间论的熵与直线时间论的妄自尊大包围之中的美国人

已经失去了精神寄托。

的确有一种选择。但是要抓住它，美国人必须重新审视古代循环理论中的某些精髓之处。

这样做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我们仍将保留对进步满怀信心的直觉以及我们对随意性的怀疑。同时我们会恢复长久以来遭受压抑的某种观点及其他观点无法提供的真知灼见。

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对历史的重复性缺乏一定的了解，那么任何有关过去的讨论都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否认类似的事情曾经发生过而且还有可能发生，谈论一座城市的建立（或者衰落），一场战争的胜利（或者失败），一代人的崛起（或者消失）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通过重复，时间才揭示了那些界定我们为何人的永久性神话。当亚里士多德因为历史只告诉我们“阿尔西比德斯做过什么或者他经历了些什么”而说诗歌优于历史时，他头脑中的历史只是事件的集合。历史要受到人们的重视，需要做许多事情。它必须通过时间将人们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没有时序的”自然连接起来。

我们必须记清，时间从其物理的本质来说无非是对循环本身的测量。无论我们使用的钟摆、行星的轨道还是激光束的频率，我们在定义时间时都要假定一个循环事件的规律性。从词源上来看，“时间”（time）一词源于“潮汐”（tide）——古人指月球的循环周期，这种含义在诸如“圣诞季节”（yuletide）与“好消息”（good tidings）这些词语中仍有保留。同样，“时期”（period）一词的原意为“轨道”，如“行星轨道”。“每年的”（annual）一词源于 annus，古时意指“圆圈”。“年”（year）与“小时”（hour）两个词源于希腊语 horos，意为“太阳轨道”。“月份”（month）一词是从“月亮”（moon）演变而来。没有循环，时间几乎无法描

述。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人力图消除自然界与社会发展中的循环周期的种种努力带来的经常只是表面的胜利。有时，我们所做的只是用一种循环替换另一种循环。比如，当我们在江河上修筑大坝，或者从事工业化，我们也许消除了洪灾或战争的循环；然而，我们也许只能降低这种循环发生的频率，但这却使之到来时更具破坏性。“进步”的结果常常是促成另一种全新的循环的发生。好好考虑一下下面这些周期吧：商业周期、财政周期、选举周期、时尚周期、舆论周期、犯罪周期、交通周期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线时间论削弱了我们天生借助不断微调获得自我平衡的能力，创造并深化了各种社会周期。相反，重新调整会以跳跃的形式——即以更加强大的循环运动发生。百年周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传统社会中相对弱小，但在信奉直线时间论的现代社会，这种周期演变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大。

最不相信循环的美国现在已经陷入有史以来最不详的循环之中。许多美国人也许喜欢认为他们的国家不会受到自然的影响，或者认为他们的历史充满了好运，诸如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或者一场差一点输掉的战争、一种不可思议的发明或者一名枪法很准的刺杀致命的一枪等。然而许多被认为是外界因素的东西都与周期性变化有联系。即使的确发生了无序的事件，我们也会联想到某些无法消除的循环节奏。小阿瑟·史来辛格在为美国历史循环观所作的那场精彩的辩护词中写道：

> 一种真正的循环……具有再生能力。除大灾难外，无法用外部事件来确定它。战争、萧条、通货膨胀可以让人情绪高涨，或者变得忧心忡忡，但是周期本身会无声无息地、独立地、自动地继续下去……这种周期的独立性深深扎根于人

类的自然生活之中。在有机界中有一种循环——如潮汐、季节、日夜、人心脏的收缩与扩张。

在当今众多历史学家之中，史来辛格是敢于向正统直线历史论发出挑战的少数人中的先驱。因此，他将自己汇入一个有众多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与诗人的漫长而丰富的传统中去。这些人在国家事务与战争中目睹过种种有节奏的现象，这些现象与史来辛格在“人类的自然生活”中所观察到的非常相似。

这些节奏是什么？在传统社会中，它们可以以多种形式与周期性出现。在现代社会中，有两种特殊而相互关联的节奏占据显要地位。其中一种相当于一个长寿者的寿命。伊特鲁里亚[①]人将它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来庆祝，而罗马人则首次将它命名为“百年”(saeculum)。今天，人们开始随意称之为“世纪”(century)。在现代，亲眼目睹过阿诺德·汤因比所谓的历史“长周期”的人大都不会背离百年周期的核心逻辑：人类活动的周期大约相当于一个长寿者的寿命（或者像康德拉提夫波这样相当于一半人生的半周期)。

另一种节奏由人生四个阶段组成，每个阶段大约持续20年左右。有史以来，几乎所有文明社会都知道古代希腊人所谓的genos与我们现代人所称的“世代”是一种受人尊重的力量，也都有自己的称谓。从闪族人、迈锡尼人到玛雅人，古代社会描述时代变迁的方法除此以外微乎其微。在希伯来语圣经中，采用的是“新一代人……不知道上帝之道”。上帝定期重演以叛教、惩罚、忏悔与新生为主题的人类永恒戏剧。千百年来，那些思考过周期性变化的根本原因或动力的人们——从柏拉图、波利比奥斯

① 伊特鲁里亚，意大利中西部古国。

到汤因比和史来辛格——大都指向了世代这一因子。

百年周期给历史以内在的时间节奏。世代与其四个重复出现的原型创造了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并使之成为一种永恒的特性。同样，它们也阐释了这些周期发生的方式与原因。

循环与原型

在中世纪，旅游者描述了法国中部一些不识字的村民中有一种奇特的风俗。每当举行比较隆重的活动时，如诸侯婚庆或商定封建徭役数额，年长者会打小孩的耳光，以便让他终生记住这一天及这件事。

在当今世界，人们加强儿童记忆时仍采取一种影响其视觉与听觉器官的方式。在大型国家仪式上，要燃放礼炮、爆竹，喷气飞机轰鸣而过，可谓震耳欲聋。小时候玩的录放机同样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同那些中世纪的法国农民一样，现代美国人同样对在他们生命的不同阶段所发生的事情怀有各种感触很深的联想。我们在纪念某些公共活动（珍珠港事件，肯尼迪总统与马丁·路德·金的被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时，通常要回忆当时我们正在干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会意识到上述事件将以各种形式影响我们的一生。

这些重大事件究竟如何影响了我们？这一问题与事件发生时我们的年龄有很大关系。当你回忆个人经历中那些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时，记得最清楚的事件往往充满了那个阶段特有的感情色彩。早期的事件带有儿童的梦想与天真，揭示了那些事件（与老人）以何种方式塑造了你的个性。后期的事件则带有成熟后的顾虑，表明你是如何影响那些事件（与年轻人）的。步入老年后，你将记住所有那些意义重大的事件。也许你们这一代人将为这些

事件树立丰碑（如今天的老年人正在华盛顿特区修建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二战纪念碑），希望后人在学龄前就能（作为传说）记住你们那个时代的生活。正是通过这种各转折期与世代共有的生老病死和共同经历，历史与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类历史是由一个个由生到死的生命组成的。任何人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整个人类文明无非是这些生命的集合。在人类已知的各种周期中，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人类的生命周期。其他任何社会力量——阶级、民族、文化与技术——都不像人类编年史这样带有鲜明的可预知性。一个能动的、有限的生命周期只是人类文明中许多主要常数中的一个：在摩西时代，这一周期的长度为 80 到 100 年，现在依然如此，尽管达到这一限度的人数越来越多。从生理与社会的角度来看，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童年、青年、中年与老年。各阶段的时间长度都相同，都与一个世代相对应。而且每个阶段都与某一具体的社会角色相连，而这一角色决定了扮演者的世界观，而其行动则取决于该世界观。

所以，所谓世代就是指大约在某一阶段出生、拥有共同历史定位与集体人格面具的所有人的总和。如同一个人（不同于一个种族、宗教或者性别），一个世代也有生有死：其成员明白他们最终都将死去。因此，一个世代拥有与个人在其生活中体验到的相同的历史紧迫感。这种人生代代的老化与死亡组成了一种动力，使一个社会不断补充其记忆内容并获得发展。每当年青一代在各生命阶段取代老一代时，这种复合式生命周期将变为一种全新的事物，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与行为。

历史创造了一代又一代人，而人生代代也创造了历史。这种存在于生命与时间之间的共生现象说明了如果甲是周期性的，乙必然也是周期性的原因。美国人总是把握不住历史发展的周期

性。美国人关于国家发展方向的预测经常被证明是错误，原因就在于此。

在本世纪50年代末期，许多预言家预测未来的美国将像迪斯尼乐园中的理想王国那样美好。专家们认为，到那时，年轻人彬彬有礼，文化健康向上，意识形态已经消失，种族主义与贫穷将被逐步克服，经济稳步发展，社会治安良好，美国将在海外进行国际警察活动。当然所有这些预言都是大错特错的。这些专家们不仅没有预测到不久之后发生的某些具体事件——新年攻势(越南战争)、阿波罗2号登月、水门事件、地球日与查帕奎迪克岛事件等，而且也没有触摸到那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精神。

他们的预言为什么这样不准确？当预言家假定可以根据新近的情况推知未来时，他们认为下一代的行为会与他们那一时代的人们的行为完全相似。这些专家没有认识到美国人的世代结构将发生一些历史性的改变：如同河流最后一定要汇入大海一样，每代人都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老。在随后的20年中，老年领导人会按期离去，一批年轻人将如期到来，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几代人将改变他们即将进入的人生阶段。

这种动力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已经多次重复出现。大约每隔20年（时间相当于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涌现一个由几代新人组成的星座——在年龄的阶梯上出现的一个新的世代角色层。随着这一星座的移动，国家的精神也将发生变化。让我们观察一下从本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随着世代更替所发生的事情：

·那些属于“迷惘一代”、做事谨慎的个人主义者（出生在1883—1900年之间）老年时被骄傲的“美国大兵：一代”（出生在1901—1924年之间）所取代。在后者的推动下，美国进入一个以物质丰富、超级大国与社会规划为标志的大发展时代。

·乐观的美国大兵在中年时为其助手“沉默的一代”（出生在1925—1942年之间）所取代。后者利用他们的知识与敏感性对国家机构与秩序进行微调，同时监控青年人的激情。

·保守的沉默一代在青年时被自恋的“膨胀一代”（出生在1943—1960年之间）所取代。后者极力鼓吹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向政府机构所宣称的空洞的道德发出挑战。

·自我陶醉的“膨胀一代”在儿童时代被为人忽略的“第13代”（出生在1961—1981年之间）所取代。后者的童年是在文化大动荡时期与成年人忙于发现自我的时代度过的，没有得到家人与社会的足够爱护。在通俗文化中，他们被称为“X一代”，这一名字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第13代人自称为美国人。

如果从世代老化这一角度来观察，从本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之间的情绪变化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可以预测：美国当时正从第一次转折进入第二次。用林顿·约翰逊与尼克松取代年老的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由诺尔曼·里尔与格劳里亚·斯太纳姆取代中年的艾德·沙利文与安·兰德斯。由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嬉皮士取代思想保守、墨守成规的年轻人。由塔图姆·奥尼尔取代杰里·马特斯。美国生活周期发生的这场彻底的变化充分告诉了我们美国从一种团结一致、狂妄自大与乐观向上的情绪转变为充满骚动、争辩与激情的情绪原因与过程。

最近这20年的情况如何？在本世纪70年末，美国人就90年代末的情况提出了许多预言，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条预言认为：60年代的各种潮流将沿着一条直线持续下去。这引发了一系列预言：政府加速规划，继续反对社会保守思想，“上帝死了”的思想更加深入，家庭生活非法化，在“后物质时代”，金钱与武器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人们的重视，经济的快速增长要么给人类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休闲时间，要么使地球陷入巨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当然，上述预言都没能实现。然而，沉浸于这种胜利情绪之中的70年代末期的预言家几乎全都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无论他们的观点充满了幻想还是启示，都假定美国正在急急忙忙向某个目标前进。没有人能想像到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从80年代到90年代，尽管各种社会组织在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美国的走向却一直不很清楚。

和以前一样，这些预言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他们未能看到生命的循环轨道，没有意识到各个世代正在准备进入新的人生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在不同阶段的思维与举止都会不同。在老年时期，充满自信的美国大兵一代．势必要被犹豫不决、喜欢一种复杂、多样化、个性化社会秩序的沉默一代所取代。在中年时期，较为随和的沉默一代随时都会让位于更具批判意识的膨胀一代，后者会推行一种对立的道德信仰。在青少年时期，充满激情的膨胀一代势必为更追求实际的第13代所替代，后者的生存思想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在童年时期，在人们重新重视对儿童的关心的大环境中，受到冷落的第13代行将被倍受爱护的千年一代所取代。随着生命周期的变化，民族情绪也将不断更新。70年代的专家们本来能够预测到这种情绪的变化。预测方法是通过观察以前世代星座相同的觉醒时代探索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今天的情况怎样呢？预言家仍在犯同样的错误。许多畅销书预测了2000年以后美国的情况：充满了冷酷的个人主义，社会分裂，政府职能受到削弱。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多样化，但缺乏凝聚力，就像一盘散沙；其公民生活在一个全球联系更加密切、人际交往日见稀疏、网址不断增加、文化分崩离析的高科技世界中。我们听到过许多这样的言论：老年生活将有所改善，而儿童

生活将继续恶化，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现在的孩子长大后犯罪率将大增。

不要为这种事情打赌。历史的发展节奏表明这种趋势在下个世纪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通过研究世代星座类似的“解体时代”，思考一下未来，可以把握将来的社会发展走势。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将今天的几代人与贯穿于历史上所有百年周期、按一定顺序反复出现的四个世代原型联系在一起。这四种原型在每代人出生时所处的转折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 **预言家一代出生在高涨时期。**
- **游牧者一代出生在觉醒时期。**
- **英雄一代出生在解体时期。**
- **艺术家一代出生在危机时期。**

每种原型代表了一种人类的永久气质与人生周期神话。当历史将这些原型与四个转折期交叉时，就会出现四种世代星座。之所以每隔20年左右就出现一次新转折，之所以历史要按照如此多的钟摆节奏向前滚动前进，原因正在于此。例如，一次转折可能使儿童受到冷落，而另一次转折则会让他们成为父母的宠儿。人们对政治、富裕、战争、宗教、家庭、性别角色、多元化及其他各种趋势的态度也存在这种周期性变化。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英美历史已经走过六个百年周期，每个周期都显示出一种类似的节奏，每个周期都有四次转折，而且（除反常的美国内战之外）每个周期都会产生四种世代原型。我们目前处于跨2000年的百年周期中的第三次转折，即现代历史上的第七个周期。

透过这种百年棱镜观看历史，可以弄清美国社会情绪的变化

为什么和人一生情绪的变化相似这一问题。让我们回想一下遥远的过去，思考人生各阶段的角色是如何每隔 20 年左右彻底变化一次的。这些变化每次都遵循一种原型模式。思考一下过去 10 年中发生的世代交替，就会再一次证明直线论预言家的观点有多么荒唐。

随着沉默一代逐步临近退休年龄，国家领导者不愿意让公众机构继续干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而是想让它们更具灵活性、公正性、专业性与参与性，分工更加细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老年艺术家正在取代老年英雄。

随着膨胀一代成员逐步达到 50 岁，大众话语已经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文雅、温和，而是变得更加慷慨激昂，更富说教性。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年预言家正在逐步取代中年艺术家。

第 13 代长到 20 多岁后，通俗文化对灵魂、自由做爱与天人合一的关注少了，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金钱、性病与在炎凉世态中独来独往之上。这是为什么？因为青年游牧者正在逐步取代青年预言家。

当大量的千年一代儿童开始上中小学时，美国的家庭又返回了宠爱孩子这一方向。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抚养的是儿童英雄，而非儿童游牧者。

在综合研究跨越整整一个人生周期的四次原型转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本世纪 70 年代左右的那个世代星座在 90 年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美国的民族情绪之所以从“觉醒”转变为“解体”，原因正在于此。当你将这种世俗的逻辑应用于下个世纪前十年及以后的时期，就会逐步注意到第四次转折正在走近，美国的国家精神在危机到来时将发生某些变化。

重新发现周期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这样说过："你向后看得越远，就有可能向前看得越远。"问题是不要沿着直线观看未来，而应该看到一些无法回避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观察在历史上人们是如克服困难，转危为安的。

我们大多数人是在中小学开始学习历史的，但老师和教材很少从周期性的角度来谈论历史事件。回想一下贴在教室墙壁上的美国总统画像：老师有没有让你把这些总统年青时的社会精神与事件同他们执政时的社会精神与事件联系在一起呢？回想一下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现代西方社会在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阿波罗2号登月成功长达5个世纪中崛起的枯燥冗长的叙述：老师是否告诉过你在这5个世纪中，除社会经济突飞猛进之外，也曾发生过一些挫折？回忆一下那些讲述美国革命、内战、大萧条与二次大战的章节：老师有没有向你详细讲述上述危机爆发10年前（即18世纪60年代、19世纪50年代与本世纪20年代）的情况？你以前有没有研究过其他百年周期中第三次转折时期的公众情绪？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有何预感？你或许没有做这些。

如果你以前是按照通常的直线理论学习历史的，你也许觉得历史非常空洞。或许你曾试图与过去和未来建立一种更具个性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你可以把个人生活体验释放到宏大的戏剧场面之中。或许你曾经渴望与祖先在创建文明的过程中总结的智慧形成一种密切的联系。也许你曾经渴望获得一种美国人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感受：积极把自己融入一种明确而似是而非的命运之中。

你即将踏上现代历史的一段新旅程。启程之前，有许多东西

要学，也有许多东西需要忘记。

你应该忘记认为美国（或者整个现代世界）不会受到自然界周期循环影响的直线论信仰。随着你对百年周期的逐步熟悉，你将遭遇一种迥然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源自古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变革的节奏可以在生物与季节变化的节奏中得到反映。古人在探求其奥义时，将这些事件诠释为神话，而将其中出现的英雄解释为原型，他们是一部反复重演的戏剧中的演员；在这一戏剧上演过程中，新的公民秩序被创造出来并得以完善与发展，然后是衰退与灭亡，但最后还要复生。古人认为，这种循环在历史发展中按照相同的节奏不断重复，没有终结。时间可以带来螺旋式的进步，同样可以导致螺旋式的后退，这与自然界的发展进程极为相似。

应努力忘记根据直线理论用单一进步标准判断变革的做法。自然是古人宇宙观的核心，他们在对某些事情的了解方面要胜过我们现代人。他们懂得自然的变迁既不稳定，也不是随意的。他们知道自然既不为进步提供保障，也不抛弃进步。他们知道某一特定循环内的波动情况要比整个循环中的不同点鲜明得多。他们明白：一年中的（或者一个百年周期的）冬季与此前的秋季相比，更像上个循环周期的冬季。他们清楚第四次转折是人生周期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要抛弃贯穿于所有现代社会直线论中对死亡的极度恐惧感（以及急切寻找逃避死亡的做法）。古人知道，没有周期性的腐败与死亡，自然界就无法完成由生物进化与社会变革构成的发展周期。没有植物的枯死，野草将会把森林覆盖。没有人的死亡，记忆将永远不会消失，而没有中断的风俗习惯，文明将会窒息而死。社会制度同样需要这种生死交替。正如洪水补充了土壤，野火使森林复生，第四次转折也会剔除社会中那些已完成历史使命

的因素，为新生事物创造机会。

最后，要忘却那种认为积极性变革会不请自来，而且次数不断增加，必须经过人的设计的直线理论观。许多美国人本能地感觉到，只有经历一场痛苦的大变革，“解体”时期的当代美国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如下因素：从华尔街到国会，从摇滚抒情诗到职业体育等。这种本能是正确的。第四次转折为各年龄段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治愈（或毁掉）合众国的心脏。

忘记所有这些东西之后，你才能从周期性的角度重新学习历史。

本书将历史变为预言。它将带你在社会历史与人类生活的汇流中畅游。在第一部分（“周期”），你将获得认识自我、家庭、社会与文明的新方法。你将学到有关生命循环、世代原形、转折与历史的知识。在第二部分（“转折”），你将从转折与原型的角度重新回顾二战以来的美国历史。你将对当前这个跨世纪的百年周期的前三次转折的发展情况有新的深入的了解。你会明白这一百年旅程为什么在第四次转折时达到高潮以及这次转折到来时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在第三部分（“未雨绸缪”），你将探索一下你和你所在的国家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能够做些什么。在现在这种以个人至上与大众绝望为核心的“解体时代”情绪下，似乎根本不可能改变历史进程。但是，通过学习与应用周期性原则，你将学会如何驾驭自己的命运。在当前这个百年周期的秋季，为确保行将到来的春天能够为我们迎来一个光荣的时代，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采取许多措施。

只有在预测百年周期的冬季时，才能真正体会到研究历史的乐趣。在第四次转折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个人的与大众的选

择，这与我们祖先经历过的种种残酷的选择非常相似。通过时间循环这一棱镜我们可以学习祖先的经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它要求我们从周期性角度对我们崇敬的美国梦做新的阐释；要求我们承认自己对直线历史进步观的信仰无非是一种浮士德式的讨价还价，而对象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浮士德总是首先提高赌注，每个赌注都是双重的，否则一无所有。在第三次转折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成功地推迟了结算日期。但是历史告诫我们不能将之推延到下一个阶段。

正如阿瑟·温格·皮耐罗所讲的那样，“未来无非是过去的重复，只是未来之门与过去之门有所不同而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感觉到下一扇历史之门离他们越来越近。是相信我们的本能、按照周期性原则进行思考、做准备的时候了。预言即为将来做准备！

第二章 时间周期

在前罗马时期，意大利有一个伊特鲁里亚王国，它是世界上最神秘与最具异国情调的文明古国之一。伊特鲁里亚人与其他意大利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能是从吕底亚(今天的土耳其)迁来的。他们的语言类似于古希腊语，但深奥难懂。为了解他们的宗教仪式，现代历史学家只能求助于流传下来的一星半点的传说，以及从坟墓中挖掘出的一些手工制品。根据这些线索，历史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伊特鲁里亚人是一个特别宿命的民族，他们认为时间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命运的演出。据传说，一位老女巫预言，他们的文明将持续 10 个人的生命那么长，然后伊特鲁里亚便从地球上消失。

在女巫做出这一预言前后，大约在公元前 9 世纪，伊特鲁里亚人创造了一种宗教仪式，并用它来获取上述预言的征兆。没有人知道那种仪式在伊特鲁里亚语中叫什么名字。罗马人取而代之之后，将它称为 saeculum。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一个长寿者的一生”，二是“一种天然的世纪”，长度大约为 100 年。从词源上看，该词可能与拉丁语中的 senectus(老年)，sero(种植)，sequor(跟随)或者一些遗失的伊特鲁里亚语词根有关。我们对百年的了解大都是通过罗马 3 世纪的历史学家森索里诺斯记述瓦罗(奥古斯都的图书管理员)的文章中获得的。对当时正在走向没落的罗马来说，伊特鲁里亚已经成为一段遥远的记忆。

森索里诺斯在一篇祝贺朋友生日、论述时间与历史的文章(文章题为《生日论》)中将“自然的百年”描述为“人类生活中一些由生死界定的漫长阶段”,并解释了伊特鲁里亚人的测定方法:

> 尽管真理隐藏于黑暗之中,在任何具有自然百年的的文明中,教科书都在教授伊特鲁里亚人的宗教仪式。这些教科书是这样记述百年的产生过程的:在一座城市或一个文明创建那天出生的人们之中,寿命最长者将在他死去那天完成第一个标准百年;而在他逝世那天活在城市里的人中,寿命最长者将完成第二个百年。

尽管森索里诺斯提供了前6个伊特鲁里亚人的百年(平均为107年),他承认在估算这些数字的过程中一定碰到过许多困难。由谁记录“寿命最长的人”?兴建于不同时期的伊特鲁里亚城镇是如何就计算体系达成一致的?森索里诺斯认为,伊特鲁里亚的牧师通过记录天空中的慧星与“奇怪的闪电”来确定周期的开始与结束。有关伊特鲁里亚人的情况,只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认,即他们认为人的天然寿命构成了人的历史与命运的核心。

如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人一样,伊特鲁里亚人早就对太阳与春夏秋冬四季的周期有所觉察。在预言与迷信的深刻影响下,他们相信伊特鲁里亚的历史也要经历一种类似的周期——生长、成熟、熵与死亡。在这两种周期中,一个长度为一年,另一个则长得令人难以相信。或许伊特鲁里亚人觉得他们需要一个适中的时间单位,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自然周期。如果是这样的话,伊特鲁里亚人做出了明确选择:人生,因为其过程与四季极为相似。

这种百年记时法还有一种帮助记忆的功能。据说,伊特鲁里亚人是一种特别注重感情的民族,与理性相比他们更倾向于个人

感情,对青年人的勃勃生机与老年人的智慧特别敏感,而且(如同劳伦斯所说的那样)对人的生理特征特别痴迷。对他们来说,如果亲身经历过某一段历史的人还健在,历史的意义将非同一般。一个能够回忆已发生事件的人去世后,伊特鲁里亚人会继续用新发生的事件去更新自己的记忆。这时一种由里及外而非由外及里(如宫廷史官的记录)的历史记录法,因为人们都真正经历过一段特定的历史,记忆特别深刻。

后来的历史证明,伊特鲁里亚人的千年预言非常正确:在奥古斯都执政期间,罗马帝国兴旺发达,最终彻底吞没了伊特鲁里亚文化。根据伊特鲁里亚人的日历,那一年恰好是他们创建第 1000 年。

罗马人也有自己的神话预言。当罗慕路斯建立罗马之后,人们说他看到了 12 只秃鹰,认为罗马将存在 12 个时间单位。后来,早期的罗马人(向伊特鲁里亚人学习时间计算术的罗马人)认定秃鹰现象一定是指 12 个百年。这种假设在一位老女巫献给罗马最后一位国王塔奎尼(他本人就是伊特鲁里亚人)的一套预言书中得到了确认。此后,这些书籍被存放在朱庇特神庙中,由专人严加看管,只有在发生危机或遇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时才拿出来参考一下。

随着罗马城邦国家的繁荣与领土的不断扩张,罗马人深信:周期性出现的百年可以测量他们的命运。在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 509 年建立后不久,罗马就形成了百年运动会的传统。这种为时三天三夜的百年运动会兼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宏大规模与美国百年国庆时举行的公民仪式。这种大规模的活动大约每个世纪举行一次。在确定举办时间时,主办者力图使大多数罗马人有机会亲眼见识一下这种运动会。到公元前 2 世纪,罗马的第一批历史学家开始经常用百年(或者百年运动会)为他们的编年史划分时期,在描述大规模战争与新法律时更是如此。

当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之时，人们对结束长期以来的政治动乱普遍持乐观态度。这种情绪在维吉尔的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他希望一个日见衰老的罗马可能“重现青春”，迎来另一个“金色年代”。在奥古斯都之后，帝王们通常宣称自己的上台预示一种新时代的开始，那个日见走向颓废与灭亡的大帝国将恢复活力。在共和国的后期，作家们明确称其所在时代为第8个百年。一个世纪之后，经过一轮内战之后，卢肯与朱文纳尔认定自己生活在第9个百年。

罗马人为什么对百年如此痴迷？这并非只是一个将100年作为一种方便完整的数字的奇怪方式。森索里诺斯本人提出并最终取消了认为罗马人总是把世间的百年(一种严格表示100年的时间单位)与天然的百年(由人生、历史与帝国的命运组成)区分开来的可能性。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罗马人对一种似乎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周期长度在80到100年之间的鲜明节奏印象极为深刻。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这种节奏大都出现在发生巨大危险之时及随后的更新与改革年代(努力创立共和国，与高卢进行的生死之战，灾难性的萨谟奈大战，汉尼拔军队的大举进犯，格拉古改革与奴隶暴乱)。在帝国时代，这种百年模式一般出现在恐怖的内乱或野蛮的入侵(奥古斯都建立元首统治，公元前2世纪图拉真与安东尼统治时的恢复期，公元前三世纪在塞弗里【Severii】统治时的恢复期，还有后来在戴克里先与康斯坦丁在位时的恢复期)之后。

然而，即使是永久的城市也将遭受一场无法避免的危机。在历史上有许多奇怪的巧合。在其中一次巧合中，秃鹰的预言被证明比伊特鲁里亚人的预言还要精确：罗马于公元410年落入西格特人之手。这恰好发生在在罗马帝国建立1200周年纪念的37年之前，也就是说罗慕路斯看到的那12只秃鹰每只相当于97年。当欧洲陷入黑暗时代后，圣奥古斯丁用他的上帝之城来攻击不断

重复、毫无意义的人类帝国之城。虽然伊特鲁里亚人与罗马人从历史上消失了,但百年周期依然存在。一千年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的推动下,它又得以重见天日。这些哲人重新发现了时间循环论的精髓。后来,现代人借助大约每隔 100 年重复发生一次的重大战争与权力新均衡这一形式,对百年周期的游戏规范适时进行重新界定。

尽管伊特鲁里亚人因为采用人的寿命的长度作为主要时间单位而在古代世界各民族中独树一帜,但其他许多古代文化也就社会发展的周期性特点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也像伊特鲁里亚人一样发现了相同的自然因素,同样也注意到大海、天宇以及动物都存在某些伟大的周期性循环。他们是依靠本能而非科学手段得出这些结论的。即便如此,这些信仰还是成为某些生命力强大的神话与流传至今的宗教的主要内容。古人的循环观总是与百年周期相连,尽管他们有时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无论百年周期在古代世界有何影响,它必将在现代世界中变得更加活跃。因为在现代世界中,它隐含着一种历史周期性循环。

时间之轮

每年 12 月下旬,许多美国人都会在门前摆放一些人工编织的常青藤环。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年终花环是一种圣诞饰物。实际上,这种仪式源于一种邪教,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的农神节及其他古代民族用来避寒的图腾。让我们思考一下这种自然的象征系统:圆形的花环象征着永恒与不间断;而常青藤则象征着通过冬季的死亡与黑暗,光明与生命得以存续;将其置于家门旁则象征人丁兴旺;这一仪式在冬至之后举行,表明严寒的冬季必然向温暖而充满希望的春天投降。另一项年终仪式——新年前夜晚会——则不

仅类似罗马时代的神农节，而且也与巴比伦人的 zagmuck、波斯人的 sacaea 以及其他每年一度的狂欢性节日相似。

在新年之后的一些节日也大多源于具有宗教仪式含义的古代年节。按照古人的习惯，春天的节日庆祝新鲜、肥沃与创造；仲夏的篝火节是拜祭先祖、驱鬼避邪的仪式；秋季的仪式用来庆祝丰收，感谢大地之恩；冬季的庆祝活动则标志着从死亡到复生之间的某些伟大的中断时刻。古人并不惧怕自然季节（或历史）的变迁，但惧怕这种变迁的终止，因为那将使世界陷入永久的冷酷或炽热（无政府主义或专制主义）状态。

这种具有宗教仪式含义的年节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之中，尤其是在辞旧迎新之际的“冬季分割期”。年幼的耶稣象征着心灵的希望，而新年诞生的婴儿则象征着世界的希望。在两个节日之间的一个星期时间里，许多现代美国人感到不知所措，就像古人在冬至到来后的那种感觉。现在同过去一样，分割期正在进行之中。在季节仪式的驱使下，年份又恢复了其环形旅程。举行这些冬至仪式的本来目的主要是推动季节继续向前，协助自然完成古代文化所谓的时间之轮（年轮），而非庆祝季节的到来。

这种四位一体的年度季节周期是古人举行仪式以示庆祝的众多时间之轮之一。时间跨度最短的由太阳与月亮控制，沿着自己的模式重复着由阴晴圆缺组成的周期。长度适中的有生命周期——动物与人，牧师与国王，王朝与文明——每种都有一个有序的生长与衰退结构。最长的周期是一些有关宇宙产生与毁灭的抽象时间，如希伯来语中的 yom（1000 年），玛雅语中的 pictun（8000 年），佛教中不可思议的 kalpa（43.2 亿年）。在古巴比伦、印度与古希腊社会中，长达 1.2 万年的“大年”或者 yuga 非常流行，因为这大体与现代天文学中的黄道岁差相一致。

无论东西方，无论短暂如一个小时或者长达一个 kalpa，无论

是真实时间、永久时间或神圣时间的测量单位，古代具有宗教仪式含义的周期几乎总是表现出相同的特征：

·每个循环都由一个圆表示，象征着这种重复性是完整而不可间断的。

几乎所有原始或古代社会都认为神圣的时间轨道是圆形的。在古印度，印度教与耆那教将之描述为 yantra（圆）或者 chakra（盘），佛教称之为 mandala（法律或生命之轮）。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所有变化都潜藏于稳定之中的原则——太极——也是用圆来表示的。同样，古希腊语中的 kyklos 有两层含义："周期"与"圆"。在雅典的雅典娜神殿中刻着这样一句箴言："人间万事皆为圆"——这种思想可以在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尔库斯·奥里列斯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家那里得到反映。古巴比伦与古埃及提出了黄道大年这一概念，而这又启发了后来许多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作家笔下的时间与命运之轮的思想。在欧洲，凯尔特文化中的神马格·鲁斯（轮子男巫）控制着时间的运行，而日尔曼部落把时间比喻为一个耳环，强调了时间的限制与束缚的能力。玛雅人的日历是环形的，而生活在北美平原上的土著人将年份称为神圣的铁环。

两个环形时间的象征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是环形蛇，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它是邪恶的象征，但许多古代社会却认为它是一种良性的黑暗而神秘的自然力量。据说这种蛇长生不老，通过周期性的脱皮获得复生，就像时间通过年份实现新旧更替一样。另一个是传统的圆圈舞——欧洲的卡勒尔舞、印度旁遮普地区的汉格拉舞，南美的圭克舞，巴尔干地区的科洛舞。人们用这种舞蹈来庆祝自然界或人生中新季节的到来。人生之环犹如结婚戒指，象征着时间的不可间断性。

·每个循环划分为几个阶段——有时是两个，但绝大多数是四个。

当古人思考时间的环形轨迹时，他们对极端总是由其对立面来界定而其平衡性与必然性也是由对立面决定的现象印象很深。白昼过去后，光明与黑暗进行交替。一年过去后，温暖干燥和寒冷潮湿实现了交替。百年（或其对等物）过去后，和平与战争实现了交替。古代中国人将这种相互间的关系称为阴（被动性）阳（积极性）。古希腊称之为 philia（爱与和谐）与 neikos（争斗与分离）的动态颤动。耆那教相信时间之轮在 utsarpini（上升运动）与 avasarpini（下降运动）之间摆动，按照字面的意思是在"上蛇"与"下蛇"之间摆动。古人相信，每个周期中的一个极端反映了另一个极端的希望与恐惧，可以加快对立面的产生。黑夜向往白昼，白昼则向往黑夜。在战争时期，人们渴望结束战乱，走向和平。在和平时期，人们渴望保护自己喜欢的东西，进而引发战争。

与时间两段论并存，更受古人青睐的当数时间四段论。古代的某些宗教将四这个数字神化：印度教中神圣的曼荼罗就被分为四个阶段；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四位一体奉为神。古人描述整个宇宙时，通常用四分法，如方向，颜色，元素，体液、风、行星，甚至认为原始时代的河流、树木、城市与山脉也可以四分。时间的四分法同样很普遍。一般情况下，最主要的四分法当数一年四季：即春夏秋冬。古人也将这种四分法用于日夜（如罗马人的四个 vigilia）、月份（月亮的四个阶段：阴晴圆缺）与人（人生的四个阶段）。

古人思考普遍存在的时间时，总是想到四位一体。印度教徒与佛教徒将瑜珈分为四个德行日见败坏的阶段。波斯人将地球上的 12000 年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为 3000 年。古巴比伦人与古

希腊人所谓的“大年”同样分为四个“季节”。古希腊神话讲述了四个时代，分别与四种金属相对应（金银铜铁），这种思想在希伯来预言家丹尼尔的“人生四个阶段”与基督教《圣经》启示录中也有所反映。时间四分法在美洲土著人（从玛雅人到达科他人）中也非常盛行。

如同时间的阴阳二分法一样，四分法也是在对立的极端（春秋、冬夏）之间相互更替的。但是在冬至或夏至之际，这种四分的时间之轮也包括过渡阶段的春分与秋分。这些发展变化的时期为有机物的生长与衰落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象征意义。时间的循环不仅从寒冷转到温暖，也要从生长转到成熟、腐败与死亡。

这样，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特性，为人生或帝国的春季或秋季增添一层含义。据说，中国主要有四种房屋建筑，分别与季节、元素、情感、地理方向及颜色相应。据汉朝历史学家董仲舒记载，统治者根据季节进行赏罚。“统治者的喜怒哀乐与上天的春夏秋冬相对应……；当上天按照季节顺序分别将这四种特征呈现出来时，就会获得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否则就会遇到一个坏年景。”董仲舒作品的译者总结说：“总之，宽恕与仁慈应在春夏两季出现，以加快生长的速度；惩罚、严厉、严格执法应在秋冬季节进行，以配合自然界的紧缩过程。”

·每个时间循环都有一个伟大的间断时刻。

古代人认为，新一轮时间循环并非逐步从上一循环中产生出来，而是始于一种循环经历一个突然中断之后。在月份循环中，这种中断发生在三个黑夜；在年份循环中，则发生于冬季的自然死亡期；在社会循环中，发生于父辈的死亡或者村庄的毁灭，或者广而言之，发生于国王驾崩或朝代结束之后。在古希腊人的大年循环

中,这种中断被称为 ekpyrosis,意指世间万物,甚至包括人的心灵,都将付之一炬。经过这种洗礼后,自然界与历史又踏上了新的旅程。

为迎接新的时间循环的到来,一些古代文化制定了许多内容复杂的宗教仪式,这与神话中的诸神、英雄与预言家在历史初始阶段所做的一切非常相似。在世界各地,有关时间流逝的仪式分为三个步骤。首先,kenosis(清除)仪式——斋戒、献祭或找一个替罪羊——将上一个循环的所有罪恶清洗干净,这样才能迎接新的循环的到来。在新年庆祝活动中,古人假定一个原始的神或国王已经死去,因而必须在每个新循环开始前进行祭祀活动。第二步是一个混乱阶段,期间旧循环已经死去,而新循环尚未诞生。在这个阶段,所有的规则都可以打破:死者可以重生,诅咒他人不受惩罚,社会秩序被颠倒,就像愚人节第十二夜举行宴会一样混乱不堪。第三步需要 plurosis(填补)仪式——宴会、庆祝与婚礼——把新循环推向一个欢乐与创新的开端。在现代基督教世界中,每年都要举行具有返祖特征的以清除与填充为主要内容的间断性仪式:这些活动包括圣诞节、新年、狂欢节与大斋节。

·每个循环都要求在创新时刻重新开始。

一个月结束之后,我们又会回到第一天。一年结束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一月份。难道没有一个我们可以返回第一年的时间周期吗? 古人认为有。每当出现英雄或预言,所有的时间单位经常被推回到起始位置。他们的日历一般只表明某国王的统治时间及一代人或朝代的年限。大多数现代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与直线时间论关系密切,不欢迎主张周期性循环的思想。但是现代的变革运动偶尔也会试图让时间在某一点重新开始(使之得到

净化)。1792年9月22日,新组建的法国议会宣布了那一年为"共和元年",并推行一种只使用了13年的全新的历法。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领导人将教堂钟楼上的时针击落,表达了他们从旧世代获得解放的幸福心情。在本世纪,本尼托·墨索里尼曾下令宣称1922年为其法西斯王国的元年(用罗马数字表示)。

在大众话语中,美国人经常把特别值得回忆的时代与无足轻重的时代区分开来。我们将本世纪的上半个世纪称为"战后"时代——这一阶段以现在依然健在的一代人的勇敢事迹为开端。在美国整个民族的记忆中,似乎此前的历史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了。

·假定每个循环都会按照相同的顺序在相同的期限内重复自己。

时代重复自己——上天的时代重复非常精确,而人间的时代重复率大体接近。在古希腊语中,periodos的意思是"转圈、圆圈"。几乎所有非西方文化都接受时间周期性这一观念。在西方——从斯多葛学派到伊比鸠鲁学派,从利比奥斯到伊本·哈拉顿,从马基亚维里到维柯,从叶芝到艾略特,从施本格勒到汤因比——时间循环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主题。哲学家科林伍德指出,"历史循环是各种历史思潮的永久性特征。"

许多时间循环的周期性各不相同。每种循环依据本身独有的特点来测量人类活动的小时、日、年或大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几千年来,哪一种循环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人类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标志?

在人的行为受具有仪式含义的时间约束的传统社会中,任何一种循环都与其他循环一样有用。有些活动受制于白昼的规则,另一些则受月份、季节、年份、在位时间、朝代等因素的规则的限

制。当社会受到一种不正常因素的干涉(比如,日食或皇帝不合时宜的去世)时,人们就会举行净化仪式,把张开的圆圈推回到其天然凹槽中,然后时间将一如既往地旋转下去。然而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循环将会逐步凌驾于其他循环之上:这就是人生的自然循环——即伊特鲁里亚人确定、后被罗马人称为百年周期的那种循环。

为什么百年周期如此特殊?原因之一是,人的天然寿命也许是人类既无法逃避也不能改变的唯一循环。人可以借助于现代科技与全球市场来改变或躲过行星的光、热与降水的节奏。朝代更替这种政治节奏可能会受到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的影响。相形之下,人生这个天然循环及其各个阶段相对稳定。

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现代人经常为躲避时间循环而随意改变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他们的创造力反映了他们的个人人生循环体验。因此,因追求和平而给年青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代人获得领导地位后,将被授权按照上述目标进行社会改革。之后,另一代人也许想反其道而行之,因而产生一个以人的寿命为节奏而跳动的历史。在传统社会中,任何团体都没有这种自由或权力。因此,人生循环的解放使人们发现了百年周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反讽:恰恰在现代社会基本放弃循环时间论而追求直线时间论之时,人的寿命却开始在历史周期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重新发现百年

罗马帝国陷落后,百年周期的思想在西方世界沉寂了大约1000年。尽管中世纪的基督教信条已经模糊地提到直线时间,但是对贵族、市民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奥古斯丁的词典中,百年周期一词已经失去了指一段具体时间的含

义，而是用来指代无边无际的圣经时间，如“永无止境的年代”。用于标识基督教直线时间（耶稣纪元）的那些日期成为僧侣编年史家的专业领域。对其他任何人来说，古代的那些循环仍然存在——如十字架四位一体，光圈的圆圈状以及每年一度的耶稣诞生、死亡与再生的纪念仪式。

这种情况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变化。那时西方社会的精英们开始认为自己是理性的、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演员，可以改变文明的命运。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普通信徒感觉到发生的各种事件是耶稣复生的前兆。在那个千年不遇的大事到来之前，他们要为改革而战，为命运而奋斗，为理想而牺牲，为仁慈而祈祷。随着直线时间观日见强烈，历史也变得更加急迫。就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当哥伦布在大海上航行，达·芬奇在绘画，王国兴建之时——百年周期重新进入西方文化之中。在浪漫传奇用语中，这个单词被庸俗化为一些至今仍在使用的派生词：意大利语为secolo，西班牙语为siglo，法语为siole。所有这些新词仍保留着那个古拉丁语词的双重含义：一是长度为一百年的时期；二是长寿者的一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根据centurio（罗马军队中下属有100名士兵的军官）创造出另一个词：centuria。起先，它指的是100年，但是不久之后它就获得了一种人生循环的内涵。

16世纪是第一个被称为一个世纪的百年时期。1517年，埃拉斯穆斯慨叹道“永恒的上帝，我看到一个伟大的世纪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学者们在寻找一个可以作为一个新世纪开端的标志时，哲学家坎帕内拉在伽俐略的科学发现中找到了答案。在16世纪80年代格里高里历法改革之后，新教历史学家急急忙忙将西方历史划分为世纪。他们感兴趣的是古代（antiquitas）与现代（modernitas）。他们将两者之间的时期称为medii aevi（中世纪），在此期间，历史的发展似乎毫无方向，毫无重要性可言。

在17世纪，尽管日历与历书开始经常提及通俗意义上的世纪，当时的作家提及上述自然世纪时，却认为它们是“西班牙的黄金世纪”或者当时的“路易十四的伟大世纪”。在17世纪末，有些宫廷诗人开始吟咏历史事件的再生，如约翰·德莱顿在1700年作的《世俗面具》（“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这是一件好事。”）。在法国革命前夕，另一个世纪结束的思想引来一股狂热的乐观主义与冷酷的悲观主义情绪。其他人感觉到一种世纪末的意识——完结、有限、耗尽、逃避现实及听天由命——后来学者将之称为世纪末情绪。以文艺复兴为开端，这种情绪开始在欧洲定期出现。在蓬巴杜夫人的预言“我们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被验证后，人们意识到另一个世纪（一个同样处于理性时代的古老政体）的确已经成为历史。

在拿破仑时代之后，人们对历史发展中的世纪现象的反思暗含有一种浪漫主义色调。古斯塔夫·鲁梅林认为，人们已经逐渐用这个词指“一种神秘的、崇高的、几乎是自然的漫长的时间单位”。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认为每个世纪都是“沉甸甸、香甜甜”的。从1880年至1914年，人们对那个“飘逝的世纪”的风俗习惯的伤感与倡导进步的新思想发生了冲突，从而产生了一种真正的世纪末的悲伤情绪。1888年，巴黎上演了以世纪末为题的一部戏剧，从此这个词真正得到了普及。人们经常谈及“颓废”与“恶化”，就如同人们渴望一种生命冲动，渴望从时间的樊笼中解脱出来一样。此前，西方世界从未像当时那样广泛谈论一个似乎行将结束的百年历法。法国散文家与批评家莱米·德·古尔蒙将这种现象归于现代性本身：“当我们不再依据君王统治时期思考问题时，世纪便成了我们的思维依据。”

在随后发生的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几个无声无息的月份标志着一个世纪的结束，而奥匈帝国王储被刺

杀则是新世纪的开始。不久,这个词又开始大受人们的欢迎,但这次是以集体行为的形式出现的——这包括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世纪",亨利·卢斯的"美国世纪"与亨利·华莱士的"常人的世纪。"最近,当人们观察到世纪初的现代群体化人正逐步转化为世纪末的后现代个性化人时,许多人开始怀疑一个文明时代可能正在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在过去的许多角落发现了这种长度为一个世纪的周期。它们的标志并非恰好100年,也不一定与基督教历法中的百年分界点相对应,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将它们认作是现代欧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安东尼·奥古斯丁·库尔诺在19世纪7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古罗马人在规定百年运动会时也没有这样精确。当我们谈及伯利克里世纪、奥古斯都世纪、路易14世纪时,意思是这种世纪只与罗马意义上的世纪有关,与现代意义上的世纪没有关系。"库尔诺所说的世纪当然就是百年。

经过20世纪中期的那场大规模的战争之后,阿诺德·汤因比颇有见地地指出"人类的内在时间单位相当于个人有意识生命的平均值"。然而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汤因比是在他的一部巨著中提出上述观点的。在那部著作中,他得出了一个悲凉的结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世纪一直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交替。

战争与和平的百年周期

在本世纪60年代末,当反对越战的青年人高喊"我们再也不学习战争"的口号时,他们的支持者——一位名叫昆西·莱特的芝加哥大学退休历史教授却正在系统地研究战争。莱特亲眼目睹了自己所属的迷惘一代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而无人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激。他参加过争取美国参议院批准成立国际联盟的活动,

但没有成功。20 年代，当欧洲大地上充溢着新的仇恨之时，他开始撰写他的巨著《战争研究》。该书包含了他 50 多项独立研究成果，于 1942 年完成。当时美国全国正陷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极度恐惧之中。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战争比第一次大战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在《战争研究》一书中，莱特指出，战争“大约每 50 年爆发一次，激烈程度越来越高”。莱特不仅在现代欧美历史而且在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发现了这一规律，并指出前人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将这种规律归于世代经历。“勇士不愿反对自己，也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对战争抱有偏见，”他写道，“但是会有人教导他的孙子，说战争是一种浪漫的事情。”虽然莱特也对更具划时代意义的“长波式”战争循环进行了深入思考，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他的百年节奏理论更感兴趣。

尽管战争带有鲜明的周期性，莱特依然相信，通过充满理性的维护和平活动，人类可以避免战争的爆发。然而当他在 1970 年去世时，别人对他的学术观点开始猛烈抨击，他的种种希望也随之逐步走向破灭。联合国(他曾是该组织的倡导者之一)已沦为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任何战争学者都希望见到的一批最理智的治国者却不知什么原因使美国在东南亚陷入一场挫伤美国人士气的战争。这恰好符合莱特的“小规模战争”四分法。

莱特的书出版几年后，他的时间表就得到了同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确证。在以文明盛衰理论而著名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指出了一种“战争与和平循环”的“交替节奏”。在这一循环周期中穿插着一些每隔 25 年爆发一次的“一般性战争”。这种战争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欧洲大约每隔一个世纪就发生一次。汤因比认为这种循环已经重复了 5 次，并举出了具体日期。每次重复都以该世纪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为起点。

·前奏为意大利战争(1494—1525)。
·第一循环始于菲力蒲二世的帝国战争(1568—1609)。
·第二次循环始于西班牙王位争夺战争(1672—1713)。
·第三次循环始于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1792—1815)。
·第四次循环始于两次世界大战(1914—1945)。

除上述五个现代世纪之外,汤因比还认定古代中国与希腊历史上也有6个类似的世纪;它们都处于他所谓的伟大文明的"衰落"时期。他在世界各国1000年来的历史中都发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巧合":从一场大战开始到下一次大战开始之间的时间平均为95年。

汤因比指出,在这种周期性现象下面"有一种世代循环在发挥作用,这是一种物理生命的流动节奏",这种节奏"控制了人的精神"。与莱特一样,他将这一点与"有关前一次战争的记忆"的逐步消失联系在一起。最终,他认为,参加过二战的老兵的后代是通过道听途说了解战争的。他们掌权后,又重蹈那种好战的行为模式。和莱特一样,汤因比认为"其他辅助性战争"发生在每个循环周期的中期。汤因比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相信"(通过)人类的控制……可以减少不和谐,增进人类生活的和谐性。"老年的汤因比变得非常宿命——认为作为一种人生追求,通过宗教获得超脱要比参与或管理世俗事务更有价值。

汤因比还将战争循环进一步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将一场大规模战争之后的"喘息期"与一场小战争后的"大和平"区分开来,为战争循环理论增添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然而他做出了一种错误的暗示,认为在这四个阶段之间不会发生任何战争。显然在欧美历史上,几乎在每个循环的每个阶段都发生了一些战争,至少是一些

小规模的战争。为解释这些现象,小费拉尔.对汤因比的战争四段论进行了改造,用他所谓的"刺探性战争"替代了喘息期与大和平期。理查德·鲁斯克仑斯同样提出了一种分为四个阶段的战争循环;该循环在战争的两极时期与多极"权力真空"时期之间徘徊。他没有具体指出这一循环的持续时间,但是他认为"西方各国历史的一大悲剧就在于这一循环的不断重复"。

有些历史学家引用伤亡数字就哪些战争可以称得上重要、大规模或者具有决定性等问题与莱特、汤因比和费拉尔展开争论。然而,仅凭战争的严酷程度来评定战争的人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无论冠以什么名称,循环末期的战争无论在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上都是决定性的,它将结束一个时代。在这里,我们在研究战争循环问题时,需要借助路德维希·德西奥的古典研究。德西奥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了欧洲的权力对比是怎样每隔一个世纪就会发生一次深刻变动的。根据这一观点,历史上某些非常惨烈的战争(如三十年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结束一个循环的战争,因为它们未能用一种彻底的新秩序替换旧秩序。

最近,有几位学者将汤因比的战争循环理论推而广之,用它阐释社会行为演变的周期性这样更为广泛的课题。在经济学界,泰伦斯·霍普金斯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汤因比的战争循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在国际关系界,与汤因比的战争循环论相对应,威廉·汤普森与乔治·莫德尔斯基也提出了政治循环理论。汤普森写道:"每隔一段时间(大约100年),在一场全球性战争之后就会出现一个世界强国。然后,它将经历一个逐步衰落的过程。世界秩序也将以同样的速度恶化,直到发生一场新的全球性战争,促使一个新的世界强国诞生。"

莫德尔斯基将全球的政治循环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长约25年,以自然的熵的进化方式接替上一个阶段。在第一个

世界强国阶段，社会秩序的（政治）供给与（社会）需求呈现高潮。在非法性阶段，对秩序的需求减少。在解体时期，秩序的供给开始下降。当人们对秩序的需求增加，进而引发一场迎新除旧的全球性战争时，这一循环周期就发展到了顶点。最后一个阶段的特点不仅使人类社会受到毁灭性打击，人们还普遍认识到一种旧的世界政治体制已经消亡，新的体制已经诞生。他认为这种全球性发展过程的影响力不亚于神话："这类循环中的主要事件、全球性战争、与问题得到解决后的庆贺场面、那些伟大民族的庆祝仪式以及其他被人淡忘的活动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各种仪式，更是世界历史的重大里程碑。"

在下面的图表中，请注意一下这些现代战争循环与古代循环的相同性。战争与和平或者社会秩序的发展与败坏之间的交替，与亚洲人所谓的阴阳或者古希腊人所谓的爱与冲突非常相似。这些理论反映了自然界的季节变化以及庆祝这些季节的年度仪式：在一个春天般的增长期后是一个夏天般的庆祝时期，一个秋天般的分裂时期之后紧随着一个冬天似的死亡时期——然后是再生。最后一个阶段使人们联想到斯多葛派提出的 ekpyrosis——那种结束一个时代，然后又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净化与革命之火。

现代战争与政治百年

作　　者	第一个 25 年	第二个 25 年	第三个 25 年	第四个 25 年
莱特(1942)	和　平	小规模战争	和　平	大规模战争
汤因比(1954)	喘息期	辅助性战争	大和平	大战争
鲁斯克仑斯(1973)	参与减少	权力真空	参与增加	战争
费拉尔(1977)	刺探性战争	调整性战争	刺探性战争	霸权战争

霍普金斯—沃勒斯坦(1982)	霸权成熟	霸权衰落	霸权回升	霸权胜利
莫德尔斯基—汤普森(1987)	世界强国	非法化	解体	全球战争
自然界	春	夏	秋	冬

是什么东西在这里发挥作用？昆西·莱特年青时主张什么，年老时反对什么？阿诺德·汤因比在现代各国文明中发现了什么发展节奏？发现了伊特鲁里亚人很早以前就发现的历史单位：天然百年周期，即历史以一个长寿者一生时间为节拍发展前进。

百年的顶峰阶段是四分之一世纪时发生的一场战争、巨变与动荡。早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将之称为 revolutio（革命）。该词是源于哥白尼提出的 revolutiones orbium celestium（天体运转轨道——可预测的天体回归时刻）。对宗教改革派来说，revolution 一词暗指通往黄金时代、天堂或正义之路。一个世纪之后，托马斯·霍布斯将之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种含义随着 18 世纪那几场史诗性革命的爆发而日渐固定下来。近几年来，美国人由于经常用它指源自以前某些著名事件（这些事件并没有产生相同作用）中的一些轶闻趣事（例如“水门事件过后”、“里根”、“金格里奇”革命等）而遭到贬值。

描述这种现象还有一个更为恰当的词——crisis（危机）。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 krisis，意指一种决定性或分裂时刻。在给病人诊断时，krisis 是指医生判断病人是否康复或者死去的时刻。在战争中，它指的是决定一支军队（一个国家）胜负的时刻。托马斯·潘恩在 1776 年将该词用于政治革命。当时他已经开始出版著名的《美国危机》。从梅特涅、布尔克哈特到尼采，一大批 19 世纪的思想家将该词用于被马克思称为“历史快车”的周期性大

战。历史学家格哈德·马瑟尔解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该词主要指“历史进程突然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加速”，其速度之快足以“释放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与道德力量。这种力量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在它的作用下，社会再也无法回到目前的状态。”

危机结束一个百年，然后开启一个新的百年。然而，如果它将一个循环内的“阳”或纷争表现到极至，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失衡现象。那么，一个循环的另一个极端——“阴”或爱的高潮阶段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历史发展周期中的冬至点，并描述出它的具体情况，有关夏至我们同样也能找得到。

莫德尔斯基在描述第二个25年的非法化时期时，称其为“内部创新”与“系统标准化基础的重新振兴”。我们从这里找到一个重要线索。正如四阶段周期论中的第四个阶段必然会取代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外部结构一样，第二个阶段一定会取代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内部结构。

那么，这些阶段的特点是什么？40年前，宗教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对世界各国的情况进行考察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写道，一场“复兴运动”是“社会成员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地构建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文化的活动”。从根源上讲，这些活动是对“（一种）长期的、可测定的心理压力”做出的集体反应。如果成功的话，它们会建造一个全新的“文化迷宫”，使人们对“自然、社会、文化、个性与肉体形象”的理解发生转变。为上述运动加以分类（先天论的、信仰复兴运动的、千禧年的、弥赛亚的）之后，华莱士推想今天所有既定的宗教都是以前的运动中那些“充满预言与激情色彩的幻想”遗留下来的化石。华莱士没有说这些复兴运动产生的频率，但是他称“它们是一些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重复出现的特征”，并暗示了百年周期，认为“几乎所有人都曾参与过这种复兴过程”。

直到最近，学者们很少探索现代历史上这些充满预言与激情的时代的周期性，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沃尔斯诺在一篇宣布“尽管19世纪某些社会学家做过某些预言，宗教运动仍在现代世界得以延续与繁荣”的论文中写道：复活运动“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布虽不均匀，但也并非无章可寻”。事实上，自文艺复兴以来，它们的发生时间还是非常规则的。下面是这位学者列举的历史事件以及长达20年的高涨期。“复活运动”一词过于乏味，因此在这里我们换用一个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直觉意象，即精神觉醒或者觉醒：

- **新教改革（16世纪30年代—40年代）**
- **清教徒觉醒（17世纪30年—40年代）**
- **虔信派教徒觉醒（18世纪40年代—50年代）**
- **福音雀跃眩　9世纪30年代—40年代）**
- **新时代觉醒（20世纪60年代—70年代）**

这些运动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对当时陈旧的文化与宗教标准的道德性进行了猛烈抨击。它们的领导者都是年青人。这些运动都提出了新的规范（即我们今天所谓的“价值观念）。除最后一次之外，其余都是在人们预测的时间发生的：每次觉醒与上一次觉醒的相隔时间都接近于百年周期，而且它们大都发生在相邻的两个危机时代中期。

觉醒期是百年周期中的夏至点，其之于危机犹如夏季之于冬季，爱之于恨。在每次觉醒之中都暗含着其对立面的因子。在百年周期的第二个四分之一阶段中，社会安定所带来的自信导致了爱的迸发，而这又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在第四个四分之一阶段，社会不安定所产生的忧虑引发了内乱，进而重建秩序。如

是，觉醒是周期循环的标志，提醒一个社会现在它正处于一段祖先走过许多次的路程的中途。沃尔斯诺指出："至少自希罗多德以来，宗教动荡时期——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改革的先兆者是历史的分水岭。"

如果觉醒运动是人类经验中的夏季而危机是冬季的话，两个季节之间需要有过渡时期。在从危机走向觉醒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一个春季阶段，而从觉醒到危机则必须经过一个秋季阶段。如果说百年周期中的两个至点可以彼此满足对方，那么百年周期中的两个昼夜平分点（秋分或春分）必定在方向上是相互对立的。如果说后危机期温暖而光明，后觉醒期则寒冷而黑暗。如果说周期中的春季带来了协调、秩序与稳定，秋季则带来论争、分裂与迷惘。

随着时间之轮从危机转到觉醒，然后又回到危机，现代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惊人的规则性。在欧洲，每次循环（一次除外）的时间跨度都在 80 到 105 年之间。那个明显的例外是从滑铁卢战役到抗日战争胜利日之间这段时间。这个汤因比式的循环延续了整整 130 年。

欧洲历史上的这一例外只能算是一种不规则现象。人们或许会想：汤因比的模板错误地将两个循环周期合二为一了。除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建国战争（涉及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英格兰、俄国以及巴尔干诸国，还有美国的内战）之外，许多历史学家所谓的"漫长的 19 世纪"是一个欧洲诸强和平相处的时期。如果将它看作是另一个危机阶段，并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期的那段时间视为另一个觉醒阶段，结果会产生一个特别短的周期（1815—大约 1870 年），随后是一个长度接近正常的循环（1870—大约 1950 年，即冷战开始的时间）。如果要替换那个特别长的循环，就会产生一个特别短

的循环，以及一个长度正规的循环。在本章最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解释也许比汤因比的解释更为合理。

无论如何，这种不规则现象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研究全球历史毕竟意味着研究许多不同的社会。如同伊特鲁里亚人的许多城镇一样，每个城镇都有各自的发展周期，而且还会（以战争与意识形态的方式）相互干涉内部事务。现代化程度越差的社会越排斥百年周期。在如此多的历史“噪音”声中，完美的规则性几乎不存在。

如果你想弄清历史发展周期如何才能变得更加规则，也许需要验证一下下面的假设。让我们想像一下这样的场景：所有的历史“噪音”都被消除了；有这样一个单一的大国：它从未有一个强大的邻国，几百年来，几乎不会受到异域的干扰；这个社会诞生在一个近乎空旷的大陆上，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各种光荣的传统来束缚其自由发展。最后让我们想像一下，这个充满了现代气息的社会因直线式发展而为人所知，因控制自然界的周期性循环而著称于世，地球上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与之比肩。根据你对百年周期的了解，你一定会认为该社会的历史发展周期极有规则性。你当然一定会这样想。

然而这个社会根本不是什么假设。这个社会就是美国。

美国的百年周期

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面值一美元的美钞背面左侧的那个印章。那是一个圆以及一个四边金字塔。塔顶有一只眼睛。那是埃及人或共济会成员认为的可以对世界历史一目了然的神灵的象征。让我们阅读一下金字塔上的铭文：annuit coeptis（上帝微笑着面对众生）。这句话是直接引用维吉尔赞美奥古斯丁的 saecu-

lum aureum（世纪新秩序）的诗句。美国的开国元勋设计这枚大印时，把百年周期也印到了钱币上。

欧洲人没有把时间循环带到美国。在没有记载的历史神话中，那些最早在海平面上看到白帆的美国土著人的祖先曾目睹过100多个百年周期。这些新世界的古人对旧世界的古人所熟悉的星星与季节的循环周期也同样并不感到陌生。这从他们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十字架、十字记号以及方形的曼荼罗上可以得到见证。经常以世代表示的人生发展节奏被当作祖先与后代之间的神圣链接及干好工作的标准。

欧洲人确实没有把时间循环带到美国。他们从船上卸行李时发现，他们带了各种钉子、耕犁、圣经与契约，但忘了带一件行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西方现代历史的诞生不谋而合，这必然会让欧洲人产生一种联想：北美大陆即是时间循环的最后目的地：寓言中的华夏神州、理想国、新亚特兰蒂斯或者新耶路撒冷。当新来者初次碰到土著人时，认为那是些黄金时代的“印度人”或者来自地域的恶魔。一组历史终结时的静态画像。他们从大西洋沿岸的丛林中开垦土地，兴建城镇时，找到了解决人类永久贫困的最终答案：这里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最肥沃的土地、最神圣的国民、最具理性的政体。这些移民不想遇到的同时也正是他们所逃避的是一种对自然周期现象的邪教式的屈从。

对美国土著人来说，这种直线时间论的侵入给他们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在新来者的文化与土著人文化之间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一障碍决定了许多土著民族的命运，甚至使某些民族遭受了灭绝之灾。对世界来说，这次文化侵略开启了现代史上的一次最杰出与最成功的实验：缔造了新国家，这个国家凭借着人类的创造力成功地摆脱了各种传统的或自然的束缚。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有一种正在发生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的感觉。

黑格尔将美国描述为“未来之国，它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挑起世界历史发展的重担。”正如美国的开国者凭直觉所预想的那样，一种新的百年周期产生了。

在18世纪之前，欧美的百年周期按照相同的节奏发展。从那以后，与汤因比所记录的欧洲历史发展循环周期相比，美国的百年周期在时间上表现得更为规则，更加清晰。

英美的危机时期

要真正了解这种模式，应该从现在入手，然后再回顾历史。偷袭珍珠港事件与偷袭萨姆特城堡事件相隔85年。而从萨姆特堡事件到独立宣言的发布也是85年。如果再加上两年（到葛底斯堡战役），你就会得出林肯总统在那篇著名讲演中所说的“87年”。再向前追溯，就会注意到87年也是从独立宣言到殖民地光荣革命高潮期之间的间隔。

如果再在这些百年周期中加上另外10年左右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种模式也贯穿于殖民者英国人的历史之中：在光荣革命爆发99年前，英国人在建国的历程中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而在那次战役发生103年前，亨利·都铎王朝在玫瑰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人们不仅在回首往事时会意识到自己参加了一场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重复，即使是在战争爆发之时他们就有这种感觉。1688年，英格兰光荣革命的支持者将群众召集起来，提醒他们说那年恰好是伊丽莎白女王麾下的皇家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百年纪念。1776年，托马斯·潘恩提醒殖民者上一位斯图亚特王朝国王的命运，并以此激发他们的热情。在葛底斯堡，林肯通过唤醒人们“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所创建的”国家这一历史事件，感

动了整个国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葬礼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之时，这不禁使人们想到惠特曼献给林肯的告别诗句（“噢，船长！我的船长！我们可怕的旅程已经结束。”）

经过多年的积累，美国的历史学家已经为这些前后相继的历史日期编制了一套术语。本世纪 30 年代，查尔斯与玛里·比尔德称内战是“第二次美国革命”。以后这一说法不知被引用了多少次。本世纪 70 年代，卡尔·德格勒将罗斯福新政称为“第三次美国革命”。布鲁斯·埃克曼在他最近出版的美国宪法史中指出“在我国历史上有三个而不是一个建国时期：18 世纪 80 年代末期、19 世纪 60 年代末期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

今天，我们仍认为自己生活在二次大战后期，但有时也许会想自己更接近于下次“创建”时刻而不是上一次。记者迈克尔·林德将他那本论述美国未来的书的副题定为“新民族主义与美国第四次革命”。著名政治学家华尔特·迪恩·波恩海姆 在对前三次革命进行总结之后预言“当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可能会导致第四个美国共和国的诞生。”由于这些作者对具体的发生时间只字未提，他们的预言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大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后任何时期都会成为下一次战争的前奏。

下面所列举的英美危机时期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发生日期几乎已成定论。

玫瑰战争危机（1459—1487；高潮期为 1485 年）以执政的兰加斯特王朝（红玫瑰）与大权在握的约克王朝（白玫瑰）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为开端。两个势力集团在相互指责、谩骂及局部小冲突之后，将英格兰推向了长达 25 年之久、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荡之中。期间，皇位六易其主，许多达官显贵遭屠杀，大片的地产被剥夺。约克王朝取胜的陶顿战役（1461 年）是在英

国本土发生的最惨烈的战争。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1485 年）中，都铎王朝的开国元勋亨里·都铎击败并杀死了理查三世—最后一位战死沙场的英国皇帝。在进入这场危机时，英国尚是一个默守传统的中世纪王国，而在危机过后，它却变为一个现代君王政体式单一民族国家。

无敌舰队危机（1569—1594；高潮期为 1588 年）以刚刚与罗马教庭正式脱离并转信新教的英格兰感到强大的天主教国家哈普斯堡王朝在全球对其构成巨大威胁为开端。此后不久，这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哈普斯堡王朝不断派人刺杀伊丽莎白女王；弗兰西斯·德雷克率领满载从西班牙盗取的财宝的舰队周游世界；菲力蒲·西德尼在低地地区英勇战死。然后，随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夏季入侵，英格兰陷入大恐慌之中。英格兰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获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以至在随后几十年中，每年这个时候，英格兰各地的教堂都要鸣钟以示纪念。英格兰进入危机时，还是一个为频繁内战所困扰的国家，但在危机之后却成为欧洲一流强国，并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势力不断扩大的帝国的核心。

光荣革命危机（1675—1704；高潮期为 1689 年）以英格兰在大西洋对岸的殖民地同时发生的两次灾难事件为开端：一是发生在弗吉尼亚的培根暴动；二是菲力蒲王战争，即发生在新英格兰的一场灭绝阿耳冈昆部落印第安人的战争，伤亡人数之多超过美国参加的任何战争。此后，殖民者又陷入政治动荡之中：先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继承人约克郡公爵的专制主义观点与波及各殖民地、拥戴威廉王的光荣革命，然后是长达 10 年的反对（加拿大）新法兰西的战争。这场磨难以新法兰西人力物力的耗尽及马尔伯罗公爵在布伦海姆战败路易十四的消息而告终。后来，温斯顿·丘吉尔（那位公爵的直系后代）称这一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的政治轴心”。就新世界而言，理查德·马克斯韦尔·布朗认为

“将1670年至1700年这段时间称为美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一点也不为过”。讲英语的美国进入危机时还是一潭盲从的殖民地死水，走出危机后却成为一个安定团结的地方社会，其学识与富裕程度堪与欧洲老家相比。

美国革命危机（1773—1794；高潮期为1781年）在塞缪尔·亚当斯领导的“通讯委员会”的精心策划下，英国议会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激烈反映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从武装游击队，第一批殖民地革命者在战争中伤亡到《独立宣言》的签署，革命者很快就下定了决战到底的决心。1778年的冬天，当乔治·华盛顿率领的军队从纽约撤退时，人们担心这次起义可能又将遭受失败的厄运，所有领导者将以叛国罪而被处以绞刑。以萨拉托加与约克敦两次大捷为标志，独立战争达到了高潮。这种战争带来的紧迫感直到宪法被批准通过以及热月革命宣告了雅各宾派的终结才渐渐消失，因为年青的美国公民看到法国革命的结局比他们自己的革命要悲壮得多。英属的美国进入危机时还是十三个效忠英国王室但又时常出现暴动的殖民地，但在危机过后却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富创新精神的民主共和国。

内战危机（1860—1865；高潮期为1863年）以约翰·布朗起义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为契机。林肯上台后，南方几个州立即认为这是在公开邀请它们脱离出去。它们确实这样做了，却引发了一场发生在新世界本土上的最激烈的战争，死伤人数超过了所有其他美国战争死伤人数的总和。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与葛底斯堡战役为标志，内战达到了高潮。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罗伯特·李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倒戈投降，而林肯却在5天之后的耶稣受难节遇刺身亡。这让那些年长的牧师对宗教活动的象征意义倍感自豪。美国人民是否应该承受这样的打击？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认为，人们可能会就这个问题“无休止

地争论下去。但是在 1865 年，几乎所有的美国黑人与许多北方人不会怀疑问题的答案。”与其他危机不同的是，内战的结局产生的悲剧感要比乐观情绪浓厚得多。美国进入危机时尚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农业共和国，但在危机过后却成长为一个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尽管满目疮痍，它却开始了新的追求—公民平等原则。

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1929—1946；高潮期为 1944 年）从黑色星期二股市狂跌开始，一直延续到二战最黑暗的岁月，大体上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政坛的崛起与执政时间相吻合。开始阶段美国陷入大萧条的绝望之中。堪萨斯州与俄克拉荷马州遭受尘暴袭击，贫穷与失业者居住在贫民窟中，然而国家的精神没有垮，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为实现一个民族重新振兴的梦想而努力奋斗。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团结一心的美国大众立即做出了反应。几个月之内，美国开始为战争筹划，动员群众入伍，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始了战时生产。以美国海军对两个遥远的大陆发动猛烈攻击为标志，这场危机达到了高潮。经济萧条与战争带来的紧张情绪随着轴心国的投降、士兵回国复员以及和平时期的社会繁荣而消失了。美国进入危机时尚是一个闭关锁国、未能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但在危机结束后却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其工业实力、民主制度及慷慨的马绍尔计划成为自由世界的一大奇迹，更是新对手苏联的嫉妒对象。

英美的觉醒运动

如果说危机对权力与政治的外部世界发起了重新挑战，那么觉醒运动则对以精神与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世界进行了改革。如果说危机提高了群体的地位，彻底改造了公众空间，那么觉醒则提

高了个人的地位并彻底改造了个人空间。如果说危机重新启动了我们的政治日程，那末觉醒则在文化领域做了同样的事情。当今天的美国人谈到选举或联盟时，一般会先说，“自从20世纪30年代（或者40年代）以来……”；当我们谈及音乐或宗教时，可能会说，“自60年代（或70年代）以来……”。在危机时期，老人发号施令，年青人建功立业；而在觉醒时期恰好相反：老年人是命令执行者，青年人却成为发令者。

正如二次大战促使历史学家去研究战争循环一样，意识革命则使人们对文化动荡的周期性产生了兴趣。60年代末期与70年代出现的愤怒的青年人、公社与招魂说，让人们联想到美国历史上某些类似的片断。有人想起了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10年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倒幕派、传教士一代与好战的女权主义者。1970年，历史学家理查德·布希曼在总结18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时，将这场“心理大震荡”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游行、校园暴动与城市暴乱”相提并论。

校园暴动事件促使几位著名学者开始对美国历史上的觉醒运动进行反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指出这些运动周期性地恢复了“一套内容大同小异的善恶是非观念”。布朗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罗林直接引用华莱士的理论，认为这些运动是这样一些“文化复活”时代：“跨度大约与一代人相仿”，以“（人们的）信仰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而告终。他还指出，美国的觉醒运动与民族危机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每次觉醒运动都是由其攻击的旧秩序所拥有的安定与富裕环境培养出来的；每次觉醒运动都会为下一个新秩序的建立提供基础。麦克罗林提出了五次美国觉醒运动：17世纪的“清教徒觉醒”；18世纪的“大觉醒”；分别始于19世纪20年代、90年代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第三次”及“第四次”大觉醒。

许多年来，政治保守派拒不接受本世纪60年代的动荡是一种精神表现形式的观点。最近许多人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宣称60年代是新生宗教与道德理念的孕育期。从乔治·威尔的专栏文章到《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杂论，许多观点保守的媒体都热衷于将之称为“第四次大觉醒”，而且这种说法日渐盛行。199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哥尔宣称“要了解政治走向与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必须了解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循环周期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改革运动。”他指出，从一次觉醒运动到下一次觉醒运动，“这种典型循环大约持续100年”；他还说“第四次大觉醒”（“始于1960年左右”）已经走过了复活阶段，现正在重新调整公众舆论导向。

正如美国人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现在更靠近下一次危机而非上一次危机一样，学者们也凭直觉推断出我们现在更加靠近上一次觉醒运动而非下一次。某些英美觉醒运动的精确日期还有待商榷，但大多数历史学家会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的。

新教改革运动（1517—1542；高潮期为1536年）以马丁·路德张贴他那篇著名的反对教皇发行赎罪符的论纲为开端，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宗教与社会大动荡。在欧洲大陆它引发了许多农民起义、疯狂的邪教、罗马遭洗劫与天主教在德国及斯堪的那维亚大部分地区的土崩瓦解。在英格兰，这种改革热情不断高涨，直到最后亨利八世正式宣布与罗马教庭脱离，它引发一系列颇受人们欢迎的改革运动，在英国许多地区实现了政教分离。这次觉醒运动以威廉·廷德尔翻译的《圣经》的出版、天主教徒动乱的镇压以及英国议会没收大片教会地产为标志达到了高潮。随着改革者渐露疲态、领导者思想渐趋保守以及对外战争转移了大众的注意力，改革运动逐渐平息下去。这次觉醒运动把英国从一个忠于罗马教庭的附属国转变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宗教及个

性化精神真实原则的国家。

清教徒觉醒运动（1621—1649；高潮期为1640年）以波及欧洲各国的激进新教运动为开端。在欧洲大陆，它发端于波希米亚，并导致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在英国，这场运动在1621年达到了高潮。那年，英国下院发布了《大弹劾》，反对詹姆士一世的专治暴行。詹姆士的儿子上台之后，改革运动获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但在官方方面却没有丝毫进展。无所畏惧的约翰·温斯罗普率领“所剩无几的”真正信徒前往美国，从而开启了新英格兰大移民的序幕。在英国国内，清教徒的觉醒运动最终导致了克伦威尔发动的革命以及查理一世被处决。在北美殖民地，这种热情随着新建的清教徒社会极力维护道德传统而逐渐平息下来。英国进入这次觉醒运动时还做着帝国与黄金梦，正是这个梦粉碎了其他欧洲国家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的企图；然而在觉醒过后，它却拥有了一个新的天堂梦：让那些殖民地移民生存下去。

大觉醒运动（1727—1746；高潮期为1741年）以发生在康涅狄格峡谷的一系列独立宗教复兴运动为开端。这些运动有许多是年轻的约纳森·爱德华兹领导的，它们蔓延很快，尤其是在北部与中部殖民地。1741年，出生在英国的福音传教士乔治·怀特菲尔德做了一次令人欢欣鼓舞的美国之行，这标志着大觉醒运动达到了高潮。当“新的光明”挑战“旧的光明”时，复活运动瓦解了殖民地的各种议会组织，并将豪情万丈的青年信徒与思想僵化的老顽固派对立起来。在18世纪40年代早期的群众集会与“祈祷音乐会”之后，这种热情才逐渐平息下去。在觉醒之前，作为殖民地的美国尚处在年青人所谓的老一代的“宗教冰河时代”；在觉醒过后，它从美国的土壤上永远消除了旧世界各种有关等级划分与社会团结的观念。

超验主义觉醒运动（1822－1844；高潮期为1831年）以查尔

斯·菲尼的福音传教活动、登马克·维西领导的奴隶起义以及大众积极参加宗教改革与激进唯心主义活动为导火索。有时与杰克逊的平民主义思想混合在一起，这次觉醒运动以纳特·特纳暴动、废奴主义青年团体的建立以及一些激进政党的建立为标志达到了高潮。在派生出超验主义哲学与文学流派之后，在一位历史学家所谓的“宗派主义的全盛期”，不仅产生了各种极富预言色彩的宗教派别、俱乐部乌托邦公社与减肥时尚，而且还诞生了美国的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在威廉·米勒的追随者所预测的天启未能出现以及经济振兴重新成为大众关心的焦点之后，这种热情才逐渐冷却下来。美国进入这次觉醒时还是一个充溢着自然法则与理性主义的沉静殿堂，但在觉醒运动之后却迎来了浪漫唯心主义以及虔诚的福音教派。

第三次大觉醒（1886—1908；高潮期为1896年）以秣市骚乱与全球学生传教士运动为开端。在19世纪90年代，农民起义与城市劳工暴动此起彼伏。亨利·斯蒂尔称这10年是一个“文化分水岭”，而理查德·霍斯塔特则认为，对那些在此期间长大成人的人们来说，那是一段“火烧火燎的（痛苦）经历”。随着布莱恩这位宗教复活主义者参加总统竞选，一群深受鼓舞的青年人开始对老一代的价值观念发起挑战，定居点的工人开始着手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倒幕派大肆攻击不道德的既有制度，而女权主义者则大声疾呼“新女性”的出现。然而随着国家经济迅速从1907年的恐慌中恢复过来，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在这次觉醒运动结束之前，还出现了圣经地带、格林威治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成员。美国进入这次觉醒运动时，还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蒸汽与紧身胸衣思想所困扰，但在觉醒过后即新世纪之初则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大有前途的国家。

意识革命（1964—1984；高潮期为1974年）以城镇暴乱、校

园言论自由运动、首批反对越战的抗议活动以及有关美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激烈争论为开端。随着时间的前移，在“爱恋之夏”①、吸毒及嬉皮士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的带动下，这种热情变得更为激烈。在肯特州与杰克逊州发生暴动之后，随着水门事件及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辞职事件的发生，可以随意表达不同观点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在70年代余下的几年中，这种热情开始内转，转向人类潜能运动、离婚革命、新时代生活时尚与价值观念变革、新自恋主义及一种后来被称为模糊不安意识的悲观思想。这次革命于80年代早期结束。那时，先前的嬉皮士开始向雅皮士过渡。进入这次觉醒运动时，美国给世界的印象是它是一个可以建造任何事物但其文化缺乏想像力的国家，运动之后这一印象发生了变化。

美国的百年周期

下面的图表阐述了英美历史中自然百年周期的发展过程。美国人的祖先已经走过了5个百年周期。现今的美国已经走过第6个百年周期中的觉醒阶段。

请注意一下那种强有力的双节拍摆动。前三次周期的时间长度分别为103年、101年与92年，大体与罗马人的世俗百年周期相当。第四次与第五次周期，虽然长度较短（分别为82年与81年），但仍接近于森索里诺斯有关自然百年周期的定义——寿命较长者的一生。（下一章将解释一下自19世纪早期以来百年周期有所减短的原因。）现在再让我们回想一下前面就汤因比的全球周期提出的那个问题：从法国革命到北大西洋协约组织的成立这

① “爱恋之夏”。指嬉皮士1967年夏天在旧金山等地集会，宣扬爱、和平与个人独立。

段时间构成了一个还是两个百年周期？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周期学者也许应该考虑一下后者的可能性，对其他国家来说也应该如此。

英美百年周期一览表

百年周期	从危机高潮到觉醒高潮的时间	（高潮年份）觉醒（整个时代）	从觉醒高潮到危机高潮的时间	（高潮年份）危机（整个时代）	从一次危机高潮到下一次危机高潮的时间
中世纪末期				（1485 年）玫瑰战争（1459—1487）	
宗教改革	51 年	（1536 年）新教改革（1517—1542）	52 年	（1588 年）无敌舰队危机（1569—1594）	103 年
新世界	52 年	（1640 年）清教徒觉醒（1621—1649）	49 年	（1689 年）光荣革命（1675—1704）	101 年
革命	52 年	（1741 年）大觉醒（1727—1746）	40 年	（1781 年）美国革命（1675—1704）	92 年
内战	50 年	（1831 年）超验主义觉醒（1822—1844）	32 年	（1863 年）内战（1860—1865）	82 年
强国	33 年	（1896 年）第三次觉醒（1886—1908）	48 年	（1944 年）大萧条与二战（1929—1946）	81 年
千年	30 年	（1974 年）意识革命（1964—1984）	51 年？	（2025 年？）千年危机（2005？—2026？）	81 年？

根据百年周期的发展节奏，人们可以预言在 21 世纪前 25 年

中会出现另一次美国危机。那时，抗日战争胜利时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如纽特·金格里奇和鲍勃·凯里）将进入老年。下一次危机时代很可能从21世纪头10年中期开始，延续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考虑到英美历史上两次高潮期之间的时间间隔最长为52年而最短为32年这一情况，下次危机的高潮不可能在2005年之前或2025年之后到来。

战争循环论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汤普森认为“两场战争之间的平均间隔期”大约为80年。据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越过发生于1945年的本世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前瞻80年，依据历史合理推测，下一次大战的爆发时间似乎应该是2025年。”莫德尔斯基与费拉尔认为2030年可能是下一次“大战”或“全球性”战争的震中。另一位循环周期学者——南加州大学的约斯华·格尔德斯坦——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将一场强国之间的大战的爆发时间设定在21世纪20年代左右”。这只是一些预示性日期，尽管那场危机不一定会像圣经中有关世界末日善恶之战的描述那样恐怖。当前这个百年周期的第四个阶段并非一定需要一场全面战争，但它的确需要一场大规模的中断或者ekpyrosis——旧秩序的消亡与新事物的复生。百年周期中的冬季的确是一个充满考验与痛苦的时期，尽管未必是悲剧性的。虽然它会带来破坏，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非凡的理想、英雄主义，人类的生存状况得到迅速提高。

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是，这种百年周期的节奏只是大体接近的。如果非常精确，人类活动将与简单无机的物理时间重合，把我们的社会变得与彗星或者节拍器一样单调乏味。相反，百年周期的不精确性恰好表明人类社会属于复杂有机的自然时间范畴。自然界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类似的例子：心脏的跳动、花朵的绽放、麻雀的定期换毛。呼吸这一活动就牵扯到数以百计的生理反

应，如血液化学、神经信号、荷尔蒙平衡与体温。谁也无法精确校准或预测其时间。但是呼吸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按照正确的顺序、在大约同一时间依次排列，否则人将很快死去。

百年周期也是如此。历史的发展也有一个潮起潮落、彼消我长的进程，其时间表规则但不精确。莫德尔斯基将对战争循环周期（他称为 chronomacropolitics）的研究与自然循环周期的研究（chronobiology）相提并论。尽管冬季有时姗姗来迟，有时骤然而至，让你猝不及防，但我们仍可以预测落叶、候鸟迁徙与河流封冻的时序。通过准确预测上述事件，人们可以为即将到来的严酷季节做好准备。

然而预测需要知识。就物理时间而言，无须了解一种循环周期存在的原因——只要知道它的存在就可以了。就自然时间而言，你需要对一种循环的节奏与其内部结构有所感悟。你需要确定此种百年周期不是某种狂乱的巧合。同时，你还须确定该周期尚未在近来诸如多边维和人员、新时代意识、数字技术或全球化市场等改革的影响下消亡。

要获得上述知识，你一定不能停留在百年周期的外部时间上，而是应该由表及里，了解发生这种现象的内在原因。你必须由里及外地审视历史。关键是发现存在于历史周期与人生周期之间的联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代历史并没有按照那些经济大国或军事大国所创造的节奏在发展，而是遵循了一种自然界赋予每个生命的自然节奏，人生本来的节奏。

第三章 生命周期

西塞罗在生命垂危之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命的旅途是既定的。自然只有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走一次，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将被赋予恰当的特性。"对任何文化与时代、任何阶级与种族来说，生老病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中国哲学家林语堂说过："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生读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自己的节奏与节拍，有自己生老病死的内在周期。"

古人是这样理解西塞罗所谓的人生阶段与林语堂所谓的人生节奏与节拍的：他们把人衰老的过程描述为一个循环，而自然界与社会将之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北美的几个土著社会来说，生命要经过四座"小山"（童年、青年、成年与老年），每个阶段都与风、季节相对应，都有自己的困难、高潮与消解。对印度教徒来说，人生是一段旅程，要经过四个静修所，即社会与精神发展的四个阶段。毕达格拉斯是西方首批认为人生是一种由四个阶段组成的循环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每个阶段大约为 20 年，分别与一个季节相对应：童年与春天，青年与夏天、中年与秋天、老年与冬天。罗马人同样将生物界的百年划分为四个阶段：pueritia（童年），iuventus（青年），virilitas（成年），senectus（老年）。

在现代，人生循环四阶段论仍是文学、哲学与心理学中的一个恒久主题。社会学家丹尼尔·列文森说过："打个比方，每个人

都懂得一年四季与人生阶段的关系。每个阶段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并在整个循环中独树一帜。它是整个循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并将两者包容在其中。”卡尔·荣格同样认为“生命之弧”“可划分为四个部分”。

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周期与自然界的周期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有二：一是将我们个人的历史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二是在一部更大的社会戏剧中寻找自己的生命角色。现代历史有自己的季节阶段——湿润期、炎热期、干燥期与寒冷期。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一群人在一个湿润的季节中长大，然后在寒冷的季节中成人，而另一群人在干燥的季节中长大，在炎热的季节中成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同的历史季节塑造不同的人生阶段，上面那种情况将会造就差异很大的两代人。更确切一点讲，历史季节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人生世代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即四种原型的循环周期。这些根植于古代气质与永久神话中的原型将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联系在一起。这四种由历史周期在青年时代锻造而成的原型在人生代代的生命历程中，可以按照同样的顺序重现这些周期。

八十年的旅程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认为，“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他注意到，除了个人如何面对生存挑战之外，我们大多数人几乎很少回忆遥远的时代与地方。几乎所有人的人生旅程长度基本相等。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顺利渡过人生四个季节，而这四个周期自毕达格拉斯在3000年前认识到其四分性以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古希腊罗马人的时间观念中，人生循环有四个阶段，每个长约20至25年。今天，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现代人延长人均寿命的努力尚未突破上述各阶段的时间长度。人们取得的大多数成绩主要表现在婴儿、儿童、成年人死亡率显著下降之上。只要一个人小时候没有得过疾病或出现营养不良，其自然寿命几乎不会发生变化。《旧约》宣称“我们的寿命”要么是“70 岁”要么“80 岁”。保险精算结果显示，今天，一位 50 岁的普通美国人还可以在上述两个年岁（70 岁与 80 岁）之间度过最后一个生日。此外，一个人生阶段并不会因为进入这个阶段的人数增加了许多而必然发生变化。荣格说得很对：“如果长寿对人类毫无意义的话，一个人的寿命绝不会超过七八十岁。”即使 50%而非 5%的新生儿都能活到 80 岁，这种意义也不会改变。

自然界希望每个部落中至少有几个年长者，但对到底应该有几位年长者并不非常在乎。

决定人生某一阶段的与其说是死亡年龄，毋宁说是影响生命的社会与生物动力。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这种动力的确已经改变了方向。它已经加速，使人生的前三个阶段缩短了一些。与此同时，百年周期也从整整一个世纪缩减为 80 到 85 年。

人生每个阶段都会赋予进入这个阶段的人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与自我形象。每次我们与别人说话时都要借助于这种角色与形象，所谓“举止要附和你的年龄”。17 世纪的道德说教家甚至还制定了一些被后人称为 tempestivitas 的信条，来描述一举一动应符和自己的年龄段的理想境界。为强调人生阶段过渡的重要性，所有社会都制定了各种成年仪式以及开始承担与一种社会新身份相伴的新责任和享受新特权的仪式。

第一个阶段为童年，即人生的春天，这是一个长身体、学知识、培养生活能力、接受他人保护与吸收前人遗留下来的各种传

统的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童年与成年之间的保护屏障有时得到加强（如在19世纪50年代、20世纪20年代与现在），有时则受到削弱（如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最近大众保健与小儿医学的进步已经减少了儿童以前面临的各种危险与痛苦，但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

童年结束时要举行人生中最著名的成年仪式，罗马人称之为adulescentia（直意为“成熟”或者“爆发”）。许多传统社会在这时要对孩子们进行一种短暂的痛苦、恐惧与隔离的考验，这象征着儿童的死亡与成人的再生。在当代美国，这种人生的过渡已经演变为一系列活动，目的是让孩子们逐步适应成人生活（酒吧戒律、第一张驾驶执照、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参加选举、中学或大学毕业、离家、服兵役）。在步入成年的过程中，年青人学会了征求朋友而非父母的意见——这一变化将有助于培养一代人的个性。正如耶鲁大学人生循环学者约翰·肖沃特认为的那样：“在从儿童步入成年的过程中，你走过了一座由你的同辈人所组成的桥。”尽管进入成年的时间在美国历史上有所变化，其总体趋势是逐渐缩短。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据估计，进入成年的生物年龄（女孩第一次来月经，男孩的青春期）已经缩短了3年。年青人开始选举、签订合同、借债及进入市场经济的典型年龄也同样缩短了。

在这段青春期之桥的对面是成年早期，即人生的夏季。这是一个将个人梦想转变为计划与工程、成家立业、入伍参军、为社会做贡献的时期。列文森将之描述为一个“陷入感情纠葛与童年矛盾之中”但“又不得不应付家庭、工作与社会要求”的人生阶段。在某些时期（如19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50年代），年青人成家立业的速度较快；但在另一些时期（如20世纪20年代和90年代），这一过程却比较艰难，所需时间较长。现在成婚、离开

父母独立生活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然而本世纪50年代的年青人在成家立业方面却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在人生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阶段已经有所减短。例如，在整个19世纪，大学生与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5岁左右。而在本世纪60年代末期，这个年龄却降到20岁以下——成为美国历史一最。

成年之后是中年，这是伟大的收获期，亨利·亚当斯称之为"人生的小阳春……阳光有些灿烂，但也有些凄凉，宛如秋季。"托马斯·哈代将中年称为"人生的核心，而非仅为人生圆周上的一个点。"这是何塞·加塞特·奥尔特加所谓的"主导"阶段。这也是一个确定生活时尚、将思想与梦想付诸实施，实现各种工程与计划，教导成年人，为孩子制定各种标准的时期。列文森认为这是个"穿上权力之披风"的时期。同样在这个时期，人们也意识到正在成长的一代不再属于他们自己。当人们首次感觉到身体衰老的迹象后，会想到他们已经度过人生的大好时期。中年是卡尔·荣格所称的"个性化"阶段。在此期间，"人的价值观念，甚至他的身体确实在向相反方向倾斜。"

中年期从何时开始？根据许多权威人士（布朗、奥尔特加、荣格、列文森）的观点，中年始于40至45岁之间。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在35岁达到身体的鼎盛期，而其思想鼎盛期则在49岁。两者的平均值为42岁。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美国人进入中年的年龄已经呈现下降趋势。在内战之前，新当选总统的平均年龄为58岁。但此后，这一数字却变为54岁。在整个19世纪，最年轻的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就职年龄为46岁。然而在20世纪，迄今为止，三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约翰·肯尼迪与比尔·克林顿）的就职年龄都在42岁与46岁之间。现在，在40多岁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非常普遍：在60年代早期，这些年

青领导者在政坛异常活跃，而今天他们在文化界更是身手不凡。

就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以老年——即人生的冬季——为终点。这是一个休闲与反思的时期，是人们从殚精竭虑的工作与家务中脱身而出的时期，是把缰绳交给年青新手的时期。奥格登·纳什的一首小诗写得好："衰老开始/中年结束/你的子孙/多于朋友。"然而这也是设定标准、传播智慧、捐助他人、充分利用社会高层职务的时期。许多老年人在从繁重的工作与家务中解脱出来后，充当青年人的幕后高参，提供每个社会都需要的战略性智慧。这种理想在 senate（参议院）一词中仍有所体现。该词是从古罗马语中的 senatus 演变而来的，原意为"元老院"。

现在有更多的美国人能活到 70 岁或 80 岁高龄。因而，与过去相比，标志老年开始的主要仪式比过去来得更早了。一个世纪之前，退休意味着体弱多病，无法继续工作；而现在却让人联想到积极休闲的景象。50 年前，年龄在 65 到 69 岁之间的人之中大约有 2/3 仍在受聘，但是现在只有 1/4 的人在找工作。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每个时代都在变化。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老年人对政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老年人对文化的影响力却江河日下。

如同一年四季一样，人生的四个阶段也有一个允许变更的节奏，它们按照这一节奏相互融合在一起。季节的长度由冬至或夏至到春分或秋分之间的时间确定，而人生每个阶段的长度则由从出生到成人期之间的时间确定。在美国社会，成人仪式现在是 21 岁举行，这也是大学毕业，开始创业的年龄。此后，一个人就可以称为独立的成年人了。人生第一个阶段的长度确定了其他各阶段的长度。一批孩子在完全进入成年后，自己就可以组成社会中的一个成人阶层，将年长者推入到中年社会角色中去。现在后者的年龄正值 42 岁，而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可以（尽管宪法没有这样规定）出任总统的最小年龄。依此类推，正在步入中年的

人们将会把年长者推入到一个更为年长的社会角色中。目前，这一阶段的起始年龄大约为 63 岁。在这个年龄，人们已经可以从政府领取养老金了。

既然在过去 50 年中，能够活到老年的人口比例已经大大增加，不妨界定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后老年期（年龄在 84 岁以上）。人在后老年期的社会角色主要是依靠他人的抚养与照顾。除消费少量资源以外，当今美国社会的老寿星中几乎没有人能改变人生四分法的根本原则。如果后老年期人口持续膨胀，而且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将对百年周期（及历史）产生巨大影响。

现将现代美国人人生周期各个阶段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总结如下：

童年：（pueritia，年龄在 0 - 20 岁之间）；社会角色：成长（接受他人的抚养、获取知识与价值观念）

青年：（iuventus，年龄在 21 - 41 岁之间）；社会角色：充满活力（为公共机构服务、测试价值观念）

中年（virilitas，年龄在 42 - 62 岁之间）；社会角色：权力（管理公共机构，将价值观念付诸实践）

老年（senectus，年龄在 63 - 83 岁之间）；社会角色：领导（领导公共机构，转变价值观念）

后老年：（年龄在 84 岁以上）；社会角色：依靠他人生活（接受公共机构的照顾，回忆以前的价值观念）

前四个阶段（从童年到老年）构成了人生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时间长度之和约为 84 年，与可以上溯到美国革命的美国百年周期基本相当。

世代与历史

人生的周期性使世代的划分成为可能。为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传统社会中，人生四个阶段的界定清晰而严格。处于各个人生阶段的人群都努力遵照上一个群体的方式扮演其社会角色——生长、活力、权力或领导。根本不存在世代一说，更没有独特的人生戏剧与富有创造性的人生轨迹。

让我们想像一下，这个社会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卡尔·曼海姆所谓的“明确时刻”）。这种紧急情况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将使所有社会成员发生转变。他们所处人生阶段不同，做出的反映也不同，因而发生的转变也将不相同。

对孩子们来说，他们的反应可能表现为对老年人的敬畏与顺从（并脱离他们的生活轨道）；对青年人来说，他们的反应是拿起武器，冒着生命危险去面对敌人；对中年人来说，他们会组织军队，管理好后方，动员全社会去全力以赴；对老年人来说，他们将统筹全局，制定相应战略。由于人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这种紧急情况产生的压力给他们留下的情感烙印也不同，而各年龄群体内的社交活动会进一步加大这一差别。孩子们相互传递恐惧的消息，青年人相互鼓舞勇气，中年人互相帮助，提高各自的能力，老年人则分享智慧。

如果这种紧急情况得到顺利解决，它将在各个年龄段的人们的个人历史上留下一段独特而持久的记忆——即世代角色。尤其是，它会把青年人描述为一个英雄集体，而且以后将会围绕他们诞生一些神话传说。当英雄一代进人中年后，这个社会的领导人会比前一代人骄傲自大。步入老年期后，他们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以争取得到大众的嘉奖。与此同时，比他们年青的另一代人

——那些因紧急情况的发生而惊恐不已的孩子们——长大后所扮演的角色将发生重大变化。而在紧急事件结束后出生的一代人则会表现得信心百倍，犹如黄金时代胜券在握的儿童。此外，由于上述紧急大事的影响深远，这代人反过来也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年青一代。

为深入理解上述观点，今天的美国人只需回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以了。凡是经历过那场大劫的人都深受其影响。请看下面的图表：

美国世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世　代	出生时间	代表成员	二战爆发时所处年龄段
进步党	1843－1859	乌德罗·威尔逊	战前老年人（没有成功的多边主义者）
传教士一代	1860－1882	富兰克林·罗斯福	老年领导者：讲原则的梦想家
迷惘一代	1883－1900	杜特·艾森豪威尔	中年将军：追求实际的管理者
大兵一代	1901－1924	约翰·肯尼迪	正在进入成年的士兵：无畏的英雄
沉默一代	1925－1942	迈克尔·杜卡基斯	受过庇护的孩子：恭顺的助手
膨胀一代	1943－1960	比尔·克林顿	战后出生的孩子（胜利之子）
第13代	1961－1981	汤姆·克鲁斯	战后出生的孩子（道德沦丧的象征）
千年一代	1982－2002	（?）属于2000年的一类人	战后出生的孩子（最后的个人接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当时在世的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使有“传教士”美称的老年人长期以来的梦想化为现实，而这恰好构成了以亨利·史提姆森、乔治·马歇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智慧老人”的一大突出特征。而他们与此前的“进步一代”的不同也在于此。战争使处于中年

的迷惘一代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照亮了乔治·巴顿、哈里·杜鲁门的丰功伟绩，使先前犹豫彷徨的一代找到了落脚之处。战争的胜利使年轻的大兵一代充满了世界征服者的傲慢。这提高了他们以“从不索取”的大众美德及大社会团体协作精神而赢得的声誉，同时也使他们成为美国历史上总统任期时间最长的一代。战争使“沉默一代”形成了谨慎与敏感的个性。这使他们一生沉浸于工作程序、公正与艺术表现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大，成为几代人的分界线。大兵一代几乎包括所有目睹过这次战争的人。相比之下，迷惘一代则包括了那些战前有资格参战者，而沉默一代则对战争有亲身感受，也许曾经应征入伍但错过了奔赴前线的机会。在1943年出生的首批膨胀一代成员中有许多是“胜利之子”——他们从一出生就生活在极度的乐观情绪中，由于年龄太小，并不记得战时父亲离家参战的情形。

在此后出生的几代人中，那场大战的象征性记忆仍在继续回荡着，只是声音越来越小。当大兵一代逐步退休，第13代是在缺乏英雄、成年人责备他们忘记了战时集体主义意识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今天，儿童时代的千年一代将是与大兵有许多接触的最后一代人。现在，家庭、学校、教堂与媒体正在重新强调大兵一代的那些陈腐的价值观念。等到下一代人出世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变为纯粹的历史，与他们的生活距离之遥远犹如内战之于“沉默一代”。

随着紧急事件及其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传统社会中，会平安无事。如果不再发生另一件紧急事件，人生代代的说法将逐步被人们所淡忘。21年之后，只有受该事件影响的三代人还留在世上。42年后，只有两代。63年后，只有那时还是小孩的人们还记得它。84年后，能够记得

过去那段光荣历史的人们就寥若晨星了。到那时，缺乏变化的社会将把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推回到世代产生前的人生循环周期之中。在无数部古代史诗中，就是在这里，徐徐下落的时间之幕结束了一个传奇故事。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极具规则性，构成了百年周期的（冬夏）至点：危机与觉醒。在长达5个世纪的英美历史上，至少每隔50年（相当于人生两个阶段的长度）就会发生一次危机或者觉醒。因此，每一代人都会在其人生的前两个阶段中受到一场危机或觉醒的影响，因而在其人生周期的某个时期会经历一次危机与觉醒。

下面的图表表明，20世纪美国的情况显然如此。

最近的世代及其历史位置

时　期	1908－1929	1929－1946	1946－1964	1964－1984	1984－?
		（危机）		（觉醒）	
主要事件	四种自由 一次世界大战 禁酒 斯科普斯审判	1929年经济危机 新政 珍珠港事件 盟军登陆	麦卡锡主义 列维敦住宅区 富裕社会 小石城事件	肯特州事件 伍德斯托克 水门事件 抗税运动	苏联改革 国债 文化战争 辛普森审判
进入老年	进步一代	传教士一代	迷惘一代	大兵一代	沉默一代
（年龄范围 63－83）	伍德罗·威尔逊 约翰·杜威	富兰克林·罗斯福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诺曼·洛克威尔	林顿·约翰逊 罗纳德·里根	柯林·鲍威尔 马里奥·考莫
进入中年	传教士一代	迷惘一代	大兵一代	沉默一代	膨胀一代
（年龄范围 42－62）	赫伯特·胡佛 安德鲁·沃尔史泰德	乔治·巴顿 汉福雷·伯加特	约翰·肯尼迪 华尔特·迪斯尼	格劳里亚·斯泰纳姆 伍迪·艾伦	威廉·贝内特 坎底斯·伯根
进入青年	迷惘一代	大兵一代	沉默一代	膨胀一代	第13代
（年龄范围 21－41）	阿尔·卡普恩 弗·斯格特·菲兹杰拉德	罗伯特·奥本海默 吉米·斯蒂华特	马丁·路德·金 艾尔威斯·普莱斯里	安吉拉·戴卫斯 吉姆·莫里森	玛丽·罗·莱顿 库尔特·克巴恩

进入童年	大兵一代	沉默一代	膨胀一代	第13代	千年一代
（年龄范围0－20）	杰克·库柏 波莉亚纳	雪莉·特普尔 《小坏蛋》	杰里·马特斯 斯伯克医生的婴儿护理著作	塔图木·奥尼尔 《鲁丝马丽的孩子》	杰茜卡·麦克鲁尔 《巴尔尼一伙》

请你将注意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期开始前瞻大约40年，即到本百年周期下一次大事件（即战后意识革命）结束。从4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每代人又经历了两个人生阶段。以前比较活跃的两代人（迷惘一代与传教士）此时已经从历史舞台的前场退出，而两代年轻人（膨胀一代与第13代）业已来到。

这次觉醒——整个社会都在全力打破常规，颂扬精神，摆脱纪律的束缚——又界定了几代人，但界定方式与以前的危机有所不同。现在再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当时65岁左右的人所扮演的是既注重道德又充满幻想的角色，而现在，在意识革命中，这个年龄段的人却在为一种既定的理性主义制度辩护。以前45岁左右的人都是些通过辛勤劳动来维持生活、讲求实际的中年人。但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却成为一批敏感的中年导航者。以前25岁左右的年轻人穿军装当兵，而现在同年龄段的青年人却变为一批喜欢说教的自恋者。而孩子们呢？那些受父母宠爱、老实听话的孩子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在困难环境中成长、从小就照看自己的孩子。

每隔40年左右，人生各阶段的角色几乎都会走向前一代人的反面。远在现代历史开始阶段，这种节奏就已经在发挥作用。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执政早期出生的英国儿童，长大后成为雄心勃勃的帝国建造者。而在女王执政后期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则变得骄傲而富有神圣感。两代人之后，与改变信仰相比，光荣革命时期的美国年轻人更注重团体协作。大觉醒时期的年轻人恰好相反。在超验主义觉醒时期，青年人想努力点燃昔日的热情。在内

战危机时期，青年人扑灭了老一代人的热情。因此，认为大多数年轻人长大后会采取与老一代人年青时（对人生、政治、文化）相同的态度的观点有失偏颇。在过去500年中，从未出现这样的先例。

人生代代走向衰老的过程实际也是将过去的节奏传递给未来的过程，并向人们表明：每一代人不仅要受历史的影响，而且也会影响以后的历史。它调节着社会变革的速度。它通过传记与历史的紧密关系将人类的生命在社会与政治两个层面上以辉煌的形式连接在一起。世代正是依照上述方式成为百年周期根基的。

既然世代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为什么人类有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人们对这一关系早已有所知晓。然而在古代社会，这种关系被家族关系与贵族集团所淡化了。而高举进步大旗的现代人一直不乐意承认存在一种可能会影响其发展进程的周期性力量。

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初，世代（不是指年月日）是普遍的社会时间标准。当古希腊诗人将爱琴海地区的史前神话写入诗歌中时，他们以世代的先后顺序来记述盖亚（大地女神）、乌拉诺斯（天空的化身）、克罗诺斯（天神乌拉诺斯与盖亚之子，篡夺其父王位，统治世界，后被宙斯废黜）与宙斯。菲罗在写腓尼基建国传奇史时以第一位统治者——一位男性神作为开端。《圣经·旧约》从创世纪（即宇宙的诞生）开始讲起，而在记述后来的历史时则以息息相连的世代为参照。这种以世代为记时手段的现象在古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与印度教徒的神话与传说中也同样存在。

各个古代社会在世代（generation）一词的含义方面表现得含糊不定。该词的词根gen源于印欧语系，意为“产生、出现”或

者（作为名词）指“出现的”任何新实体。如果用来指人，这一广泛概念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定义。一是指家族的世代：父母的所有儿女。当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到埃及牧师“第345代”或者“第四代”继承人时，指的就是家族世代。另一个含义为社会世代：自然界或社会在大约同一时间内所塑造的所有人的总称。当《圣经·新约》提到“毒蛇的一代（a generation of vipers）”，当赫西奥德谈到金银铜“三个世代”时，指的就是社会世代。

由于古代社会大多以家族部落为活动中心，因而几乎没有必要将人以世代的形式区分开来：在贵族与精英中，新婚暗含着新（社会）一代的产生。此外，在传统的社会环境中，代际差别不会太大。即使出现大的差别，最多持续两三个人生阶段而已。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以家族世代为参照就可以了。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欧洲人开始自觉谈论世纪时，显然也在谈论同龄群体。在法国革命到来前的世纪末情绪中，社会世代理论突现在人们眼前。在巴黎的各个沙龙中，人们都在谈论如何界定每代人的时间长度与天赋权力（有些观点源于托马斯·杰菲逊）。

在随后的150年中，西方许多伟大思想家努力拓宽并完善这一概念。他们几乎都同意奥古斯特·孔德① 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世代已经成为社会变革节奏的主要调控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② 将世代正式定义为“一群新人”，他们“受过教育、在一起长大，他们是社会的主人。”威廉·狄尔泰将世代描述为“一种存在于拥有共同的童年与少年、大好年华相互重叠的人们之间的同期性关系。”乔塞波·费拉里③ 则将其全部社会理论建立在发

① 孔德（1798－1857），实证主义与社会学的创始人。
② 穆勒（1773－183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
③ 乔塞波·费拉里（1811－1876），意大利历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

生于他所谓的“社会领导者、先哲与各代统治者”之间的各种活动之上。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卡尔·曼海姆、何塞·加塞特·奥尔特加，弗朗索瓦·芒特雷（他在一本题为《社会世代》的书中首创了“社会世代”一词）及其他许多人推出了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的世代理论体系。

随着各种新的进步理论的诞生，欧洲人在文化与政治生活中越发感觉到代际差别的存在。在19世纪末之前，欧洲的精英们经常谈论世代问题。这些世代多用某一年命名，因为那年所发生的一切深深影响了某一群年青作家或活动家，如（欧洲的）1815一代、1848一代、1870一代，（俄国的）1820一代，（法国的）1830一代或者（西班牙的）1898一代。在本世纪20年代，人们首次正式谈论跨越大西洋两岸的一代，因为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1914一代”与美国的“迷惘一代”混杂于巴黎的许多咖啡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成为全球进步的象征，美国人对世代的兴趣超过了欧洲人。自那时开始，只要出现一个同龄群体，美国人就会毫不犹豫地给它们冠以某个名称。

欧美的这种历史经历表明，社会发展越快，世代问题出现的频率就越高。然而，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反对将世代变化法定为某种理念的激情就越高。如果说现代性讲述的是指向未来的理性进步，而世代却在提醒人们他们与潜意识中的历史遗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现代性讲述的是社会控制，而世代变化则有一种大胆反抗社会统治者的趋向。极端的现代主义政治革命有时想彻底消除世代，方法是诬蔑那些记忆受过“错误”政治影响的公民（或者像柬埔寨那样加以灭绝）。大多数现代精英干脆筑起一堵怀疑论的高墙，对世代的历史意义实行隔绝。他们不需要代际差异。如果出现这种差异，他们总是惊奇不已。

在美国，这种让人惊奇的事件大约每20年发生一次——这同正在进入成年期的青年一代与正在进入新的生活阶段的老一代之间的时间段大体相当。1950年左右的年青人没有表现出战前地方资源养护队员的那种团结、乐观与积极参政的热情，这让美国人大吃一惊。60年代末期，曾经被许多知名社会科学家（从玛格丽特·米德到肯尼斯·克尼斯顿）认为是性情温顺的年青人突然变得怒不可遏起来，这着实让那些学者吃了一惊。自90年代早期以来，三次人生阶段的过渡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注意。一系列的二战纪念活动不禁让人们产生一丝怀旧情绪。人们开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罗伯特·普特纳姆所称的“以高度的道德感而著称的伟大一代”现在就要退场还是（如鲍勃·多尔提议的那样）去担负“最后的使命”？当人们大谈“火车失事”取代让步之时，正在进入中年的膨胀一代直接跳过沉默一代，执掌了国家大权（1992年有克林顿与戈尔，1994年有金格里奇及某些新的国会议员）。由于意识到膨胀一代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年青一代，人们赶紧把兴趣（主要是贬义）转向了X代。

今天，政客们与商人们已经体会到推销人生循环论带来的各种好处。人们在电视广告、政治演讲、电影与通俗文化中经常听到谈论各年龄层的声音。即便如此，世代一词的广泛含义仍将继续受到人们的忽略，仿佛鲍勃·迪兰、吉姆·莫里森或者库尔特·柯巴恩就此已经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现在，人们对每代人对选举、购车的不同态度已经能够理解（与接受），而对他们与自然及历史的密切关系却知之甚少。学者们仅仅正在开始发现威廉—玛丽大学历史学家安东尼·艾斯勒以下论断的可取之处：“世代原理实际上提供了一条通向全部历史的光荣之路。”

认识世代

托马斯·沃尔夫在《你无家可归》一书中写到自己所属的迷惘一代时说："你也属于它的一员。你生活在这个时期。你无法逃脱它。无论你自己喜欢与否，你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对沃尔夫、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海明威、马尔考姆·考利与20年代的其他作家来说，作为迷惘一代的成员，他们具有许多共同习惯：年青时厌世、玩世不恭，喜欢冒险与狂欢，对讲排场、重外表的老一代嗤之以鼻。沃尔夫的同龄人处在一个与喜欢说教的中年人大决裂的时期，同时也处在一个与新一代循规蹈矩的儿童一代分裂的时期。作为迷惘一代的成员，他们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进入成年。尽管没有人下过这样的定义，人们却很清楚这一点。

沃尔夫所属的迷惘一代文人从未具体讲他们是如何识别自己这代人的。但是这个问题却必须提出：在一个每分钟都有婴儿诞生的世界中，我们如何定位社会意义上的世代？如何确定它们的出生年限？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确定一个世代的时间长度。正如大的历史事件所标明的那样，历史依据各个年龄段的人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而给他们打上不同烙印。因此，一代人（根据出生年月）的时间跨度应该接近于一个（根据年龄确定的）人生阶段的长度。在19世纪早期之前，美国的平均代龄应在25年左右。自那以后，这一数字逐渐减为21年。考虑到历史发展中的反常情况以及大型历史事件发生的精确时间，这种期限势必有所变化。

在将这种时间长度应用于真实的出生年月之时，必须寻找一种潜藏的世代角色。每一代人都有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一种鲜明

而可变的人类创造，包含了人们对家庭生活、性别角色、组织机构、政治、宗教、生活时尚与未来的态度。一代人可以像一个个人那样去思考、感觉与行动。它可以是安全的或不考虑后果的，个人主义的或集体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与任何社会范畴（种族、阶级或民族）一样，一代人容许许多个别例外现象的存在，也允许在某些边缘问题上含糊其辞。然而与其他大多数范畴不同的是，它有独特的传记。关于沉默一代的共同体验，你可以讲上一生，而讲述方式绝不会与谈论妇女、西班牙后裔或者加利福尼亚人的方式雷同。用费拉里的话说，原因在于一代人“有诞生、生存，也有死亡”。它会怀念一种独特的过去，述说自己对不久的将来的焦虑，而且也对自己的生死有所了解。

在认识一个真实的世代角色方面没有固定的程式，但研究一下下面的三个要素将有所裨益：第一，一代人的共同历史定位；第二，其共同的信仰与行为；第三，其成员为同龄人。

共同定位指一代人在由历史潮流与事件组成的编年史背景下在某一特定时期所处的位置。历史定位使世代这一概念得以成形。

在历史上的紧要关头，每代人往往占据人生的一个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沉默一代、大兵一代、迷惘一代与传教士一代分别代表了青年、成年、中年与老年四个阶段。本世纪20年代末期（在经济危机到来前）、60年代早期与80年代早期（在文化大动荡之前与之后）的几个世代与人生阶段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这些由人生阶段结成的联盟是一个个世代炼狱。处于这种联盟中的同龄群体必须具有曼海姆所谓的“时空一致，……共同的历史定位”。在这里，其成员遇到了“相同的具体历史问题”。奥尔特加则提出了“日期区”的说法，认为这些日期区将某一代成员“在生命力与历史位置两个方面达成一致”。

在任何既定时刻，历史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一代人中的年龄最大者与最小者。例如，越南战争对出生于1945年的膨胀一代形成的压力要比对那些出生于1955年的人大得多。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1920出生的大兵一代的影响则比1910年出生的人大得多。然而，在每一代人中，几个特殊的年龄层会将年长者或年青者聚合在一起，使他们拥有一种共同定位感。切里尔·麦尔瑟在《成年人》一文中指出，对出生于50年代的美国人（比如她自己）来说，他们“是在70年代获得60年代感受的。”这种感受非常真切，足以将麦尔瑟及其同龄人与熟悉这篇文章的年长的膨胀一代联系在一起。然而没有人能够将他们“60年代的经历”提前到“50年代”或推迟到“80年代”。因此，生于1944年与1954年的人们拥有共同的时代定位，而出生于1954年与1964年的人们则没有。

如果注意一下哲学家朱利安·马里亚斯所定义的由连续的出生群体组成的“社会绘图法”，可以通过精确的日期区将不同世代区分开来。他提议说，“依此类推，每代人将是两座山脉之间的峡谷地区，而为了确定某一点的归属，必须了解一下地形全貌。”有时，山谷之间的分水岭显而易见，有时却非常模糊。有时，即使是短短一秒钟也会在区分相邻两代人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在当代美国，孩子出生早一分钟或晚一分钟，就有可能会导致他们上幼儿园与小学的时间不同。同样，根据征兵法，一分钟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下面两种情况：一是在一场有争议的战争到来之前大学毕业；二是成为深受战时服兵役压力之苦的人群中的一员。一分钟的差异确实将1942年12月31日出生的新生儿与1943年1月1日出生的新生儿一分为二。也正是这关键的一瞬促发了1965年的大学生运动，在沉默一代与膨胀一代之间划下了一条永久的分界线。

一代人的共同信仰与行为使其与出生时间不同的人群区分开来。而这些信仰与行为也是一代人推动历史前进的手段。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代人所有成员的信仰与行为完全一致。然而绝大多数人在许多方面经常表现出鲜明的共性。孔德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每代人都养成了“全体服从某些基本观念”的习惯，而狄尔泰则提出了“世代世界观”的观点，即这种世界观可以影响一代人从青年到老年的整个行为取向。在对最近几代人的上述情况进行量化处理时，我们可以借助于根据年龄分类的丰富数据——民意测验、教育试验、犯罪记录与人口普查报告。代际差异往往是惊人的，而且具有启发意义。

要洞察世代特性的变化轨迹，应考虑一下政治联系的变化情况，例如有共和党倾向的迷惘一代（一生对进步与组织抱有疑心）与有民主党倾向的大兵一代（一生对科学与政府持乐观态度）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我们看一下各代人对待危险的态度，例如50年代年青的沉默一代追求稳定的婚姻与事业，而90年代的第13代却讨厌早婚，在事业上不思进取。再让我们看一下不断变化中的男女社会角色之别。大兵一代曾一度加大了两性之间的差别，而人口膨胀一代则努力（在事业上、家庭中与社会生活中）缩小这一差距。再让我们考虑一下各代人的人生目标。在60年代末期，属于膨胀一代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相信“创立一门有意义的人生哲学”要比“全力挣钱”重要得多。自80年代中期以来，第13代对人生目标的看法却走向了反面。在两次大选之间，人们的思想追求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不亚于发生了一场地震。在两代人之间，这些具有戏剧性的调查结果表明，一种新的角色可以使相隔20年的两代人进入成年后的情感结构发生彻底转变。

对一个世纪之前出生的人们来说，这种情况很少见，因而很

难对他们的行为与信仰进行量化处理。因此要弄清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必须根据轶事传说，个案研究与当时人们的观察进行推理。有时，可以从一个记载比较详细的事件中发掘出内在的角色。例如，1868年的美国大选被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世代分裂，因为那些内战后疲惫不堪的选民与候选人将那场战争的领导者与将军们抛到了一边。仅在那一年，年长的超验一代（林肯）失去了整整三分之一的国会与州议会席位，而年青的镀金一代（格兰特）却受益匪浅。在那次及随后的两次总统选举（1868、1872与1876年）中，年青的实用主义者向年老的改革派发起挑战，并获得了胜利。这三次大选最终为性格迥异的两代人间的激烈冲突划上了句号。

共同而鲜明的成员资格是指一代人界定自我的方法，以及哪些人属于同一年龄群体的普遍观点。这种资格赋予一代人一种使命感。马里亚斯曾讲过，“我们属于哪一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是谁的问题。”每当世代的界限模糊不清时，分清这一界限的最好办法是弄清人们的立场。

这种成员资格确认了许多民意测验专家长期以来对膨胀一代所持的怀疑态度——即他们那一代人的实际期限（上限为1943年，下限为1960年）比人口统计学家在界定这一代人时经常使用的1946年至1964年之间的生育高峰期早了几年。如果我们问在1943年至1945年之间出生的人们是否一直认为自己属于膨胀一代，他们可能会说是。如果向在1961至1964年之间出生的人提出同一问题，他们会（非常肯定地）说不。在1961年至1964年之间出生的年青文人自称为“X代”，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否定自己属于膨胀一代。即使你不能直接向某一代人提这样的问题，他们仍会有许多关于其同代人成员资格的证据。正是这种证据把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末期的迷惘一代著名作家与年龄略大

一些的作家（兰多夫·伯恩、T·S·艾略特、艾兹拉·庞德）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将其与年龄稍小一些的年青一代（约翰·斯坦贝克、兰斯顿·休斯、W·H·奥登）联系在一起。

说一个人认同自己所属的一代，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自己这一代人。奥尔特加认为，这种世代的经历是“大众与个人的动态妥协”。拒绝这种妥协并非易事。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坚决拒绝这种妥协，他会痛苦地发现自己受到孤立，成为一个局外人。德国社会学家尤利斯·彼德森指出，任何一代人都包括他所谓的三类成员：“指挥者”、“被指挥者”与“受压制者”。扮演指挥角色的成员设定基调；被指挥者遵循这一基调（从而使之合法化）；而被压制者要么远离这一基调，要么奋起反抗。

一代人在进行自我审视时，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方向感。奥尔特加认为每代人都是“一种在特定时刻被送入太空的生物火箭样本，有一定的速度与方向”。这样每代人都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充满活力的抛物线”。曼海姆同样提出了每代人的“根本使命”感。对某几代人来说，这种使命感可能是压倒一切的。战后大兵一代特别团结，说明那一代人对其向往与奋斗的世界有着坚定统一的认识。托玛斯·杰菲逊的同龄人在美国革命胜利之后也有同样的使命感。然而对其他几代人来说，这种使命感大不相同。沉默一代将扫除生活中的艰辛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使人们联想到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的进步党一代。膨胀一代认为自己应该追求一种梦幻与价值——别人也同意他们的这种追求，尽管有些不情愿。林肯所属的一代也是如此。而第 13 代对自己这代人不抱多大希望——这已经成为他们的集体角色。以乔治·华盛顿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两代人也有类似的特点。

一代人可以集体选择其使命，然而正如你不能选择自己的父

母与祖国一样，你也不能选择你所处的世代。那是一种命运，决定了你生活中的一切，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无论你喜欢与否。正如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生活在自己所属的世代中这一命定行为构成了人类生存戏剧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片段。”

世代纵览

1992年，当各类新闻周刊与电视广告突然将注意力集中于X代时，美国通俗文化在是否有新一代年青人到来的问题上打破了持久的沉寂。这一沉寂可以追溯到越战结束。在整整20年中，谁也没有过多考虑这一问题，因为似乎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新青年。但是在90年代，这一话题重又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大约每隔20年，美国就会出现新的一代。这种意外情况是由某一惊人事件所引发的。在这段经历之后，从言谈举止上看，这一代青年人与上一代年青人发生了鲜明的差异。

下面的图表列举了其中一些事件。事件发生的平均周期很重要。该平均周期为21．5年，与近期的一个人生阶段及一个世代的长度非常接近。这些事件共同反映了自18世纪早期以来美国各代人经历的种种大型历史事件的发展节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你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它们无不反映了具有独特历史定位、世界观与使命感的一代代青年人的角色。

进入成年的美国世代	
进入成年的世代	新的青年一代受到广泛注意的日期
觉醒一代	1734年：爱德沃兹在诺桑普顿发起的复兴活动
自由一代	1755年：华盛顿在荒野之战。
共和一代	1776年：杰菲逊的《独立宣言》
妥协一代	1804年：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
超验一代	1831年：特纳起义与加里逊创办《解放者》杂志
镀金一代	1849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
进步一代	1876年：爱迪生与威斯汀豪斯参加百年国庆展览
传教士一代	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里安的平民主义改革运动
迷惘一代	1918年：美国兵与文人聚集在巴黎
大兵一代	1935年：地方资源养护队与就业工程管理局
沉默一代	1954年：麦卡锡时代的"沉默的"年青人
膨胀一代	1967年：嬉皮士在旧金山举办"爱之夏"活动
第13代	1992年：媒体发现了X代

如果你属于美国，你就属于美国的一个世代。这同样适用于你的许多先人与继承者。全部历史无非是按时序排列的一部部个人传记。

下面的表格已经得到许多自上个世纪开始从事美国世代研究的专家们的确认。大阿瑟·史勒辛格认为从自由一代到传教士一代，美国共经历了8个世代。

英美 24 个世代

世　代	出生年份	著名成员（男子）	著名成员（女子）	成员进入成年的时期	原　型
亚瑟王一代	1433－1460	亨里七世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	玫瑰战争	英雄
人文主义一代	1461－1482	托玛斯·莫尔	约克郡的伊丽莎白	—	艺术家
宗教改革	1483－1511	约翰·诺克斯	安妮·伯尔琳	新教改革	预言家
报复	1512－1540	弗兰西斯·德雷克	伊丽莎白一世	—	游牧者
伊丽莎白	1541－1565	威廉·莎士比亚	玛丽·赫伯特	无敌舰队危机	英雄
议会	1566－1587	威廉·劳德	丹麦的安妮	—	艺术家
清教徒	1588－1617	约翰·温瑟普	安妮·霍奇森	清教徒觉醒	预言家
保皇派	1618－1647	纳桑尼尔·培根	玛丽·迪尔	—	游牧者
光荣革命	1648－1673	卡特“王”	哈娜·达斯汀	光荣革命危机	英雄
启蒙派	1674－1700	卡的华拉得·格登	玛丽·莫斯各鲁芙	—	艺术家
觉醒一代	1701－1723	约拿森·爱德沃兹	伊里莎·路卡斯·平克尼	大觉醒	预言家
自由一代	1724－1741	乔治·华盛顿	莫茜·华伦	—	游牧者
共和一代	1742－1766	托玛斯·杰菲逊	“莫利·皮切尔”	美国革命危机	英雄
妥协一代	1767－1791	安德鲁·杰克逊	多莉·麦迪逊	—	艺术家
超验一代	1792－1821	亚伯拉罕·林肯	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	超验主义觉醒	预言家
镀金一代	1822－1842	尤利西斯·格兰特	路易莎·梅·阿尔考特	内战危机	游牧者
进步一代	1843－1859	伍德罗·威尔逊	玛丽·加塞特	—	艺术家
传教士一代	1860－1882	富兰克林·罗斯福	埃玛·格德曼	第三次大觉醒	预言家
迷惘一代	1883－1900	哈里·杜鲁门	多萝茜·帕克	—	游牧者
大兵一代	1901－1924	约翰·肯尼迪	凯瑟琳·赫普伯恩	大萧条—二战危机	英雄
沉默一代	1925－1942	马丁·路德·金	桑德拉·迪·奥康纳	—	艺术家
膨胀一代	1943－1960	纽特·金格里奇	希拉里·克林顿	意识革命	预言家
第 13 代	1961－1981	迈克尔·乔丹	乔迪·弗斯特	—	游牧者
千年一代	1982－?	布莱德·莱恩弗罗	奥尔逊兄弟	千年危机?	英雄?

勃兰代斯大学历史学家莫顿·凯勒认为，从政治的角度看，从独立战争到战后人口膨胀期，美国共有11个世代。文学研究家亨里·佩尔认为，从文学角度看，美国共经历了8代人。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从社会与政治的角度看，从共和一代到大兵一代，美国共经历了8代人。尽管学者们并未全部列出这些世代的具体出生年月，但这些世代之间的密切对应性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认真关注美国世代发展周期的学者都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模式。

各个世代的长短又是如何表示的呢？如果千年一代的最后出生年月没有出乎我们的预料，美国的世代全景图将570年来出生的全部人口划分为24代，每代的平均长度为24年。在美国革命之前或革命期间出生的14代人中，平均期限为25年。从那以后，该平均值缩短到21年，与近来的一个人生阶段相当。从美国革命至今，除一代之外，其他所有各代都介于17年至24年之间。

各代人的出生日期也与危机和觉醒相互交替的百年周期一致。当你比较这些日期时会发现，每代人中的最年长者往往在一场危机或觉醒运动的开始或结束之前出生。因此，每代人的主要特征在儿童时期就渐露端倪了，那时社会正在进入或走出上述危机或觉醒。同样，一代人的主要特征将在社会心态再次发生逆转之前达到成熟。只要回想一下你自己所属一代的人生周期，就会明白这对你与你所认识的人同样适用，对古人也是如此。

最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每个百年周期内的重复模式。第一代人随着一次觉醒运动而进入成年，第二代则会有一个觉醒的童年。第三代随着一场危机而进入成年，第四代则会拥有一个危机的童年。所有上述四种历史定位都与一种世代原型有关，它们是：预言家、游牧者、英雄与艺术家。在整个英美历史上，除一

次特殊情况（美国内战，英雄期被跳过了）之外，这些原型一直按照不变的顺序延续着，重复着。

正是由于这种重复出现的模式的存在，美国在每次危机或觉醒期间的世代星座总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与人生四个阶段相关的原型相同。在危机时期，预言家进入老年，游牧者进入中年，英雄进入青年，而艺术家则进入童年。在觉醒时期，英雄进入暮年，艺术家进入中年，预言家进入青年而游牧者则进入童年。在这些星座的推动下，百年周期不断向前发展，因为正如每代人都会受到历史的影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会影响历史的发展。因此，这种机械的原型重现掌握着时间那个大车轮的滚动方向。

那么，根据历史定位就可以预测的原型又有哪些呢？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为什么如此接近于人类及历史的本质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返回古代的气质四分学说及相关的伟大神话。

四种原型

就对天然四边形物体的痴迷程度而言，也许没有哪个古代民族能与古希腊人相比。早在公元前6世纪赫拉克利特执政时期，希腊哲学家就认为世间万象都包含两对对立物。这一观点导致了四元素说：火与空气（象征着热与冷的对立），土与水（代表着干燥与湿润的对立）。根据古希腊人的宇宙观，可以将所有物质划分成这四种元素，可以将所有变化解释为每种元素的特性与其对立面之间的动态均衡。阿奈克西曼德① 认为冬季是潮湿与寒

① 阿奈克西曼德（公元前611？－547?），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与天文学家。

冷对炎热与干燥侵占上个夏季所做出的惩罚，夏季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最后，这种四分法演变为一种人类生理学与个性理论。传说中的希波克拉底医生认为人有四种体液（血液、黄胆汁、黑胆汁与粘液）；这四种体液分别产生了四种气质，每种气质与四种元素及一年四季相对应：多血质与湿润欢乐的春天相联；胆汁质与炎热的夏季相对应；忧郁质与干燥、萧条的秋季相对应而粘液质则与严酷寒冷的冬季相对应。在一年四个不同季节中，人体内的四种体液会相应增加。对古希腊人来说，一个多血质的人乐观而幸福；胆汁质的人反映敏捷，具有模范作用；忧郁质的人悲观而郁郁寡欢；粘液质的人缺乏热情，反应迟钝。

与希腊人的季节观一样，他们同样认为人的四种气质也是分组对抗的：多血质与忧郁质；胆汁质与粘液质。一个人的个性是根据其所表现出的四种因素的组合情况来确定的。援引一个政治比喻：克罗顿的阿尔克米因认为，如果这四种因素组合平衡，则会获得健康，相反如果只有一种因素含量过高，人就会生病。据神话传说，宙斯曾向四个神（普罗米修斯、狄厄尼索斯、阿波罗与埃庇米修斯）布置了这样一项任务：把人类变得更具神的特征。因而就有了人的每种气质分别与这四个神相关的说法。

在随后的两千年中，希腊人的这种学说成为西方个性差别与精神紊乱思想的主流。在文艺复兴时期，该学说中的许多用语已经被吸收进英语与传奇作品中：从乐观（健康）的，易怒的，忧郁的与冷淡的，到幽默与喜怒无常。后来，启蒙运动主义者宣布人性是可以征服的。由于受到现代医学、实验心理学与弗罗伊德自我改造学说的冲击，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古代四分法一直受到人们的冷落。

本世纪，气质四分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往日的尊严。这一

转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新一代欧洲心理学家反对实证主义，重举四分法的大旗。阿迪克斯在其论述中提出了四种世界观（传统、不可知论、教条的、创新的）；埃杜亚德·斯普兰格认为有四种生活类型（理论的、审美的、宗教的与经济的）；厄尼斯特·克莱奇默指出有四种不正常的气质（麻醉的、过于敏感的、忧郁的与轻度躁狂的）；20世纪最著名的四分法当数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根据心理机能提出的四种态度类型（理性、直觉、情感与感觉）。

据荣格看来，某些象征、渴望与行为模式（原型）是与生俱来的。他说，在各个时代与各种文化中，这些原型已经深深植根于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任何真实的或幻想的进步都无法削弱其影响。荣格在梦与神话中探索这些原型，并仿照古人的四分法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参考了印度教中的四分式曼荼罗。他的四种原型的机能从两对对立的事物的动态对峙中获取能量：思想与情感、感觉与直觉。当一项机能占据心灵，其对立面必然会受到压制，并成为心灵的“影子”。中年以后，人们意识到在其心灵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型存在某些局限，于是开始从其影子中（创造性地或破坏性地）吸取能量。荣格将这种对人生周期中自我矫正的探求称为“个性化”。

最近几十年来，在荣格四分理论的启发下，心理学家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理论与治疗方案，其中包括著名的米尔斯—布里格斯个性类型指标。现在的书店中陈列着许多资助类的书籍，书名经常套用荣格提出的各种原型：国王、勇士、魔术师、恋人以及唤醒内心深处的英雄。还有一些作家用个性原型来阐述历史，如威廉·欧文·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各种角色可以追溯到原始部落时期的四种原型：酋长、小丑、巫师、猎人。

这些理论反映了赫拉克利特所谓的enantiodromia（天然反作

用力)，即事物逐步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过程。请看一下下面的图表。这些四位一体分为两组对立体，平衡并纠正人的生活状况。荣格派学者罗伯特·莫尔与道格拉斯·吉利埃特承认这些原型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将国王对生育与慷慨的关注、勇士的果敢及恋人的多愁善感与魔术师结合起来。"

原型理论一般只用来阐明个人的个性，但也可以推而广之，来解释世代问题。与个人一样，一代人也会受到其在童年时代获得的营养及在走向成年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影响。一代人在扮演一种角色时，与个人一样，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选择。而每种角色也都是由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决定的。希波克拉底相信一个能动的个人必须保持四种气质的均衡。一个能动的、沉浸在单向时间之河中的社会同样会按照先后顺序经历这四种原型。

古希腊人所谓的四种气质的排列顺序（及相应的季节）与世代类型进入中年的时间顺序相一致。在那个年龄段，一代人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最大。英雄在百年周期中的春季进入中年，艺术家在夏季（觉醒）进入中年，预言家在秋季进入中年，而游牧者则在冬季（危机）进入中年。总之，气质、原型、四季与百年周期中的四个阶段相互对应。

气质与原型

古典气质	多血质（外向，乐观）	胆汁质（情感外露）	忧郁质（内向，悲观）	粘液质（情感保守）
相对应的神	普罗米修斯	狄厄尼索斯	阿波罗	埃庇米修斯
相关的季节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冬　季
赫拉克利特式的四位一体	潮　湿	炎　热	干　燥	寒　冷

核心特征	乐观	反应敏捷	悲观忧郁	冷漠迟钝
阿迪克斯世界观	传统	不可知	教条	创新
斯普兰哥的生活类型	理论的	审美的	宗教的	经济的
克莱切默的气质	麻醉的	过渡敏感的	忧郁的	轻度躁狂的
荣格的机能	理性	直觉	情感	感觉
麦尔瑟—布里格斯的性格类型	直觉思维	感性认识	直觉情感	感性判断
汤普森的社会机能	酋长（国王）	小丑（艺术家）	巫师（牧师）	猎人（士兵）
莫尔—吉里亚特的男性类型	国王	恋人	魔术师	勇士
世代原型	英雄	艺术家	预言家	游牧者

原型与神话

出身贫寒但非同凡响、幼时就表现出超人的力量与胆识、声名鹊起、战胜各种邪恶力量、刚愎自用、失败、以背叛或英勇的牺牲与死亡达到高潮。也许你认为这是赫克拉斯、超人、伊阿宋、阿尔古英雄或者日本硫黄岛男孩的传奇故事。

荣格认为，这种英雄神话最能充分地体现重复出现于许多时代与文化之中的各种原型。有些英雄神话，例如超人，乃是纯粹的寓言故事。但也有些英雄神话植根于历史真实之中，如我们对二战老兵的回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寓言与真实的区别将逐步消隐，直到最后剩下的大部分是神话，即原型本身的粗略轮廓。

许多学院派历史学家一发现制造神话现象就大声反对，他们

对学生们对60年代与70年代的了解大多源自诸如《约翰·菲兹杰拉德·肯尼迪》、《尼克松》与《阿甘正传》等电影这一事实哀叹不已。然而蓄意制造神话的做法由来已久。《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用美国南北战争制造神话，莎士比亚以玫瑰战争作为其神话体裁，荷马用发生在地狱之海（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小型战役来书写自己的神话故事。在任何时代，神话原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确定自己的生活目标。通过将历史事件转化为神话，一种文化可以超越杂乱无序的历史，利用重演过去的本能来表现自我。那些世代流传的神话无不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生代代都可以在有生之年目睹各种重复出现的美德（或邪恶）。

在所有神话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英雄神话。然而正如赫克拉斯与俄耳甫斯两则对立的故事提示的那样，英雄可以是凡夫俗子，也可以是神仙皇帝。他们拥有荣格所谓的外向型或内向型性格。约瑟夫·坎贝尔在《神话的力量》一书中坚持认为：“有两种行为。一种是实实在在的，英雄通过这一行为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救死扶伤。另一种是精神行为，通过它英雄学会如何体验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超人特性，然后带着这种启示返回尘世。”

世俗的英雄——国王与精神中的英雄——预言家经常出现在同一神话中。然而在这类神话中，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甚至年龄相差很大。比较典型的情况是，他们隔着两个年龄段。在少年英雄探险的传说故事中，他首先遇到的往往是坎贝尔所说的“保护者（经常是一个干瘪的老太太或老头子）。后者向冒险者提供防止恶龙袭击的护身符。”预言家可以是一位掌管宗教仪式的长者、圣人或者坎贝尔所说的巫师——他在精神上经历过时间的转变仪式，在故事中正在步入老年。他利用自己的法力来帮助年青人。这位老者缺乏世俗的力量但却不乏超自然的神奇才能，而且还能与神灵对话。

现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西方古典故事中英雄少年与年长预言家组合的例子：旧约全书中的约书亚与摩西，希腊神话中的阿尔古特与半人半马的凯伦（Cheiron），罗马神话中的勇士伊尼特与女巫茜比尔，凯尔特神话中的亚瑟王与梅林，条顿人神话中的西格弗利德与希尔德布兰德，盖尔人神话中的库丘莱恩（Cuchulain）与智者斯卡塔（Skatha）。在西方以外的地区，这种组合也非常普遍。在印度教神话中，年青的王子罗摩遇到了老隐士阿加斯蒂亚；在古埃及神话中，阎王奥西瑞斯之子霍拉斯得到了无所不知的智者索斯的教诲；在印第安纳瓦霍人的神话中，年青的太阳神在探险过程中得到了蜘蛛老妪的指点。即使今天，这个永恒的故事仍在被人重述着，如迪斯尼故事中的学徒与男巫师，幻想作家托尔金作品中的弗罗多与甘达尔夫，《星球大战》中的路克·斯基沃克与奥比一万·克诺比，《狮子王》中的辛巴与拉费基（与埃及神话中的索斯一样，他也是以充满智慧的狒狒形象出现的）。

对青年英雄来说，年长的预言家不一定是他的同盟。后者也可能是他的死敌，如美狄亚之于忒修斯，又如《白雪公主》与《澳洲男巫》中的老巫师。然而正如坎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英雄少年与智慧老人的密切关系对前者最后获得胜利至关重要。像梅林一样，智慧老人可以是一位和蔼的导师。像奥比一万·克诺比一样，他可以感受到无形的宇宙之力。如甘多夫一样，他可以通过神奇的意念挽救青年英雄。再如《唐老鸭与米老鼠》中的男巫，他会告诫人不要骄傲自满。最后，年长的预言家帮助年青的国王建立（或挽救）了自己的王朝。

有关英雄少年（国王）与年长预言家的神话之所以非常普遍，是因为人们喜欢听将勇敢的年青人与聪明的老年人搭配在一起的故事。然而不同时代的人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出现老年人与青年人共生的现象。当然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有好多年没

有见到了。勇猛顽强的年青人与足智多谋的老年人的这种建设性关系上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在二战期间。这些讲述英雄少年的神话之所以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文明之中，是因为人们可以用它们来解释世俗社会在吐旧纳新的过程——换言之，在危机时代——中所遇到的各种现象。

另一类非常受人们欢迎的神话——年青的预言家与老国王——与前面的神话正好相反。这些神话传说讲述的不是兴国立业，而是宗教的形成，让人们联想到的不是危机四伏的世界，而是一个在无忧无虑、精神颓废的强大王朝统治下行将窒息的世界。它们讲述的是年青人的睿智（而非勇敢）与老年人的无知(而非智慧)。

我们在讲述青年预言家（吾珥的亚伯拉罕、埃及的摩西、罗马地方长官面前的耶稣）的神话中遇到的主要人物的年龄大都在40岁左右，他们富有，充满理性，虽大权在握，但丧失了必要的价值观念（如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埃及的法老与下令杀死耶稣的罗马犹太巡抚彼拉多)。英雄神话在皇城中结束，而预言家神话则从那里开始。在佛教的神话传说中，年青的悉达多·释伽牟尼逃离了皇父豪华舒适的王宫。在波斯人的神话中，年青的琐罗亚斯德（波斯语为查拉图斯特拉）抗拒过于庸俗的卡维与卡尔潘①。在伊斯兰教的民间故事中，年青的穆罕默德敢于对自己的富商家庭发起挑战。在西方寓言中，年青的梅林毫不畏惧地反抗国王沃尔汀根，年青的酒神巴克斯用点金术来惩罚贪得无厌的老国王迈达斯，而花衣吹笛人从汉姆林神经麻木的市民手中领走了他们的孩子。

这些预言家神话揭示的是荣格所谓的正在走向老年的英雄原

① 卡维（Kavi）是波斯的君王，卡尔潘（Karpan）则是波斯的一种传统牧师。

型的阴影。它们在审视英雄时不是借助英雄自己的眼睛，而是选取了年青预言家这一全新视角。发现国王什么衣服也没穿的不是国王的同龄人，而是一个敢于吐露真言的孩子。这些神话偶尔也会推出一些善良的老人，一般是妇女，她们的作用是帮助年青人来表现他们的幻想。然而贯穿于这些神话中的是一种不同世代间的压抑与敌视。通过向年青人讲授耽于幻想（或者自我中心思想）所带来的教训，告诫老年人大权在握（或者腐败）可能产生的不利因素，上述年青预言家讲述的是觉醒时代的情况。

描写游牧者与艺术家的神话没有宏大的场面，但颇具个性特色。这主要是因为与他们遭遇历史大转折时相比，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并不非常重要。这些原型经历第一次转折时正处于茁壮成长的儿童时代（觉醒中的游牧者，危机中的艺术家），尚未长大成人。他们经历第二次转折时正在步入中年（危机中的游牧者，觉醒中的艺术家），尚未进入大权在握的老年时期。

与英雄神话及预言家神话相比，游牧者与艺术家的故事讲述的多是普通的人际关系，极少涉及王朝与宗教的兴衰，但同样体现了阴影的人生周期，只是顺序恰好相反而已。游牧者是一些倍受冷落的弃儿，他们长大后努力放慢生活节奏，简化社会结构，提防社会突变。艺术家却是一些受到父母保护，极为敏感的孩子。他们长大后努力加快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之走向完美与复杂化。游牧者生来独来独往，没有过高的奢望；而艺术家则生来善与人合作，心怀大志。

一个常见的故事情节是：一个像灰姑娘那样讨人痛恨的孩子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中。她必须利用自己的竞争本能来求得生存，然后获取成功。在类似的神话中，生活在贫困中的年青人必须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摆脱坏人的追杀（阿拉丁）、避免被人吃掉（汉瑟尔与格雷特尔）、被人当作奴隶（《木偶奇遇记》中

的皮诺曹）或者被火熔化（《安徒生童话》中的玩具铅兵）。这些神话中一般没有父母的角色，敌人通常不是老人，而是残酷而虚荣的成年人。即便有一些老巫师，他们也是友好的帮手。他们像仙女，心地特别善良，但缺乏冷峻的智慧。这些神话中的游牧儿童都是年长的艺术家在黑暗的觉醒期中抚养起来的。

如果神话表现的是中年游牧者原型，那么它将讲述一个聪慧而孤独的成年冒险者的故事。故事中如果有老人的话，代表的只能是老年预言家与青年英雄。游牧者既不像青年英雄那样尽职尽责（或者天真无邪），也不像老年预言家那样超然、充满睿智（或者邪恶）。游牧者经常因为别人的过人之处而与之发生磨擦。在《星球大战》三部曲中，汉·索罗顺着年龄之梯向下看去，看到了善良的路克·斯基沃克与莱娅公主——向上望去，看到的是智者奥比—万·克诺比与邪恶的达斯·维达。在危机时刻，游牧者也会做一些艰苦的工作，丝毫不考虑自己这样做

能否得到公众的称赞或嘉奖。

内容与上述神话相反的儿童神话讲述的是一群敏感而顺从的年青人，他们生活在认真严肃的成年人构筑的保护网中。让我们回忆一下有关荷兰小男孩的经典神话，他为保住大堤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或者回忆一下那些被人格化的小动物（巴姆比、彼德·考特恩蒂尔）或机器（小发动机）的故事，它们因讨人喜欢而容易受到侵害。这些神话刻画了一批试图在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中帮助他人的儿童形象。有时成人架设了一个密封的保护网，使孩子们无法与外界沟通（雷默斯大叔、高傲的温妮）。在这些故事中，代际关系特别融洽。年青游牧者故事中的情感基调生硬而恐怖，但在这里却变得细腻而温馨。这些神话刻画了老一代游牧者抚养的儿童艺术家。如果我们透过儿童世界的多棱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成人世界陷入危机之中的可能性（克里斯托夫·罗

宾)，虽然还称不上是事实（荷兰小男孩)。

从上述四种原型神话中，你可以辨认出两对相互对立的气质，以及两个反向的人生循环周期。当几代人同时进入神话故事中时，你通常会发现游牧者被英雄少年与年长预言家夹在中间，而艺术家则被年青的预言家与年长的英雄围在中间。

类似的原型顺序几乎贯穿于各个时代与文化之中。这是为什么？社会不会轻易将一次事件（或故事）升级为神话，除非它指明了人类永恒的行为走向。这种排序说明，人们对为原型所压抑的阴影并非一无所知。如果各代人可以以不同的顺序（比如，从英雄到预言家，到艺术家，到游牧者）生活，那么阴影揭示自己的机会就更稀少了，而社会获取那种可以促使人类文明适度向前发展的 enantiodromia（反作用力）的难度也就更大了。

荣格关于个人的观点也适用于世代：每个原型的阴影在同一周期中相隔两个人生阶段的那个原型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过于活跃的老年英雄会受到充满睿智的青年预言家的反对；而过于忧郁的年长预言家则会受到勇敢的少年英雄的反对；过于冷漠的老年游牧者会受到敏感的年青艺术家的反对；而过于急躁的老年艺术家则会受到处世有方的青年游牧者的挑战。

这种排列顺序进一步验证了人们经常谈到的一种现象：老人与儿童有许多相通之处，尽管他们的时间定位相差整整一个周期。如果一代人的阴影年长或年青两个人生阶段，那么与之相应的原型则会年长或年青四个人生阶段。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曾经指出："与前一代人相比，我们经常感到自己更接近于离现在较远的某代人，这一点也不奇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就发现了祖辈与孙辈之间的亲合现象。如果假定每个家族世代都代表了相隔两个人生阶段的两代人——意思是你将冷落了父辈，而与祖辈亲近，那么这种朴素的观点恰好直接反映了原型的时间排列顺

序。

在美国最伟大的历史神话《飘》中，玛格丽特·米切尔笔下的人物承认出生日期相差60年的两种原型之间存在某些相似特征。在小说中，白瑞德对斯佳丽说：

> 如果你与众不同，你不仅会与同龄人产生隔阂，而且也会受到父辈以及子辈的孤立。他们永远不会了解你，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大惊小怪。但是你的祖父祖母却经常为你感到骄傲，说："真可谓老树抽新芽，"你的孙子孙女也会羡慕地说："祖母年青时长得一定非常漂亮！"他们会极力地模仿你。

白瑞德在描述他的"海盗"祖父时承认，"我羡慕他，想努力向他看齐，我并不非常喜欢父亲，因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绅士，举止高雅，心怀虔诚——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白瑞德预言斯佳丽的孩子"可能变得性情温和，做事谨小慎微，和性格坚强的孩子通常的表现一样……所以你将来一定会获得孙子孙女的赞许。"在米切尔的小说中，白瑞德与斯佳丽代表了（游牧者）镀金一代，他们的父母代表的则是（艺术家）妥协一代，他们的儿女则是（艺术家）进步一代的代表，而他们的孙子孙女极有可能成为（游牧者）迷惘一代的代表。

这些现代神话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你所属的一代并不像塑造你的一代，而与塑造你的塑造者的一代有许多共同之处。原型并不创造与自己相似的原型；相反，它们创造与他们相似的原型阴影。

原型循环周期

这些神话说明，代际区别从逻辑上讲必须依赖于四个相互对立的原型。如果不是自以为是的年长预言家无能，怎么会产生英雄少年狂呢？如果没有骄傲自满的老年英雄，怎么会产生青年预言家？反过来，这又要求每一代人对比其年青两个人生阶段的一代人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在大多数社会中可以看到这种重要的跨周期性关系。这是因为儿童一代对周围世界产生第一印象之日正是中年一代控制儿童周围各种机构之时。尽管在儿童面前，他们的生身父母与比他们年长的两代人（因为代际平均年龄差为 21 岁）的地位几乎平等，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仍是老一代。膨胀一代的父母为大兵一代与沉默一代，但大兵一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50 年代的学校教育、家庭教师协会、小儿科护理、电视节目与电影业上。同样在 90 年代，虽然第 13 代是千年一代儿童的生身父母，但膨胀一代是这一代儿童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父母，因为他们的生活基调早已由威廉·贝内特、希拉里·克林顿、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比尔·盖茨及其他膨胀一代成员确定好了。同样，属于迷惘一代的诺曼·洛克威尔斯为沉默一代确定了基调，而以比尔·克斯比为代表的沉默一代则为第 13 代确定了基调，正如第 13 代中的乔迪·弗斯特们将为下个世纪初期出生的那一代人确定基调一样。

人生每向前行进一个阶段，这种模式就会重复一次。当儿童一代进入成年时，年长一代人将步入老年，并控制着青年人周围的各种机构。青年一代到达服兵役年龄时，与之相应的跨越人生周期的阴影已经掌握了发动战争的大权。在美国历史上，一代人执掌国家大权的年龄一般在 65 岁左右。此时，士兵的平均年龄

大约比他们小 42 岁（或两个生活阶段）。大兵一代参加了（传教士一代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沉默一代参加了（迷惘一代发动的）朝鲜战争，膨胀一代参加了（大兵一代发动的）越南战争，而第 13 代则参加了（沉默一代宣布的）沙漠风暴（海湾战争）。

这种跨周期关系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本杰明·富兰克林（预言家）所属的觉醒一代为托玛斯·杰菲逊（英雄）所属的共和一代确定了生活基调；而共和一代随后又确定了林肯（预言家）所属的超验一代的基调。期间，华盛顿（游牧者）所属的自由一代为丹尼尔·韦伯斯特（艺术家）所处的妥协一代确定了基调，后者又为格兰特（游牧者）所处的镀金一代确定了基调。

每个原型对其阴影的态度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敌对的。如同斯基沃克与其父亲的双重关系，这种态度通常是友好与敌对兼而有之。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大多数父母步入中年时都想抚育一代新人，后者的集体人格面具补充而非照搬他们的角色。然而生儿育女的最后结果却经常让做父母的大吃一惊。属于大兵一代的儿科医生本杰明·斯伯克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宣布“我们需要理想主义的孩子”。于是他的同龄人按照他的指导去培育膨胀一代，尽管许多人后来对他们充满自恋的孩子颇为不满。属于沉默一代的作家朱迪·布鲁姆在意识革命高潮期写道：“我讨厌那种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护孩子的思想。”于是她的同龄人依照这一建议抚养第 13 代，尽管后来许多人对他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颇感遗憾。

这种跨周期的阴影关系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在百年周期的核心深处存在一种不断重复的现象，即人们对孩子的态度不断在过度宠爱与过度冷落之间来回摆动。危机时期，游牧者为主的家庭成员对儿童艺术家倍加宠爱；在觉醒期，艺术家统率的家庭则对儿童游牧者关心太少。在危机之后，由英雄领导的家庭则给

予儿童预言家更多的自由；在觉醒过后，由预言家领衔的家庭又会限制儿童英雄的自由。

这些极为突出的跨周期现象说明，神话总是按部就班地刻画原型。上述顺序也是时间周期中可能存在的唯一顺序：从英雄到艺术家到预言家，最后到游牧者。四个原型按照这种顺序依次重复出现，形成了四种世代星座。

人生与时间周期					
时　期	0－20岁	21－41岁	42－62岁	63－83岁	84岁？
		（危机）		（觉醒）	
进入老年期（63－83岁）	艺术家	预言家	游牧者	英　雄	艺术家
进入中年期（42－62岁）	预言家	游牧家	英　雄	艺术家	预言家
进入青年期（21－41岁）	游牧者	英　雄	艺术家	预言家	游牧者
进入童年期（0－20岁）	英　雄	艺术家	预言家	游牧者	英　雄

请沿着对角线仔细观察上面的图表。注意一下存在于各种原型与其生命周期的历史定位之间的永恒关系。例如，英雄总是在觉醒之后以儿童的形象出现，而在危机期间进入成年。预言家总是在危机之后以儿童的形象出现，而在觉醒期间步入成年。

现在再让我们反回头来看一下前面有关现代美国历史上各个世代的综述。为每个世代贴上一个原型标签，并找出当时其他各代描述这代人时经常用的一个形容词。

请再沿着对角线观察下面的图表。请找出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当前各世代的生命周期的人格面具，每个人格面具都是一部集体

传记，跨越了时间与年代的界限。将这些对角线作为按先后顺序排列的世代原型去理解，你也会注意到，每个原型都遮掩了上下两个近邻，而与相隔两个人生阶段的原型相呼应。从进步一代开始将四条对角线前移，就会（在属于沉默一代的迈克尔·杜卡基斯与加里·哈特的同龄人中）找到有“新进步一代”之称的第一代人。从传教士一代开始向前移动，就会（在年青的膨胀一代中）找到被称为“学生激进分子”与“黑幕揭发者”的第一代人。从迷惘一代开始向前移动，就会（在第13代中）找到媒体经常谈论的“新迷惘一代”。

最近的世代与原型

时代	1908－1929	1929－1946	1946－1964	1964－1984	1984－？
		（危机）		（觉醒）	
主要事件	四次自由 一战 禁酒 斯科普斯审判	1929年经济危机 新政 珍珠港事件 盟军登陆	麦卡锡主义 莱维敦住宅区 富裕社会 小石城事件	肯特州事件 伍德斯托克 水门事件 抗税运动	苏联改革 国债 文化战争 辛普森审判
进入老年 （63－83岁）	进步一代 （艺术家） 同情	传教士一代 （预言家） 明智	迷惘一代 （游牧者） 粗狂	大兵一代 （英　雄） 强大	沉默一代 （艺术家） 同情
进入中年 （42－62岁）	传教士一代 （预言家） 说教	迷惘一代 （游牧者） 实用	大兵一代 （英　雄） 骄傲	沉默一代 （艺术家） 优柔寡断	膨胀一代 （预言家） 说教
进入青年 （21－41岁）	迷惘一代 （游牧者） 被疏远	大兵一代 （英　雄） 勇敢的	沉默一代 （艺术家） 敏感	膨胀一代 （预言家） 自恋	第13代 （英　雄） 被疏远
进入童年 （0－20岁）	大兵一代 （英　雄） 受保护	沉默一代 （艺术家） 受压抑	膨胀一代 （预言家） 自我陶醉	第13代 （游牧者） 遭抛弃	千年一代 （英　雄） 受保护

随着各原型年龄的增大，其角色也会经历一次深刻而典型的变化，使人们联想到古希腊的一种学说：所有生物都朝着一种与其首次展现于世人面前时的形式相反的方向发展。然而每种原型也有一种潜在的、恒久不变的属性。社会学家纳蒙沃斯写到："一代人的价值取向在一生中不会有大的变化。由于一代人在生命早期就已经专心致志地追求某种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一般都会伴随他们一生。"当一代人在中年时占据了社会的整个领导层，它将重新改造社会环境，以反映那种价值取向。与此同时，这代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为自己的阴影，并赋予后者以挑战其主导思想观念的能力。父母一代在对自己的阴影毫无觉察中步入老年，儿女一代也将进入成年，并作为阴影开始反对老一代的观念。

当这种发展节奏得到各种历史事例的充分证实之后，将会出现四类世代周期。下面就是这四类周期——从预言家原型（出生于百年周期的春天）开始。

·预言家一代在儿童时期表现出危机过后的自我陶醉，成年后成为觉醒时代的自恋主义改革者，中年时制定各种教条与原则，而在充满智慧的老年时期将成为下次危机的导航者。

·游牧者一代在儿童时期正值觉醒时期，受人关心爱护太少；成年后身处觉醒过后的世界之中，受到别人的冷落；中年后恰逢危机时期，表现为追求实际的领导者；老年时期处于危机过后时期，生活艰辛但性格顽强。

·英雄一代在儿童时期时值觉醒过后，倍受父母关怀；成年时处于危机时期，表现为勇猛的青年协作者；中年时精力充沛，傲气十足；老年时受到下一次觉醒的打击。

·艺术家一代在儿童时代恰逢危机期，受到父母的溺爱；在

危机过后进入成年，思想与感情非常敏感；在觉醒时期，作为领导人表现得优柔寡断；老年时正值觉醒过后，对别人充满同情。

以前有没有人注意到这四类周期？有，几千年来许多人都注意到了。

原型与历史

所罗门王在位期间，希伯来人开始记载其神圣的历史。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没有比出埃及、在巴勒斯坦定居这两件事更重要的了。这两个事件与他们的时间距离与“五月花号”距今的时间相当。即使在今天，在旧约 24 部福音中，这两件事就占去了 6 部。

事实上，《出埃及记》是一个四代人的故事。

1. 神圣的摩西一代。在年青时代，他们唤醒人们，使之归顺上帝。他们抛弃了世俗特权，反对埃及法老的权威。后来，他们带领希伯来人跨越红海，穿过荒野，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到达伽南之门，即上帝的应许之地。

2. 金牛犊的崇拜者。上帝用痛苦与磨难来惩罚这些流浪者与“缺乏信仰的人”，是因为他们犯有各种罪孽。他们当时年龄太小，无法参加摩西领导的反对法老的斗争，但对埃及人诱人的煮肉锅记忆犹新。

3. 以约书亚为代表的忠实士兵。他们出生在出埃及之后，在进入成年的过程中打了许多胜仗，此后摩西通过涂油礼对他们委以重任。他们进入伽南（老人不得入内）时表现得非常团结，在婚姻方面严以律己，从而征服了土著人，实

现了摩西的梦想。

4. 具有独创性的士师一代。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约书亚在弥留之际提醒这些年青的“继承者”：他们将享受“非你们所修治的（土地）；非你们所建造的（城邑）”。他们掌权时，社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分裂与文化混乱的态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

《旧约全书》将20年作为一个人生阶段——在这个年龄男性已经“能够参军打仗”。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长度约80的人生周期包含四代人与四个人生阶段（前提是我们认为圣经过于夸张摩西与约书亚的寿命了）。从摩西领导的出埃及与约书亚带领的攻打伽南之战恰好是40年。当希伯来人在杰里科大获全胜时，摩西已经步入老年，金牛犊流浪者进入中年，约书亚的士兵们还是青年英雄，而士师们却仍处在孩童时代。又一个40年之后，希伯来的攻占活动得到了巩固，严格自律的约书亚一代已经进入老年，而且有些人已经走上领导职位。“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一代人，他们不知上帝为何人，也不知上帝对以色列有何种贡献。”

在这个故事中跳动着百年周期的节奏，长度为80年，以觉醒期为开端，然后要经历危机及危机过后的乐观期。推动百年周期发展的是四种原型，每个原型都拥有其所希望的历史位置：摩西一代（预言家），金牛犊（游牧者）、约书亚（英雄）与士师们（艺术家）。

在征服伽南之后，圣经中的编年史比较混乱，谁也不知道在上一次百年周期结束之后，是否应该立即开启一个新周期。有的学者指出，几代继承者经历了不断重复的四个阶段：满足、预言、惩罚与解救。每当发生什么事件，尤其是恶劣事件，旧约经常告诫人们其影响（通常是诅咒与惩罚）将波及“到第四代”，

但不再向后蔓延。在古希伯来人的记忆中，此后出现的精神启示难以与摩西的启示相比，也没有世间的胜利足以与约书亚的辉煌战绩相比。即使当时的确有一个世代周期，但也正在走下坡路。正如圣经《传道书》所记述的那样，“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人又来到世上：但是地球却会永远存在下去。”

据说出埃及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13世纪，大约与古爱琴海地区新一代英雄传说开始的时间相当。与旧约的作者们一样，荷马对世代节奏怀有一种天生的敏感。荷马在《伊利亚特》中说道：“树犹如此，人亦不例外。/有时秋风扫落叶，但丛林/在春天仍会绽出新芽；/人生代代也是如此，生与死不停地交替着。”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的四个主要人物恰好代表了四个世代原型：内斯托尔（预言家）、阿伽门农（游牧者）、奥德赛（英雄）与忒勒马科斯（艺术家）。他们的生命循环周期是按先后顺序展开的。大约在特洛伊战争之前一个世代，以虔诚而著称的中年内斯托尔是皮洛斯的统治者；阿伽门农在童年时经历了一场家族仇杀，长大后成为一名富有的年青王子；奥德赛是伊萨卡的一位年青猎手；而忒勒马科斯当时还没有出生。在战争年代，内斯托尔凭借着“白发苍苍的老者”的智慧操纵着亚该亚同盟。此时，已经过了善战骁勇年龄的阿伽门农尽管饱受着精神的折磨，仍不失为一个聪明、讲求实际的将军。战争使奥德赛、阿卡琉斯、埃阿斯与狄俄默得斯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奥德赛的妻子珀涅罗珀将忒勒马科斯抚养成人。忒勒马科斯是一个敏感而听话的的孩子。20年后，战争结束了，内斯托尔荣归故里。阿伽门农也返回家乡，但因为罪恶深重而惨遭杀害。奥德赛回到伊萨卡后成为一名中年英雄，挽救了那个王国的命运。这时，忒勒马科斯进入成年，他非常听话，在父亲的帮助下，盼望着在和平时代继承父业。

这个传奇故事持续了四分之三个百年周期就结束了。这个周期以危机为主，根本没有觉醒期。荷马也没有说后来发生了些什么。与希伯来人的历史一样，在一成不变的社会传统的重压之下，百年周期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后劲。百年周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黑暗时代。在那个时代，不再拥有书写史诗的素材。

如同旧约与荷马史诗一样，各国的古典文学中也不乏带有挑战世代周期意味的情节。早期的伟大诗人与历史学家——荷马、修昔底德、维吉尔与李维——通常着重描写由英雄原型为开端的周期，而神话传说则集中描述由预言家原型（例如那些以亚伯拉罕、摩西、老子、释伽牟尼、耶稣或穆罕默德为开端的神话）发起的周期。

显然，古代人知道两种基本世代传说：一种以军事或建国事件为开端，另一种则以新宗教或价值观念的产生为开端。是否有人凭直觉观察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历史（而非单单神话的）联系，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人可能是著名政治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公元前2世纪，波利比奥斯研究了古希腊罗马城邦的历史，发现了一种政体循环现象——从王政到贵族统治到民主到专政，然后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这种循环现象古已有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有过类似的论述。但是波利比奥斯没有就此止步。他还将之与世代相继的模式联系在一起。依照他的观点，城邦的第一代国王通常是治国有方的明君，而其子女则变得腐败无能，其同代的贵族们发动起义。打天下的贵族们在治国方面也还可以，但是其子女却陷入寡头政治的泥沼之中，从而引发一场同龄人的民主革命。一代过后，民主制度缔造者的子女又重蹈暴民统治之覆辙，最终导致专制。然后，一位新国王将及时地夺取政

权，新一轮循环又开始了。波利比奥斯从未论及这种循环周期的时间长度。显然它可能进展得非常缓慢，经过多个世纪，也可能速度很快，一个百年周期（四个世代）就告一段落。

大约在1500年之后，思想活跃的哲学家兼政治家伊本·赫勒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史中也发现了一种类似模式。赫勒敦在论文《历史引论》中指出，中世纪的伊斯兰王朝的“威信”只能持续“四代人”。第一代人通过攻城拔寨，建立自己的统治，此后以天经地义的权威来管理国家。第二代人目睹而羡慕这一业绩，并努力去效仿，但收获甚微。第三代人对王朝创建过程缺乏了解，不仅缺乏开国者的优秀品质，而且对这些品质不屑一顾。就这样，王朝日渐衰落。第四代在无知者的指导下长大成人，他们对王朝持轻视态度。随后王朝就陷落了。在混乱之中，后来的一代人中又诞生了一位新国王，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开启了另一轮循环。一个王朝的统治大约持续一个世纪，赫勒敦用了许多比喻来将这种王朝的发展轨迹与寿命比作人生的循环周期。

人们经常将波利比奥斯与赫勒敦称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开创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两项发现：首先，历史的发展呈现为一个个社会变化阶段（环形的或直线的）；第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法国革命之后，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与日俱增。到19世纪，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历史分为一些有机的发展阶段。同样，他们假定世代的变迁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某种重要角色。这两种思想势必会相互影响。当法国语言学家保罗·爱弥尔·利特雷提出历史发展以四部曲形式进行——从道德到工业到科学到审美——的观点时，他将之比作一个世代相继的过程。当俄国小说家伊万·屠格涅夫出版《父与子》时，当时的读者认为他在书中批评了社会变革理论。

就对待这两种思想相互影响这一问题的认真程度而言，谁也

比不上乔塞波·费拉里。费拉里大约在拿破仑逝世前后出生，与19世纪40年代的那些年青激进派一同进人成年。他在西方历史中发现了一种循环周期，与赫勒敦周期极为相似。当时费拉里的家乡皮埃蒙特在奥匈帝国的专制统治之下，而他是一位意大利共和派人士。在1848年起义失败之后，他和一些意大利知识分子逃亡巴黎，在那里他撰写了一篇题为《政治时期论》的论文，探索了“政治时期”的世代原因。费拉里相信，自罗马帝国沦陷以来，世代的变动成为所有文明进步的唯一动力。他在论文中详细列举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世代变迁过程，并将它们划分为许多四阶段周期。他坚持认为这种周期是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与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发展“兴衰成败的主要因素”。按照费拉里的观点，革命的一代提出一种新思想，反动的一代反对这种思想，和谐的一代利用这种思想安邦治国，创建政治体制，而过渡的一代则微妙地打乱这一和谐，此后周期将重新开始。

半个世纪之后，沉重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正在进入成年阶段的一代的影响——激发德国历史学家埃杜亚德·韦克斯勒提出了人生代代即一系列“世界观之战”的观点。他认为“从古希腊开始，就存在着四种古典基础：思想、观点、经验与理解”，而这四种基础按照固定的时间顺序排列。他将这四种类型描述为物理—机械的、理性—数学的、宇宙—有机的、伦理—个人的，并认为每种类型在几乎所有东西中都有自己的思想形式：有自己的爱与恨、艺术观、上帝观等等。他认为每个世代类型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修辞的、神话的、史诗的），以及一种几何式的思维模式（金字塔、圆锥、圆、螺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阿诺德·汤因比提出了“物理世代周期（Physical Generation Cycle)”，并认为这种周期潜藏于他提出的战争周期下面。这实际上是一种世代类型理论。汤因比

认为，之所以会周期性爆发大型战争，根本原因在于战争对不同年龄段的人造成影响不同。参加过大战的士兵老年后走上领导职位后会尽力约束自己，不要发动战争。那些对第一次战争没有丝毫记忆的人们会成为下一次战争的发动者。如果你在战争参加者与发动者之间增添几代人，就会勾勒出一个时间跨度为一个汤因比战争周期的四阶段周期。

最近的意识革命又引发了两种新的四位一体式世代理论，一种是欧洲人提出的，另一种是美国人提出的。当奥尔特加·加塞特于本世纪 20 年代详细描述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欧洲世代的“重要轨道”时，从未将其理论系统化。奥尔特加死后，他的学生完成了这项工作。朱利安·马里亚斯用老师的思想解释当时喜欢闹事的“1968 年一代”（与美国膨胀一代同龄的欧洲人）。马里亚斯提出了一种由四部分构成的周期：第一代创造，第二代形成一种墨守成规的个性，第三代反映并使之理论化，而第四代则从文体上对各种形式与习惯发起挑战。

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现自己成为一种将其所属的“大兵一代”同事与躁动不安的“膨胀一代”学生对立起来的代沟思想的攻击目标。作为回应，他指出，从 18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存在一种四位一体、重复出现的现有制度与理想的抗争周期，即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发展的相互交替。亨廷顿的周期理论与百年周期相当。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一系列世代类型，但做了某些暗示：第一代创建社会制度，第二代完善这种制度但同时也觉察到自己在道义方面的失败（他称这种态度为虚伪），第三代倡导新理想，而第四代则对这些理想进行检验，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在实践中的失败（他称这种态度为愤世嫉俗）。

最近，乔治·莫德尔斯基根据自己的汤因比式漫长的战争与

和平周期也提出了一种四位一体周期理论。莫德尔斯基在深入研究世界历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之后，向人们描述了一种标准设定与目标实现相互交替的循环现象。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发展四段论的影响下，莫德尔斯基坚持认为，没有中间阶段，一个社会根本不可能直接从标准设定直接走向目标实现。莫德尔斯基所谓潜藏于四位一体百年周期动态论之下的“世代机制”指的是从创造的一代到适应的一代，到标准化的一代，再到正在步入成年的竞争一代的时间顺序。

四位一体世代循环

出处	预言家	游牧者	英雄	艺术家
旧约	摩西 (预言的)	金牛犊 (无信仰)	约书亚 (英雄的)	士师 (行政管理)
荷马史诗	内斯托尔 (圣贤的)	阿伽门农 (受到诅咒)	奥德塞 (满足的)	忒勒马科斯 (恭敬的)
波利比奥斯	平民主义者	专制的	王政的	贵族统治的
赫勒敦	不屑一顾的	轻视的	创造的	羡慕的
费拉里	革命的	反动的	和谐的	过渡的
韦克斯勒	有机的 (神话、循环)	个人的 (史诗、循环)	机械的 (科学、金字塔)	数学的 (修辞、圆锥)
汤因比	宣战	年龄太大不能参战	参战	年龄太小不能参战
马里亚斯	反思的	反习俗	发起	因循守旧
亨廷顿	说教的	愤世嫉俗	制度化	虚伪的
莫德尔斯克	标准的	竞争的	建设性的	适应的

上述所有理论反映了一种可以追溯到《旧约全书》的模式——各种文化、各种政治与社会体制4000年来都曾经验过的四

位一体周期。它的名字不断变化，但潜在的原型顺序（从预言家到游牧者到英雄到艺术家）却是恒久不变的。

在古代社会中，每当危机时期产生英雄一代或者每当觉醒时期诞生预言家一代，就会出现这种由四种原型组成的循环周期。此后，走向惰性的传统会削弱这种循环，并将社会推回到各个人生阶段的角色都事先规定好、无需任何变化的原始状态。现代历史开启之后，这种世代循环再次出现。这次，传统做出了让步，使由四种原型组成的循环得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存在。任何历史问题，纳蒙沃斯认为都要“经过四个完整而连续的时代，才能得到解决”。他接着提议说，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这种世代相继的现象也许能够很好地勾画出我们的时间之轮。”

在人类历史上，世代循环从未像在美国那样有力地推动着时间之轮前行。

第四章　历史循环

在拉什莫尔山的花岗岩上雕刻着四位美国伟大领导人的巨像。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到亚伯拉罕·林肯，他们的出生时间相隔126年，他们分别代表了四个不同的世代（自由、共和、进步与超验）。但是，那巨石雕像刻画的远不止这些：从左向右，参观者可以看到四个世代最受人尊敬的总统，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原型。这些原型不是按照时间先后而是按照百年周期的顺序排列的：游牧者、英雄、艺术家与预言家。原型神话的力量在这些巨型石像的雕刻者古茨昂·伯格鲁姆的想像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意识到，这座丰碑以最完美的形式表现了他们国家的历史。某几代人因支持某些伟大的原则而为后人所怀念，而有几代人则因建立了庞大的政府机构而流芳后世。有几代人以实用主义与勇敢精神而著称，也有几代人以他们的渊博学识与思维灵活而为人称道。在他们身上，每一种原型都发展到了极至，展现出独特的美德与优势。美国要发展、繁荣，要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需要的不只是这些原型中的一种或两种，而是四种缺一不可。

这种四位一体的完美结合并非偶然。它反映了源于人类开始追求美好社会时就已存在的动态平衡。

美国循环的根源

从人类与循环时间论及传统永久决裂的那一刻起，这种自足的原型循环周期就诞生了。在西欧，它诞生于15世纪最后的25年中。

文艺复兴——即儒勒·米歇尔与雅格布·伯克哈特两人所谓的“对世界与人的重新发现”——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历史的标志。这是一个艺术与建筑繁荣的时代，展示了“人”现在的确是“万物之灵”。这也是一个专制国家兴起的时代。统治者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借助火炮、炮舰、火枪与军队取得了血淋淋的权力均衡。这是一个商业活动活跃、人口持续增长、海外探险盛行的时代，并因此而诞生了一些全球性帝国。

虽然已经开通了前往中国的海路，修建了数不清的王宫府邸，现代性的诞生之路仅走完了一半。另一半要等到四五十年后才能走完。那时，现代性的另一面表现为热火朝天的宗教改革及与之相伴的各种异教、改革、反动迫害活动。宗教改革者从个人体验出发，对人的道德追求进行重新定义，因为世俗的传教上与统治者对这种追求已不再感兴趣。通过清除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各种中介物，宗教改革运动对信仰与良心做了全新的现代诠释。如果说文艺复兴摧毁并重组了中世纪的世俗秩序，那么宗教改革则摧垮了中世纪的宗教秩序。如果说文艺复兴将历史时间重新定义为人类追求幸福的过程，那么宗教改革则将其重新定义为以获得拯救为目标的精神进步。走完这两步之后，西方人的历史观与未来观发生了彻底变化。

推动上述变革的是两代杰出的欧洲人。第一代代表了英雄原型，出生在15世纪中期。其中最著名的人物都与征服、理性及

实用性发明联系在一起：统治者有佛罗伦萨的劳伦佐、勃艮第的“勇士”查理、俄国的伊万大帝、西班牙的菲迪南与伊莎贝拉；艺术家有波提切利、达芬奇与布拉曼特；探险家有克里斯托夫·哥伦布、亚美利哥与瓦斯科·达·伽马。另一代大约出生在40年以后，他们代表了预言家原型。欧洲大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乌尔里希·茨温利、威廉·廷德尔、西班牙的查理5世与圣依纳爵·罗耀拉。这些名字都与热情、投入与批评联系在一起。

因此，现代性是在世代原型激烈冲突过程中产生的。如果说作为英雄的第一代歌颂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外在辉煌，那么时隔两个人生阶段之后的预言家一代（阴影）对这种“不着边际”的狂妄自大与不讲道德的行为极为反感（路德在回忆其成年时期的意大利之行时这样描述道），他们极力歌颂上帝在精神方面对人类的支配。在这种独特的循环推动下，涌现了许多别的循环，进而敲响了现代历史的节奏，而西方人对代际差别的痴迷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可以说现代世代循环论发源于15世纪晚期的西欧，但美国世代循环的起始时间则更为精确具体。地点是不列颠群岛——那个发展速度一直走在讲英语的北美地区前列的国家的老家。时间是1485年，一位名叫亨里·都铎的勇敢的年青贵族在博斯沃思原野打败并杀死了国王理查三世。这一事件宣告了玫瑰战争的结束。这位青年成为英格兰强大的都铎王朝的开国皇帝。这使英格兰转变为一个拥有现代政治合法性原则的国家。40年后，在亨里的儿子的鼓动下，英国人掀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剥夺了罗马教会在英国的精神（与现世）大权。之后，他在英格兰创立了一个符合现代宗教合法性原则的国教（新教）。

如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英格兰是在两代历史性人物的推动

下胜利走出黑暗的中世纪的。这两代人各自是对方所代表原型的阴影。第一代是由亨里七世与约翰·凯伯特为代表的勇敢的亚瑟王一代，他们为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第二代是以亨里八世与约翰·诺克斯为代表的预言改革派，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英雄与预言家相互交替，孕育了新的美国文明：

·威廉·莎士比亚所属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代中的英雄在大西洋海岸（大约在1600年）建立了第一批英国移民定居点

·在约翰·温斯洛普率领的清教徒一代中诞生了号召并组织第一次大规模美国移民活动的预言家（大约在1640年）

·卡特“王”发动的光荣革命一代造就了一群把一个混乱的殖民地转变为一个稳定的区域社会的英雄（大约在1690年）

·诞生于约拿森·爱德沃兹所属的觉醒一代中的预言家（大约在1740年）宣布新世界从社会与精神两方面与旧世界脱离。

·托马斯·杰斐逊所代表的共和一代中的英雄（大约在1790年）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

当然，认为美国世代循环的根在英国并不等于将美国大多数人的根定在地球上那个小小的角落。然而，如果你回顾一下本世纪初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美国——半数以上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英国人。而现在，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持有这种想法。至今大多数美国人仍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西欧人，但是这一比例正在稳步下降。在追溯千万个美国人的家史时，你不必再讲述兴起于古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某些城邦国家的故事。

对美国土著人来说，这种寻根的故事必须从3万年前开始讲起。那时，第一批亚洲人经过长途跋涉，跨过白令海峡，沿着逐

渐消融的冰山遗迹创造了部落文明。对美国黑人来说，这样的故事可能得从中非的某些王国开始，内容包括被抓、绑架、出卖以及那段前往新世界的可怕的中途之旅。对后来不计其数的移民来说，这故事可能要涉及世界各地——从香农河沿岸种土豆的农场到长江两岸的稻田；从人口密集的乌克兰公社到荒凉冷落的瑞典山区；从到美国当临时工的墨西哥人到印度支那的渔民。

尽管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但新世界的历史循环是随着英国人的移入开始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英国移民成为这片后来演变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殖民地文明发展的独裁者。在殖民者修建詹姆斯顿与普利茅斯两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土著人几乎全部被赶到该文明定居地边界线以外的地区。除边境地区零星的拓荒者与猎人之外，殖民者和土著人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往来。美国黑人——与殖民者生活在一起，而且数量很大，到1776年占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无疑对美国社会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黑人居住在南方四个殖民地。由于南方实行奴隶制，这种影响受到了极大限制。

除土著人与黑人之外，美国其他种族的出现还是最近的事。在白人殖民者中，盎格鲁—萨克逊人长期占主导地位。到1720年，也就是在普利茅斯农场建立整整100年后，据估计，90%的自由殖民者拥有英格兰、苏格兰或者北爱尔兰苏格兰人血统。到1820年，也就是200年之后，这个数字仍保持在80%左右。在余下的20%中，约一半有德国或荷兰血统——这些人的历史与英格兰的历史有许多重叠之处。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自由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北欧而且都是新教徒。“美国”的政治辩论主要参照英国的先例进行，而且在英语的应用方面，当时的美国比英国本土还要规范。

在19世纪40年代镀金时代移民大潮的冲击下，这种情况开

始发生变化。新移民到来后，新旧移民携手共进，继续推动已经形成巨大历史规模的英美世代循环向前发展。如同飞入行星轨道的新月，新移民潮对美国社会（也包括正在到来的少数民族与现有的大多数居民）的发展轨道产生了一定影响。

尽管与该循环的根源没有直接关系，但美国黑人及其他非盎格鲁移民的经历却与这一循环的节奏密切相关。从 1739 年的斯托诺起义到 1831 年的纳特·特纳起义，从杜·波依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领导的黑人意识运动到本世纪 60 年代漫长而炎热的夏季，美国人反对种族主义的活动一直与预言家原型的成年同步。新种族的崛起（19 世纪 50 年代信仰天主教的德国与爱尔兰移民；本世纪前 10 年的犹太人、意大利与波兰移民；今天的西班牙与亚洲移民）通常与成年游牧者相一致。同样，美国本土主义者对上述情况做出的激烈反映体现了父母保护儿童英雄原型这种不断重复的现象。

美国是世界各国移民向往的地方。这一事实在促使世代成为历史发展单位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包括英格兰在内）现代史早期，只有社会精英——即那些可以随意打破传统、对他们在各个人生阶段的社会角色进行重新界定的人们——才能成为许多世代中有意义的成员。然而，在詹姆斯顿建立与“五月花号”事件之后，新世界向来这里的任何人都提供了这种机会。从 17 世纪至今，美国宛如一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移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有关世代变化的允诺。通过一系列改革——宗教宽容、民族独立、无产男性获得选举权、奴隶解放、妇女及少数种族获得全部民权，美国逐步向更多的人提供了全面参与美国世代发展梦想的机会。

现在，每个美国人，无论他多么贫穷，还是刚刚移民到美国，都获得了真正参与社会角色重新定义的机会，进而成为推动

世代循环前进的动力。或许是因为早期移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或许是因为被吸引到这里来的人们的天性，总之，美国向世界提供了最鲜明的世代循环例证。

美国历史原型

从亚瑟王一代到今天的千年一代儿童，在英美历史上共出现了24个世代。前6个完全属于英国。其后的4个属于殖民地，但仍深受英国社会与政治的影响。第11代（觉醒者，出生在1701－1723年之间）是第一个具有美国典型特征的世代，其名称、出生年月及人格面具与英国的同代人有显著区别。觉醒者一代的主要成员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组成，这是美国历史一最；老年后，他们也是听过美国国歌、见过美国国旗的第一代美国人。因此，今天的千年一代儿童是中世纪以来英美所有世代中的第24代，在美国世代史上却是第14代。

在概述英美百年循环时，我们根据上述24代人的出生日期所在的百年周期加以分类。我们对各百年周期中的四个世代都做了简述，而且这些简述以预言家原型开始，以艺术家原型结束。第一代预言家的出生年月和最后一代艺术家的出生年月与百年周期的起始期与结束期非常接近。在这些重复的四位一体模式中有两个例外：一是在中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个时间仅为半个百年周期（以英雄原型开始）的周期；二是美国内战百年周期（作为唯一的怪异现象，它拥有三个而非四个世代）。从整体上看，这种简述提供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集体传记，叙述方式是由里及表，叙述角度是人生循环。这与你在内容庞杂的传统学术理论中所碰到的任何历史相去甚远。

请注意一下四种原型是如何按照一种不断重复的顺序排列

的。每种原型在其人生循环周期中的某一点都将经历一次觉醒与危机，而且总是在人生的同一阶段经历这两个时期。请注意历史是如何影响青年一代的，及老一代是以何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青年一代的。在这里，唯一的例外出现在美国内战百年周期内。在此期间，没有出现英雄原型。

要认识上述世代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必须对这四种原型的人格面具进行反思，回忆一下那些共同享有各种原型的著名人物。

我们不会忘记预言家，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成年时表现出的极高的热情（约拿森·爱德沃兹、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及他们老年时的讲求原则的指导风格（邦克山战役中的塞缪尔·朗顿、葛底斯堡的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闲谈）。儿童时他们自我陶醉，作为父母他们珍爱下一代。他们的主要才能表现在想像力、价值观念与宗教上。他们中最著名的领导者包括约翰·温斯罗普与威廉·伯克利、塞缪尔·亚当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波尔克与亚伯拉罕·林肯以及赫伯特·胡佛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都是讲求原则的说教者、为大众利益做出牺牲的号召者与正义战争的发动者。在人生早期，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战争；在后期，他们深受人们的尊敬，主要是因为他们催人上进的言辞而不是取得了什么辉煌的业绩。

我们不会忘记游牧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成年上升期间喜欢惹是生非（帕克斯顿的男孩、密苏里的袭击者、酒类走私贩），中年时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弗朗西斯·马里昂、斯通华尔·杰克逊、乔治·巴顿）。他们在少年时代受到的关心与爱护太少，因而作父母后对儿女异常爱护。他们的主要才干表现在自由、生存与光荣上。他们中最著名的领导者包括纳桑尼尔·培根与威廉·斯多顿，乔治·华盛顿与约翰·亚当斯，尤利西斯·格兰特与格罗佛·克利弗兰，哈里·杜鲁门与杜艾特·艾森豪威尔。他们都是些狡猾

的、聪明绝顶的现实主义者——沉默寡言的勇士，喜欢在解决问题或应战对手时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他们中包括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下令对某人处以绞刑的总统（华盛顿与克利弗兰）、一位下令对巫师处以绞刑的州长（斯多顿）以及早期带过兵打过仗的领导者（培根、华盛顿、格兰特、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我们不会忘记英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成年时的集体胜利（光荣革命、约克顿大捷、盟军登陆）以及他们老年时的骄人业绩（乌得勒支和平与奴隶法案、路易斯安娜购买与蒸汽船、阿波罗号登月与州际高速公路）。儿童时他们倍受父母的宠爱，作父母后他们非常娇惯自己的孩子。他们的主要才能表现在社会、富裕与技术三个方面。他们中最主要的领导者包括古尔顿·萨顿斯塔尔与卡特“王”，托马斯·杰斐逊与詹姆斯·麦迪逊，约翰·肯尼迪与罗纳德·里根。他们都是些精力旺盛、富有理性的国家制度设定者。中年时，他们大力倡导经济繁荣与公众乐观主义，都因用毕生时间为大众造福而为人称道。

我们不会忘记艺术家，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成年上升期默默无闻（1800年的木屋定居者、1880年的平原农民、1960年的郊区新居民）以及中年时灵活多变、颇受大众欢迎的领导艺术（辉格党时代的让步、进步党时代的政府改革、现时代的预算与和平进程）。他们在儿童时期颇受父母的宠爱，而作父母后却对自己的孩子较为冷漠。他们的主要才能表现在多元化、专门技术与程序得当三个方面。他们中最著名的领导人包括威廉·舍尔利与加德华拉德·考尔登，约翰·昆西·亚当斯与安德鲁·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华尔特·蒙德尔与柯林·鲍威尔。他们都是些思想敏感而复杂的社会技术员、鼓吹公平竞争与宽容政治。除安德鲁·杰克逊之外，他们是所有美国政治领导者中最老练与最受人们信任的。

历史上的原型

原　型	英　雄	艺术家	预言家	游牧者
世代	亚瑟王一代 伊丽莎白一代 光荣一代 共和一代 —— 美国大兵一代 千年一代	人文主义一代 议会党 启蒙一代 妥协一代 进步一代 沉默一代	宗教改革一代 清教徒一代 觉醒一代 超验一代 传教士一代 膨胀一代	报复一代 保皇派一代 自由一代 镀金一代 迷惘一代 第13代
童年的共和一代	好	沉静	英勇	坏
成年	授权	未能实现目标	尊崇	冷落
成年主要焦点	外部世界	相互依赖	内部世界	自足
青年	建设	改善	思考	竞争
中年过渡	从精力充沛到骄傲自满	从墨守成规到勇于实验	从超然到批评	从疯狂到疲惫
步入老年过程中的领导风格	集体的，自我膨胀	多元化的，优柔寡断的	正义的，严厉	孤独的，讲究实用
老年的名声	有力	敏感	明智	艰辛
老人待遇	受人赞赏	受人喜欢	受人尊敬	遭人抛弃
被培养方式	严厉	过度宠爱	安逸	受人关心不够
培养他人方式	安逸	受人关心不够	严厉	过度宠爱
积极的名声	无私，理智，能干	关心他人，虚心，有专家知识	讲原则，果断，富有创造性，	精明老练，追求实际，有洞察力
消极的名声	缺乏考虑，机械的，盲目	多愁善感，把事情弄糟，优柔寡断	自恋，专横，残酷	无情，缺乏教养，超道德
才能	社会，富裕，技术	多元化，专门知识，程序得当	想象力，价值观念，宗教	自由，生存，荣誉

如同上面的图表所揭示的那样，这四种原型为美国历史提供了平衡与自我纠正功能。如果在我们祖先的遗产中，这四种原型中无论哪一种比重太高或太低，我们今天的情况会更糟。

每个世代都拥有自己独特之处：开始、结束以及有限的中间道路。正如奥尔特加指出的那样，一代人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物体，而是一条介于满怀希望的青年人与喜欢回想往事的老年人之间、“富有活力的轨道”。一代人所处的历史时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向某个目标前进。

现在我们重新研究一下古人的智慧：每种有机物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既保持本质不变，又转化为其对立面的。在某些方面，一代人总是保持年青时期的人格面具；但同时在他人生各阶段这一人格面具的表现方式却极为不同。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美国大兵一代身上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曾经为自己投身于未来而自豪，但现在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倡导群体。这一点在沉默一代的身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曾经因为是墨守成规的“孤独人群”而遭到人们的指责，但现在却过着充满各种“选择”的个人主义生活。膨胀一代曾梦想建立一个溢满宽容、欢乐与爱的理想国，现在却极力限制年青人的各种过激行为。第 13 代中年龄最大的一批人在成年时曾热衷于各种冒险活动，而今天，在他们成家后不久却开始反对个人与公众的冒险行为。这种现象依然持续着。

一代人的经历仅是一幅巨型画卷中的一个小片段。对历史来说，更重要的是所有各代人的总体经历。弗朗索瓦·芒特雷称，各代人的生活地点与方式好比“房顶上的瓷瓦”——在时间上相互重叠，在目的上相互纠正，在效果上相互补充。随着各代人年龄的增长，将形成一种新的原型星座，改变整个社会——从政府、经济到文化与家庭生活。

在一次循环过程中，这些星座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让我们思考一下下面两个社会有多么的不同：一个由自我膨胀的老英雄与犹豫不决的中年艺术家管理，他们联合建立的公众事业被热情如火的青年英雄付之一炬，而他们的自由也受到做事鲁莽的游牧少年的束缚。另一个社会的领导者包括喜欢评判是非的老英雄与追求实用的中年游牧者，他们携手创建的公共事业得到了崇尚集体主义的青年英雄的帮助，但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他们也受到了沉静的儿童艺术家的阻碍。前者属于觉醒期星座，就像20年前意识革命期间的那个社会，而后者则是危机期星座，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即将到来的危机期间的社会。

原型与转折

转折是一个具有典型社会情绪的时代。在转折期间，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及对自己所处的国家的态度将发生巨变。转折是由世代星座日趋陈旧所致。社会转折每隔20年左右发生一次，届时，各个世代将逐步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与原型和星座一样，转折在百年周期中也分为四种类型，排列顺序也与百年周期中的四个阶段相同：

·第一次转折是高涨期。老年预言家退隐而去，游牧者进入老年，英雄进入中年，艺术家进入青年，新一代预言家刚刚诞生。

·第二次转折是觉醒期。老年游牧者消失了，英雄步入老年，艺术家进入中年，预言家进入青年，新一代儿童游牧者也出世了。

·第三次转折是解体期。老年英雄消失了，艺术家进入老年，

预言家进入中年，游牧者进入青年，新一代儿童英雄出生了。

·第四次转折是危机期。老年艺术家消失了，预言家进入老年，游牧者进入中年，英雄进入青年，新一代儿童艺术家诞生了。

一如自然界中的一年四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四次转折同样重要，同样必不可少。觉醒与危机犹如百年周期中夏冬两季，其中任何一方都可以解决对方提出的问题。高涨与解体可谓是百年周期中的春秋两季，轨道截然相反。当社会进入觉醒期或危机期，新的社会情绪表现为社会发展方向突然转变。如果这种突变导致一场文化革命，社会就会进入觉醒期；如果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震荡，就会进入危机期。在高涨期或解体期，新的社会发展方向得到迅速巩固。当前一次危机暴露的根本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个新的民众政府的地位得以巩固，社会就会进入高涨期。而当觉醒期的各种矛盾得以化解，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为人们所接受，社会就会进入解体期。

通往新转折之路可以是鲜明而剧烈的（如 1929 年的股市大动荡），也可以是模糊与循序渐进的（如 1984 年美国的一天清晨）。它通常发生在新一代儿童出生 2 至 5 年之后。就在前一次转折的社会情绪变得日益乏味，用一种新情绪来替换它的时机已经成熟时，转折之路与世代之间的密切关系使每种原型都可以拥有整整一个人生阶段。

四次转折构成一个由生长、成熟、熵与死亡（与再生）构成的四位一体社会循环周期。在春天般的高涨期，社会不断强大，沉浸于希望之中。在夏季般的觉醒期，社会充满了幻想，在幸福与欢乐中舞蹈。在秋季般的解体期，社会开始收获与消费，然后在焦虑中走向分离。在休眠般的危机期，社会为生存而挣扎，并

做出牺牲。因此，在百年周期运行期间，任何寿命较长者生活其中的社会都要面对来自精神与世俗两个方面的最深层需要。

就像第一个闷热潮湿的日子宣布春季已经结束或者第一场雨加雪表明秋季已经过去一样，每隔 20 到 25 年（或通俗一点说，每隔一个世代），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百年周期中的一个新季节到来了。我们总是记不住历史像自然界一样必然会变化这一事实。亚伯拉罕·林肯对此体会颇深。在炮击撒姆特城堡 18 个月之前，他在向一群人讲话时，讲述了一个有关一位亚洲君主的故事：他命令手下的谋士起草一份“永留后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恰如其分”的声明。谋士们三思之后，向这位君主呈上了这样一份奏折，上面写道：“这种声明也将消失。”在现代史上，迄今为止每种转折已经出现过 6 次。根据有记载的历史，我们构建了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次转折

高涨期是社会生活的复兴期。人们在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之后想做的是将危机抛到身后，满足于集体取得的成绩。危机没有解决的任何社会问题现在仍将得不到解决。

社会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人们义无反顾地做出牺牲，但仍将需要稳定性与协调性。最近，人们有关群体生存的危机感转化为一种对投资、发展与力量的渴望，结果出现了一个商业繁荣、社会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局面。大众的议论焦点大多集中在行为方式而非结果上。安全是头等大事。知书达礼的个人在为一个有目的的社会服务，尽管有几个孤独的声音面对精神空虚的社会发出了几声充满焦虑的呐喊。生活偏爱那些态度友好与趋同者，人们对个人冒险的态度也日趋缓和。（褒扬责任感与服从大局行为的）

羞耻感发展到了极至。人们对男女差异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在抚养儿女方面也变得更加纵容。除最近一次危机的几声无关紧要的回音之外，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最终，人们似乎可以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令人悲伤的是精神已经死亡。人们担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只是再也不能用心去体会生活。

二战结束之后出现的高涨期可以说代表了美国有史以来国家情绪的至高点。镀金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跃进是与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资本大积累分不开的，其象征是摆放在百年展览会机器展厅中的那些大型蜗轮。19 世纪早期的哥伦比亚特区与西北地区的城区图非常规范，就像一个个几何图形，令人联想到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所拥有的那种和谐的氛围。这种氛围在感觉良好时代达到了极至。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总统在一片欢呼声中连选连任。在乐观向上的 18 世纪前 10 年，那些献给亚麻与船运的颂歌让人们联想到一个极力追求“有用性”与“优质工程”的社会。

让我们回忆一下美国人在 1963 年前后的未来观：我们对政府抱乐观态度，我们拥有由聪明人领航的忙碌而充实的未来，许多大学计划与“原本不能实现的梦想”都将化为现实。人类在 10 年内可以到达月球，消除贫困。未来世界是一个友好的社会，有振奋人心的太空行走，彩色的几何图形，让人宽心的米尤扎克背景音乐以及舒适的家庭生活。进步仿佛一场喧闹的酒会，酒会一直持续下去，变化的只有参加酒会的人。未来具体而确定，但缺乏紧迫与道德方向。

第二次转折

当觉醒期到来之时，人们在高涨期有关温和的理性与适宜的制度的各种假设将受到巨大的挑战。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相比显得非常渺小。

伴随着各种旨在寻求个人与集体达成一致的乌托邦实验的开展，新的精神议程与社会理想也迸发出来。尽管人们私下认为高涨期的繁荣与安定是想当然的，但在公开场合却对之不屑一顾。此时，社会对心灵的寻求超过了科学，对意义的探求超过了事物本身。年青人对既定的制度与秩序进行抨击。在这种抨击造成一定影响之后，社会将很难继续团结在某些共同目标周围。人们不再相信社会进步需要社会纪律做保障。任何需要集体纪律的公众活动都将导致争议，最终走向失败。此时的战争极不光彩，给后人留下的记忆也极差。人们追求精神的热情令人欢欣鼓舞。这种热情大大超过了人们对世俗问题的关注，社会越来越能理解与宽容充满冒险的生活方式了。人们开始对自己以前的虚伪言行感到内疚。社会秩序不断恶化，犯罪与物质浪费成风。男女差异在缩小，对孩子的保护程度降到了最低点。

最终，热情逐渐下降，人们对旧的文化制度完全丧失了信心，内奸被识破，团结受到破坏，现有制度被宣布非法化。

许多美国人至今仍对那种激荡于各大学校园与意识革命时期许多城镇街道上的热情念念不忘。在1900年左右的格林威治村，1840年左右的乌托邦公社，一个世纪前的康尼狄格村以及“五月花号”登陆后几十年中清教徒建立的新耶鲁撒冷都出现过类似的情绪。以前的几代人对此也有所了解。

让我们回忆一下1984年左右美国人的未来观：他们的未来

观从《2001年：星球大战历险记》发展到《接近第三类》。那是一种属于精神的未来，人类的意识战胜了机械。人们的理想在完美与灾难、歌颂爱情的乌托邦与毁灭一切的地域之间摇摆着。我们假定各大国家机构仍可轻易地凝聚在一起，继续发挥作用，但我们相信自我表现优于自我约束。

第三次转折

在解体期的开始阶段，社会各界都在欢迎觉醒运动释放出来的摧枯拉朽的文化力量。人们已经受够了精神再生、道德反抗与生活方式实验之苦。人们对自己的个性化感到满意，并开始大力提倡以实用主义、自立、自由与民族（或者团体的、种族的）沙文主义为内容的时代精神。

虽然个人获得了极大满足，但是公众的信任度在文化分崩离析、有关价值观念的激烈辩论与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中呈江河日下之态。寻欢作乐的生活时尚与大众对个人异常行为的宽容度日益减小并存。愧疚感（鼓励原则与个性）达到了巅峰。性别间的差异缩小到了最低点，家庭趋向稳定，孩子们获得了无微不至的保护。随着道德辩论的日趋升温，人们辩论的焦点已经从手段转移到结果。开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公众活动的难度加大，因为各种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人们带着极大的道德热情去参加战争，但缺乏协调一致性或进行到底的决心。

最后由愤世嫉俗产生的异化演变为沉重的悲观主义。在高涨时期，知书达礼的人们为有发展目标的社会服务，即使是坏人也会被迫去参加一些建设性的社会活动；而在解体时期，与人恩惠的社会为有发展目标的个人服务，即使是好人也发现与自己所在的团体进行沟通都很困难。社会灾难的临近最终会引发出一种麻

木不仁，这在半个世纪之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但是作为一个集体却再也做不到这一点。

对几乎所有美国人来说，目前文化战争所产生的情绪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但这在历史上却一点也不新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陷入犯罪、酒精、移民、政治腐败与游戏般的审判之中的美国开始致力于改革，极力倡导正统派基督教。19 世纪 50 年代同样充满了道德正义感与浮躁情绪，“闹独立的人”越来越多。历史学家大卫·唐纳德说这 10 年是“美国各级政府威信最低的”时期。18 世纪 60 年代，北美各殖民地获得了一种精神复活感，但各种暴力活动及对政府职权机构腐败的过激反映又搞得人心惶惶。

让我们看一下美国人今天的未来观：那些被称为智囊团的知识渊博的人为信息时代扭曲历史发展轨道现象倍感欣喜，而大众则被各种专门技术弄得目瞪口呆，愤世嫉俗的公众对好消息不屑一顾，对反面的内容却能做深入思考。通俗文化充斥着诸如《全部回忆》中的功能失调、《机器人警察》的犯罪，《终结者》中的惩罚与《独立日》中的逃离邪恶之类的未来主义意象。

第四次转折

当以前受到忽略或者没能及时消除而现在变得异常可怕的各种威胁突然到来时，作为反应，社会就会进入危机时期。生活的混乱与复杂使社会面临着各种危险，从而留下了这样一条命令：社会必须取得上风。这要求公众齐心协力，政府机构采取严厉措施，个人做出牺牲。

人们支持旨在发挥公共权力机构职能的新措施，而这些措施所取得的成功又进一步证明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只要政

府认真管理国家，社会所遇到的各种障碍都会得以消除，而几十年来形成的陈规陋俗也会被人们所遗弃。由于更加关注公众生活所面临的各种危险，人们在精神方面的好奇心相应减少。社会紧迫感会消除各种恶劣行为或者反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开始为自己以前逃避罪责的行为感到羞耻。公共秩序得以改善，喜欢冒险的人越来越少，犯罪与物资浪费也随之减少。家庭关系得以加强，性别差异加大，而在儿童抚养方面出现父母过度宠爱子女的现象。年青人将精力集中于世俗的成功之上，将价值观念留在老人之手。战争充满了愤怒，而追求战绩的目的性也更强。

最终，这种情绪转化为疲惫、轻松与乐观。人们恢复了对社会与权威的信任。倍受鼓舞的领导者开始描绘发展蓝图，人们充满了希望，整个社会则在期盼善良与单纯。

今天的老人认为这种情绪属于大萧条与二战时期，其实类似现象在美国内战、美国革命，甚至在殖民地时期与英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都曾出现过。

让我们回顾一下美国人在上次危机最黑暗的岁月中是如何看待未来的：从"彩虹之上的某个地方"到 1939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期间展示的五彩缤纷的未来世界，人们无不满怀希望与决心，对社会应该往何处去持有坚定而相同的观点：精神单纯（家与苹果馅饼）与物质丰富（更多、更大、更好的住房与苹果馅饼）。只要社会各界精诚团结，甘愿做出自我牺牲，就能赢得胜利，从而轻易实现上述目标。

我们在本章结尾，对英美历史上的 7 个百年周期中的所有转折进行了概述。每次转折都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最后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与焦虑。四次转折就是这样不断推动巨大的时间之轮的，并周期性地给文明注

入新的活力，将人类的冒险历程不断推向前进。

在下面的总结图表中，百年周期中的四个阶段向我们展现出几种不同的循环。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百年周期，历史会是个什么样子？

根据杂乱无序时间论的观点，历史没有任何发展模式。无论谁对之进行画表分类，都会列出许多横项与纵项。这些项目可以用来说明任何现象，因而也就相当于什么也说明不了。社会在之字型道路上毫无目的地行进，随时都会加速、停止、掉转方向或者告一段落。

根据线性时间论，不会出现任何转折，只会出现单一发展路线中的某些阶段。每 20 年一个阶段，在内容与结构上，每个阶段都会超过上一阶段。在每张图表中，每行各个单元的内容读起来，除乘数更大一点外，与前面的单元没有什么差别。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的情况就可以推断出 21 世纪 20 年代是个什么样子，那时电视频道更多，网页更多，老年补贴增加，企业自由代理人数也将增加，此外还会发生更多的枪杀事件，新闻媒体对暴力的报道也更多，文化分裂现象日趋严重，对政治玩世不恭的态度有增无减，青年人异化现象更趋严重，党派偏见不断加深，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永远不会有终点、平衡与纠正。美国最后将沿着某条奇怪的离心路线彻底驶出可控范围。

依照循环时间论，社会一直在发展。通常，这种发展是一种螺旋式前进，有时则表现为螺旋式倒退。人们总是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节制自己当前的过度行为，寻求一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自己需求的未来。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得以持续与繁荣。

四次转折的情绪				
	第一次转折（觉醒）	第二次转折（高涨）	第三次转折（解体）	第四次转折（危机）
世代进入：				
老年	游牧者	英雄	艺术家	预言家
中年	英雄	艺术家	预言家	游牧者
青年	艺术家	预言家	游牧者	英雄
童年	预言家	游牧者	英雄	艺术家
家庭	强大	弱化	脆弱	加强
孩子抚养	放松	关心不够	加强	过度宠爱
性别角色差异	最大	缩小	最小	加大
理想	确定	发现	争论	拥护
公共机构	得到加强	受到攻击	被腐蚀掉	建立
文化	天真	多情	愤世嫉俗	实用
社会结构	统一	分裂	多样化	移动
世界观	简单	复杂化	复杂	简单化
社会优先项	团体至上	个人观念加强	个人至上	团体观念加强
社会动力源	羞耻感	良心	内疚	耻辱
当务之急观	干有效的事	修正内部世界	做感觉对的事	修正外部世界
未来观	光明	欢欣	黑暗	紧迫
战争	恢复性的	有争议的	非决定性的	全面的

历史发展中的节奏

1969 年，在大学生的阵阵反抗声中，一位名为彼德·哈里斯

的青年社会学家在哈佛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200页、题为《美国历史透视》的专论。在文章中，哈里斯得出了如下惊人的结论：在三个多世纪的美国历史中，许多社会指标——出生率、结婚年龄、工资增加额、社会稳定性、政治激进主义——总是大约每隔22年左右发生一次突然转变。这种根据各种历史档案材料总结出的富有韧性的模式迫使哈里斯开始对自己专业中的线性理论标准进行重新思考，并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现在他是泰普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许他在想那些目标为城市化、工业化与教育的长期发展趋势毕竟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相反，或许“通过美国历史中那些漫长的阶段，可能发现社会制度在发展与演变方面表现出一种令人称奇、极为规则的模式”——换言之，“一种真正的人生循环系统”。

哈里斯将这种长22年的阶段称为“发展循环间隔”，并点出了转折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国家的情绪’也会严格按照这种人们熟知的间隔，发生摆动或循环。”这些循环首尾相连，成为一个贯穿全部美国历史的自然度量单位。例如，他指出，“从英国内战到17世纪80年代殖民地暴动（当地的光荣革命）的时间恰好是两个生长周期，而独立战争却是在四个循环周期之后爆发的。”他说，如果美国人在1689年用他的理论来预测未来，“按照该时期的循环时间定位，危机的发生时间应该定在1777年。”

近几十年来，许多著名学者表示支持哈里斯的观点，赞同小阿瑟·史勒辛格所谓的“人类历史的变迁与沉浮模式”。这些循环起止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长度要么是整整一个百年周期，要么是半个百年周期。持续整整一个百年周期的循环通常可以划分为四个周期性阶段。持续半个百年周期的循环（诸如经济学家主张的康式循环或者哈里斯自己提出的发展间隔）通常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与整个百年周期非常吻合，宛如

一种双节拍。那么，导致这些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像史勒辛格一样，大多数理论家指向了世代变迁——即使他们自己无法确切讲明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哈里斯认为每代人的“情绪个性”会随着社会化环境中的周期性变化而波动。

这些循环理论家的观点未能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主要原因在于主流学派在评判每种新发现的循环时把它当成了一种孤立的珍品古玩来品味。大多数学者既不寻求循环，也不对他们碰巧发现的循环的发生原因进行思考。只要专家们不予以重视，无论历史发展周期在与他们的对话中表现得多么不屈不挠或者善于雄辩都无济于事。百年周期依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仿佛它仍躺在伊特鲁里亚人的某个墓穴之中，没有人能读懂雕刻在它身上的文字。

某些循环趋势由于未能得到精确的量化处理而受到了曲解。怀疑论者恰好利用了人类的这种无能。让我们考虑一下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对政治与家庭权威的态度。在 1935 至 1975 年这半个百年周期中，调查结果确认了这种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事实。在此之前，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从 1690 至 1740 年的半个百年周期，只能根据主要材料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得出这样的推论：从地方资源青年养护队到惠勒尔牧场嬉皮士的时间间隔与年青的科顿·马瑟撰写的那些内容简洁的“家庭和睦”的小品文及年青的疯狂而虚荣的约翰·达文波特（1597－1670）点燃篝火的时间间隔接近。我们需要同样的想像力，才能将下述两代人进行比较：18 世纪 80 年代就论文集《联邦主义者》展开争论的兴奋不已的青年理性主义者与在 19 世纪 30 年代被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称为“（聚在一起不是进行辩论与建设而是“指责、祈祷、布道或抵抗”）出生时头脑中带着尖刀的年青人……疯男疯女、留胡须者、浸礼会教派、反对三位一

体论的马格莱顿信徒、激进分子、呻吟派、重农派、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浸信会教友、教友派信徒、废奴主义者、加尔文主义者、一神教派信徒与哲学家”。

尽管无法直接测量出核心趋势，某些相关指标还是能测量出来。请你思考一下上述青年人摇摆不定的态度对学生运动有些什么暗示。你能够找到类似的摆动情况吗？如果能，你的答案将会得到自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温斯罗普在同一年出生）将大学指责为反对英国皇权的“主要力量”以来历史记录的确认：每个百年周期发生一次，觉醒期会导致大学生反对社会权威的暴动急剧增加，而其激烈程度也更是有增无减。这种学生运动在 18 世纪 40 年代、19 世纪 30 年代、80 年代与 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了高潮。另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在美国建立乌托邦公社。这一模式主要集中在觉醒时期（尤其是在 1840 年、1900 年与 1970 年左右）。为此政治学家迈克尔·巴库恩称，这“充分表明存在一种乌托邦式循环，其节奏基本可以预测。”

要描述一种历史循环，需要有一个可以对日期与数量进行比较的客观框架，并在这种框架中对之进行阐述与量化处理。在了解这些注意事项之后，现在让我们返回来关注一下与百年周期同步的其他循环。

政治

美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循环理论是阿瑟·史勒辛格在研究亨里·亚当斯的一句话时提出来的。史勒辛格发现，自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政治在自由与保守之间不规则地摆动着。后来他的儿子小阿瑟·史勒辛格将该理论加以完善，并将它们概括为大众热情时期与私人利益时期。

史勒辛格的循环与百年周期的排列关系如下：大众热情时期相当于觉醒与危机两个转折期，而私人利益时期则和高涨与解体

期相一致。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奇：危机期与觉醒期都需要对大众热情进行重新确定——前者满足社会生存的需要，而后者则满足社会表现的需要。在高涨期与解体期不会出现这种需要。

史勒辛格所做上述类比不很准确，如果他的循环（每个周期大约为50年）的行进速度不是那么快的话，也许与百年周期更加接近。他通过奥尔特加长度仅为15年的“世代”周期的例子来为这种快速的周期理论辩护。然而奥尔特加提出的只是一个假设，从未经受历史的真正考验。人们会想，一个15年的循环将很快偏离百年周期。然而通过忍受这些奇怪的周期，史勒辛格拉近了自己的循环周期与百年周期的距离。当然，最近这种观点的缺点已经开始暴露。据他推断，美国将在1988年进入一个大政府自由主义新时代。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出现。4年后，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史勒辛格又预言一个新的自由主义时期即将到来。但他的预言又没有成功。如果把时间定位放在一边，应该说史勒辛格对美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节奏的认识是正确的。权威政府尚未死亡，目前处于休眠状态，正为在第四次转折期间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做着准备。

第二种著名的美国政治循环理论是与百年周期完全相符的政党重新联盟循环。大约每隔40年左右——而且总是在危机或觉醒期间，一次新的“重新联盟选举”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政党体系”。根据华尔特·迪恩·伯纳姆的观点，这些选举分别发生在1788年（联邦派—共和一代）；1828年（杰克逊领导的民主党）；1860年（林肯领导的共和党）；1896年（麦金利领导的共和党）；1932年（推行新政的民主党）；与1968年、1972年或1980年（尼克松—里根领导的共和党）。根据这种推算，伯纳姆认为我们目前处于第6个政党体系。尽管上述理论与自己的循环理论有出入，史勒辛格依然承认它们的发展非常规则。他指出，“在过去

125年中，每次重新联盟循环都持续了大约40年。”产生这些循环的原因是什么？政治学教授保罗·艾伦·贝克认为，那些在结盟时期长大的孩子成年后逃避联盟，而在“正常”政治时代长大的孩子成年后却追求这种联盟。结果是每隔两个人生阶段就会出现一次重新结盟。

史勒辛格与伯纳姆的循环理论都描述了一种二分式变化周期，持续时间为半个百年周期，因此，我们可以将之纳入四分式百年周期中重新认识，使之趋于完善。觉醒时期的大众热情不可能与危机时期相同。本世纪60年代发生的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激进活动根本不是新政的重演，1900年左右的倒幕运动也难以让人联想到林肯的联盟党。有一种大众热情可以削弱政府的权威性，也有一种可以加强政府的权威性。同样，高涨时期的私人利益也不能与解体时期的私人利益划等号。在高涨时期，私人利益想与仍在起作用的公共机构合作，而在解体时期，它则想逃离正在走向衰败的公共机构。

百年周期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了二分式重新联盟循环：政党团结、参加选举人数增加、竞选时颇具绅士风度的时代一般始于危机期临近结束时，并贯穿整个高涨期。而政党分裂、参选率下降、第三党的改革与竞选过程中相互攻击的时代通常始于觉醒期临近结束时，并贯穿整个解体期。在1970年至1990年这段时间，参选率急剧下降，1900年至1920年之间的情况与此类似。罗斯·佩鲁特在1992年选举中所获选票数量是自布尔·莫斯1912年选举胜利以来第三党所获票数最多的一次。而1912年的选举则是共和党自1856年以来所获选票最多的一次。所有上述情况都发生在解体时期。在觉醒时期，选民想与越来越不值得信任的公共权力机构断绝关系。相反在危机时期，选民希望重建这种机构，因为他们更加信任、也更加需要它。可以称觉醒时期的大多

数选举是分裂性的，反映了党纪的松散；而大多数在危机时期举行的选举可以说是重新联盟的，确定或加强了一党统治。

外交

许多人也许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比什么都要零乱随意。什么模式能够解释清世界各地的战争及治国之术呢？大多数外交史学家一直未能回答这一问题，直到1952年，学者弗兰克·克林伯格才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现了一种"情绪的历史性变动"。他阐明了某一事件与社会对它的反映之间的明显区别。他指出，无论受到何种挑衅，美国的反映取决于其主导情绪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

在克林伯格提出的循环中，每次变化大约持续47年，与百年周期非常接近，只有美国内战期间与结束后不久那个时期除外。总之，他的内向论与觉醒期和危机期相重叠；而他的外向论则与高涨期与解体期交汇。在觉醒或危机时期，人们为社会的内部变化所吸引（从新政直到珍珠港事件；越南战争之后象征着祥和的宝瓶座时代），美国正在向一个内向型社会发展。在高涨或解体期，人们的目光越过了国界（去从事炮舰外交、天定扩张说或者全球联合），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外向。在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克林伯格循环完全偏离了百年周期的正常节奏，也许是因为内战带来的是异常灾难性的痛苦，而非战胜一个外国强敌后产生的欢欣。

克林伯格在解释他的循环理论时，提到了"世代经验"，尤其提到了年长的国家领导者渴望修正中年时所犯的各种"错误"，并恢复少年时流行的决策风格。在本世纪80年代早期，克林伯格写道，美国从1967年开始了一个内向时代。这个时代将持续到1987年。根据这种推算方法，下一个外向式时代将持续到2014年。

经济

1930年，斯大林下令逮捕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蒂夫，并把他流放到西伯里亚。他的罪名是：竟敢反对线性论特征最鲜明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康德拉蒂夫认为，市场经济长期以来呈现出循环的特征。他在劳改局去世后不久，就成为全世界经济史学家崇拜的对象。今天，他的名字与一系列为人所熟知的二分式“康式（经济）循环”联系在一起。这些循环可以上溯到15世纪，周期在40到55年之间。

这些康式循环在具体细节上有所区别，但大多与百年周期非常吻合。循环的高潮发生在高潮期与解体期临近结束时，而低潮则发生在觉醒期与危机期临近结束时。（这表明美国目前处于一个波长很大的高涨期。该高涨期始于1980年，并将持续到2000年过后不久。）在这里，一个双向的钟摆又一次与百年周期的季节性特点相背离。在高涨期，工资与生产力的发展一般比较顺利而且速度很快。在觉醒期，高速发展的经济至少遭受过一次较大的挫折（本世纪70年代中期、19世纪90年代中期和30年代末期、以及18世纪30年代中期）。现在人们认为这些挫折结束了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解体期，经济活动又加快了步伐，但是增长速度不平衡而且出现间歇现象。在危机期，经济发展要先后经受恐慌、萧条、通货膨胀、战争与全民军营化管理等一系列因素的蹂躏。在危机末期，它将会恢复健康的发展轨道。

公共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转折期不同而差别很大。在高涨期，政府扮演一个在计划与管理两个方面表现得非常盲目的角色。17世纪前10年的皇家贸易特许证、19世纪70年代的国会赠与地与本世纪50年代的“军工联合体”都是典型的例证。游戏规则是提倡储蓄，照顾年青人，保护有组织的生产商（垄断企业、托拉斯、行会与工会）。在觉醒期，这种大众角色所暗含

的全民协同努力的现象逐步消失。在解体期，国家管制受到削弱，而开拓冒险精神及创造性毁灭市场的行为开始占上风。同时，游戏规则开始倡导动用储蓄余额，照顾老年人，保护个人消费者。在危机期，将会重新出现全国上下团结共进的局面。

收入与阶级平等问题也存在一种类似的节奏。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贫苦人口比率持续明显下降的时期（1946－1967 年与 1865－1890 年），这与以前出现的两次贫困人口比率上升的情况大体相符。然而历史上收入最不均衡的阶段（本世纪 90 年代末期、20 年代末期、19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与 18 世纪 60 年代末期）都发生在解体期邻近结束时。高涨期促进了收入均衡与阶级地位的平等，而觉醒期却又打破了这种均衡。解体期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而危机期则会予以纠正。

家庭与社会

1963 年，贝蒂·弗里旦在女权运动低潮期写《女性的奥秘》，指出女权运动的历史就像潮汐，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席卷整个美国社会，然后又会在巨澜与旋涡中消退。这些潮汐的发生时间与百年周期一致。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运动在觉醒期迸发。在解体期，男女差别缩小到最低点。在危机期，男权（与女性道德）的功效重新被视为生活的理想。在高涨期，男女差别扩大到最高点，此后将开始新一轮循环。

转折是这样，原型也是如此。预言家世代总是产生一些热情洋溢的女性（从安妮·哈钦森到苏珊·安东尼到希拉里·克林顿）。人们认为她们是与男性同龄人平等的女性。英雄一代喜欢由一位理性模范出任领导（如托马斯·杰斐逊与约翰·肯尼迪式的人物），他们重新确定了男女在公私两方面的劳动分工。几百年来，年青的女性游牧者表现出某些掩盖了男女差别的“男孩”特征，而作为艺术家的年青女性则挥动着、炫耀着（象征着女性的）蜂窝与

铁环，强调男女间的差异。中年时期，后两种原型则努力改变以前的状况——游牧者强调两性差异，而艺术家则要缩小这一差异。弗里旦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许多年青妇女被剥夺了担任公职的机会，只好回到家中操持家务。她谈到这一情况时，一定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这些周期性节奏。还有一些学者就以前高涨期的情况做过类似的论述。

性别角色的周期性转变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在高涨期，家庭成员有一种安全感，在孩子抚养方面表现得更为娇宠与纵容。在解体期，家庭成员则有一种危机感，父母更加爱护孩子。在美国高涨期之前，上一个家庭娇惯孩子的黄金时代是19世纪70年代。家庭演变史家玛丽·凯布尔将之比作“（强调优生优育的）斯波克医生代表的（20世纪）50年代”。在今天的文化战争之前，上一次家庭悲观时代是本世纪20年代。在那10年中，由于家庭观念的丧失而出现的歇斯底里现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与上述家庭变化节奏平行的是某些不断变化的理想或隐喻，美国人用它们来表达自己对整个社会的态度。在高涨期，人们需要一种归属感；在觉醒期，人们想反抗；在解体期，人们想分离；在危机期，人们想团结。在某些少数民族群体中，这些态度在制定群体发展主导战略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郡府向北方倒戈投降之后的百年周期之中，一位给人印象深刻的黑人领导者的形象从布克·T·华盛顿（墨守成规）演变为杜·波伊斯（反抗）到马库斯·加尔威（分裂）。在日本投降之后的百年中，主要的美国黑人运动又重蹈覆辙——从种族平等会议（保守）到黑豹党（反抗）到伊斯兰民主运动（分裂）。

无论一个人所属群体的大小，他或她在高涨期极有可能感到

外界对自己非常公平，一种以羞耻为核心的社会风气将培养人们的凝聚力与感激之情；而在解体时期，人们却会有一种受迫害的感觉，一种以内疚为核心的社会风气将导致分裂与相互谴责。当个人认为自己独立于制度之外时，一个少数群体或个人的目标将与周期产生不和谐。在高涨期，人们想表明自己具有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而在解体期，人们则想说明自己没有必要参与社会活动。

人口

战争的爆发会导致出生率的下降，而和平伊始，出生率又会急剧回升。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可以将这种模式归于某些铁一般不可动摇的生理与经济规律。在现代社会中，百年周期也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高涨期，家庭生活重新受到人们关注，男女差异加大，这必定会影响人口出生率。

在过去5个世纪之中，每当进入第四次转折，人口出生率就会下降。因此，艺术家世代（新近的代表是沉默一代）通常属于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代。而另一方面，每次进入高涨期，一般（一次除外）都会出现人口增长率显著提高的现象。因此，预言家世代（最近的代表是膨胀一代）一般属于人口急剧增长一代。唯一的例外是出生在1860至1882年之间的传教士一代。然而这一例外也同样证明了这一规则的正确性，因为美国内战之后的20年是19世纪20年代至本世纪30年代这段时间（否则会出现人口增长滑坡）中唯一的人口增长高峰期。（在游牧者诞生的）觉醒期与（英雄诞生的）解体时期，人口出生率的升高与下降程度不很明显。在最近的意识革命期间，人口出生率降到了美国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但在该时期临近结束时却又出现了迅速反弹。

向美国移民也有一个百年周期：在觉醒期攀升，在解体期达到高潮，而在危机期开始下降。攀升期与社会移动性的加快、大

众宽容心的提高，领导具有多元化意识以及社会管制放松有关。解体期的颠倒现象是由本土主义思想突然回潮（如19世纪50年代，20世纪20年代与90年代）引起的。随后的下降期与积极保护国家的活动相一致。在危机期到来时，美国社会认为移民是一种不安定因素，而那些可能想在经济形势好转后移民的人则认为这时移民得不偿失。

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移民到美国时都是孩子或年青人。因此，在解体期进入成年期的游牧者原型需要相对较多的移民，相反，在高涨期步入成年的艺术家原型所代表的人口中移民的比例显著下降。例如，沉默一代是美国历史上移民比例最小的一代，而第13代以及（年龄比较大的）迷惘的一代则是移民比例最大的两代。

社会混乱

在觉醒期，社会犯罪率及对混乱社会秩序的担心出现上升趋势，并在解体期达到高潮，然后在危机期急剧下降。

《纽约时报》在1749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悲叹道："看来，如果这个城市中的好人晚上出门时不全副武装，就会非常危险。"在随后的解体期，许多人都发出了类似的慨叹。从1849年西部淘金小镇到强盗泛滥的芝加哥与犯罪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的纽约，每次解体期都给人留下一个美国暴力犯罪活动泛滥成灾的印象。每次犯罪高峰期也是人们齐心协力维护社会治安的时期：私刑一词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义务警察一词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联邦调查局人员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而犯三次罪你就会被捕入狱的说法则诞生于本世纪90年代。最终，大众的努力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危机期临近结束时，暴力活动与社会混乱的统计指标会降低到周期最低点，在随后的高涨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状态将得以保持。

物质浪费的趋势（及相关的不正常现象）与上述犯罪趋势相似，但略微提前了一段时间。事实上，人均饮酒量指标也遵循一个极为规则的周期循环：在高涨期开始攀升，在觉醒期快要结束时达到最高点，然后在解体期大众日益激烈的反对声中开始下降。在第二次大觉醒期临近结束时，美国人的人均饮酒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个数字在1830年达到了最高点（人均年饮酒量为4加仑），然而在内战爆发前夕，这一数字不足上述最高点的三分之一。第二次较大的降幅发生在1900年至1910年之间，即下一次觉醒期行将结束之时，在随后的禁酒时期又继续下滑。近几十年来，人均饮酒量在1960年前后开始回升，在1980年达到了最高点，此后又开始下降。就可以改变人的思想的药物（包括从鸦片剂到迷幻剂在内）来说，其变化趋势也是大同小异。耶鲁大学医学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谈到这种80年的周期性循环时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长大的美国人会觉得社会上的吸毒现象极为普遍，而社会对吸毒行为的容忍度也很高；而在本世纪40年代或者在2000年以后长大的美国人则会有一种社会坚决打击贩毒吸毒现象的印象。"

由于青年时期恰逢犯罪与吸毒多发时期，上述趋势会在正在步入成年的一代人的身上留下一种特殊的标记。青年预言家是社会退步的先导，而纵容孩子的老年英雄则是这种退步的旁观者。在孩童时已习惯于这种退步的青年游牧者后来得了一个缺乏教养的恶名。青年英雄扭转了这种颓势，而喜欢说教的老年预言家则对此拍手称快。从孩童时就习惯于这种转变的青年艺术家后来得了一个非常懂礼貌的好名声。

文化

在思想领域，百年周期在注重精神（在觉醒期）与外部世界（危机期）之间有规则地摇摆。一些知名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

种模式。例如，埃德蒙德·摩根指出："在18世纪40年，美国的主要知识分子大多是牧师，他们思考的对象也是神学。在1790年，他们是政治家，思考的对象也相应变为政治。"这象征了一种由表及里的转移。在本世纪30年代，人们特别注重外部世界；1939年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标志着这一转移达到了高潮，该博览会是对科学的礼赞，更是对人类改变自我生存环境能力的颂歌。相反，本世纪70年代则非常注重内部精神世界，即玛丽琏·弗格森所谓的美国"内部之旅"，即迈向"更高境界"的第一步。

在这种由内部理想与外部理想构成的循环的运转过程中，百年周期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周期性振兴与发展的过程。危机可以彻底改变人们表达思想与情感的社会环境。在高涨期，文化以乐观的（即便有些温柔的）形式反映大众对正在成形的社会秩序所抱的共同愿望。新思潮只是在边缘地区开始出现，并以微妙的形式逐步破坏这种共同愿望，但还构不成大的威胁。在觉醒期，社会安定而繁荣，为新文化的诞生提供了温床。这与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的一句名言非常相符："为艺术而艺术是养尊处优者的哲学。"新的标准、新的风格与新的发展方向首先对危机后的社会秩序发起攻击，然后才能站稳脚跟。在解体期，新文化会经历一个由繁荣走向分裂与多样化的过程。随着危机过后社会秩序的逐步动摇，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主题将逐步失去其独特性，变得更像是滑稽模仿与剽窃。在新危机到来时，这种文化受到净化与审查，然后再为新的公众目标服务。如果说以前可以允许艺术对社会进行某些干扰，它现在的目的却是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之后，新的社会秩序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模板，以便让文化活动（重新）为某些良性的、装饰性的但又具有破坏性的目标服务，进而在海滨开辟一块地方，等待一种新的觉醒期幻想的登陆。

各种文化形式都反映了这些模式。让我们回想一下过去三个百年周期中的音乐风格。在觉醒期产生了黑人圣歌与福音歌曲，随后是拉格泰姆音乐与早期布鲁斯。而最近则产生了黑人灵歌、摇滚乐与表达抵抗情绪的民歌。在解体期产生了歌谣，随后是布鲁斯与爵士乐，最近出现了乡村音乐、说唱音乐与另一种摇滚。在危机期则会产生军歌与进行曲，而最近出现的则是摇摆舞音乐与大乐队音乐。在高涨期会出现歌谣、随后是音乐喜剧与室内乐，而最近出现的则是低声浅唱与古老高雅的摇滚乐。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建筑与时装。高涨期的时装风格夸张而实用，以浪漫复活为特征，融合了男性的自信（与大型建筑）与女性的温顺（与规范化）。在觉醒期则回归自然、宗教、民俗、乡村与原始的主题，而且在开始阶段总要伴随着社会传统规范的逐步解体并（在食品、服装、语言、性别与休闲五个方面）出现一些为良心所驱动的生活方式图腾。解体期就属于这种时期，故意将各种风格、时代与性别混合交叉在一起。第四次转折使人们重新对理性的与古典的东西以及简朴、克制与礼貌产生兴趣——而且男女时装开始进行重新调整，然后重返典雅之路。

虽然每次转折都会在文化方面有所创新，但在某些艺术媒体方面的创新要比其他方面辉煌一些。就音乐而言，觉醒期极富创造性。在文化方面，自莎士比亚与米尔顿以来，高涨期与解体期通常是丰收期。在过去三个百年周期中，解体期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美国此时开始对外宣传其在最近的觉醒期取得的各项成果。19 世纪 50 年代与本世纪 20 年代，美国作家在欧洲获得了令人眩目的名声，而在本世纪 90 年代世界各国对美国通俗文化的各个方面（书籍、学报、新闻、电影、软件与电子游戏）怀有莫大渴望。当然没有哪个时期能与这一时期相比。

彼德·哈里斯在“人生循环系统论”的专论最后，探索了根据这种理论是否“有希望建立一门可预知的社会未来学”。当然，这种希望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线性时间观念格格不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任何循环的左右，可以根据自己的希望做出抉择。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种自由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各种欲望是不可预知的呢？市场商人与民意测验专家并不认为如此。他们之所以不惜花费几十亿美元来研究如何预测人们什么时候想买某些产品或者选举某类候选人，原因也正在于此。这些模式通过统计结果显示出的可靠性不会将人类的自由化为乌有。

这种原则也适用于百年周期。它并不迫使人们去做什么事情。它也不限制任何人的自由，只说明在什么时候大多数人更想推动他们的生活沿着某一方向而非另一方向前进。

意外事件与异常事件

即便一次历史循环没有违背自由意志，仍会留下某些棘手问题：命运、混沌或意外事件。百年周期如何才能与历史上的各种偶然事件及发展趋势和平共处？如果在几百年前，又有谁能预测到人类会发明汽船与火车、经历黑色星期二的股市大动荡、偷袭珍珠港事件、水门事件或者发明微型计算机？什么样的社会变化理论能够预测到这些情况？

答案非常简单：百年周期既不对它们进行预测也不排除它们。是的，历史总是伴有某些意外事件。但是就百年周期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意外事件本身，而是社会对它们的反映。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意外事件，将它转移到另一个年代，并

努力重演其影响。例如，我们将水门事件发生的时间提前40年：1934年前后的美国能接受两位属于大兵一代、迫不及待地将一位刚刚在一场大动荡中就职的传教士一代总统赶下台的老兵记者吗？当然不能。或者将大萧条发生的时间后延40年：1974年左右的膨胀一代能兴高采烈地身着军装、参加准军事工程建设、并设立一个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对付经济危机吗？这种可能性当然也不大。

今天，许多专家宣称科技已经变为一种具有自制能力的力量，可以独自确定主要社会潮流的发展步伐与方向。他们坚持认为，电视正在将美国人转变为一个个收看数千个电视频道的小社会，把他们隐藏在封闭的蚕茧中，从而将社会生活的凝聚性蚕食殆尽。他们说计算机正在将个人神化，削弱社会的权威；计算机带来的信息革命压倒了所有政府，将经济全球化，并使国界变得毫无意义。

上述各种论点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既然这些趋势在解体期才能出现，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技术真的改变了我们还是只是帮助我们获得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40年前，人们普遍认为采用阴极射线技术的电视是一种单一化工具，可以根据著名电视新闻播音员华尔特·克朗凯特与埃德·莎利文播报的多数人都同意的信息来引导社会舆论。而电视现在起的作用却正好相反。40年前，今天被称为计算机的集成晶体管技术让人们联想起压迫弟弟妹妹的老大哥形象。这种技术的全部形式是位于信息金字塔之上的主机。现在计算机的象征意义却恰好相反。今天，这种技术的主导形式是联入一个可参与网络的解体个人站点。

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迎合国家的情绪。当汽车、电话与收音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刚刚出现时，人们认为这些发明通过贫富分离、促进隐私、鼓励人们到世界各地旅游度假，会使

美国人的生活个人化，并逐步走向分裂。这些技术确实有这方面的负作用，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随后在二战期间，由于这些技术被用于护航、通讯联络与宣传，它们也成了公众利益的象征。本世纪50年代，它们在规范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70年代，人们开始对它们展开攻击，称它们象征着非人性化与墨守成规。今天，这些技术重新露面，来适应解体期的社会情绪：跑车、移动电话与微型收音机的广泛普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技术直线论没有充分考虑到一次新转折可能带来的各种危险。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预言：所有人在不久之后将通过各种高科技便携设备进入一个充满无限选择的大千世界。他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的是，仅仅把几条线路反转一下，上述技术可以使一个中央政府监督所有人的行为。再让我们看一下美国人最近开始面对的其他几种与个人选择有关的技术——生育控制与基因测试——并想像一下这些技术也会发生类似的反作用。尽管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不愿意采用本世纪30年代的强迫消毒法与优生学，但是宣布处于高科技时代的美国永远不会步履蹒跚地向那个方向走去，未免过于轻率了些。

技术的诞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历史进程中也会有一些疯狂事件骤然而至，并带来灾难性损失。这些事件往往与某些人名联系在一起。对那些时间杂乱无序论者来说，这种无章可寻的意外事件以一种看似混乱的步伐行进着。就20世纪而言，一个杂乱无章主义者也许会援引阿道夫·希特勒、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与蒂莫西·麦克威这样的例子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些历史火花与整个国家对它们的反应是否真的独立于百年周期之外了呢？希特勒是否做到了这点？美国人想希特勒也许会在任何时代通过挑衅将美国卷入战争，但令人庆幸

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但是他会不会在当前的解体期出现呢?可能不会。奥斯瓦尔德呢?虽然随时都会发生疯狂行为，但美国历史上的政治刺杀案件大多发生在觉醒期。麦克威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本世纪60年代末期，那时人们对过激的爆炸事件的邪恶性并没有取得多少共识。

历史总会产生一些火花。但有些火花稍纵即逝，有的则会形成燎原之势，让人始料不及。历史总是产生一些优秀思想，当然也会产生一些恶劣的思想。有些像云雾，转瞬间就飘逝而去，而有些则会成为伟大的灵感或者招致大的灾难。

正如克林伯格指出的那样，美国对外来挑衅做出反应的历史充满了这种对比。例如，我们可以把美国参加一战和二战的情况进行一下比较。两次战争爆发之前，都发生了外国挑衅事件（英国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被德国潜艇击沉与偷袭珍珠港事件)。一种情况下，国会拖延了两年，继续耐心忍受着挑衅，最后才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宣战。另一种情况下，国会在事发第二天就宣战，进行宣战表决时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在前种情况下，战争引发了一些关键性问题，如禁酒、工人暴动及对煽动性言论的审判。在后种情况下，全民动员，没有遇到丝毫阻力。两次战争都获得了全胜。一战后，士兵们回国后开始对道德规范表示不满，并加入犯罪团伙。二战后，士兵们回国后受到了热烈欢迎。两次战争都扩大了美国的海外影响。一战后，这种影响很快就被白白浪费掉了。二战后，这种影响却在随后的20年中得到了巩固。

在第四次转折过程中，各种世代力量会将各种源自外来因素的事件汇集起来，以便号召全国做出一致反应。当希特勒与东条英机发动全球性侵略战争时，美国做好了在关键时刻做出回应的准备。当时预言家当权，英雄正进入成年，原型发令者指挥战

争，原型听令者则奔赴前线。结果是两代人之间实现了最大限度上的合作。作为老年预言家的领导者并没有在军事对峙中畏缩。确实有人谴责萨姆·亚当斯、约翰·布朗与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他们为达到尽快发动青年的目的，导演了种种紧急事件。

当百年周期进程过半时，任何战争都无法逃避觉醒期由激情的青年人形成的逆流。在越战期间，原型听令者是年长者，而发令者却是年青人。年青预言家对指挥他们行为的道德沦丧的公共机构发起了挑战。与此同时，如果有必要，老年英雄会竭尽全力凭借财富与技术手段来消除牺牲的必要性。结果是两代人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在本世纪 60 年代末期，两代人都对自己在越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都不能以实际行动取悦对方。

英美历史上的每次主要战争都受到了转折的影响，而这些转折又都是由战争所引发的。参见下表：

战争与转折			
第一次转折	第二次转折	第三次转折	第四次转折
安妮女王之战 1812 年战争 朝鲜战争	英国内战 乔治王战争 美国—西班牙战争 越南战争	法印之战 墨西哥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沙漠风暴	玫瑰战争 无敌舰队大战 菲力蒲王之战 培根起义 威廉王之战 光荣革命 美国革命 美国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 1812 年战争（对革命的重新确认）到朝鲜战争（战后全球秩序的重新确认），高涨期的战争都是前一次危机的回音。这

些战争往往以平局收场。人们耐心很大，热情却很低。

从嗜酒成性的信仰复兴主义者 1745 年攻打路易斯堡到 1970 年的“愤怒的日子”①，觉醒期的战争都激荡着青年人的激情。国内的混乱状态促使当局者匆匆做出军事决策，使每次战争在当时就充满了争议，并给后人留下痛苦的记忆。

从攻占魁北克到科威特解放，解体期的战争都是速战速决，人们只是在短时间内关心它。它们未能改变潜在的社会情绪，因而最终也不会起到净化作用。人们的热情很高，但耐心不够。

危机期的战争都是些大规模的、势不两立的决定性战争。国人的决心要取决于老年领导者的远见，而战争的结果则可以彻底重新界定王国、国家或帝国。

百年循环周期可以避免重大战争吗？谁也不知道。觉醒期不需要战争。也许危机期也不需要——尽管自 15 世纪以来所有第四次转折都以全面战争为标志达到高潮。历史只教育人们，无论发生什么战争，总是反映了当前转折期的情绪。第四次转折期间发生的战争定义上最为宽泛，但是结果却是最显著的。这表明，如果日本人没有袭击珍珠港，美国也许会碰到别的挑衅来促使它对轴心国宣战。那样一来，结局会更好还是更糟（比如，没有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妥协）呢？这难以预测。百年周期并不为结果好坏打保票。

然而，既然百年周期在现时代多少发挥些作用，或许能就美国何时可能碰到何种海外联盟或对手提供某些线索。在美国革命结束后不久，年青的美利坚合众国或许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当时整个欧洲旧世界正陷入危机——即革命时代——之中。19 世纪 60 年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美国内战进行之际，欧洲与日本正

① 愤怒的日子，指美国大学生反对越战运动的高潮阶段（约 1969 - 1972 年）。

忙于建国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让美国受了点轻伤，却毁灭了欧洲。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场战争带有解体期冲突的几个重要特征。开始时毫无意义，结束时却充满了仇恨，而且尽管造成了巨大损失，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在大西洋两岸遭受过战争蹂躏的士兵所构成的迷惘的一代中）塑造了一批美国军队此后必须再次面对的极权主义统治者。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与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在1914年8月的年龄都在21岁至31岁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经历第四次转折时发生并非偶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百年周期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二战欧洲胜利日与日本投降日以及铁幕① 的形成是大多数国家在第四次转折期经历的重要事件。因此，在现代历史上，各社会百年周期的时间定位在二战之后变得比以前更具同时性。今天，世界各地的原型星座极为相似。

身居高位的是年长者。人们仍将他们与公众信任及庞大的公共机构联系在一起。这些年长者最近刚从高位上退下，恐怕他们在驾驶国家这艘航船时表现出的强硬无人能比。美国大兵一代的同代人在中国被称为参加过长征的一代（邓小平）、在英国被称为闪电一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法国被称为抵抗一代（弗朗索瓦·密特朗、乔里奥·安德里奥蒂），在苏联被称为爱国战争一代（勃列日涅夫与安德罗波夫）。接替他们担任领导职位的是在战争时还是小孩，经历过空战的成年一代（如鲍里斯·叶利钦、赫尔穆特·科尔、雅克·希拉克、让·克雷第安与罗马诺·普罗蒂）。他们都是些鼓吹开放、外交、通讯与欧洲共同市场的后现代专

① 铁幕，西方报刊及政界用语，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及东欧国家为阻止同欧国美国家进行思想、文化交流而设置的一道无形屏障。

家。与此同时，所有旧的同盟关系日渐衰退，并最终走向破裂。

在他们之后走来的是全球化一代：他们在年青人参加动乱、入侵布拉格、欧洲恐怖主义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进入成年。在欧洲，他们被称为1968年年龄在50多岁的一代（亚里山大·里贝德、盖瑞·亚当斯、查尔斯王子、托尼·布莱尔与何塞·马里亚·亚兹纳尔）。在以色列，他们被称为后出埃及一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内塔尼亚胡。这些美国膨胀一代的同代人为价值观念着迷疯狂，抵触西方通俗文化，为怒气冲天的党徒所吸引，但在掌权方面表现得不是很积极。美国第13代在世界各地的同龄人，即今天的“90年代的一代”（在法国被称为波夫一代，他们对什么都不屑一顾）。他们在媒体中的形象如下：追求欢乐，没有根基，他们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具有企业家气质、追求实用，具有市场头脑，在经济上具有全球化观念，但是对社会怀有恐惧，与政治相比他们更喜欢赚钱。

从里根与撒切尔的特殊友谊，从西雅图到明斯科的大学生在因特网上冲浪，今天世界各地的世代表现出的这种跨越国界的契合性可以保证：已达到担任领导职务年龄的美国人至少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在海外会碰到气质极为相似的人。这可能会使百年周期的节奏性变得更强，并使其四个阶段的时间定位更加规则，从而在更为严重的危机之后迎来更加振奋人心的高涨期。然后，也许不会再重复这类情况。谁也不知道。百年周期不是一种彻底稳定的社会动力，原因非常简单：彻底稳定性是任何人类制度都无法达到的。

毕竟百年周期无法确定各种历史结局的本质、好与坏。这些结局都值得人们怀疑，都受各代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及领导者的）行为好坏的制约。既然这些结局都受到人们的怀疑，百年周期的时间定位与世代结构的规则性同样值得怀疑。既然能够想像

到一场大灾难可以结束所有的历史循环，那么我们也应该将那些可以歪曲或缩短历史循环的小型悲剧考虑在内。因为所有现代社会都可能经历过一次或多次这种不规则的循环。

在英美历史上，美国内战是仅有的不规则现象。该百年周期中的第一次与第二次转折极为正常，但第三次与第四次转折的时间却大大缩短了，两者加起来仅有 22 年（1844 - 1865），相当于一次转折的通常长度。在超验主义觉醒期与美国内战高潮期之间只有 32 年之隔。同样，该百年周期也没有产生英雄一代。这是五个世纪中由四种原型构成的循环受到破坏的唯一一次。

乍一看，美国内战似乎是按照历史发展日程发生的。其高潮年（1863 年）是在上一次危机高潮期之后 80 年到来的，在下次危机高潮期 81 年前发生的。但是内战之前的百年周期比较长。前三次百年周期的长度都接近于一个世纪（分别为 103、101 与 94 年）。世代不可能突然缩短到这种长度。如果节奏的减缓速度比较慢，该周期的长度应该在 90 至 95 年之间。因此，内战危机百年周期的高潮期与结束期也许比历史节奏提示的时间提前了 10 至 15 年。

这是为什么？当时在世的三代成年人（年长的妥协一代、中年的超验一代与年青的镀金一代）的各种最恶劣的本能都发挥到了极至。在亨利·克雷、丹尼尔·韦伯斯特与约翰·凯尔霍恩避免战争的努力失败后，布坎南执政时期的年长的妥协者无法从空洞的政治程序与混乱的道德秩序中自拔。正在进入老年的超验一代分为两个独立的、在地理上分隔开来的团体，因而无法通过陈述残酷战争的种种弊端来防止战争的爆发。与冒险者不同的是，只有在战争毁灭了青年镀金一代的生活与美好前景后，他们才对战争与容易受到伤害的个人荣誉感产生了兴趣。这三代人构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星座。他们加快了危机的进程，使之快速达到了高

潮，造成了最惨重的结果。

就美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第四次转折而言，历史学家可能要绞尽脑汁地想像一种比实际情况更振奋人心的结局。而对内战来说，他们也可以很轻松地设想出一种比较理想的结果。的确，联邦政府得以保全，黑人奴隶获得解放，而工业革命也得以蓬勃发展，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南北方之间的仇恨又持续了一个世纪，南方因此陷入贫困与政治放逐的困境之中。南部的经济重建没有成功，却滑入一个私刑与种族歧视时代，其他各项社会议程（从劳动者的不满情绪到妇女权力等）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只好等到下次觉醒期到来之后才又从零开始。从当时人们的政治反映看，许多美国人的确将那一周期中的第四次转折所产生的非同寻常的痛苦归于年长的超验一代的灾难性行为：内战于1868年结束，在随后的大选中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世代巨变事件，选民们把那些老年狂热分子赶下台，将四十几岁的镀金一代推举为总统。

此后的几代人都未能胜任创建公共机构、实现超验一代理想的英雄角色。进步党一代（在内战之前属于倍受关怀、品质优秀的儿童一代）在他们之后，极有可能扮演这一角色。但是由于那场危机结束得过早，过于激烈，这一代大孩子没有获得什么授权，却受到了巨大伤害。许多年青的进步党一代成员参加过内战，战后的政治大权却落到了“血染衬衫的”镀金一代手中。进步党一代对社会团体几乎不抱任何信心，形成了一种具有改良作用的艺术家原型人格。为补缺原型空白，镀金一代身上混合了游牧者与英雄两种原型。在执掌一个文化异常贫瘠的高涨期的大权之后，镀金一代在一场大骂老一代的觉醒运动中被赶下台。

美国内战这一不规则历史现象表明了世代星座是如何变得具有危险性的，原型如何才能以极具攻击性的方式上演人生循环这

部剧本以及危机如何以事先不可想像的悲剧形式结尾的。它同时也证实了历史发展不是预先设定好的，人的行为（以及他们的政治选择）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进程。

美国内战这一不规则现象既向我们提供了希望，也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其后的转折则恢复了正常。一个遭受了巨大创伤、饱受战争之苦的社会恢复了百年周期内各转折的均衡顺序。即使在危机的高潮阶段，公共权力机构仍坚持种下了以后会带来累累硕果的种子：跨越北美大陆的铁路线，家庭农场与向许多大学赠与土地。它也为民族团结与国家腾飞打下了新基础：在内战结束之前，美国是一个复数名词；结束后变成了单数。内战后的几代人从未放弃对进步的追求与信仰。他们对满目疮痍的社会进行修复，并为未来投下巨资。他们的辛勤劳动、明智的投资抉择以及在消费方面的节制为20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通过学习上述历史先例，可以在下次第四次转折过程中避免一场灾难的发生，我们将对以克雷、林肯与格兰特为代表的先辈感激不尽。

概　　述：
英美百年周期中七个世代与转折的循环

百年周期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周期性循环，时间长度大约与一个寿命较长者的一生相当。它阐明了现代历史上觉醒期与危机期周期性重复出现这一现象。

英美的百年周期可以上溯到15世纪中期，即中世纪后期。共有七个百年周期：

- 中世纪后期（1435－1487）
- 宗教改革（1487－1594）
- 新世界（1594－1704）
- 革命（1704－1794）
- 内战（1794－1865）
- 强国（1865－1946）
- 千年（1946－2026?）

美国目前正处于千年百年周期中的第三次转折，中世纪以后的第24代正在出生。

转　折

转折是指世代原型进入一个新星座时社会情绪的变化。每次转折的时间长度大约与人生一个阶段相当。

第一次转折是高涨期——一个强调政府机构、削弱个人主义的乐观时代。期间，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旧的价值观念在腐朽没落。（游牧者进入老年；英雄进入中年；艺术家进入青年；预言家则进入童年。）

第二次转折是觉醒期——一个精神大动荡、充满激情的时代。此时社会秩序受到新的价值体系的冲击。（英雄进入老年；艺术家进入中年；预言家进入青年；游牧者进入童年。）

第三次转折是解体期——是一个个人主义得到张扬而政府机构受到削弱的悲观时代。期间，旧的社会秩序走向衰落，新的价值体系正在深入人心。（艺术家进入老年；预言家进入中年；游牧者进入青年；英雄进入童年。）

第四次转折是危机期——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百年周期大动荡时期。此时，在价值体系的推动下，旧的社会秩序被新

的社会秩序所代替。（预言家进入老年；游牧者进入中年；英雄进入青年；艺术家进入童年。）

中世纪后期的半个百年周期：转折

·从法国撤军（第三次转折，1435－1459）这是一个王朝衰落，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1435年，在圣女贞德被处死之后，英国人最后从巴黎撤走。在15世纪40年代，英国人被全部赶出法国，从而宣布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同时，年轻的亨里六世治国无术，使英国的中央集权受到削弱。到15世纪50年代，王公贵族纷纷置法律于不顾，争权夺利，私下相互宣战，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此时，亚瑟王一代正进入童年。

·玫瑰战争（第四次转折，1459－1487）以兰加斯特王朝与约克王朝发生了不可挽回的矛盾为契机。在一场伤亡惨重的内战之后，约克王朝的几位国王（爱德华四世、五世与理查三世）在位时发生了外国入侵与国民起义事件。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1485年）中，亨里·都铎打败了理查三世，然后自封为亨里七世，成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两年后，他在斯多克战役中打败了一位妄图篡夺王位者，从而彻底赢得了臣民的信任。

这时，亚瑟王一代正步入青年。

人文主义者正进入童年。

世　代

世代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共同的历史定位赋予他们一种集体人格面具。一个世代的时间跨度大体与一个人生阶段相当。世代分为四个原型，且排列顺序总是一致，它们在每个人生阶段都构成了一个星座。

预言家原型诞生在高涨期，在觉醒期进入青年期，在解体期进入中年，然后在危机期进入老年。

游牧者原型诞生于觉醒期，在解体期进入青年，在危机期进入中年，在高涨期进入老年。

英雄原型出生于解体期，在危机期进入青年，在高涨期进入中年，在觉醒期进入老年。

艺术家原型出生在危机期，在高涨期进入青年，在觉醒期进入中年，在解体期进入老年。

在第四次转折过程中，这一星座包括所有出生于本百年周期内的四个原型。在前三次转折中，该星座包括一个和多个在上个百年周期出生的原型。

中世纪后期的半个百年周期：世代

·亚瑟王一代（英雄，出生在 1433 - 1460）在英国从法国撤退这一士气受挫时期长大。那是一个悲观情绪日益加重、社会秩序渐趋混乱的时期。父辈将挽救王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亚瑟王一代成年时遇上了一场内战——战争以 28 岁的亨利·都铎建立新的君主政治而宣告结束。进入中年的过程中，他们紧密团结在一个充满男子汉气概的新时代周围。这时，经济繁荣（以羊毛出口为代表），社会治安良好（以公务繁忙的地方行政长官为代表）与中央政府强大（以新设立的专断暴虐的星室法庭为代表）。进入老年的过程中，他们圈地、印刷书籍、计划航海去新世界，为此赢得了骑士团结协作的好名声。这在讲述他们这一代人的珍贵史诗《亚瑟王之死》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代表人物：英国的爱德华四世、亨利七世、约翰·卡波特、威廉·格罗新、约翰·德·威尔；欧洲大陆的达·芬奇、克里斯托夫·哥伦布）

·人文主义者一代（艺术家，出生在 1461 - 1482）在血腥内

战中度过了一个安全的童年。他们中许多精英都在国外上过学。进入成年的过程中，他们明白自己的任务是完善新秩序。在青年时代，他们成为新的人文主义者——希腊语教师、国际知名学者、歌谣诗人、受过法律教育的高级教士与能看书写字的商人及自耕农。由于在中年时经历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打击，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有些人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对外界不闻不问。有的则闪烁其词，相互推诿。少数人辛辣地讽刺了社会上盛行的虚伪之风，坚决维护旧秩序，并为此献出了生命。在老年，一种激进思想残酷地推翻了他们的繁文缛节，给他们以巨大打击。（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里纳克、约翰·克里特、沃尔西枢机主教、斯蒂芬·加迪纳；欧洲大陆的米开朗琪罗、哥白尼）

宗教改革百年周期：转折

·都铎文艺复兴（第一次转折，1487－1517）是一个政治与社会巩固发展的时代。在大众的欢呼声中，亨利七世挫败了新王朝遇到的几次挑战，巩固了王政。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人口出生率上升，商业繁荣，社会建设迅猛发展。当时大兴奢华之风，沃尔西枢机主教修建的豪华宫殿就是最好的印证。该时代在一种文化贫乏的情绪中走向结束。

此时亚瑟王一代正步入中年。

人文主义者进入青年。

宗教改革派进入童年。

·新教改革（第二次转折，1517－1542）以德国马丁·路德抨击罗马教庭为开端，迅速蔓延到英国。这种改革热情以亨利八世宣布与罗马教皇决裂、威廉·廷德尔《圣经》译本的出版、广受欢迎的改革项目以及国会没收教会大片地产为标志达到了高潮。

随着改革者渐露疲态或者（如托马斯·克伦威尔）受到处决，以及与苏格兰之战和与英国战争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该时代也宣告结束。

此时，亚瑟王一代正在进入老年。

人文主义者进入中年。

改革派进入青年。

报复派进入童年。

·偏狭与牺牲（第三次转折，1542－1569）是一个社会分裂、农民暴动与政治阴谋的时代。在爱德华六世与玛丽女王在位期间，最高统治者因为宗教问题不断易位。经济像一艘航船在发展与停滞的交替循环中缓慢而行。皇室的腐败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在该时代结束时，即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早期，整个国家陷入失望之中，对未来充满了焦虑。

此时，人文主义者正进入老年。

改革派进入中年。

报复派进入青年。

伊丽莎白一代进入童年。

·无敌舰队危机（第四次转折，1569－1594）以大权在握的诺福克公爵与西班牙人密谋反对英国王室为开端。阴谋被揭穿后，刚刚改信新教的英格兰开始认为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全球范围内对其形成威胁，于是奋起反击。经过一系列小规模战争与掳获商船事件之后，双方的对峙不断升级。随着英格兰（1588年）在抵抗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战争中获得奇迹般胜利，战争达到了高潮。在成功击退荷兰人的入侵，粉碎了西班牙统治法国的企图之后，这种紧张情绪才得以舒缓。

此时，改革派正进入老年。

报复派进入中年。

伊丽莎白一代进入青年。

议会党人进入童年。

宗教改革百年周期：世代

宗教改革一代（预言家，出生在1483－1511）从小衣食无忧，生活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青年时成为反抗者，首先鼓动大学（16世纪20年代），然后怂恿一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青国王及议会（16世纪30年代）参加了一场宗教大动荡。动荡过后，天主教会受到了清算，神职人员纷纷被解散，大众开始用圣经来武装自己，英国国教与罗马脱离。在中年，他们的自以为是演变为坚守原则。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成为联邦说教者、性爱秘学之家、改信加尔文主义（或者罗马主义者）者以及因为宣传异教邪说而被处死但毫不后悔的殉道者。进入老年之后，他们中许多人看到了英国清教徒迁往异乡定居，而这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渴求的目标。（代表人物有英国的亨里八世、托马斯·克伦威尔、约翰·诺克斯、伊丽莎白·巴尔顿、威廉·廷德尔、尼克拉斯·里德雷以及欧洲的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报复一代（游牧者，出生在1512－1540）在宗教狂热与日见没落的社会权威的环境中度过童年。在愤世嫉俗的后觉醒时期——政界充满了残酷的内讧，市场起伏不定——步入成年。他们中有喜欢吹牛的商人、雇佣军、间谍及以掳掠商船为生、凭借勇气与运气进行报复的海盗。他们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他们进入中年时恰逢英国女王（本人也是一位聪明的孤儿）与西班牙帝国对峙抗衡的时代。他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险者知道如何“烧掉菲力蒲王的胡子”，偷走他的金子。他们用简单的言词呼吁英国人维护国家尊严。老年时，他们凭借睿智与经验，成为争取英国社会团结的核心力量。他们以个人牺牲为一个光荣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代表人物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弗兰西斯·德雷克、约翰·霍金斯、托马斯·格雷夏姆、伯雷勋爵、弗兰西斯·沃尔辛汉姆与欧洲的凯瑟琳·德·麦迪茜、米歇尔·德·蒙田)

伊丽莎白一代（英雄，出生在 1541 - 1565）从小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当时上述学校的办学初衷是将他们塑造成为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巨大成功、在工作中团结协作的完美典范。他们进入成年时正值英国与西班牙的几场大战。他们应征入伍，骁勇善战，对宫廷忠心耿耿。在辉煌的中年时期，他们治理商业，到海外许多国家探险，修建豪华的乡下别墅，追求新科学，写诗赞美秩序井然的宇宙。历史学家安东尼·埃斯勒认为，这些“奸诈的成功者”凭借那些“规模宏大、野心勃勃的工程”将自己与前辈——“被燃尽的一代”区分开来。进入老年后，他们看到了人民幸福、国力不断增强的“欢乐的英格兰”。而他们十分挑剔但有良心的子女却对此不屑一顾。（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威廉·莎士比亚、沃尔特·拉里、菲力蒲·西德尼、弗兰西斯·威尔、弗兰西斯·培根，爱德华·库克与欧洲的塞万提斯与伽里略）

议会党一代（艺术家，出生在 1566 - 1587）在一个充满外来威胁与对外战争的时代中度过了童年。成年时恰逢大英帝国和平昌盛之初，他们在法律、学术、宗教、手工艺方面赢得了近乎完美的信誉。他们这些新文学贵族在乡村别墅中影响着那时的社会。在宫廷中，他们成为詹姆士一世推行的拜占庭政策的辩护者。在议会中，他们提倡文明，坚持以先例为议事准则，主张遵守正当的议事程序与议事内容公开化。在中年，他们的渐进主义思想受到了青年激进分子的抨击。他们中的阿米尼乌斯派教徒进行争辩，但受到了反抗；他们中的议会党一代对此表示欢迎，但没有正面回答。他们在讲演与布道词中含糊其辞，眼看着英格兰朝着一个充满歇斯底里与暴力的旋涡中驶去，却无能为力。（代

表人物有英国的詹姆士一世、约翰·多恩、威廉·劳德、伊尼古·琼斯、白金汉公爵、约翰·塞尔登与欧洲的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及彼德·保罗·鲁宾斯)

新世界百年周期：转折

·美好的英格兰（第一次转折，1594 - 1621）是一个乐观与繁荣的时代，充满了帝国梦想，同时又对海外敌人保持警惕。就艺术而言，这是真正的英格兰文艺复兴；而对文学来说，这是光荣的莎士比亚时代。詹姆士一世在 1601 年接替伊丽莎白女王上台之后，鼓励学术、探险与贸易。他与下院的友好关系在他执政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受到削弱。

此时报复一代正进入老年。

伊丽莎白一代进入中年。

议会党一代进入青年。

清教徒一代进入童年。

·清教徒觉醒（第二次转折，1621 - 1649）以议会的《大抗议书》为开端。詹姆士的儿子上台后，改革浪潮日益汹涌，并获得了大众的普遍支持。约翰·温斯罗普带领剩下的一些真正的清教徒为寻求宗教流放地而来到北美大陆。在英格兰，清教徒运动导致了长议会（1640 年）、内战与查理一世被处决（1649 年）。在新鲜而荒凉的殖民地，宗教实验的热情有所下降，各个解体的定居地开始寻找可执行的正统道德规范。

此时，伊丽莎白一代正进入老年。

议会党一代进入中年。

清教徒一代进入青年。

保皇党一代进入童年。

·反动与复辟（第三次转折，1649 - 1675）是一个漂流与就

向新世界移民的理想展开激烈争论的时代。面对风云突变的形势（克伦威尔在17世纪50年代的摄政职位、斯图亚特王朝在1660年的复辟、1664年与荷兰之战而夺取了今天的纽约），各殖民地的居民感到迷惑不解，开始各自为政，纷纷与英格兰断绝往来。该时代以殖民地自治权力的削弱与对未来形势的焦虑而告终。

此时，议会党一代正进入老年。

清教徒 一代进入中年。

保皇党一代进入青年。

光荣一代进入童年。

•殖民地光荣革命（第四次转折，1675－1704）以国内动荡与灾难性的对印第安人之战为开端。不久之后，英格兰议会努力恢复皇室对北美各殖民地的直接领导权。随后的抵抗活动以1689年的殖民地起义为标志达到了高潮。上述起义是英格兰以奥伦治公爵威廉的名义成功发动光荣革命的消息传到殖民地后爆发的。在随后10年中，英国人又与（加拿大）新法兰西开战，最后以英国在全球的胜利、殖民地自治制度的加强以及与土著人关系相对和平的新时代而告终。

此时，清教徒一代正进入老年。

保皇党一代进入中年。

光荣一代进入青年。

启蒙主义一代进入童年。

新世界百年周期：世代

清教徒一代（预言家，出生在1588－1617）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在无敌舰队被击败后的和平年代渡过的。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他们中许多人在进入成年后，公开指责老一代雅各宾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精神空虚。他们中有人后来领导

英格兰打了一场内战，将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还有一些人在上帝的召唤下，发动了一场北美大移民运动。这些年轻的清教徒在从长岛到缅因州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许多以教堂为中心的城镇。他们以前曾极力倡导爱心，但中年时由于担心旧世界可能会对信仰没有改变的儿女产生恶劣影响，便开始推行严格的法制。他们的道德权威性直到老年时期都未曾受到人们的挑战，因为他们是印第安战争与光荣革命中的老年顽固派成员。（代表人物有殖民地的安妮·哈钦森、约翰·温斯罗普、西蒙·布莱德斯特里特、罗杰·威廉斯、约翰·哈佛、威廉·伯克利与国外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及笛卡尔）

保皇党一代（游牧者，出生于1618－1647）在一个宗教大动荡与家庭崩溃的时代长大成人。在新英格兰，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的后代；在切萨皮克殖民地，他们是那些因父母早逝或为贫困所迫，搭乘疾病流行、驶往烟草种植地的航船、签有契约的英国年青人。他们以暴力与缺乏教养而著称。他们在进入成年的过程中喜欢冒大险，许多人年青时死去，有的成为那个世纪最著名的商人、猎手、雇佣军、叛逆与海盗。中年时代，他们英勇地反抗来自旧世界独裁者与新世界土著人的威胁。作为在政治上有污点的老年人，他们很少反对那些主要以他们的同代人为迫害目标的族间仇杀（如萨勒姆杀巫事件）。（代表人物有殖民地的英克利斯·马瑟、威廉·斯托顿、本杰明·车尔吉、麦塔考米特、威廉·吉德、纳桑尼尔·培根与国外的路易十四、约翰·洛克）

光荣一代（英雄，出生在1648－1673）童年时受到父母的保护，上过以地方税收为后盾的学校，而且当时通过的新法律禁止“绑架”年青人做仆人。他们在印第安战争与光荣革命中表现英勇，年青时就被委以重任。青年时代，他们为英格兰在政治、商业与科技方面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同时认为父辈的热情与穷困

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应该予以克服。中年时，他们推行保险制度、发行纸币，兴建公共设施，并（在南方）建立了一种稳定的蓄奴寡头政治制度。老年时，他们精于世故，殖民地向他们发放了第一笔军务抚恤金，并向他们赠与地产。他们对青年人的宗教狂热行为极为不满。（代表人物有殖民地的科顿·马瑟、约翰·维斯、威廉·兰道夫、罗伯特·“金”·卡特、哈纳·达斯汀、彼得·舒勒尔与国外的奥伦治公爵威廉、沙皇彼得大帝）

启蒙一代（艺术家，出生于1674-1700）他们童年时，家庭观念浓厚，社会不鼓励青年人冒险，特别注重教育与美满婚姻。成年时，他们当中的精英分子过上了一种斯文的威廉斯堡式的城镇与种植园二位一体的富裕生活。青年时，这个作为继承者的一代为各殖民地提供了第一批持证上岗的职员、政治官员与种植园主。中年后，他们沃尔普式的领导风格中透着对年青一代的关注。他们对年青人的宗教狂热情绪既欢迎又心怀恐惧。他们中许多人在老年亲眼目睹了（在《印花税法案》事件中）青年一代抛弃了他们的小世界所赖以生存的喝茶时的彬彬有礼与洛克克式的繁文缛节。（代表人物有殖民地的约翰·彼得·曾格、亚里山大·斯波茨伍德、塞缪尔·约翰逊、威廉·比尔德二世、小埃丽莎·库克与国外的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伏尔泰）

革命百年周期：转折

·帝国奥古斯都时代（第一次转折，1704-1727）目睹了殖民地文明第一次充满自信的繁荣景象——贸易额猛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北方）中心城市的建立以及（南方）大规模进口非洲奴隶。当时的美国人大力倡导社会纪律，为大英帝国实力的不断增长感到自豪。从社会角度讲，这时殖民地的虚伪礼仪发展到了极至；从文化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充满了证件、诙谐与以皇家

科学院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时代。

此时保皇党一代正进入老年。

光荣革命一代进入中年。

启蒙一代进入青年。

觉醒一代进入童年。

·大觉醒（第二次转折，1727－1746）以宗教复活的形式发端于康尼狄格山谷，后随着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布道与约纳森·爱德沃兹撰写了许多宗教宣传小册子（1741年），在北方各殖民地达到了歇斯底里式的高潮期。这种热情捣毁了城镇与殖民地的立法会，动摇了微不足道的旧制度，并将年青的信徒与老一代实干家对立起来。在打破温文尔雅的传统与残留的旧世界障碍之后，这种热情在乔治王战争时期逐渐下降。

此时，光荣革命一代进入老年。

启蒙一代进入中年。

觉醒一代进入青年。

自由一代进入童年。

·对法战争与印第安战争（第三次转折，1746－1773）是一个经济活动与领土变化最活跃的时代。殖民者在18世纪50年代卷入一场针对新法兰西的战争。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英国的彻底胜利（1760），重新开始就如何保障公共道德，反对举债，犬儒主义与缺乏教养等不良现象展开了激烈争论。在殖民地领导者机构恢复宁静后，大众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向英国议会与大英帝国的腐败。

此时，启蒙一代正进入老年。

觉醒一代进入中年。

自由一代进入青年。

共和一代进入童年。

·美国革命（第四次转折，1773－1794）英国议会对波士顿倾茶党的反应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殖民地这个火药箱，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召开、康科德战役的打响与《独立宣言》的发布。殖民地人民在约克顿镇的胜利（1781年）标志着这场革命达到了高潮。七年之后，美国各州通过了建国宪法。在华盛顿总统经受住政治极端激进分子的干扰破坏、镇压了拒绝缴纳酒税的不安定分子并与英格兰签订了最后的条约之后，这种危机情绪才渐趋缓和。

此时，觉醒一代进入老年。

自由一代进入中年。

共和一代进入青年。

妥协一代进入童年。

革命百年周期：世代

觉醒一代（预言家，出生于1701－1723）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在美国出生；他们是认为和平与繁荣是想当然的第一代殖民地居民。成年后，他们在一场宗教大动荡中对父母一代的道德自足意识进行了抨击。到18世纪50年代，在打乱了父辈建立的社会秩序、把各殖民地弄得无法无天之后，他们将殖民地推向了悲观的深渊——同时也促成了社会的再生。他们成为美国18世纪最著名的一代教育家、哲学家、教士与废奴主义者。年老之后，他们为美国革命增添了一种道德紧迫感。这种危机感一直持续到宣布独立之前。（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约纳森·爱德沃兹、本杰明·富兰克林、萨姆·亚当斯、伊丽莎·平克尼、约翰·伍尔曼、克里斯坡·阿塔克斯与国外的让·雅克·卢梭、玛丽娅·特雷塞女王）

自由一代（游牧者，出生于1724－1741）在一个像英国画家贺加斯那样对孩子不管不顾的时代努力争取父母的爱抚。他们的

童年是在经济崩溃、土地压力与移民日益增加的时代中度过的。成年后，他们参加了缺乏教养的格林山兄弟会、帕克斯顿兄弟会与自由兄弟会，并作为费力不讨好的步兵与勇敢的武装民船船员参加了对法战争和印第安战争。中年时，他们高喊着“不要冒犯我”与“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成为最勇敢的爱国者（包括大多数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他们中也有革命的叛徒。年老后，他们在领导工作中表现得非常谨慎，对各种伟大事业持怀疑态度，同时他们中的反联邦分子则极力抑制青年一代的民族化热情。（代表人物有美国的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弗朗西斯·马里昂、丹尼尔·布恩、伊坦·艾伦、帕特里克·亨利与国外的乔治三世、凯瑟琳女皇）

共和一代（英雄，出生于 1742 - 1766）出生在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安定时代，因而得到了父母无微不至的爱护。他们成年后，以世俗乐观主义与合作精神而著称。青年时代，他们保家卫国，成为科学家，赢得了荣誉。他们是有条不紊的社会规划家，更是获得巨大成功的政治家。他们深得老一辈的信任，同时也清楚自己的历史责任。他们青年时代就步入政坛。他们是宪法得以批准通过的中坚力量，也是美国早期几届内阁的主要成员。中年，他们开挖运河、扩张领土，而他们中做事井井有条的联邦派与共和一代领导人把美国变为一个“自由工厂”。年老后，那些一心想否定他们成就的年青人让他们感到非常气愤。（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约翰·保罗·琼斯、阿比盖尔·亚当斯、昆塔·金特、罗伯特·富尔顿与国外的马克西米林·罗伯斯皮尔、沃夫冈·阿莫德斯·莫扎特）

妥协一代（艺术家，出生于 1767 - 1791）出生在（亨里·克雷回忆说）“革命的摇篮中”，目睹了勇敢的成年人的抗争与胜利。他们在进入成年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顺从，为勇敢的父辈所

开启的社会完美时代奉献了自己的博学、睿智与专门技能。他们思想浪漫而敏感。青年时期，他们成为历史学家马修·克雷森所谓的"行政管理之父"，并参加了荣耀可能无法与第一次独立战争相比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中年时期，他们指导了平民主义运动，为奴隶制与迁移印第安人事件急躁不安，并主持制定了《大妥协方案》，这反映了他们的犹豫不决。作为老年人，他们担心自己"后英雄时期"的任务失败了，美国的寿命也许超不过他们。（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安德鲁·杰克逊、亨里·克雷、丹尼尔·韦伯斯特、华盛顿·欧文、多利·麦迪逊与国外的拿破仑·波拿巴、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内战百年周期：转折

·感觉良好时代（第一次转折，1794－1822）目睹了乔·巴洛所谓的"征服伽南"。这是一个社会和谐、建立帝国的史诗时代。美国获得了大片新领土。运河、蒸汽船与收费公路将荒野推得更远。一场错误的战争（1812 年）却统一了整个国家。国内几乎没有混乱现象的发生——就像在一个（爱莫森写道）"无法写出一本书……也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思想"的时代，人们对宗教不感兴趣一样。

此时，自由一代进入老年。

共和一代进入中年。

妥协一代进入青年。

超验一代进入童年。

·超验主义觉醒（第二次转折，1822－1844）以查尔斯·菲尼的福音派教义与登马克·维奇的奴隶暴动为开端。不久该运动与杰克逊的平民主义合二为一，而纳特·特纳领导的黑人奴隶起义（1831 年）、废奴团体的建立以及接二连三的政党分裂事件则标

志该运动的高潮。在引发一个浪漫理想主义热潮——包括女权主义、新预言宗教派别、饮食时尚与乌托邦公社——之后，这种热情在 19 世纪 40 年代升华为一种对自助、道德修养与民族扩张命定说的信仰。

此时，共和一代进入老年。

妥协一代进入中年。

超验一代进入青年。

镀金一代进入童年。

·墨西哥战争与地方主义（第三次转折，1844 - 1860）是一个“美元至上”的商业主义与西部淘金热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惠特曼式自我崇拜、反对墨西哥人与爱尔兰人的本土主义时代。在修修补补的国家领导人下面，日益激烈的情绪导致了一系列道德改革活动。到 19 世纪 50 年代——从堪萨斯城到哈泼斯渡口，从德雷德的童子军到地下铁路，根据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观点，这个国家分为两个无法调和的地方群体。

此时，妥协一代正进入老年。

超验一代进入中年。

镀金一代进入青年。

进步党一代进入童年。

·内战（第四次转折，1860 - 1865）以一次总统大选为导火索。许多南方人认为这次选举是促使他们走向分裂的起因。撒姆特堡战役成为迄今为止在新世界国土上进行的最激烈的一场战役。《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与葛底斯堡战役（1863 年）标志着这场战争达到了高潮。两年之后，南方联盟战败投降，而林肯却遇刺身亡。许多人原希望这场战争将“踏平隐藏着愤怒的葡萄的葡萄园”，却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结局。

超验一代中的第一批人进入老年。

镀金一代中的第一批人进入中年。
进步党一代中的第一批人进入青年。
传教士一代中的第一批进入童年。

内战百年周期：世代

超验一代（预言家，出生于1792－1821）出生于美国建国后社会秩序渐趋稳定时期，是第一批被描述（出生时即被命名为）为具有美国个性的孩子。进入成年后，他们以福音传道士、改革者与学生暴动分子的身份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宗教运动。这些指点江山的年青人的内心幻想各不相同，加剧了地方分裂。他们进入中年后，年老的废奴派与南方未能达成妥协，使国家卷入内战；而他们的热情也被一位年长教士的道德声明煽动起来。胜利者实现了解放奴隶的目的，却未能像年老的激进分子希望的那样为美国带来和平。步入老年后，他们中的女权主义者与诗人（许多人留着长胡子）成为真理与正义的坚定阐述者。（代表人物有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杰斐逊·戴卫斯、拉尔夫·爱莫森、苏珊·安东尼、纳特·特纳、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与国外的维多利亚女王、卡尔·马克思）

镀金一代（游牧者，出生于1822－1842）度过了一个苦涩的童年。他们的父母由于受宗教大动荡的影响变得心烦意乱。他们在国家蒸蒸日上、移民大量涌入、商业主义盛行、对政治一无所知与大学入学率锐减之时进入成年。青年时代，他们中许多人来到边境地区的新兴城镇寻求发财梦或者成为早期的“强盗贵族”。他们中的林肯支持派与南方独立派都急切地参加了内战，许多人献出了生命，尤其是南方联盟。进入中年之后，他们开始痛恨道德狂热行为。他们中出任总统的人与企业家开始注重达尔文式经

济学、特威德① 式政治、维多利亚式的谨慎与卡耐基的竞争法则。老年后，他们碰上了城市化经济产生的“工业垃圾堆”。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城市化是一个残酷的过程。(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尤利西斯·格兰特、马克·吐温、约翰·洛克菲勒、路易莎·梅·阿尔克特、威廉·詹姆斯、斯汀·布尔及国外的路易斯·卡罗尔、马克西米连)

内战百年周期没有英雄原型。

进步党一代（艺术家，出生于1843-1859）童年时受到地方主义与战争的影响。“血染军服”的老兵给他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因此他们成年后变得非常谨慎，追求举止文雅与专门技能而非权力。在重建时期，他们作为举止文雅的教授、律师、校准员、专家、国家公务员与管理者赢得了人们的好评。中年时，他们致力于改善社会生活的决心受到了热情洋溢的青年人的抨击。他们在弗罗伊德“谈心治疗法”与维多利亚后期伤感时代成为美国高雅而充满朝气的驯马人。他们粉碎了托拉斯垄断并成功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寻求进步的改革。老年后，他们仍要求人们对难以管教的年青人采取宽容态度。(代表人物有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亨利·詹姆斯、布克·T·华盛顿、凯瑟琳·李·贝茨、克拉伦斯·达洛与国外的奥斯卡·王尔德、西格蒙德·弗罗伊德)

强国百年周期：转折

·重建与镀金时代（第一次转折，1865-1886）在这一时期，年老的改革者被推到一旁，而（范·威克·布鲁克斯指出）那些

① 特威德全名为威廉·玛西·特威德（1823-1827），美国政客，在纽约建立“特威德集团”，结党营私，侵吞巨额公款，以伪造和侵吞公产罪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在发行《日晷》的日子本可以成为作家的老兵，纷纷想通过修建铁路、开矿山、钻井发财"。在这样一个尊崇"金钱即真理"的实用主义时代，人们的储蓄率呈攀升趋势，大规模生产飞速增长，机械与政治机器在轰鸣，人们的实际工资收入大幅增长，而中产阶级家庭兴盛发展。

此时，超验一代正进入老年。

镀金一代进入中年。

进步党一代进入青年。

传教士一代进入童年。

·第三次觉醒（第二次转折，1886－1908）以秣市骚乱与学生传教士运动为开端，农民抵抗运动与工人暴动逐步升级，以布莱恩以宗教复活主义者的身份获得竞选资格（1896年）为标志达到了高潮。镀金时代的现实主义受到了倒幕者、比利周日激进派、"新女性"女权主义者与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梦想者的猛烈抨击。在把进步党运动推向激进与分裂之后，随着威廉·霍华德·塔夫特接替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这种热情才逐步下降下来。

此时，镀金一代进入老年。

进步党一代进入中年。

传教士一代进入青年。

迷惘的一代进入童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禁酒（第三次转折，1908—1929）在此期间，科技迅速发展，利己主义者辈出，阶级分化日趋严重，托拉斯与工会矛盾重重，政治领导者许多都是技术专家，但在政治领导方面却表现得软弱无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众都致力于道德改革（国家联盟、禁酒、妇女选举权）。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财政增长高潮期，同时人们还就毒品、性、金钱、犬儒主义、暴力、移民与家庭等问题展开了颇具悲观

色彩的讨论。

进步党一代正进入老年。

传教士一代进入中年。

迷惘的一代进入青年。

美国大兵一代进入童年。

·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四次转折，1929－1946）随着黑色星期二股市暴跌，突然揭开了序幕。美国经济经过三年自然回落之后，大萧条引发了罗斯福新政革命，政府职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人们对国家的复兴又充满了希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开始致力于大规模的备战规划、战时动员与生产，这最终促成了1944年盟军登陆与全面反攻。两年之后，随着美国参战军人顺利退役，这种危机情绪得以缓和。

此时，传教士一代进入老年。

迷惘一代进入中年。

美国大兵一代进入青年。

沉默一代进入童年。

强国百年周期：世代

传教士一代（预言家，出生于1860－1882）童年时，即美国内战后期，倍受父母娇惯、生活舒适。成年后，他们成为劳工无政府主义分子、学生暴乱者、黑人大学与女子大学第一批志向远大的毕业生。他们中的年青人追求农村平民主义，定居地的家务工作、传教士改革、倒幕新闻作品创作与妇女选举权。中年时期，他们组成的正派大队与正统派基督教徒强制推行禁酒，打击移民，并组织刑警队。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他们中的老年精英成为“智慧老人”——为了青年人的利益颁布新政（与社会保险），领导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

一个转折时代重新确定了美国的最高理想。(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杜·波·依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厄普顿·辛克莱、简·亚当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国外的温斯顿·丘吉尔、列宁)

迷惘的一代（游牧者，出生于1883－1900）童年是在城市生活恶化、毒品泛滥、剥削童工与移民大量涌入的条件下度过的。他们独立性强、老于世故，被人们称为坏孩子。长大后，他们是一群热血沸腾、不拘小节的青年，应征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在战争结束后，他们的返乡经历却非常令人心酸。这一代人在青年时代涌现了许多小说家、演说家、土匪、体育明星、电影名人，震动了本世纪20年代。在中年时，即当他们处在事业巅峰期时，大萧条骤然而至。在二战中，他们中有人在前线指挥作战，有的在后方管理生产；在冷战时期，他们中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艰苦朴素、性格直爽。老年后，为支持要征服世界的年青一代，他们做出了许多奉献，而对自己却关心很少。(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哈里·杜鲁门、欧文·波林、乔治·巴顿、梅·韦斯特、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与国外的阿道夫·希特勒)

美国大兵一代（英雄，出生于1901－1924）作为新游乐场、童子军俱乐部、维生素与限制童工政策的受益者，他们获得了“好孩子”的名声。在成人时期，美国的入学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青年时，他们齐心协力，度过经济萧条期，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击败了外来的敌人。他们在中年时根据《美国大兵法案》，获得了社会资助。他们把城市郊区建设得非常漂亮，研制成功具有神奇治疗作用的疫苗，缩小了在导弹技术方面与它国的差距。他们发射宇宙飞船，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们对总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纷纷推出新边疆、伟大社会与模范城市等设

想，但是随着越战、水门事件、财政赤字与“幻觉”问题，这种关注程度有所下降。老年后，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但对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没有形成大的影响。（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约翰·肯尼迪、罗纳德·里根、华尔特·迪斯尼、朱迪·加兰德、约翰·威恩、沃尔特·克朗凯特及国外的威利·布兰特、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

沉默一代（艺术家，出生于 1925 - 1942）童年在战争与大萧条中度过，充满了压抑。他们长大成人的时间有些晚，未能成为战斗英雄，同时又有些早，没能赶上思想自由的年青一代。相反，这个早婚的孤独群体成为危机过后不喜欢冒险的技术员与专业人员、敏感的摇滚乐手与民权倡导者。在那个时期，似乎只有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才能扣开成功之门。对他们这代夹在顽固的老一代与有激情的年青一代之间的人来说，中年充满了焦虑。他们上台后，家庭开始分裂，文化出现多元化，政府机构复杂化，诉讼事件日益增多。他们进入老年后，生活非常富裕，但做事犹豫不决；此时，嬉皮士也已经开始出现。（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柯林·鲍威尔、沃尔特·曼德勒、伍迪·艾伦、马丁·路德·金、桑德拉·迪·奥康纳、艾尔威斯·普莱斯利与国外的安妮·弗兰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千年百年周期：转折

·美国高涨期（第一次转折，1946 - 1964）目睹了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经过。社会运动出现停顿。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教会成为政府的附庸。人们对和平时期的巨额国防预算没有任何异议。大众的生活情趣在一种由郊区、州际高速公路与管理有序的通信组成的集体主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得以繁荣提高。受人尊敬的政府宣布“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他们管理着一个乏味的、

精神已经死亡的现代主义社会。

此时，迷惘一代正进入老年。

美国大兵一代进入中年。

沉默一代进入青年。

二战后人口膨胀一代进入童年。

·意识革命（第二次转折，1964－1984）以城市暴动与学生运动为开端，与反对越战活动及反文化活动相辅相成。这场革命引发了女权主义、环境保护与黑人权力等运动，并导致了暴力犯罪案件与家庭破裂现象的急剧增加。水门事件（1974年）标志着这种愤怒情绪的极点。此后，这种情绪开始内化，转变为新时代生活时尚与精神再生。这种情绪到里根竞选连选连任这一乐观时期才逐步消失。这时以前的嬉皮士已经进化到雅皮士这个接近成熟时期。

此时，美国大兵一代正在进入老年。

沉默一代进入中年。

人口膨胀一代进入青年。

第13代进入童年。

·文化战争（第三次转折，1984－2005?）以美国某家电视台开播的以介绍美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节目《美国您早》为开端，现正在向悲观主义靠拢。个人的信心依然很高，几乎没有什么波及全国的问题急需解决。暴力事件不断增加，文明程度日趋下降，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机构与领导者的威信越来越低，通俗文化低俗化，这一切都让人们感到非常悲观。人们担心美国人已经失去全国统一的价值观念，而是在逐步分化为几个相互竞争的阵营。

此时沉默一代正在进入老年。

人口膨胀一代进入中年。

第13代进入青年。

千年一代进入童年。

·千年危机，即千年百年周期中的第四次转折尚未到来。其世代星座如下：

人口膨胀一代进入老年。

第13代进入中年。

千年一代进入青年。

新的沉默一代进入童年。

千年百年周期：世代

膨胀一代（预言家，出生于1943-1960）童年是在斯波克医生优生优育理论盛行、乏味的因循守旧环境中度过的，接受的是人造地球卫星时代的教育。那时人与人友好相处，而在家庭中父亲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爱恋之夏”到“愤怒的日子”，他们在步入成年的过程中不断反对父辈制定的各种世俗的发展蓝图。随着他们中的佩花嬉皮士、黑豹党、“气象员”组织成员以及“耶稣迷”（基督教耶稣运动中的青年成员）宣称自己是大众道德的仲裁者，青年人的病变情况日益严重——学业能力倾向测试成绩开始了一个长达17年的滑坡现象。80年代早期，许多青年人成为自我为中心的“雅皮士”，他们从事的是主流工作，但追求的却是一种完美主义的生活方式。进入中年（并掌握国家大权）后，他们开始宣扬价值观念，吹捧“有意义的政治”，并发动焦土式文化战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比尔·克林顿、纽特·金格里奇、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坎蒂斯·波根、斯皮克·李、比尔·盖茨与国外的托尼·布莱尔、内塔尼亚湖）

第13代（游牧者，出生于1961-1981）父母婚变使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他们上学时，学校采取开放式授课方

式。他们看过许多以坏孩子为主角的电影，而且电影内容从老少皆宜过渡到少儿不宜。总之，他们的童年过得非常急促。他们进入成年的过程中，青少年犯罪率与考试不及格率已经有所降低，但还是有人指责他们行为粗野、愚蠢，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在青年时代，他们经历了艾滋病给性生活带来的痛苦与求婚仪式毁灭，这使他们在约会与结婚时变得非常谨慎。在择业方面，他们拥抱冒险，喜欢无拘无束的职业而非忠实的社团主义。从喜欢穿破衣烂衫到跳摇摆舞，他们那种肥皂泡式容易破裂的文化暗含着一种麻木。从政治的层面上看，他们倾向于实用主义与独立性，宁愿自告奋勇，也不愿选举他人。许多人批评他们是“无为派”或懒鬼。他们生活在一种青年人生活水平呈下降趋势的残酷社会环境中。（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汤姆·克鲁斯、乔迪·福斯特、迈克尔·德尔、迪昂·桑德斯、温诺娜·里德、昆丁·塔兰蒂诺及国外的戴安娜王妃、阿兰尼斯·莫利塞特）

千年一代（英雄？出生于 1982 - ?）是随着“注意，车上有孩子”这一标语出现的。随着堕胎率与离婚率的下降，大众文化开始指责父母对孩子撒手不管的做法，并重新塑造婴儿在家庭中的重要角色。虐待儿童与儿童安全问题成为热门话题，而讲授美德与价值观念的书成为畅销书。今天，政治家在界定成人问题（从减税到财政赤字）时往往都要考虑到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好莱坞电影中的淘气鬼变成了小天使，有线电视与因特网对儿童节目进行严格把关。教育家开始大谈各种标准以及互助合作式的学习方法。校服正日益受到家长与孩子们的欢迎。从国际比较角度看，由于加强了对孩子的管教，美国学生的考试成绩已经比以前大有改观。（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杰茜卡·麦克鲁尔、奥尔森孪生兄弟、巴比·里查德、伊丽莎·洛佩兹、杜尼·瓦特斯、杰茜卡·杜勃罗夫与国外的安娜·巴昆、威廉王子）

千年百年周期中的艺术家原型尚未出生。

英美百年周期中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高涨期）	第二次转折（觉醒期）	第三次转折（解体期）	第四次转折（危机期）
世代进入：				
老年	游牧者	英雄	艺术家	预言家
中年	英雄	艺术家	预言家	游牧者
青年	艺术家	预言家	游牧者	英雄
童年	预言家	游牧者	英雄	艺术家
中世纪后期百年周期			从法国撤退（1435－1459）	玫瑰战争（1459－1487）
宗教改革百年周期	都铎文艺复兴（1487－1517）	新教改革（1517－1542）	偏狭与牺牲（1542－1569）	无敌舰队危机（1569－1594）
新世界百年周期	欢乐英格兰（1594—1621）	清教徒觉醒（1621－1649）	反动与复辟（1649－1675）	光荣革命（1675－1704）
革命百年周期	帝国奥古斯都时代（1704－1727）	大觉醒（1727－1746）	对法与印第安（1746－1773）	美国革命战争（1773－1794）
内战百年周期	感觉良好时代（1794－1822）	超验觉醒（1822－1844）	墨西哥战争与地方主义（1844－1860）	美国内战（1860－1865）
强国百年周期	重建与镀金时代（1865－1886）	第三次觉醒（1886－1908）	一战与禁酒（1908－1929）	大萧条与二战（1929－1946）
千年百年周期	美国高涨期（1946－1964）	意识革命（1964－1984）	文化战争（1984－2005?）	千年危机（2005？—2026?）

第五章　老年预言家

1689年4月的一天下午，美国各殖民地盛传詹姆士二世要剥夺它们的自由。国王亲自任命的新英格兰总督埃德蒙·安德洛斯爵士带领军队杀气腾腾地开进波士顿，妄图扼杀殖民地自治。对生活在当时的所有人来说，未来一片昏暗。

就在这时，大街上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眼睛、神情与态度中都透着一种号召力”的“老人的身影”。他的一举一动都“将领导者与圣贤结合在一起”。老人迎着英军，径直走到大街中央，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然后喝令军队停住脚步。“这个庄严而宣战似的声音是不可抵抗的，它可以在战场上喝令一队士兵，也可以向上帝发出祈祷。听到老人的喊话，看到他伸出的手臂，英军队列中的战鼓声突然哑了，行进的队伍也悄然停了下来。”

就是这一个简单的反抗行为，激发了波士顿人的勇气。他们开始行动起来。一天之内，人们就把安德洛斯赶下台，然后将他投入监狱，波士顿人的自由得以保全，由此开始了殖民地的光荣革命。

这是纳桑尼尔·霍桑《重讲故事集》中的一个故事。在故事结束时，作者问道：“这位老年预言家是谁?”没有人知道。人们只知道他曾生活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开始在新英格兰定居、有火热心肠的年青清教徒们中间。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就在这位年老的教

士兼勇士消失之前，人们看到他拥抱了85岁高龄的西蒙·布莱德斯特利特，后者是当时仍健在的首批清教徒之一。这位老年预言家还会回来吗？霍桑补充说，“我听说，每当清教徒的后代表现出先辈的精神时，老人就会出现。”

后人必须等一段时间，才能再次看到他——事实上，大约要等一个寿命较长者一生的时间。霍桑写道，“80年过后，”这位老年预言家会重现。那是1775年的夏天——美国的老人们又一次乞求上帝，号召青年人向可恨的敌人开战。霍桑接着写道：“当我们的先辈在邦克山忙着修筑工事时，那位勇敢的老人整晚上都在站岗放哨。”这位老人——这个萨姆·亚当斯或本杰明·富兰克林或塞缪尔·朗顿（那位向邦克山上的军队做演讲的哈佛大学校长）的同代人——属于觉醒一代。这代人青年时代为他们在晚年时建立的共和国提供了精神支柱。

霍桑在1837年写这个暴动传说时，还是一个33岁的年青人。邦克山上的先人属于他的父辈，到那时已经老态龙钟。美国又出现了新的争论话题（奴隶制）与新的敌人（墨西哥），但是谁也没有希望那个时代的老人——诸如约翰·马绍尔与约翰·雅克布·阿斯特——扮演老年预言家的角色。

霍桑预言说，“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会再次出现！他到来时，社会往往处于黑暗、逆境与危险之中。但是如果国内的暴君压迫我们或者侵略者的铁蹄玷污了我们的土地，老年预言家仍会出现。”霍桑没有指出具体是什么时候，也许他当时心理明白但没有明说。

如果这位年青作者从邦克山起义算起向前推算80年或90年，或者如果他预想到了那些当时正震动着美国人灵魂的青年狂热分子（如约瑟夫·史密斯、纳特·特纳与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老年时的情况，他可能会预测到下一位老年预言家将从他自己所属的

超验主义一代中出现。由于年青时深受宗教的煎熬，霍桑的同龄人命中注定要在晚年面对一段“黑暗、逆境与危险”时期。那位年老的牧师兼勇士将再一次以约翰·布朗的名字出现，从绞刑架上谴责非正义；以朱莉娅·华德·豪的名字出现，留下“一部用擦亮的钢条写就的充满着火一样激情的福音书”；以威廉·特库姆塞·舒曼的名字出现，“用他可怕的挥舞如飞的钢刀发出的致命的闪电”把佐治亚烧焦；以罗伯特·李的名字出现，率领千军万马，战死在公墓陵；更以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出现，向国会宣布“我们经历的火一般的考验将照亮我们的前途，不管这将给我们带来荣耀还是羞辱。”

如果霍桑能把眼光再向前移动 80 年，也许能预测到另一位老年预言家——其童年在霍桑老年时经历的那场“火一般的考验”之后开始。这代人成年后将用隐藏在内心的火焰将老一辈建立的世界化为灰烬。然后在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又会以“二战智慧老人”的身份走完其自称的与命运的约会。如果再在这种循环中加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属的传教士一代，霍桑的故事将不是一次重述，而是四次。

当古代的世代经过这些伟大的历史之门时，他们在老年预言家身上看到了一种老人——他们与美国不久前忙忙碌碌的老人、“老山姆叔”及 19 世纪 30 年代（霍桑写这个故事时）革命战争的幸存者截然不同。这些年老的教士兼勇士是些什么人？他们是预言家原型在老年的表现。他们的老年时期则是新世代星座产生的前奏。

在上述历史时期，其他原型都到哪儿去了？1689 年哪些人正在进入中年？他们中有以前当过海盗的本杰明·丘奇、做事鲁莽的雅克布·莱斯勒及比新世界其他群体遭受了更多不幸（与残酷）的保皇党一代中的领导者。1775 年呢？以乔治·华盛顿为代表的自由

一代，他们是担负历史上最残酷工作的能手。1865年呢？他们是有义侠风度的镀金一代中的陆军上校、破产的农民、愤世嫉俗的企业家及一名孤独杀手。1944年呢？他们是行武出身的迷惘的一代，他们中兴致勃勃的将军与朴实无华的政治家做出了残酷的选择，而年青的战争英雄赢得了人们的掌声。这些都是游牧者原型。

那时，谁正在进入成年？他们是以科顿·马瑟为代表的通力合作、乐观向上的光荣革命一代；是以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共和党一代，他们在美国历史上是在城市建设方面业绩最为显赫的一代；还有美国大兵一代，他们曾经爬上霍克角的悬崖，利用原子的秘密。他们都是英雄原型。

当时，哪些人是儿童？他们有启蒙一代的儿童，后来成为耶鲁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再往后成为耐心等待着继承父辈创建的殖民地制度、举止彬彬有礼的专业人员；他们中有妥协一代的约翰·昆西·阿丹姆斯，远远看到父亲的朋友在邦克山战役中流血身亡，不禁痛哭失声；有进步党一代中的西奥多·罗斯福，他们曾坐在父母的肩头观看林肯的葬礼车从身边缓缓驶过；也有迈克尔·杜加吉斯，珍珠港事件爆发那天恰好满8岁，盟军登陆发动总攻时满10岁，他听到父母谈论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与全球秩序，长大后又努力去改善这一秩序。他们都是艺术家原型。

每隔80到100年，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都会重现类似的世代模式。这四种原型按同一顺序组合在一起——老年预言家、中年游牧者、青年英雄与童年艺术家，形成美国历史中最悠久的传说。老年预言家的每次出现都标志着一个“黑暗、不幸与危险”时刻——百年周期中第四次转折的高潮期——的到来。

在自然界中，即将到来的季节总是人们记忆中最模糊的那个

季节。美国历史的发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也是如此。在盟军反攻日——上个百年周期中的第四次转折——达到入伍年龄的美国人中仍健在的不足现有人口的10%。而在1929年那个黑色星期二已经进入成年，而且对当时的事情记忆犹新的人们则不足2%，当时美国踏进了上个百年周期的冬季。在比他们年青的人中，能想起解体时代的情绪是如何迅速转化为某种根本不同的东西的人更是微乎其微。美国人总是对下一次转折心怀茫然，直到它真正到来那天。

我们也许更愿意把自己视作自然界的主人，可以控制各种变化与进步，免受历史周期性的影响。然而我们越是在自然周期面前表现得缩手缩脚，我们越想根除它，我们的时间观与未来观就会变得越可怕。今天大多数美国成人是在一个人们梦想改善环境——获得更好的职业、更鼓的钱包、更强大的政府、更美好的未来、更和睦的家庭、更可爱的孩子等各种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的社会中长大的。而在处于第三次转折的今天，人们经常觉得这些目标正在悄然离去。许多人希望时间之轮能够倒转，但又很清楚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儿孙一代担心。

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好像是一个原始民族，当感觉到干燥阴冷的深秋正在走来时，开始怀恋温暖潮湿的春天，不知道它可否重来。许多美国人希望现在重现一个百年周期的春季。但是自然界中的一年四季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如在自然界，百年周期中的秋季可暖可凉、可长可短，但是秋风一定会扫尽落叶。百年周期中的冬季可能匆匆而过，也可能姗姗来迟，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它一定会到来。

我们也许不希望那个老年预言家再次降临——但是他一定会来，而且很快就要来到。

在我们的下一段路程中，历史与预言参半。该旅程以二战为起点，走过现在，通向当今青年人的老年时代。你将从周期性的角度重新学习美国最近的历史，将我们所熟知的人生与时代汇合在一起。你将了解到与下述关键时期密切相关的情绪变动情况：20世纪4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与80年代中期。你将从原型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今天在世的几代人。这些原型随着每次转折都会形成一个新的星座。你将了解到这在下一个第四次转折中意味着什么。

这样，历史课就变成了你个人的人生故事。

第二部分　转　折

第六章　第一次转折：美国高涨期（1946—1964）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世界重新获得了和平，但美国依然处于为一场全球性战争做准备的动员状态。美国在危机中徘徊的时间太久了，整个美利坚目睹了这一切：各个港口里停泊着无数艘战舰、公路上跑着无数个护送车队、仓库中堆放着军事物资、政府机构中挤满了战争策划家、工厂里四处都是兵器工人。生产线仍在不停地运转，却要在数以百万计的老兵从前线回家找工作时停止。看来势必要恢复战前的阶级冲突。著名社会学家甘纳·麦德尔警告说，一场"工人激进运动"与"暴力活动"就要来到。这种危险首先出现在日本投降几个月后，汽车生产工人举行罢工反对通用汽车公司。

罢工失败了。在后来被称为《底特律条约》的一份文件中，通用汽车公司与工人们达成了一项比较温和的协议。《财富》杂志的编辑宣称"在美国历史上工人的要求从未像这次这样似是而非。"人们不可能再返回30年代。现在是新时代，需要合作与信任。

在经历那场战争中令人伤心的胜利与挫折之后，美国人开始在社会统一这一光明的理想与对社会冲突的黑色记忆中徘徊。他们渴望自己属于一种安定的社会秩序——一种强大、普遍存在且

不容争辩的东西。政治家们却在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各种计划，政客们谈论旨在为“普通人”谋福利的“集体行动”。在二战激战正酣之际，在一封《致日本公开信》中，《星期六晚间邮报》用挑战的口气指出“贵国人民正在用自己的生命做毫无意义的牺牲，而我国人民却正在为一个以大众就业、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配与大众所有制为目标的光荣的未来而战。”

在那场战争行将获得可以预见的胜利之时，美国人开始担心上述希望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在展望未来时，人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与我们现在思考未来时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未来与刚刚过去的时代类似。人们不愿意回忆最近的参照系——艰苦的30年代与愤世嫉俗的20年代。《财富》的编辑们担心“粗鲁、急切的做法”与“坏脾气”可能会重现。该杂志的编辑重新刊登了1932年拍摄的一幅警察殴打一战老兵的照片，并警告说“一片越橘馅饼”满足不了“老兵们的辘辘饥肠”。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一场新的经济萧条不久就会发生。萨姆纳·斯利彻特警告人们说“市场（将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规模与最快的速度消失”。美国研究所①的列奥·车尔尼预言“……容易受到战后失望情绪感染的中产阶级家庭”将面临“不安全、不安定与不适应现象”。在日本投降一个月后，《生活》杂志预言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将出现大幅下降。面对日益减少的人口与衰落的经济，美国政府感到非常恐惧，于是着手策划一个涉及约两百个机构的大型活动，以便提供失业救济，其规模不亚于二战之前的罗斯福新政。

这根本没有必要。乐观向上的美国推翻了悲观者的观点。老兵们退伍后没有出现一点暴乱的迹象。他们在家乡受到了经久不息的欢迎。由于胜利的情绪仍没有消失，《财富》杂志赞扬美国

① 美国一家商业性质的私人法律事务咨询公司。

人发现了“一条积极的中庸之道”，尽管“这条道路本身有些不对头”。几乎没有人想就那些陈腐的政治或文化问题重新展开讨论。相反，回国的老兵想成家、要孩子、搬进漂亮的房子，找到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以至于老将军乔治·马绍尔谴责他们在“和平的迷惑中”忘掉了“战争的崇高目的”。《财富》杂志继续关注着国家发展的脉搏。它警告说：“现在是限制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如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引发下一次经济萧条。”然而，当这种快乐的情绪持续到战后第一个平静的圣诞节，即使是那些做事谨慎者也开始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社会实际失业人数仅为劳工官员所预测数字的十分之一。《财富》杂志最后也加入到“众多充满希望的预言家中”，并发出这样的言论：“我们似乎有能力拥有一种超越历史的生活标准”。二战标志着“人类在与自然资源匮乏的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终极胜利。”

到1946年6月，美国意识到战后社会心态的转变是永久而深刻的。《财富》杂志宣称：“美国的快速发展期正在继续下去，其规模之大，简直无法衡量！在这里，旧的标准毫无用途……这种奇观宏大而让人困惑不解……1946年夏季的美国太奇怪了……与1929年、1939年或者任何其他时期的相似性已经快速消失了。”该杂志的编辑们引用华尔特·惠特曼在美国内战后所作的一首诗中的诗句来鼓励美国“打开所有的门阀，任凭她流淌——与其他东西一起摇动——不久你就会卷入到强烈的运动之中，即使你想停下来，也已不可能。”这种迅猛增长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出生率方面。许多父母在日本投降当日的兴奋中怀孕，于1946年4月中旬将孩子生下来。这引发了一个生育高潮期。该高涨期一直持续到1963年下半年发生的一场悲剧。它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了美国人的情绪。

这两个里程碑——日本投降日与肯尼迪总统遇刺——圈定了一个历史时代，人们分别称之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好时代”、“最佳岁月”、“幸福日子”与“美国高涨期”。

由于艺术家拍摄了一些怀旧电视节目与电影，几十年后人们对那段美国高涨期仍难以忘怀。在现在40多岁或年龄更大一些的人们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国家机构工作效率很高、政府强大、科技对人友好、小学教学质量高、工作可靠、家庭关系和睦、社会治安良好的时代。政府可以拿出钱来做任何想做的事，而不会出现财政赤字。中产阶级的比例逐年增加，贫富差距逐步缩小。工人的生产能力与家庭收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增，似乎没有极限。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写了一本名为《富裕社会》的书。书中认为，“贫困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人们只有“在事后才会想到它”。哈罗德·斯塔森在1946年说：“我们的经济制度是由我们的主观态度与团结一致而非由有限度的科学或者生产力构筑起来的。”在国外，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在扮演一个新帝国的角色，并（如罗伯特·奥本海默所说的那样）相信“当我们在世界上徜徉时，世界发生了变化”。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佩恩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拥有全世界一半财产、一半以上生产力以及近乎全世界三分之二机器设备”的“巨人”。美国人为此感到自豪。

美国人变得越富有、越具有集体观念，美国将变得更加美好（也许更乏味）。犯罪率与离婚率下降，美国进入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青年人举止文雅有度的时代。难怪艾森豪威尔总统为美国家庭生活的幸福而倍感愉快。

一个富裕、有序的家庭社会需要相应的生活环境。进入郊区：这是美国高涨期给后人留下的最永久的纪念碑。郊区生活的发起者是威廉·列威特。战时他曾在西比斯干过定额工作，这使

他有机会就同龄人对普通住宅的兴趣进行一番考察。战后不久，美国各地开始效仿建造列威特郊区居民小区。到50年代，每五座新房子中就有四座建在“新郊区”。《财富》杂志赞扬这种住房“宽敞、豪华并具有统一性——这种组合正是市场商人所向往的”。与战前许多美国人称为家的没有洗手间的农舍及城市住房相比，郊区住宅可以说是中产阶级创造的一个奇迹。

对一心想进入被某位当代作家称为“安全时代”的美国人来说，按规划设计建造、排列井然有序的郊区住宅正是他们追求的自然生活方式。由于大众对面目狰狞的希特勒记忆犹新，美国国内的稳定是在一种清醒的冷战现实主义思想保护下得以实现的。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解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后，谁也不敢预言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灾难了。人们普遍持一种沮丧的观点……认为在未来，冲突将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为提防这种威胁的到来，美国在高涨期的许多宏伟工程（州际高速公路、基础研究、学生贷款、新数学与理科课程）都带有明显的国防目的。而新郊区运动恰好反映了这种对安全问题的过度敏感心理。如果可以规范商品的消费与销售服务，个人需求可以以有效的方式予以满足，从而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必需的各项巨大工程节约资源。如果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也为生活俭朴与团结协作提供了文化基础，每个人都像共用一台割草机的好邻居一样竭尽全力，美国就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种新的民主精神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浅薄的物质享乐主义。1954年出版的《墨守陈规的时代》一书是这样描述美国人的：他们“满足于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好的飞机与铅管制造业，而政治与文化却是二流的”。1956年拍摄的电影《人体攫取者的入侵》讽刺了那些机器人似的市民，他们头脑过于机械，外星人已经接管了他们所在的星球，却没有一个人注意

到。马尔维纳·雷诺尔兹在歌中唱到了“用劣质建筑材料建成的小房子”。路易斯·芒福德对“大量风格相同、难以辨认、排列方式呆板、相隔距离相同、位于标准的道路两旁、建筑在不毛之地上的房子以及在里面居住着的属于同一阶层、收入相同、处在同一年龄层、收看相同电视节目、吃着从相同品牌冰箱中取出来的相同的乏味的预制食品的人们”感到失望至极。牛顿·米诺抨击电视是一片由浅陋而有益的节目构成的“荒原”。当迈克尔·哈灵顿写《另一个美国》一书时，他想暗示人们：美国的主要组成部分（中产阶级）所做的一切也许比人们想像的要好。

这种高傲心态中包含了许多为现代美国人所讨厌的因素——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到令人窒息的团体思想与庸俗的文化。然而，在当时，这种时代心态与年龄稍大一些的成年人青年时期所遇到的社会与经济秩序混乱相比，有不少优越之处。如果美国人在 1928 年或 1944 年（即前两次转折临近结束之时）预测到本世纪 50 年代左右的那种心态，也许会认为几种现代人会立即予以抨击的社会潮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次美国高涨期的社会心态给生活在本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人留下一种不合时宜的感觉。但人们当时却觉得这种心态非常时髦——乐观精神、科学技术与国家富强结合在一起，生成一种脆弱的（甚至是浅薄的）集体事业感。

1946 年到 1963 年这段历史看上去之所以如此离奇古怪，原因在于我们今天已经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世代思维方式失去了联系。呆在破旧潮湿的房屋中深居简出的“旧世界（欧洲）中的”“迷惘一代”老人不可能超出头脑聪明、掌握了高科技的沉默一代。对那些生活在战后经济与人口大增长时代中的文化勇士来说，中年美国大兵一代的“远大志向”看上去似乎有些陈腐，甚至有些麻木。而对年青的第 13 代中的企业家来说，沉默一代事

事都要以公司与集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做法不亚于天方夜谭。对今天属于千年一代的孩子们来说，父母鼓动孩子们深入探索成人文化与趣味的做法简直不可思议。

要了解美国高涨期的产生过程与原因，必须分析一下那个年代的世代史。让我们思考一下当时发生的各种世代循环：饱经风霜的老年迷惘一代对社会实行全面封锁，以便稳定社会情绪；美国大兵一代从中年时的保守思想中汲取能量；沉默一代成为较为灵活的助手；人口膨胀一代重新受到宠爱与娇惯。从人生周期的角度看，战后的社会情绪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心态方面，危机过后的美国绝不会重复本世纪 30 年代或 20 年代的美国形象。

美国高涨期是好是坏，暂且不谈。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周期性节奏中，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时代。在上个百年周期中的危机期过后，它收拾残局，并为随后发生的觉醒期做好准备。这样，它不仅为美国注入了乐观情绪与创造性能量，而且也使之染上了一种陈腐的气息。当然这种气息以后必将被清除。

从 1946 年到 1963 年这段时间内，美国在许多领域获得了成功（如公共合作等）。而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却失败了。当然，当时的美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得也不很成功（如个人发展），而今天我们却在这些方面自以为非常成功。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奇：在本世纪 50 年代中期，即在高涨期的巅峰期，美国的情况与现在恰好相反，形成了当前这个百年周期的两个极端。

第一次转折与原型

包括最近这个时代在内，从 15 世纪算起，英美历史共经历了 6 个第一次转折或高涨期：

·都铎王朝文艺复兴（1487－1517），属于宗教改革百年周期。

·欢乐的英格兰（1594－1621），属于新世界百年周期。

·奥古斯都帝国时代（1704－1727），属于内战百年周期。

·感觉良好时代（1794－1822），属于革命百年周期。

·重建与镀金时代（1865－1886），属于强国百年周期。

·美国高涨时代（1946－1964），属于千年百年周期。

上述各个时代都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在当时与以后都被人称为“战后”时期。在解决了巨大的危机，发现了新的理想国以后，社会又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与发展方向，因而加快了发展速度。那是一个重建与品尝胜利喜悦（或者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代。人们渴望团结，建设家园，描绘美好蓝图，生儿育女，成家立业。人们的心态异常活跃：每次社会合作都以上次合作的成功为基础，直到——在高涨期临近结束时——追求秩序与团结的趋势变成某种近乎本能的冲动。

高涨期相当于自然界中的春分阶段，此后黑夜变短白昼变长，社会秩序的供求呈上升趋势。它是百年周期四部曲中的春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童贞的季节。在经历了战争与死亡的冬季之后，诗人韦切尔·林赛笔下的夜莺宣布了春天的到来，“我想它们在思考过去的艰险/我想它们在诉说和平。”这时，如释重负的社会自然会重新追求朴素的生活乐趣，耕田种地。这是英国诗人托马斯·纳什所称的“一年之中的尧舜”的季节，世间“处处有花树，都有女儿环舞”。随着地球上新生活的开始，它也成为（华莱斯·斯蒂文斯写道）“一个虚无主义者/与追求生活简朴者讨厌的时代”。随着生殖精神的到来，罗伯特·布朗宁认为，“世界

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在百年周期的第一个转折期，儿童受到宠爱，兴建了许多学校，士兵们受到嘉奖，国王登基，帝国得以建立。

在危机过后的思潮与技术中，每次高涨期都体现了这种情绪。在最初的三个高涨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大众充满了（在文化领域）乐观。对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感觉良好期同样充满了希望，因为美国人刚刚结束了一场争取民主自治之战。现在，他们可以开始追求幸福生活了，他们丈量土地，兴建村落与城镇，开凿运河，潜心发明创造，用乔尔·巴娄的话说，是“将科学”用来“造福人类生活，协调社会关系”。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一个伤痕累累的美国开始同心同德，致力于事业重建。在镀金时代，美国人重视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在科研与发明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同时向工业基础建设大量投资，为确保这个大陆国家的团结与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高涨期留给人们的记忆中缺乏光辉的业绩、惊天动地的改革运动以及举止滑稽可笑的所谓名人。相反，它往往让人们想起（如同弗尔农·帕令顿在描述镀金时代时所讲的）历史上的“大型烧烤野餐”。这时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国泰民安的欢乐图景——无论是威廉斯堡富丽堂皇的长方形建筑、肯塔基州整洁漂亮的小木屋，谢克海茨井然有序的“甜蜜温馨的家”，还是列威特式小镇样式划一的住宅建筑。人们重新用团结与进步的乐观思想看待外部世界。然而这种乐观情绪也带有轻率的一面，即报喜不报忧：在心满意足的表层之下，人们忽略了某些被后人认为是明显的不公正做法。高涨期对那些生活在多数主义文化思想之中、并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来说是大好时期。而对那些拒绝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也不失为安全时期。

高涨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绪是由当时各种原型正在进入的新

的人生阶段决定的：游牧者进入老年，英雄进入中年，艺术家进入青年，而预言家正进入童年。现在让我们分别看一下这四个阶段（与相对应的原型）。

·当精疲力竭的游牧者在老年时代取代预言家时，他们放慢了社会变革的步伐，避开旧的改革，追求简朴与宗教复兴运动。

老年游牧者厌倦了大事业与意识形态，开始安抚社会，接受危机的后果，并从危机的荣耀（或者灰烬）中营造出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他们是讲求实用的社会仪式信徒，因循守旧，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养护儿女与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上。与年青一代相比，社会的飞速进步或者国家的胜利给他们的印象要浮浅得多。他们为狂妄自大、刚愎自用的社会的前景忧心伤神。他们给青年一代留下的印象是疲惫不堪，甚至有些反动。步入老年之后，这些游牧者虽以头脑精明而著称，但这并未使他们赢得多少大众的赞许。当时大众更关注青年一代，很少注意老年人。因此，这些游牧老人并没有为自己争得多少荣誉与地位。

尽管相隔两个百年周期，伊丽莎白一世与乔治·华盛顿两个人的晚年生活却成为老年游牧者生活情况的绝佳例证。尽管老年时仍不失精明与勇气，但他们已经开始讨厌冒险，因国事操劳而疲惫，极力保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优雅但陈旧的制度，举止谦虚谨慎，从不表露出一点虚荣或贪欲，对更加激进与自信的年青一代采取一种既排斥又友好的态度。在奥古斯都时代，年长的保皇党一代被人们指责为“悲伤而堕落的一代”。确实，公众对他们的看法是殖民地时代最糟糕的。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认为，在美国革命之后，华盛顿所属的自由一代同龄人“命运不济……在青年时代，老年人受到尊敬；而在他们自己步入老年后，

青年人却赢得了橄榄枝。”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们妄自菲薄，情绪极为低落，（像约翰·亚当斯那样）认为“永远不会有人给我建造陵墓，树立丰碑”。

·当叱咤风云的英雄在中年取代游牧者时，他们建立了一种乐观向上、富于创造性的社会道德规范。

中年英雄所处的时代回荡着危机过后人们的欢呼声，他们是国家的建设者，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操纵庞大的社会机器方面超过“迷惘的”先辈。从科学到宗教，从治国安邦到艺术，他们为生活的各个领域注入了活力与理性。在他们掌权的鼎盛时期，希望推动人类文明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百年发展期——即走向富裕、幸福、知识与权力。有人认为他们是那个时代最精干的（可能也是最不善于沉思）一代。

在历史上，中年英雄就在高涨期这部戏剧中扮演主角。亚瑟王一代创建了一个新王朝，伊丽莎白一代为一个新帝国增光添彩，而光荣革命一代为一个物质富裕、精神开化的新世界文明奠定了基础。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奥古斯都时代向他的（处于光荣革命时代的）同龄人宣讲道：“忙碌起来。行动起来。精神乐观是一件幸福与可爱的事情。”富兰克林的同龄人创建了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将蓄奴制写入法律，带领各殖民地走过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在感觉良好时代，杰菲逊要求中年共和党人“团结一致，为大众谋福利”，从而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国家”、“快速发展的国家”尽一臂之力。共和党人治理国家时遵循的原则是“政府有活力”，社会“和谐有序”，思想“沉静”，科学“实用而富于理性”，商业“繁荣”。

·墨守成规的艺术家在青年时代替换英雄一代之后，成为敏感的助手，将他们的专业知识与合作精神献给了一个日趋稳定的时代。

艺术家一代是在危机过后、社会秩序渐趋稳定之时进入成年的。供他们自我选择的机会不多，因而很早就踏上了追求生活繁荣与安定之路。他们学会了如何满足大众的各种需求，帮助英雄一代实现他们的宏伟蓝图。在向社会文化中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他们还小心谨慎地扮演一种更为内向的精神实现的角色。这种努力促使人们追求职业技能（从而完善了英雄一代在外部世界获得的巨大成就），并对良心与情感进行批判（暴露英雄一代内心世界的各种缺陷）。

在前两次文艺复兴高涨期，青年人被认为是那个时代受教育最多但同时又是最缺乏冒险精神的一代。同样，在殖民地奥古斯都时代的启蒙派青年称自己“温顺而听话”。他们知道如何以洛克克方式装饰殖民地的社会生活，同样也是美国在科技、医学、宗教与法律方面涌现的第一批真正的职业工作者。在感觉良好时代，妥协一代青年是带着约翰·昆西·阿丹姆斯所谓的“保持平静与沉默的责任”进入成年的。生活在新边疆的人们越来越不像探险者，而更像是定居者或者像刘易斯与克拉克一样成为公务员。在镀金时代，进步党一代开始时以举止文雅、性情温和而著称，有人称他们是“一个和谐的集体，结构对称而给人愉快，融合了各种优秀品质”。

·预言家在童年取代艺术家之后，他们生活在安定的环境中，乐观的成年人非常宠爱他们。

高涨期将乐观情绪灌输到孩子们心中，从而导致了一个生育高峰期。这时，人们过多地关注家庭生活与长期投资。在危机后井然有序的世界中，父亲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更多的时间来抚养孩子，为新一代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这些孩子在一个秩序井然但精神空虚的社会中长大成人，父母鼓励他们培养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与母亲的关系（与个人价值观念的关系）比与父亲的关系（与社会事务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认为这代孩子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此鼓励他们更多地向生活索取。

在欢乐的英格兰时代属于清教徒一代的儿童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长大成人：贸易蓬勃发展、社会欣欣向荣、一切都沉浸在胜利之中。历史学家大卫·莱弗伦茨认为，他们生活在一种“由较好的母爱”与“疏远的……起压制作用的父亲”构成的混合情感之中。在奥古斯都时代属于觉醒一代的儿童是殖民地有史以来衣食住行条件最好的一代。他们在科顿·马瑟所谓的“秩序井然的家庭中”长大成人，因而养成了历史学家盖瑞·纳什所谓的“反理性、反科学……与反道德”的性格。据一位英国旅游者讲，感觉良好时代的超验一代儿童表现出“典型的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历史学家约瑟夫·凯特认为，在“1790年”以后人们对儿童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自由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玛丽·卡布尔认为，镀金时代属于传教士一代的儿童生活在一种“漫长的儿童野餐中”，那是“一种有节制，同时又充满自由与欢乐的氛围”。简·亚当斯回忆说，她的同龄人“有许许多多的优越条件”。亨利·甘比则回忆起那时的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帮互助的情况比“前一代人”要常见得多。

让我们把这四种原型放在构成上述世代星座的各个人生阶段中加以描述。每代人的行为与前一代人在同年龄段的行为形成了

鲜明对比——各自的鲜明特点震惊了社会。这四种原型转变的总和也恰好反映了大众情绪从危机期向高涨期的变化过程。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最近的百年周期中第一次转折的世代历史，即处于1946年到1964年之间的美国高涨期。所谓转折归根到底是数以百万计的同龄人的日常生活史。当你阅读下面的概述时，你会在回忆的海洋中寻觅筛选，想像你所熟悉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原型的。

迷惘一代进入老年：年长的守旧者

1945年，当杜鲁门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无党派人士”取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接任美国总统时，几位报刊评论员这些写道：“犯错误对杜鲁门来说是家常便饭”。一年之后，约翰·刘易斯向他发起挑战，看他是否有胆量镇压一场钢铁工人罢工，总统果然不负众望。这位擅长辞令的年长的联盟改革家抛弃了以前的主张。杜鲁门后来回忆说：“约翰·刘易斯不得不认输。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6年后，尽管一些年青国会议员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观点视为“上帝的御旨”，杜鲁门在攻击这位将军时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在美国高涨时期，迷惘的一代把带领美国经历了被麦克阿瑟称为“战争炼狱”的老一代权威送出了历史舞台。随着传教士一代（包括麦克阿瑟、玛格丽特·桑格、弗兰克·劳埃德·莱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海伦·凯勒、杜·波依斯、乔治·马绍尔与伯纳德·巴鲁奇）被杜鲁门为代表的年青一代所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后者缺乏一种精神气质，或者说智慧，这种东西（如同一位青年人在谈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莫特时说的那样）内含着“某种类似于高山大海的东西”，它“非常简单，但同时很崇高。”

传教士一代大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进入成年。美国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将那个时代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归于“在经商的一代之后涌现了一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们发起并参加的社会活动（平民主义、倒幕运动、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正统基督教运动、劳工无政府主义与禁酒）反映了简·亚当斯所谓的“高尚的良心”。弗雷德里克·豪写道：“我们这一代人给后人留下的最大影响”是一种“福音教派心理……它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对各种社会问题做出解释，并从宗教的角度提供解决的方案。”乔治·桑塔亚纳将自己所属的一代人称为“预言家”，“将道德标准应用于各种社会问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传教士一代主导了美国社会中的老年人形象：喜欢穿深色衣服，教条而虔诚，喜欢说教，讲求原则。

迷惘的一代不会步其后尘。相反，美国高涨时代的老年人是经历坎坷的实用主义者，是毕生热衷于批评的产物。这始于进步党时代报刊提出的“坏孩子”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大西洋月刊》指责“正在成长的一代人…思想摇摆不定，心灵扭曲”。在一战期间，人们对应征入伍的青年人进行了智商测试，结果发现半数以上的人的智商还停留在12岁以下的儿童时期。为此美国年青人头脑愚笨的说法一下又成为热门话题。后来，这些年青人的道德问题经常成为传教士老一代的抨击对象。在大萧条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毁掉了我们文明店堂的……自私的一代”进行了猛烈抨击。显然，罗斯福当时指的是已届中年的迷惘一代。他们在整个30年代，被人们谴责为“同情南方派”、否定派、“不负责任者”及（在战争临近时）主张“孤立主义”者。步入老年后，他们又一次受到人们的谴责，这次是说他们思想反动、腐败、反对进步。迷惘一代中年长的文学界精英大多接受这种困扰他们一生的判决。亨里·米勒

认为，“事实是，揭掉面纱之后会发现我们都是食人生番、暗杀者、叛国者、说谎者、虚伪者与胆小鬼。”

迷惘一代有一个粗狂的童年与谨小慎微的老年。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可以将他们的人生周期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不是非常高兴吗?”）巴比·鲁丝埋怨说，“我的童年非常糟糕。”在儿童时代，父母对鲁丝所属的一代人放任不管——如乔治·伯恩斯，7 岁就开始在沙龙中唱歌挣钱。迷惘的一代在进入成年后开始大力宣扬“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这实际上是对那个充满社会反抗、精神混乱、移民大量涌入、吸毒现象泛滥成灾的童年时代的再思考的结果。正如菲兹杰拉德所说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为“这一代新人饱受了贫困之苦，他们崇拜胜利；长大后发现所有的神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结束了，而人也丧失了全部信仰。”在本世纪 20 年代，他们勤奋工作，紧密团结，因为他们感觉到（如艾德纳·圣·温森特·米莱）他们的“蜡烛在黑夜结束之前将会熄灭”。

在他们的中年时代，大萧条使他们的态度发生了一次大转变。根据马尔考姆·考利的观点，对他的同龄人来说，这是一个“怀疑与失败的”时代。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使 30 年代的美国获得了坚韧不拔但又团结一致的好名声。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连选连任，倾向于共和党的迷惘一代直到 1941 年才获得了国会的大部分席位与州长席位。这一时刻的到来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世代都要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迷惘的一代抛弃了独立主义思想，涌现出一批为赢得这场战争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包括勇敢的巴顿将军，热情的布莱德里将军，坚强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们为年轻的部下带来了活力。在国内，他们操纵着一台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战争机器。他们这一代人中产生的第一位

总统几乎没有经过更多的论证就投放了两颗原子弹，然后一手策划了战后的和平。这种和平与他自己当兵打仗时所遇到的任何和平相比，少了一份报复，多了一份安全。

迷惘的一代在孩童时代得不到父母的关心与照顾，中年时得不到政府的嘉奖，一生受尽了各代人的批评与指责。步入老年后，他们的集体形象很差。一项为时 20 年之久的心理测试结果表明，高涨期的老年迷惘一代在自尊方面的得分远不如觉醒期的老年大兵一代。迷惘一代步入老年后在政治与社会两方面都保持沉默，这反映了他们在如何对付各种人生坎坷方面的睿智。他们对政府缺乏信心，很少宣扬自己，甘为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青年人扮演“人梯”。他们不很好的自我形象使他们可以做别人不能干（或不愿意干）的不光彩的事情。责任都在于他们自己。

这些老年人曾在危机到来之前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在危机过后又为美国带来了宁静与和平。30 年后，这些在 20 年代叱咤风云的“狂野的青年人”有的走向灭亡，有的走向成熟，变得因循守旧、谨小慎微——如维吉尔·汤普森或者诺尔曼·洛克韦尔。他们对待青年一代注意掌握好分寸，为年青人获得一种现代意义的乐观主义情绪奠定基础。但是，他们从未体验过这种乐观情绪。据保罗·蒂里奇讲，“我们这一代人目睹过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邪恶如何浮上水面，喷发而出。”依照他们的观点，战后的世界仍不太平。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写道，“明天会非常精彩，但前提是不发生难以形容的可怕事件，或者确实不存在任何恐怖事件。”

他们的性格中带有一种源于舍生拼争的韧性。桑顿·韦尔德写道，“人生就是一场战斗。世界上所有善的与杰出的事物都时时刻刻处在危险的悬崖边上，要得到它们必须努力奋争 ——无

论它们是土地、家园还是国家。”如果为了在一个超道德的世界中保卫美国而不得不抄近路的话，迷惘的一代会挺身而出。迷惘的一代以前曾产生过达什尔·哈姆特与雷蒙德·钱德勒与汉弗雷·伯加特。他们现在的领导者为埃德加·胡佛与杜勒斯兄弟等。他们的档案中有许多为青年人所不知的计划与秘密。

为其他几代人的改革运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迷惘的一代在领导国家中遵循一种温和的现实主义原则。他们晚年时期的几位领导者（如斯蒂文森、德克森、欧文）以华丽而自我贬低的演说以及诸如“我喜欢光电摄像管”之类的竞选词而著称于世。迷惘的一代喜欢单调乏味的政治：在1952年与1956年大选中，竞争对手完全相同，这是美国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他们不喜欢财政赤字，而是为国家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后来的大兵一代政客们却宣称这是他们的功劳。为实现全球重建与国内基本建设目标，他们甘愿承担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高税收负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有生之年可能享受不到这种牺牲所带来的好处。

与传教士一代不同的是，除艾森豪威尔“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美国形象”这种朴素的愿望之外，迷惘的一代领导者并没有什么宏图大志。他们主要把宗教视为一种获取仪式性安抚与社会秩序的工具。正如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政府不是深深扎根于宗教信仰之中就毫无意义可言——我并不在乎这种信仰是什么。”艾森豪威尔对新技术也表现出同样的不安。他反对发射登月火箭，警告美国大兵一代不要兴建“大型军工企业”；并拒绝乘坐喷气式飞机，直到1959年。历史学家威廉·奥尼尔描述这位老将军时说他“出言谨慎，对变革持怀疑态度，与约翰·肯尼迪等相信美国可以做成任何事的人风格完全不同。”在文化方面，埃德莱·斯蒂文森与艾森豪威

尔一样保守。他穿旧式鞋子一点也不觉得难看，他的贴身顾问说他们从不看电视节目。

迷惘的一代在毫不掩饰地接受了自己已经年老这一事实的同时，无私地投身于一个为年轻一代积累财富的时代之中。如果说传教士一代的退休时间比较晚而且短暂，那么迷惘的一代接受了新出台的强迫退休制度，以便为青年人提供工作机会。在全国普遍推行强迫提前退休制度、工资飞涨与社会安全网络受到削弱的情况下，与年轻人相比，迷惘的一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贫穷的几代人之一。按照今天的标准，当时的养老金数额极低。从蓝领工人到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几乎半数以上的迷惘一代老人从未住过带卫生间的两居室房子。

在整个高涨时期，在国家优先考虑的项目中，对贫困人口发放的救济金非常少，但迷惘的一代成员几乎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收获年鉴》一书的编辑路易斯·库普兰所解释的那样，“我们绝不能在精神上、身体上或经济上成为亲戚朋友或政府的负担。”1959年，就在埃塞尔·安德鲁斯创建美国退休者协会后不久，她拒绝“为老年人生活的艰辛而哭诉，……也不想强调老年人在政治方面拥有各种潜力，更没有敦促政府提供补贴。”1961年召开的白宫老年人大会起草了一份洋洋洒洒的“老年人义务清单”，声明“老年人应该主要靠自己实现生活自立”。尽管巴里·格德沃特明确暗示要废除社会保险制度，他从进入老年的迷惘一代身上获得的选票仍然超过任何一代青年人。

迷惘的一代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全部进入老年之前，大多数人已经听到了别人对自己的“最后一声喝彩”，随后便从大众生活中消失了。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小撮人经常被人们讥讽为“老顽固”或“守旧派”。如同厄尔·沃伦一样，他们导演了几出排斥外国人的悲剧事件（例如扣留了几位日裔美国人），但同时

也曾为受到指控的罪犯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根据布鲁斯·巴尔顿的座右铭，这些人虽然穷困但尚未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争取权利。他们手中的这块盾牌培养了一种上帝保佑美利坚的保守思想。他们中现仍健在的文化人对蒂里希所谓的生活“模式化”趋势进行了辛辣批判。新出现的地方自治主义趋势给迷惘的一代以沉重打击，而年青人却表示欢迎。然而，他们中那些在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各民族大熔炉之前出生的老人在城市民族聚集区成功地保留了一种旧时代的生活气氛。现如今，在那里，许多50岁左右的人不会忘记以前看望仍讲母语的祖父祖母的情景。

到本世纪60年代中期，老人医学家开始相信生活节俭、自助、愤世嫉俗、思想保守与选举时支持共和党是美国人进入老年后的普遍特征。时代发展得太快了。

大兵一代进入中年：权力精英

亨里·麦考姆将自己战后的同龄人称为“普罗米修斯与亚当”。在全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包括亚里山大大帝、恺撒大帝与拿破仑——像他们那样征服了那么多的土地与海疆。然而美国大兵一代在战争结束之后返乡的路上，就像《流金岁月》中回乡的老兵一样，“退役后心情有些激动”。他们追求的是“一份好工作，美好的未来及一个够我和妻子居住的小房子。”他们不要求羡慕的人群赞扬他们，奖赏他们，然而他们却得到了这些。在日本对马岛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当非凡的勇气成为普遍的美德之时”。这反映了美国人对凯旋归来的英雄们的崇敬之情。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回忆这段历史说，“我们是特殊的一代，我们就是美国的象征。你得习惯这样看待自己。”

童年时，美国大兵一代的父母决心精心培养他们，绝不像迷

惘一代那样糟糕。父母对他们管教特别严格。父母们为达到这一目的兴建了青年俱乐部、安全游乐场、制定《童工法》，对孩子们饮用的牛奶进行消毒处理，增加维生素的摄入量，甚至还实行禁酒。所有这些无非是想使孩子们免受上一代某些坏习气的侵袭。美国大兵一代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长大后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性格直爽。他们中出现了第一批童子军、第一位美国小姐及第一批全美英雄人物（即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当选）。为将美国大兵一代与品质“败坏”的上一代人（当时还是媒体关注的对象）区分开来，弗拉纳甘神父在美国大兵一代的童年时期就曾宣布，“根本没有坏孩子这种事情。”

本世纪20年代，大学校园中风行犬儒主义与个人主人，乐观主义与团结合作受到冷落。到20年代末期，（热内·舒弗特回忆说）美国大兵一代自诩为美国“最杰出的一代”。通过在历史学家保拉·法斯所谓的严格要求的“同龄人社会”中生活，他们学会了如何约束自己。在本世纪30年代，这意味着同盟、党派政治以及总统竞选中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压倒性票数连选连任。在大萧条到来后，年轻人尽职尽责，忠于职守，被人们称为美国“被淹没的中产阶级”中“幸运的一代”，而非受到孤立的年轻人。由于他们意识到推行新政的传教士一代出台的措施对己有利，于是认为联邦政府是一位随时都会帮助自己的好朋友。在政府的号召下，青年人植树、修路、修筑堤坝，为他们所在的社区提供水电。伍蒂·古斯利在歌中唱道：“你发的电将我们这里的黑暗变成了光明，哥伦比亚水电站，继续轰鸣吧，轰鸣吧！”正是坚韧不拔的精神使他们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受益匪浅。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部队，他们在海外征战了差不多四年，然后胜利返回祖国。对战争中没有负伤的美国大兵中97%的人来说，战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为此，他们在青年

时期就受到了人们的好评，中年后便开始执掌国家大权。

作为凯旋的英雄，美国大兵一代成为斯蒂芬·安布路斯所谓的“我们的一代”。他们给校园、工厂与政坛带来了一股务实、肯干的精神。如同《史密斯先生的华盛顿之行》中的吉米·斯蒂沃特，他们觉得有责任将一个腐朽失落的世界清扫干净，消除大萧条带来的混乱，颂扬“行为端正的青年人”，将行军作战时的那种劲头转移到和平时期的社会建设中来。他们表面上非常随和（“来根烟吗?”），但对待各种卑鄙与罪恶行为却毫不手软。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美国大兵一代在诸如日本侵略、使用毒气与体罚等问题上比老一代要严厉得多。

在科技方面，美国大兵一代在战时发明了雷达、加密技术与原子弹，现在他们开始将目标转向太空火箭、电视与新型家用电器的研制与开发，目标是把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愉快。大兵一代中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先后获得了 99 项诺贝尔奖，其中大多数是在艰深学科（如物理学）领域取得的。在商业方面，有强烈责任感的美国大兵一代为美国制造业增添了敢作敢为的自信。他们在战后完成了许多大型建筑工程，如桥梁、公路、隧道、港湾与房建，创下了许多世界之最。各大公司利用这些基础设施，根据大众需求，扩大生产规模，获取了巨额利润。在乔治·加罗普就何为“普通人”提出了权威性概念之后，鲍勃·麦克纳马拉与李·亚库卡开始设计普通型汽车，克蒙斯·威尔逊开办了假日饭店，为中等收入家庭提供高级休息场所，而麦当劳兄弟创建了快餐服务业。不久之后，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连锁店，它们个个都能向人们提供便捷可靠的服务。

美国大兵所制定的发展方案带来的不仅是郊区生活的繁荣，而且形成了《组织者》一书的作者威廉·怀特所说的美国大兵式郊区“社会伦理”。这种伦理规范在其诞生之日就广受欢迎，后

来却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它主张合作、集体参与、友善及男女有别。就像斯洛恩·威尔逊《穿灰色法兰绒外套的男人》一书中的主人公那样，理想的男性应该是一位坚强的追求者，而理想的女性则应该是一位具有奉献精神的家庭主妇。一个以反对大男子主义为开端的时代却以“男人”对导弹技术方面的差距展开的讨论而告终。一个以贝蒂·弗里丹分析《女性的奥秘》而告终的时代开始时也出现了一本畅销书，名为《失落的女性》，将“女权主义”称为“一种顽疾”。此外，还有一本杂志名为《观察》，它对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大加赞扬，说她们是“一种杰出的动物”，“一举一动都比 20 或 30 年代解放了的女性更具女性特征。”

郊区家庭生活以电视为核心。作为战后的一种新兴科技成果，电视促进了美国大兵一代“一般问题”文化的形成。那些古老的电视节目充分表现了已届中年的美国大兵一代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科研、生儿育女、保持乐观、让人们齐驱并进。美国大兵一代中涌现了最著名的电视戏剧演员（路西·巴尔、杰克·格里森），思想最正派的记者（吉米·斯蒂沃特、约翰·韦恩、伯特·兰凯斯特、科克·道格拉斯、亨里·芳达、查尔顿·海斯顿、格利高里·帕克与罗伯特·米奇姆）。

这一代人（包括约翰·肯尼迪）相信“人要做其必须做的事情”，但对精神沉思几乎一点也不感兴趣。在本世纪 50 年代末期，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坦指出，“有时美国人看上去有这种想法，即如果你是一位思想家，一定是个让人生厌的人。”美国大兵一代简单地将宗教与到教堂做礼拜等同起来，认为“真正的信徒”应该与狂热联系在一起。当莱特·米尔斯预言一位想“对症下药”的权威精英的到来时说道，“我们不随便谈论当前的‘各种理想’。”丹尼尔·贝尔宣布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认为自己的同龄人倾向于迎接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挑战，而不想探索各种价值观

念之间的细微差别。如同理查德·尼克松与阿尔杰·希斯一样，美国大兵一代中的谴责他人者与受到谴责者穿着打扮相同，居住在相同的房子中，阅读相同的杂志，收看相同的电视节目。

美国大兵一代喜欢歌颂相同点，他们相信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然而除了1946年美国大兵一代中的杰克·罗宾逊的成功突破之外，美国的种族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对歌曲《我这样的黑人》的作曲者与电影《猜猜谁来吃晚饭》的导演来说，这种情况简直不可思议。那时，人们认为中年黑人可以享有大众文化，而早期民权运动提出的各种目标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当美国大兵一代在媒体中播放美国黑人音乐，播出黑人明星身穿白衬衫、扎白领带的形象时，商业界开始意识到：从经济角度讲，种族融合比种族隔离要有益得多。最终，这种思想导致大兵一代控制的美国国会制定了相应法律。这些反种族隔离法与积极性措施或文化多元化无关，而是源于机会均等这一逻辑思想。

在这代中年人"清洗"美国的过程中，各个年龄段的选民逐步意识到这代人在和平时期的表现与他们在战时的表现一样出色。截至到1950年，一位美国大兵一代成员（托玛斯·杜威）两次参加总统竞选，两位（克拉克·克利福德与乔治·凯南）成为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还有几位（约翰·肯尼迪、理查德·尼克松、林顿·约翰逊与杰拉尔德·福特）开始了前途一片光明的政治生涯。到1953年，美国大部分州长与国会议员都是美国大兵一代成员。在整个50年代，冉冉升起的大兵一代的精英们对他们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所扮演的微不足道的角色极为不满。马克斯韦尔·泰勒对谨小慎微、缺乏活力的迷惘的一代领导风格大加批评，埃里克·塞法利德则指责上一代人的"计划缺乏理性"，约翰·肯尼迪埋怨说，"我们年青人节省下来的东西被我们的外交官与总统浪费掉了。"民主党在1958年的大选中获得了绝对性胜利，

使一大批渴望将美国政府塑造得更富进攻性的大兵一代成员步入政坛。

1960年，所有总统候选人清一色都属于精力充沛的美国大兵一代。他们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将自己在家庭、经济与文化方面表现出的活力注入到治国安邦的宏伟大业之中。年长的艾森豪威尔与杜鲁门对此抱有疑心。杜鲁门静心观察这次也许是20世纪最缺乏实际意义的总统大选时称赞双方的“备忘录非常出色”，但同时指出双方都未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说肯尼迪和尼克松“让我讨厌至极”。如果肯尼迪当时没有获得大多数同龄人的选票，他可能就会落选。自从1932年实行根据年龄层次进行民意测验以来，获得美国大兵一代集体投票的候选人还从未尝到过失败的滋味。这一代人的投票经常是竞选者走向成功的关键。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布“火炬已经传到在本世纪出生的新一代人手中”。他在竞选中提出了“让我们的国家再一次运动起来”的口号。他要求自己的同龄人要敢于“担负任何重任，做出牺牲”，努力恢复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威望”。这个刚刚执掌国家大权的一代人想让他们的国家在被大卫·哈尔伯斯塔姆称为“新一代敢想敢做者”——像鲍勃·麦克纳马拉（“生活在一个敢做的时代、一个敢做的社会中的敢做的人”）与麦克乔治·邦迪（“一个对权力充满了强大而无情冲动的人”）——的指引下，发展成为（援引贝尔的话）“一个世界强国，一个超级大国，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属于大兵一代的本·布莱德里与其他媒体同盟努力把关，守口如瓶，没有将今天可能会成为头条新闻的总统桃色事件曝光。

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格利哥尔·伯恩斯在称赞那个入主白宫的同龄人时说：“他是一个超人！”并认为他“全知全能”。理查德·纽史塔特声称“总统的权力”可以解决这代人想解决的任何

问题——例如，总统拿起电话就可以让钢铁公司降低钢产品的价格。在这个新的“帝王式总统”的统治时期，美国社会可以以无限的速度与无限的规模发展下去。由于在二战中遭受过进出口模式之苦，大兵一代经济学家，如华尔特·海斯特对“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赞不绝口，同时对清教徒式的节俭与宗教复活主义大加讥讽。他们鼓励消费者去花钱，而不是存入银行，劝说由大兵一代控制的国会推行和平时期财政赤字政策，以便加快国民生产总值（由大兵一代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所发明）的增长。

在本世纪60年代早期，理查德·鲁威尔在描述大兵一代中那些中年精英派时发明了另一个新词：既成权力机构。当时，这两个词包含着一种高傲与积极的内涵。在60年代早期，公众权力与公众福利是等同的。那时，德克萨库在歌中唱到（而且人们也相信）：“你可以将汽车托付给工作服上带星形图案的加油站工人。”正如沃尔特·克朗凯特百说不厌的那样，“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更为确切一点说，那时就是这个样子。

沉默一代进入青年时期：灰色的法兰绒套装

拉塞尔·贝克回忆说，“我痛恨战争的结束。”不过拉塞尔还是承认是那颗原子弹使他安然逃脱。“我那时拼命想成为一位与死亡打交道的英雄。我想让战争继续下去。”如同许多沉默一代同龄人一样，在美军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只好凯旋回国时，年青的贝克正盼望者参加一场入侵日本的战争。与他同龄的沉默一代后来在朝鲜检验了一下自己的勇气，但是那些“精选者”（以及《满洲候选人》一书的盲从者）根本不是有超人之称的前辈们的对手。如同赫伯特·吉利斯对年青的道比吹胡子瞪眼一样，美国大兵一代与沉默一代都清楚谁参

加了“大战”，谁没有参加。美国高涨时期的年青人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耀，只好（用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的话说）在年龄略比他们大一些的一代创造的新秩序中“满足于对各种技术进行修修补补”。

在高涨期开始几年中，还呆在校园中的沉默一代发现周围全是得胜回国的美国老兵。后者获得了高分，得到了最好的工作，而且对年青人的“一点微词”都忍受不了。1949 年，《财富》杂志指责大多数沉默一代大学生“缺乏冒险精神”，表露出一种“灰色法兰绒的思想”。民意测验表明，他们中大多数人想为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而几乎没有人想开创自己的事业。正如弗兰克·康洛伊所承认的那样，沉默一代的“穿着、举止与生活风格都是……成年人的缩影”。就像《商界成功秘诀》一书中的罗伯特·莫斯，这些年青大学毕业生扎“诚实的”领带，照镜子，看上去就像《佩吉·苏结婚了》中一位教授嘲讽的那样“价值观念带有浓重的中年人情调”。就此曼彻斯特说过一句妙语：“美国的年青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内向，谨小慎微，态度冷漠，缺乏想像力与冒险精神——而且沉默寡言。”

沉默一词是美国大兵一代对这一代年青人的奚落语。但是沉默一代在童年时代即危机期曾有过一段辉煌。诺尔曼·洛克韦尔的油画作品描绘了一批衣着整洁、性情温顺、毫无调皮捣蛋迹象的男孩与女孩。一些畅销的儿童读物（《划船去大海》、《小发动机》）强调帮助他人，安分守己。人们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的表现无可挑剔，而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人做到了这一点。随着儿童文盲率降到 1. 5%，据说吃口香糖与排队加塞儿开始成为严重的纪律问题。总之，尽管沉默一代的中学生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在教养方面取得的成绩却是空前的。他们在青春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如自杀、交通事故、不法行为、犯罪、物质浪费）降到了美

国历史上的最低点。他们只要犯一点错误，就会招致成年人的一顿奚落，说什么美国士兵为他们流血牺牲之类的话，仿佛要把他们吃掉似的。康洛伊回忆说，在“作孩子的什么也不是，地位最低下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沉默寡言，努力不引起他人的注意。”

沉默一代在童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效仿老一代的美国大兵。比较典型的一种约会方式是学习《温柔的陷阱》：尽早找女朋友，毕业后就结婚，然后搬到郊区，混迹于美国大兵一代之中。菲力浦·罗斯承认，在高涨时期，如果一个年青人不想结婚成家，“就会受到人们的指责，不是说他搞同性恋，就是说他不成熟，太自私或者害怕承担责任。”沉默一代中的年青妇女几乎全都是家庭主妇，没有自己的工作，而在战前美国大兵一代中却有许多职业女性。美国最受人们羡慕的女明星（格雷丝·凯莉）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一位外国王子结了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生育率超过了还没有读完中学的妇女，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1956 年，男女的法定婚龄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沉默一代中的男性在工作中也表现得同样专心。他们很快就成为大老板。理查德·史克尔写道，“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人经常在我们的恶梦中出现，不久之后有组织的人也会和他走到一块去。尽管在我们读这些做事谨小慎微的人的文章时，我们中许多人正在和公司招工者谈论如何效仿他们的问题。”数百万沉默一代成员加入到这场“卑鄙的竞争”之中，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在高涨期，美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到 20 岁时，他们中大多数人所受教育已经超过了父母一辈；到 25 岁，住房条件超过了父母；到 30 岁，收入超过了父母。在 20 岁到 40 岁之间，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代人能在人均实际收入与家庭富裕程度上获得如此大的增长，也没有哪一代人能相信伍迪·艾伦的那句名言：

“所揭示的仅是真实生活的百分之八十”。受益的不仅是社会精英：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年青的非熟练工人也能加入到中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并到郊区购买住房。即使在最贫困的城市住宅区，人们的家庭观念与团体观念也非常强。在这种观念的支持下，迁移到北方不久的黑人青年获得的收入也很快超过了自己的父母。

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大卫·李斯曼将沉默一代称为“寻找回来的一代”——与受到孤立的迷惘一代不同，社会乐意接纳他们，让他们融人其中。在沉默一代的最后一批成员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在平均受教育时间方面成为美国之最（超过13年，而迷惘一代还不足9年）。上过大学的“孩子们”说话很有礼貌，而以杜鲁门为代表的老一代人则满嘴俚语。许多公司在广告词中对他们年青聪明的技术员大加吹捧——电视观众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让沉默一代感到伤心的是，高涨期并没有使他们在成年过程中遇到真正的挑战，他们不是那种自讨苦吃的人。老一代并不希望他们取得更大的业绩，让他们成为为美国大兵一代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所谓的国家财富这部机器服务的“水管工人”就足够了。像柯林·鲍威尔一样，年青的沉默一代学会了如何操纵各种体制，善于“实现各种目标，做人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由于目睹过战前某些左倾主义者把自己的事业毁在麦卡锡听证会上，他们在工作中总是尽量避免异端行为，维护自己的清白。军役制通过扩大征召名额给年青人增添了不少压力，使他们“卷入”某些社会公益事业。应征人伍率甚至超过了越战时期的膨胀一代。尽管如此，他们中却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相反，据斯蒂芬·罗森菲尔德回忆说，他们“对当局（表现得非常）尊敬，对看上去有些荒诞的纪律（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即便如此，老

一代人仍对他们不屑一顾。《观察》杂志警告说，那些听话的青年人“容易受到希特勒之类人物的哄骗”。艾森豪威尔甚至鼓励年青人读那些《共产党宣言》，尽管他本人以前也没怎么读过这本书。

他们讨厌冒险，这使他们免去了许多外来的危险，尽管无法躲避内心的创痛。一脸微笑的阿尔弗雷德·纽曼在《疯狂》杂志的封面上写道：“什么，我担心？”他们确实担心——成为《孤独的人群》，一种保守文化的被动受益者。许多年青人渴望像詹姆斯·迪恩那样成为一个无所追求的叛逆者。在一个“遇到麻烦”意味着辍学结婚的时代，沉默一代的“少年罪犯”与其说是做错了事，还不如说是什么也没有做，或者因为难以名状的原因拒绝接受高涨期的情绪。保琳·凯尔欣赏了迪恩在电影《伊甸园之东》中的表演后写道，“美国影坛（出现了一种）新形象，这个男孩是一头漂亮而又受惊的动物，他太多情而失去了戒心。”作为沉默一代一员的历史学家大卫·哈尔伯史塔姆在文章中写道：“很少有年轻的美国人看上去桀骜不驯，同时又彬彬有礼。”由于社会纪律过于严厉，而年青人对感情与性的要求又如此执著，那时的歌曲与电影刻画了一些承受不住强大压力而发疯的青年人。那时的青年文化中显露出一种自卑，暗含着一种“找一个人诉苦的”苦闷与对“心碎”的恐惧。像艾尔维斯一样，沉默的年青人觉得《一切都破碎了》，同时又在苦苦追寻“我怎么了？/我浑身发痒，就像一个人被困在一个长满绒毛的大树上。”

随着高涨期逐步走向衰落，许多年青大学生决定为那个让他们觉得有点僵化而又程式化的新文化注入一种人们急需的人情、敏感与美。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为专家或者从事“帮助他人的”工作（医学、政府机关、法律、教育、社会服务），使他们这一代人在所有凭证上岗的劳动者中所占比例大幅增长，创下了本世纪

之最。

沉默一代擅长文学与艺术，他们在作品中描写具有破坏作用的生活与情感。“文化部长”埃德·莎利文接受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之后，摇滚及沉默一代的其他艺术形式在促使非盎格鲁文化加入主流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沉默一代中的“叛逆者”开始在咖啡店中聚会，偶尔口吐一些脏话。1955年，大约在艾伦·金斯堡朗诵他的长诗《嚎叫》时，在旧金山的第六展览馆，留山羊胡、穿凉鞋、生活放荡不羁的垮掉一代青年人开始品尝外国菜肴，听曲调忧伤的爵士乐，读嬉皮士写的诗歌，对大兵一代的“守旧社会”进行嘲讽，尽管这样做他们还觉得有些不自然。大兵一代（如专栏作家赫伯·盖恩）觉得这些“垮掉派”非常有趣，而非可怕。在出版《耶鲁大学的上帝与人》——对大兵一代的世俗思想发出了学究式挑战——之后，威廉·巴克利创办了思想保守的《民族评论》，当时，他根本不敢希望由此可以改变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被关在高涨期文化这个“杜鹃鸟巢”（肯·凯西语）式疗养院中的沉默一代精心培养高雅的不轨行为，以达到委曲求全的目的。休·赫弗纳将最典型的花花公子描述为一个“喜欢爵士乐、外国电影、常青藤大学联盟服装、杜松子酒、补酒与漂亮姑娘”的人，他的“生活……新鲜、复杂而伤感”。到50年代末，嬉皮士思想走出咖啡店，来到了城镇郊区。约翰·厄普代克在描述其风格时称其“一半是店铺，一半是科研机构”。当厄普代克与菲力蒲·罗斯撰写有关主人公怀疑自我的冒险小说时，汤姆·莱勒与斯坦·弗雷伯格开始上演充满诡辩的讽刺小品，而安迪·沃霍尔则在美国大兵一代的汤灌中找到了艺术灵感。除迪恩与普莱斯利之外，典型的青年影星都是些“愚蠢可笑的人”，如杰里·刘易斯，或者“情人”，如戴比·雷诺德。他们通常在电影中扮演充满自信

的大兵一代中的“性格直率者”的配角。

在政治方面，美国大兵一代的上台为处于上升期的沉默一代及他们的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在约翰·肯尼迪将一批沉默的聪明助手（皮埃尔·塞林格、比尔·莫亚斯、罗伯特·肯尼迪）推向成功的同时，鼓励其他人参加和平军团或者参加民权运动。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他们中大多数人为男性。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沉默一代女性看着手上的戒指、手中的拖布以及在自己身边跑来跑去的孩子，开始对整个社会制度产生了疑问。

无论沉默一代有何种社会奋斗目标，他们必须承认大兵一代建立的各种社会制度是不可动摇的。当彼得、保罗与玛丽在歌中唱道“如果我有一把斧头”时，他们的同代人都清楚，美国大兵一代掌握了所有的斧头，并利用手中的大权制造洲际弹道导弹、修筑州际高速公路。沉默一代开始感到内疚，担心美国每天都有一些可怕的犯罪案件发生，但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粉饰太平地将其遮掩起来。小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利用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不断唤醒美国大兵一代的良心。当年轻的“局外煽动者”开始在美国大兵一代修筑的大厦中搜寻各种缺点时，处于上升期的这代人开始引吭高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深信，我们总有一天会获得胜利。”

膨胀一代进入童年：可怕的丹尼斯

儿科医学专家本杰明·斯伯科在他那本首版于1946年的《儿童护理常识》中宣称，“我们需要理想主义的孩子”。斯伯科医生想培养出新一代儿童，而且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后来，人们常常用“斯伯科的婴儿”一词来指在美国高涨期

出生的一代人。当时这本书年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册。

在美国高涨期，由于最近经历过一场大灾难，那些作父母的大兵一代开始担心下一代人是否需要一种新的气质。在这种情况下，培养理想主义儿童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追求。埃达·勒莎恩解释说，“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变得内向些。对我们来说，法西斯与共产主义……只能在那些抚养孩子时独断专行的国家获得成功。”与勒莎恩同龄的美国大兵一代经常回忆自己年青时的集体主义思想，对麦卡锡时期的听证会感到后怕，但同时又对性情温顺的年青一代充满了忧虑。因此，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变得自私一些，以便抵御来自同代人的压力以及各种“主义”。

因此，童年时的膨胀一代是在美国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温暖阳光照耀下长大成人的，同时父母还对他们寄予了历史学家兰顿·琼斯所谓的“伟大的希望”。在战后，作为父母的美国大兵一代认为自己的孩子（用曼彻斯特的话说）“作为儿童会讨人喜欢，作为小学生非常聪明，而10岁以后将变得更加出类拔萃。”此后，“他们的父母将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按照父母的计划，这些孩子将在一个现代家庭中长大成人，从那里他们可以乘坐快速单轨电车到五彩缤纷的城市去购物、游玩或者工作。当膨胀一代的第一批成员涌入大学后，《时代周刊》宣称他们“已经走到一个金色时代的边缘”，不久之后就会“规划出没有灾难与雾气的城市，使欠发达地区繁荣起来，这无疑将会消除贫困与战争”。儿童生育高峰的产生，部分原因是成年人的这种乐观情绪，另一部分原因是一种贯穿所有繁荣时代的生育思想。尽管结婚时间较早的沉默一代生的孩子差不多占膨胀一代全部人口的一半，晚婚晚育的大兵一代却为如何培育孩子奠定了基调。人口出生率的急剧增长进一步夸大了高涨时期的繁荣景象。与在出生率极低的时代出生、深居简出的沉默一代不同的是，膨胀一代变得越来越像

卡通片《101只达尔马提亚狗》中那些哇哇乱叫、数量不断增加的木偶。他们是生活富足的象征。

人们将儿童时期的膨胀一代视为现代儿童。父母在培育孩子的过程中采用了被勒莎恩称为“民主纪律”的原则，并在和孩子的交往中努力做到“深思熟虑、有理有据、态度和善”。斯伯科鼓励母亲在托儿所中对孩子要有耐心（不要采用恫吓的方法），在喂养孩子方面采取“放任”的方法，即孩子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某些教条。在整个儿童时期，膨胀一代生活在被一位心理学家称为“如果他想有一个整洁的房间，他就会把房间打扫干净”的氛围中。如果说妈妈的工作是细心照料孩子，父亲的任务则是支付各种账单，孩子们根本不知道钱从何处来。在家中，经常扮演严厉角色的父亲感到很不自在。一本畅销书建议父母“要全身心地去爱护自己的孩子，否则你就算不上一个让人喜欢的父母”。到美国旅游观光的欧洲人经常把美国成年人对孩子百依百顺的事情当作笑谈。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成年人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家庭主妇人数的剧增，膨胀一代儿童可以说生活在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家庭中。作父亲的大兵一代每天乘车去上下班，而母亲则将无数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孩子身上。苏珊·利特文回忆说，在那时，“当父母也是一种职业，而且同任何职业一样，你工作越努力，收获越多。”在上学之前，膨胀一代儿童的母亲几乎没有在外工作的。即使有少数母亲有工作，孩子们也主要是由亲戚在家中带大的。只有2%的孩子白天要被送到公共托儿所。斯伯科强调“母子的关系”，认为“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将他们的成功归于“一种源于与母亲的密切关系所产生的灵感。母亲对孩子抱有极高的期望”。在晚年时，膨胀一代中的激进者们承认在儿童时代他们与母亲之间有一种社会学家肯尼斯·金斯敦所谓的“强烈关系”。

在越战时期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膨胀一代中有32%的白人（黑人为44%）认为只有母亲“关心我”；只有8%的白人（黑人为2%）认为父亲关心自己。

中年时期的大兵一代男子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改善物质环境与儿童生活条件。如果不改变自然，它将成为人类的敌人。那时，许多人喜欢用奶瓶给孩子哺乳，而不是用母乳，膨胀一代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吃母乳最少的一代人。大兵一代的科学家攻克了诸如白喉、小儿麻痹症之类以前非常可怕的儿童疾病；懂得在水中加入少量氟以防止儿童蛀牙。儿童外科医学的发展也达到了巅峰：任何一代美国人在接受注射或手术（包括现在已经被禁止的环割与扁桃腺切除）方面都比不上膨胀一代。

与此同时，大兵一代在科研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促进了公共教育的发展。美国各地的学校为自己的师资力量倍感自豪，部分原因是在母亲与教师之间建立了一种强大的相互支持的网络。担任膨胀一代学童老师的是大兵一代中最杰出、最聪明的女性，因为她们无法找到别的职业。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事件的刺激之下，美国的普通纳税人做出了积极响应：开办新学校，配备高水平师资力量。大兵一代这样做不只是出于地理政治目的的考虑：许多膨胀一代成员至今还记得父母告诉他们，为了创建一个繁荣昌盛、安定团结的国家以便让孩子们生活得更有意义，成年人是如何努力工作的。如果说传教士一代向大兵一代传授的只是一些基本知识，那么大兵一代向膨胀一代教授的则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让他们学会了后来被金斯敦称作“原则倾向”的东西。

最重要（也是最科学的）的抚养工具是电视。从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每个家庭日均收看电视时间从0增加到4.5小时。儿童时代的膨胀一代特别喜欢看那些情节简单、以喜剧结尾、主人公多为能干的父母、聪明的科学家或诚实的领导者的电

视剧。在喜剧、电视剧与电影中，孩子们的形象要么是不服管教的《可怕的丹尼斯》、充满好奇心的《毛毛狗》，要么是可以解开谜团的大师。如同瓦尔德·克利夫一样，在电视机前长大的成年人通常让孩子在一个对儿童友好的世界中通过自己的错误来汲取教训，从而获得人生经验。

孩子们也清楚成年人非常关注他们的思想。正如亚特·林克莱特所说的那样，“孩子们说的都是些该死的话”。无论孩子们对什么感兴趣，都会深深吸引父母的注意。在20世纪初期，琼斯就指出：“让我们想像10岁以下的孩子能成什么事，简直不可能……但是50年代的某些时尚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孩子们创造的。”从米老鼠的耳朵、大卫·克鲁凯特的帽子到呼拉圈，膨胀一代是第一代被广告公司当作目标的儿童。美国在最近的危机时期还对沉默一代少年几乎一点也不感兴趣，但在高涨期快结束时，可爱的儿童却成为该国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

许多孩子的生活的确可以与古老的电视情景喜剧《欢乐日子》中的形象相媲美。对膨胀期的儿童来说，能干而富有理性的成年人似乎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切里尔·米尔斯现在仍记得当时似乎总是“有人”（“上帝、圣人、天使或者星星”）在看护着他们。未来似乎“就像《杰特森一家》描写的那样幸福、舒适、简单而富裕”。对大多数中产阶级青年来说，不存在贫穷、疾病与犯罪，或者最多是一些暂时的麻烦事，很快就会在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大潮中悄然而去。在此期间，主流文化向孩子们灌输了如此美好的世界观，而很少要求他们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困难或悲剧做准备。在20世纪其他任何时期，从未出现这种情况。通过收看电视游戏节目《是真是假》，孩子们意识到真理给人带来好处，而虚假只是一种笑谈而已。生活在无忧无虑中的孩子们自然会尽情编织自己的内心生活。

在膨胀时期，儿童不仅受父母的喜欢，而且也是社会的宠儿。他们成为图书馆、娱乐中心及其他公共机构的重点接待对象。而在危机时期，只有职业成年人（今天已经迈入老年）才能到上述公共机构活动。生活在这种慷慨大方的环境中的膨胀一代儿童养成了一种丹尼尔·杨克洛维奇所谓的“权利心理”。兰顿·琼斯回忆说，“被其他几代人认为是特权的东西，膨胀一代却认为是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在整个美国高涨期，随心所欲的膨胀一代精神一直深受人们的欢迎。196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年龄在9到13岁之间的孩子对成年世界持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罗伯特·塞缪尔森仍记得自己在“一个人们相信技术与社会的精英可以确保社会稳步走向完善的极度乐观的时代”进入青春期的情况。在本世纪60年代初期，属于美国大兵一代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科尔参观了几所地方中学后认为，现在的学生“非常好管理”，他还预言，“不会再发生暴乱事件。”

走向第二次转折

1963年，斯蒂芬·斯宾德将战后时期描述为《现代人的奋斗》，这是人类文明在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出现的正常现象。美国在战后的繁荣发展只持续了18年，但人们已经认为战后的一切都是现代的，而战前则不然。在《追忆30年代》一书中，英国作家唐纳德·大卫指出：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看来，战前的情况“似乎已经变得比伊萨卡或罗马还要遥远了”。

当老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肯尼迪总统就职仪式上欢呼一个新的奥古斯都时代即将到来之时，这标志着弗罗斯特本人所属的传教士一代获得了胜利。弗罗斯特一代抚养成人的“好孩子”

已经做好准备，为实现他的同龄人离开人世时的各种幻想而奋斗一生。然而，最后一批传教士一代成员的去世表明，在整个高涨时期，美国没有一代成年人可以专注于内心世界的探索。对在日本投降10年后出生的孩子们来说，弗罗斯特在就职仪式上朗诵的那首诗与他们存在某种距离，这距离和弗罗斯特本人与南北战争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如果弗罗斯特当时想到了这一点并想到了他那一代人对先辈镀金一代所做的抨击，他会意识到自己在1960年欢呼的那个奥古斯都时代也不会长久。弗罗斯特于1963年逝世。和绝大多数传教士一代成员一样，他从未亲眼目睹过此后发生的一切。

在美国高涨时期，世代原型将社会情绪从萧条和战争时期的忧郁与焦躁转变为乐观向上。正是这种转变造就了一个新的（但不永恒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诞生。总而言之，迷惘的一代、大兵一代、沉默一代以及膨胀一代通过他们在人生循环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推动着整个美国向社会安定、家庭幸福、个人服从社会、机构建设与信仰世俗进步者的目标迈进。美国变得富有活力，并将目光投向未来，整个国家团结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这种情绪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正如每代人所对应的原型一样，每代人只能在其人生某阶段发挥积极作用。在走入下一个人生阶段的过程中，任何一代人都不会甘愿接受前人在同一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大兵一代不会做谨小慎微的船锚，沉默一代不会成为乐观的建国者，膨胀一代也不甘心做默默无闻的助手。下一代孩子能获得父母更加温暖的保护吗？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事情，将来也不会发生。

在一个高涨期行将结束时，会出现以下情况：

·老年游牧者现在变得与其说是谨慎，毋宁说是反动，成为

英雄实现其雄心壮志的障碍。

·中年英雄现在大权在握，变得骄傲自满，在领导社会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的道路上变得缺乏耐心。

·青年艺术家开始对自己当一个无法实现的伟大抱负的助手颇为不满，渴望独立，扫除一切阻碍其发展的障碍。

·童年预言家受到对未来充满自信的成年人的溺爱，开始感到在英雄领导的世俗社会内部隐含着一种可怕的精神真空。

到60年代初期，随着这四种原型完全占据上述几个人生阶段，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由于每种原型已开始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英雄进入老年、艺术家进入中年、预言家进入青年——他们先前扮演的社会角色已经无法维持。

战后高涨期气数已尽，无法继续维持。必将产生一种新情绪——而它正在向我们走来。这一火花发生在1963年11月22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天发生的一些事件至关重要，但绝非必然。如果奥斯瓦尔德没有击中目标，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百年周期仍将向前发展。第二次转折一定会到来，只是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也应该到来了。

第七章 第二次转折：意识革命（1964－1984）

许多电影、戏剧与歌曲描述了美国在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遇刺）之前的情况。《美国素描》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部电影的广告词中有这样一句话："1962年你在哪里?"对当时所有人来说，这一事件不亚于个人生活史中的一座里程碑。那场悲剧发生后不久，人们就开始相信什么也没有受到影响。西奥多·怀特对陷入悲痛中的华盛顿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宣称："（首都）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变化。"诚然，美国表面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一场不可逆转的内部变革已经悄悄开始了。在美国民族的灵魂中正在形成一道新的伤痕。

在第二年即1964年，几次新运动悄悄发生了。这些运动的全部含义在随后的20年中才得以完全显露出来。那年春天，埃德·莎利文邀请甲壳虫乐队参加他的演出，这表明老一代接受了那些敲敲打打、留长发的年轻人。在那年夏天召开的美国共和党大会上，巴里·格德沃特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为美国政治增添了一种愤怒的基调。那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论坛运动对既有的教育机构进行了猛烈抨击，而民主党人则在一则电视广告中告诫人们说，格德沃特会把那些摘花的孩子烧死的①。

① 1964年林顿·约翰逊竞选总统时曾指使手下人拍摄了这样一则电视广告，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正在花丛中摘花，突然被一颗原子弹炸死了。广告的寓义是：约翰逊的竞选对手巴里·格德沃特是一个好战者，不适合当当总统。

与此同时，林顿·约翰逊策划了一场东京湾①事件，激怒了另一类佩花嬉皮士。在人民与领导者的情绪之间出现了隔阂。《建议与批准》一书的作者艾伦·德鲁里说："在国会山，领导人是在一种相互谅解与相互尊重的气氛中处理国家大事的，而在全国各地暴乱与暴力活动风起云涌。"

美国已经进入觉醒期，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意识革命。

肯尼迪逝世后，美国经济继续飞速发展，西尔维娅·波特认为"(这么快的速度）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人们似乎已经能够控制经济周期。美国的领导者开始鼓吹什么"经济快速增长科学"，并逐步放慢财政与货币的增长速度。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根据过去20年的情况做出推论，宣称不久之后美国人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不必再去生产。许多专家开始怀疑人们如何面对这种高度繁荣与富裕。罗伯特·西奥波德开始探讨《富足的挑战》，罗伊·哈罗德则谈论"经济饱和的可能性"，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大谈一种可以按一定程序吸引大众购买超过其实际需要的"技术体制"。人们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是：美国人能否下定决心，去尽情享受生活。

既然美国人将来会拥有如此丰富的物质财富，大众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良心与不同政见等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艾利斯塔尔·库克告诫人们："对当局者的虚伪与滥用职权行为进行有益的反抗"会导致"(大众）对任何制度与权威失去信任"。在这句话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假设：无论人们怎样反对，有形的基础设施（发电厂、高速公路与股票）以及无形的社会习惯（家庭、公共秩序与工作习惯）都将如磐石一样不可动摇。人们开始相信，越了解自己的内心欲望，就会更富创造性地消费自己创造的东西—

① 越南北部一地区旧称

一这不仅提出了更高的经济发展目标，而且可以促使经济不断发展下去。

虽然这种对美国生活方式持久的信任使觉醒成为可能，觉醒时代却会首先消除这种自信，然后再根除这种生活方式。对上述自信的破坏始于1964年，以三部具有启示意义的电影（《五月里的七天》、《失败与安全》和《斯特朗吉洛博士》）为标志。这三部电影对人们在高涨期对权威、政府与科技的信任进行了抨击。根据新的观点，社会权威造成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损失：公司摧残了个人，警察压迫穷人，学术界抹杀人的创造性，而父母也扭曲了孩子的心灵。这种观点首先是由60年代中期一些生活富足的儿童提出来的。到70年代末期，它已经逐渐被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贫穷阶层所接受。在《美梦与梦魇》中，迈伦·马格奈特指出，在开始阶段，觉醒是由世俗社会的精英发动的一种兴高采烈的实验，最后却导致许多家庭与社团陷入混乱之中，这在穷苦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随着岁月的流逝，觉醒精神越来越深入到主流文化之中。那些守住旧观念不放的人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美国编年史家詹姆斯·莱斯顿记录下1966年如何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绪……疑问、怀疑与挫折”；1967年人们感到“一种内部危机……极端政治”以及“年轻人逃避现实”；1968年充满了“暴力与反抗……抵抗与反动”，而且“(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局势已经无法控制”；而1969年则充满了“失败、毁灭、反暴力、种族关系紧张与恐惧”。

在1965至1970年这5年中，在美国人对自己的社会进行“人性化”的过程中，整个国家在极度的欢乐与悲伤中摇摆着。埃得加·凯伊斯的《沉睡的预言家》是一本当时最受人们欢迎的讲述未来的书。这本书解释了古代理想国亚特兰蒂斯施行技术统

治论最后以悲剧结束的原因。而 2000 年委员会埋怨“人们的道德品质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在电影《2001 年：太空旅行》与《巴巴莱拉》所揭示的未来社会中，人的思想、肉体与机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影响着。从彩虹服装到人们在百老汇大街上可以对裸体与淫秽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各年龄段的美国人都参加了查尔斯·莱希所谓的“美国绿化活动”，将穿上窄下宽的喇叭裤的个人提升到穿灰色法兰绒外套的团体之上。1968 年，杀害马丁·路德·金与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完成了他们的刺杀三部曲。对许多人来说，这是那个暴力猖獗时代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在 1969 年仲夏的四周时间内发生了三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阿波罗 2 号登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与查帕奎迪克岛交通事故——将美国觉醒期的各种激烈矛盾推向了高潮。人类第一次登月成功充分展示了科技的辉煌。而对那些崇信科学、集体协作与征服自然的人们来说，这一事件则标志着“使命控制”的终极。根据安·兰德的观点，这标志着美国“理性”的“具体化”。然而，正如媒体提醒人们的那样，登月火箭剥夺了许多穷人的资源。太空船刚一返回地球，一群青年人就在伍德斯托克对使人类登月化为现实的社会秩序发起了挑战。辉煌已经逝去；“伟大”现在意味着衣不遮体的乌合之众而非服装统一的方阵。与此同时，泰德·肯尼迪在查帕奎迪克岛的遭遇表明美国人的公众道德标准与个人道德正在江河日下，同时也表明他们逃脱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与养儿育女责任的趋势。人们在电视上观看这些新闻的同时，还到书店购买菲力蒲·罗斯的《伯特尼的怨言》，到剧院看《噢，加尔各答！》，到电影院看《鲁丝玛丽的孩子》。吉米·亨德里克斯演唱的那首女妖般迷人的歌曲《星条旗》标志着美国文化已经到了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候，就像当年恺撒大帝率军越过卢比

孔河与罗马执政官庞培进行决战一样。美国文化再也不会一成不变，以后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而新奇。

1969年也是越战最残酷的一年。这场战争正好发生在美国觉醒期的高峰阶段。从代沟到暴徒暴乱，从摇滚乐到“伟大社会”的精疲力竭，这场战争与觉醒密不可分。在高涨期，越南内战也许可以得到解决，但在觉醒期美国的干涉注定要遭到失败。经过精心策划，美国人想利用这次战争向一个在道德问题上值得怀疑的同盟提供支持，而不会影响到国内宏伟的经济建设。然而这种如意算盘没有成功。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美国领导者第一次被迫承认他们无法解决某些国内外大问题。然而，与其说越战是文化动荡加剧的原因，毋宁说是这种动荡的征兆。詹姆斯·莱斯顿指出，美国的“内部危机不能用那场战争的失利来解释”，尽管它已经成为“（人们）对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深怀不满的象征。”

在五角大楼，美国国内的经济规划者在言谈中表现得同样傲慢。1966年，约翰逊总统手下的解决贫困问题委员会主席萨尔根特·希利弗预测反贫困斗争“用大约10年时间”就可以获得胜利。到70年代早期，尽管越战已经招致大众的不满，但考虑到当时美国每年都要向月球发射载人火箭，应该认为“大炮与黄油”加上“有保障的收入”的目标已经达到。西贡沦陷之后，美国两大政党一致同意将新设的“和平津贴”用作中产阶级老年补贴。理查德·尼克松、威尔伯·米尔斯、乔治·麦克加文与其他大兵一代的领导者意识到，尽管这些补贴将会成为政府一项很大的开销，但年青一代将来会变得比大富翁更富有，因而这笔开销支付得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高涨期的繁荣到那时已经变为一台冒着黑烟的破烂机器。

许多美国人不再相信（或者关心）经济进步。由于人们开始

更多地从精神角度去审视未来，一些舆论领导者开始发出质问：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会把美国人变成一种更为优秀的民族，还是使他们变得更加贪婪？从 1970 年 4 月的第一个地球日到 1972 年 12 月阿波罗 2 号的最后一次升空，倍受世人关注的美国放弃“越大越好的”观点，转向接受了“小而美”的观念。接着在 1973 年与 1974 年，美国政府机构——与社会繁荣一起——倒塌了。随着水门事件的发生及经济不景气的出现，个人主义势力获得了胜利。听厌了在大众面前吹牛皮的美国人将吉米·卡特推上了总统席位。

在被约翰·厄普代克称为“贫民窟 10 年”的 70 年代，美国大众普遍对所有大型机构（从各级政府到企业到家庭）采取不信任态度。《已故行星地球》列非幻想类畅销书之首，这表明，环境保护主义者号召美国人降低能耗，削减大型工程项目。当时人们想，通过与自然界达成一种消极的和谐关系，美国人可以实现与内心世界的真正和谐。这种简化思想削弱了美国的生产力，却没有影响人们对食物的渴望。再加上两次石油价格上扬产生的影响，结果导致美国陷入经济停滞状态。即使在 20 多年以后的今天，美国人能拿回家的人均实际收入尚未达到 1973 年的水平。

在觉醒期后期，美国在高涨期各种不可思议的打击的影响下步履维艰：煤气管道事件、伊朗人质危机与美元不断贬值。当吉米·卡特宣布美国患了一种全国性疾病时，世界人权会议发布了《人的宣言》，宣称“自我发现（是一种）主权”，并认为“（自我发现）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美国人当时被克利斯托夫所谓的“自恋文化”所陶醉，认为接近生活的最好方法不是（像在高涨期）以社会为起点，然后向内发展，而是从自我开始，然后向外延伸。觉醒运动的最后一个目标是让那些思想保守派得出同样的结论，进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复兴运动。在 70 年代末期的

减税浪潮与1980年罗纳德·里根上台这段时间中，保守派终于放弃了既定的政治制度。他们赞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后形成的观点：个人比国家更具有德行，并惊喜地发现一个充满了有自治能力的个人的社会恰好为共和党重现青春提供了一片理想土壤。

到里根政府第一届任期结束时，觉醒期已经走完了它的路程。在1964年至1984年之间，美国人的精神渴望像波涛一样翻滚不息，而社会纪律却日见衰退。正如资深民意测验专家丹尼尔·杨克洛维奇在他的20世纪80年代情绪扫描——《新规则：在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中寻找自我实现》中所指出的那样，意识革命改变了美国人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那时的成年人都不会忘记，不断变换的世代潮流是如何影响着那段历史的。各代人对觉醒期的记忆也各不相同。对老兵一代来说，意识革命充满了失望与耻辱，更是一个愤然分离的时期。对沉默一代来说，那是一个个人“发展历程”，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喧嚣与冒险。对膨胀一代（对这个时代的记忆最美好）来说，觉醒期为他们揭开了一段人生历程。对第13代来说，如同青年作家朱丽·菲力蒲斯所说的那样，这个时代“就像这样一个故事，听到那里，谁也不会发笑，这时你会说，‘我猜你会这样的。’”

美国高涨期的国民情绪就像历史长河中的泡沫一样难以长久。无论刺杀事件、越战与水门事件是否发生，百年周期都会进入觉醒时期。

第二次转折与原型

包括最近一个时期在内，从16世纪开始算起，在英美历史上共有6个第二次转折（觉醒期），它们是：

·新教改革（1517－1542），属于改革百年周期；
·清教徒觉醒（1621－1649），属于新世界百年周期；
·大觉醒（1727－1746），属于革命百年周期；
·超验觉醒（1822－1844），属于内战百年周期；
·第三次大觉醒（1886－1908），属于强国百年周期；
·意识革命（1964－1984），属于千年百年周期。

觉醒是一个文化动荡与精神更新的时代。当高涨期日益加强的社会纪律让人突然觉得乏味无聊、难以实现、不合理或者不正当，人们开始以追求真正精神价值的名义群起而攻之时，觉醒期就会到来。迄今为止，人们对上一次危机的记忆中还掺杂着一些高涨期的稳定与舒适，而且认为高涨期的某些主要美德已经过时，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觉醒期恰好在世俗文明发展到高潮之后——或者在这种文明的发展受到以改革与反抗为主要内容的解放运动抑制之前——达到巅峰。当对手接受了新意识，压迫者被新的价值体系所同化，觉醒的使命就宣告结束了。

觉醒期是百年周期中的夏至点，是伟大的光明时代。社会秩序达到了巅峰，而人们对秩序的需求却正在降低。莎士比亚说，夏季到来时，"狂风吹落五月的花蕾"。随后到来的是酷暑难熬的日日夜夜。这时，秩序松懈，精神上升。暴风雨说来就来，天空中电光雷鸣。这个季节与青年人的激情分不开。爱默生说"我们以彩虹为衣，心比天高"。随着仲夏神灵的出现，生命进入成熟期，绿意更深，道路变得更难寻。在夏季行将结束之时，自然界营造出一种满足的气氛。如同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笔下的八月，觉醒期在最后阶段"边打瞌睡，边创造，心满意足。"

当一个社会从高涨期向觉醒期过渡时，情绪的转变往往具有欺骗性。起先，人们将这种转变视为可信赖的公共机构受到的一

点（具有提神作用的）刺激。然后，这些新的情感获得了有利地位，对一种不知如何停止建造的旧秩序设下了包围圈。随着社会内部生活的加强，其外部生活日渐削弱。人们认为权力高于责任，个人高于社会，理想高于公共机构，创造性高于因循守旧。不管觉醒期开始时有多么令人欢欣鼓舞，都会逐渐产生一种阴暗的色调。陷入困境中的公共机构不再提供此前被人们认为是想当然的秩序与繁荣。灾难的幽灵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并坚定了人们的改革决心——这经常会引发暴乱、社会混乱与政治动荡。1641年，一位英国议员宣称，“改革必须全面彻底。要改革所有地方，所有人与各个职业……要改革大学、城市与乡村……实际要做的工作比我所谈到的还要多……只要不是天父种植的树木都要连根拔起。”在觉醒运动快要结束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人们的个人生活状况比作为群体的社会秩序要好得多。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觉醒期，就会发现值得人们记忆的是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对相互对立的极端形象——权力、财富、知识的胜利与富有激情的精神呼唤并肩而立。通常，前者反映了当时身在高位的一代人所取得的成绩，而后者则代表正在上升的一代人的喊声。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居住在豪宅大院中的沃尔西主教与潜心研究路德抗议书精髓的学院成员；弗兰西斯·培根是在那些坚持认为只有通过信仰一条路才能获得上帝拯救的目空一切的清教徒的面前完成他的《学术的进展》一书的；德·威特·克林顿总督开凿雄伟的伊利湖运河时一群行将昏厥的青年人沿着运河开辟了一片福音传道区；格鲁夫·克利夫兰总统合上在芝加哥这座不夜城举办的美国展览会的灯闸时，在许多城镇的街道上许多无政府主义分子与平民主义者却在公然抨击美国工业化社会。在觉醒期，恺撒大帝率领的罗马帝国向上帝领导的王国摊了牌，而这次摊牌也是历史上最为激烈的。

觉醒期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绪，是因为那时各种原型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英雄进入老年，艺术家进入中年，预言家进入青年而游牧者进入童年。当进入成年的预言家对英雄的辉煌业绩大加指责时，代际差异变得异常鲜明起来。

·当雄心勃勃的英雄在老年取代游牧者时，他们创立了更为辉煌的世俗业绩，为青年一代的精神目标搭好了舞台。

终于，正在步入老年的英雄一代不听老年游牧者的忠告，在他们执掌公众大权时进入了觉醒时期。老年将至这一事实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精力以及实现集体目的的决心。相反，这更激发着他们去成就更辉煌的事业。当青年狂热分子抨击他们的狂傲时，他们首先反对新价值观念，然后予以接受。此后，他们继续掌握国家大权，并依此寻求并获得青年一代的经济奖赏。在觉醒期后期，大众给予那些曾为后一代幸福流血牺牲的战争英雄许多物质报偿。正在步入老年的英雄乐观、崇尚团结协作、相信大众，青年一代却似乎缺少这些品质。

大觉醒运动中的光荣一代老人认为自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谓的美国第一批“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仍在日记本页边空白处记录优秀事迹的科顿·马瑟觉得自己的“耐心……受到了……追求狂喜而非忏悔的青年狂热分子的轻蔑之情的考验”。在超验主义觉醒运动开始时，年老的共和党人正沉醉在被人称为新世界最伟大的一代的光环之中。然而即使在杰非逊欢呼“伟大的进步”与“科学之光普照”时，年青的批评家仍否定了这一代人共济会式的兄弟情意及他们追求的安定、充满智慧的理性思想。大卫·汉弗雷大声斥责道：“我们不会把这个世界留给只会傻笑，一

心想把我们赶走的一代人。”阿尔伯特·加拉丁告诫青年人说，要注意“你们那些糟糕透顶的激情”。杰菲逊听取了早期有关奴隶制的激烈辩论之后不无失望地说：“1776 年的那一代人为使这个国家获得自治与幸福所做的自我牺牲，将被儿女一代的愚蠢与毫无价值的激情所抛弃。”

·当优柔寡断的艺术家在中年取代英雄时，他们一边安抚容易意气用事的青年人，一边利用专门技能来改善社会。

在年轻预言家的精神追求与老年英雄一代的物质追求之间徘徊不定的艺术家一代扮演了一个调停人角色。他们给新的青年运动以指导，同时关注老一代的建设成就，并努力更上一层楼。当他们利用英雄与预言家的人格碎片塑造出一个中年混合画像后，为对自己早期的因循守旧做出补偿，他们开始在社会与家庭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极为冒险的措施。可以容忍不和谐因素的艺术家通过对令人不愉快的选择做出让步或者向后推延，避开了可能发生的争论。

在大觉醒运动到来时年龄太大，无缘参加青年反抗运动的启蒙者（如本杰明·杜利特尔）告诫人们“不要盲目行事”，应该集中注意力（如纳桑尼尔·埃普利顿）“找到一些中庸的和平手段”，并“寻求平衡”。爱德华·威格斯沃斯承认，“我学会了寻求中庸之道，如果我不注意说出几句过于温和或过于刺耳的话，请多多包涵。”在超验主义觉醒时期，中年妥协派赢得了“后英雄一代”的声誉。和威廉·沃尔特一样，他们努力“在外表上装得镇静而沉稳，无论内心有多么混乱”。他们的命运在于寻找可以消除分歧的方法。在 19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中年进步党一代在亨里·詹姆斯所谓的“杂乱的生活”中寻找“欢乐与悲伤、有益与有害的

事情的契合点”。在防止第三次大觉醒演变为社会混乱方面，这种本能的中庸之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以自我为中心的预言家在青年时代取代艺术家时，他们对老一代创建的公共机构在道德方面的失败发起了挑战，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社会的精神觉醒运动。

有过高涨期而非危机期亲身体验的青年预言家一代认为，在新的世俗秩序下生活舒适与放纵是理所当然的。父辈把他们培养成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生活。他们认为老一代英雄创建的宏伟大业在道德价值方面有许多缺憾，让人难以忍受，于是愤然发起挑战。年青预言家认为自己（以及他们的文化）是一把照亮新的精神权威的火炬，是新价值体系的仲裁者。最终，他们劝说别人与他们一道以牺牲社会合作为代价去追求个人独立。就这样，他们使整个社会陷入一场改革创新的热潮之中。

在清教徒觉醒时代雅各宾式的繁荣之中，约翰·温斯罗普号召与他同龄、信奉新教的“圣人们”抛弃“这个邪恶而衰落的时代”“普遍存在的腐败”，与他共同创建一个新耶路撒冷。在大觉醒期间，年青的布道者抨击“精神死亡”者，要求用“新的光辉”取代“旧的光辉”，谴责（援引吉尔伯特·泰纳特的话）“认为幸福与财富密不可分……整日忙忙碌碌挣钱”的“那一代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后来回忆说，他的觉醒一代同龄人进入成年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变得充满了宗教气息”。在超验主义觉醒时代的高潮阶段，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宣誓“将沉睡在道德死亡怀抱中的国家唤醒”。随着青年运动的发展，玛格里特·富勒的《日晷》杂志呼吁人们“根据每个人的内部特点，让其自由选择一种方

式，去实现追求完美之梦”。内战后的传教士一代对镀金时代的自以为是、自我满足进行了猛烈抨击。1889 年，乔治·海伦，一位被称为“伊阿华学院预言家”的 27 岁的男子，对“我们工业至上主义文化隐含的邪恶的道德盲目性”展开了无情的抨击。这震动了美国中西部，为他的同龄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当游牧者在童年时代取代预言家时，恰逢社会动荡不安，成年人忙于发现自我，因而父母对他们的照顾很少。

游牧者一代的童年正值成年人纷纷挣脱社会的羁绊，重新发现内心深处的自我。在残酷的文化动荡的浪潮中苦苦挣扎的儿童游牧者，对道德改良运动冷嘲热讽，认为那些显然一事无成的成年人命该如此。人们希望他们快快长大，尽快获得独立生存、八面玲珑与参与竞争的能力。然而，在他们朝上述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却给成年人留下了一种相反的印象。到觉醒期结束时，当成年人观察儿童世界遭受的各种损失时，年青游牧者变成了刚出现的未来悲观主义的象征。

保皇党一代在儿童时期，经常听到像理查德·马瑟这样失望的老人说“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一脸忧伤”。理查德的儿子伊利查反问道：“难道我们这代人……不是也有溺水而亡的危险吗?”保皇党一代成为美国历史上受教育时间以及寿命最短的一代。在大觉醒期间，神职人员发现，宗教狂热行为“经常把小孩子吓哭”，这最终导致自由一代形成了多疑的性格。在超验主义觉醒期，人们在描述镀金一代青年时认为他们正在学习如何独立生活。一位外国游客就此评价说：“孩子们还没有脱下小衬裙，就有了商业头脑。”托马斯·伍尔夫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天真，生来就老气横秋、枯燥乏

味……以黑暗为母乳，断奶后就陷入暴力与喧嚣中”的迷惘一代，“青年人本能的欢乐情绪到哪里去了？”

在整个历史上，这种原型的叠加导致了许多次觉醒时代的产生。1964 年至 1984 年的意识革命也不例外。

大兵一代进入老年：老年公民

《观察》杂在志 1965 年的一篇文章中宣称：“今天的美国人一举一动就像是对赢得胜利上瘾的冠军一样。他们已经在许多战争中获得胜利，并且度过了经济萧条期。他们习惯了与对手针锋相对、打斗与各种考验。”对那时爬上权利巅峰的一代人来说，这种考验是向人们表明肯尼迪的遇刺尽管让人感到非常悲伤，但没有削弱这一代人的集体力量。民权立法工作是对他们的第一次考验。在肯尼迪任职期间，迷惘一代的领导者，如埃弗雷特·德克森及南方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理查德·拉塞尔使立法工作脱离了正轨，但林顿·约翰逊通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恢复了立法工作的尊严。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林顿·约翰逊在 1964 年的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获胜。这彻底挫败了迷惘一代的反抗预谋。到 1966 年，大兵一代占多数席位的国会一年中对教育与卫生保健事业的投资额可与以前各届国会的投资总额相比。短短几个月之后，美国就拥有了一个部门齐全的政府：从新的运输与房管部门、新的民权管理处到医疗保险与救助机构。“伟大的第 89 界国会”确认大兵一代有能力建设一个伟大社会、参加两次战争（一次是冷战、另一次是热战）以及登上月球。正如埃里克·霍夫尔谈及阿波罗登月计划时所说的那样，这些成就标志着“世界的胜利”。

大兵一代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上述目标，不过，构筑这座大厦

也需要受益者的一举一动必须像他们一样“光明磊落”。然而随着觉醒期的发展，年青一代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去做。如同B·F·斯金纳一样，大兵一代试图缔造一种“行为技术”，来设计与修筑通往社会幸福之路。然而当大兵一代幻想着文明的《第二个华尔登湖》时，青年人却坚持演出一场比梭罗更加奇特的戏剧。一些模范城市的公共住宅区成为青年犯罪、受社会救济的受孕女孩的温床。获得社会资助的学生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他们却参加了暴乱。

觉醒运动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当时被称为代沟。从发式、性观念、音乐到说话的腔调，新青年运动给大兵一代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分裂、热情与自私，与当时正在进入老年的一代人所敬慕的品质背道而驰。如果说60年代末期是一个因青年暴乱而骇人听闻的时期，那么，更让某些大兵一代领导者感到痛心的是，他们的儿女也参加了这些运动。“似乎一切都乱了套”（詹姆斯·麦克格利哥）；“在教学中，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乔治·瓦尔德）；“我郑重其事地说：国家在分裂”（约翰·格德纳）。

青年时期当兵打仗征服了半个地球的大兵一代领导者从未想到，一场规模不大的地区战争竟会带来如此多的麻烦。在对东京湾决议表决时，只有年长的迷惘一代中的怀疑派（众议员莫斯与格鲁宁）投了两张反对票。但是战争开始后，前线部队与后方群众的表现都不能让林顿·约翰逊所属的一代人满意。父母与子女（尤其是在作为父亲的大兵一代与作为膨胀一代的儿子之间）经常吵架，关系日趋紧张。随着越战的进行，让这一代人失望的是，他们珍爱的联邦政府已经变为（用尼克松的话说）一个再也做不成任何大事业的“无情、无助的巨人”。年长的大兵一代的乐观情绪开始显得非常空洞。最后，由邦迪、拉斯克、罗斯托及麦克纳马拉提出的“克制的反应”战略以克制的失败而告终，即

尼克松所谓的“越南化”。从那以后，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大兵一代比膨胀一代更想从记忆中抹掉越战的阴影。

骄傲自大的大兵一代仍要付出代价。水门事件成为觉醒期的热月，因为在两位膨胀一代成员（伍德华德与伯恩施坦）的强烈要求下，尼克松被迫引咎辞职。这是在两代人的代沟之争中，青年一代获得的最丰厚的战利品。这样，尽管白宫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为老一代所把持，但政府大权已经减弱。在随后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一些由大兵一代出任、大权在握的委员会主席被赶下台，并通过了许多新规定，从而取消了大兵一代提出的新发展项目。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政府方面：在水门事件之后，谴责大兵一代企业家违背自然规律，歧视妇女、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无法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喊声不绝于耳。60年代末出现了两次石油短缺现象。大兵一代曾在年青时代，即大萧条时期花费了巨大精力开发能源；现在他们却经常听到青年一代的怨言：如果人们减少使用大兵一代兴建的堤坝与发电厂所发的电能，生活也许变得更好。

大兵一代后来逐步放弃了与青年一代的争论。他们中有人开始接受米尔顿·梅耶的观点：“我们错了，年青一代是对的。”觉醒运动提出的价值观念体系与他们终生追求的乐观主义、团结协作与集体主义信念发生了冲突。但是随着大兵一代步入老年，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对儿女观点的接受是一种胜利的象征。如同乔治·布什后来宣称的那样，这一代人总是“从任务的角度：任务的确定以及完成情况，来看待生活”。一旦发现觉醒运动无法逆转，大兵一代就可以把身体向后一仰，承认自己已经使生活变得非常舒适，也许现在应该轻松一下了。事实上，美国大兵一代把美国从大萧条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并缔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美国。现在任务已经完成，是领取战利品的时候了。当属于大兵一代的父

母与老板听到自己的儿女嘲讽高涨期的文化遗产时，他们觉得坚守自己的阵地已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他们逐步接受了一种跨世代的自我陶醉的时代精神。

就这样，大兵一代与膨胀一带子女之间的代沟之争以一种极不平衡的结果而告终：膨胀一代赢得了这场价值观念之战的胜利，获得了对文化的主控权，而大兵一代则继续执掌国家大权，并获得大众的赞许。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摈弃了迷惘时代沉默寡言的角色，现在以《新闻周刊》所称的“地球上最有权力的游说集团”领导者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该协会在它颁发的一个小册子中建议：“你已经付出了许多，现在应该开始收获了。”从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早期，一些老年组织的成员人数（以及老年期刊的发行量）增加了60倍，而它们的宣传内容也从迷惘一代在高涨时期主张的自立转变为应得权力。在其受益者开始推行被格雷·潘瑟斯称为“愤怒的生活方式”的觉醒时代生活策略时，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政治的“第三条轨道”获得了今天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年长的大兵一代成为“加利福尼亚第13条建议”及其他旨在要求政府减少学校税收的地方斗争的主要成员。迷惘一代的老人反对公共开支，对税收不管不顾，而大兵一代老人的想法则正好相反。大多数迷惘一代老人是共和派，而大多数大兵一代老人则是可靠的民主党。

在新成立的老年游说团的鼓励下，大兵一代主持的最后一届国会将越战以后的全部和平津贴用在他们自己这代人身上。到70年代末期，年青一代向大兵一代转账支付的金额超过了（按10：1的比例）“伟大社会”扶贫项目的余额。老人生活骤然富裕起来了。这是大兵一代的另外一项成就。在高涨时期，当迷惘一代进入老年后，养老补贴比工资下降了20%；而现在，老年人从美国政府获得的补贴比人均工资额增长了15倍还要多。如

果说迷惘一代的老人是高涨期最贫穷的一代，那么大兵一代的老人则是觉醒期生活最富裕的一代。从 1957 年到 1976 年，在心理测试中“心情非常紧张”的老年人口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其他年龄段的比例却明显增长。8 个大兵一代老人中会有 7 个说他们生活得比自己的父母要好得多，而其他一些民意测验表明他们是觉醒时代最幸福、经济上最宽裕的一代。

年青一代并不强烈反对以纳税形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补贴，因为这样做可让后者在文化、地理与家庭关系上分离出去。新的资助项目使大兵一代自愿提出退休，成为美国历史上退休最早的一代。对迷惘一代而言，退休一词往往让他们联想到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而对大兵一代来说，退休则意味着过上 20 多年无忧无虑的健康生活。数以百万计的大兵一代退休人员经常远离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与同龄人住在一起。一到那里，他们就表现出一种活力与兴奋，使人们联想到他们中年时代在高涨时期建设郊区住宅的情景。属于膨胀一代的老年医学专家肯·迪奇瓦德指出，在亚利桑纳州的太阳城，“人们很难抽出时间和你说话；他们非常忙碌，非常积极。”居住在新住宅区的老年人可以筑起高墙，抵御觉醒期文化的侵袭。迪奇瓦德说，“太阳城非常安全。那里的居民在大街上散步不会受到惊吓，也不会遇到令人不愉快与不堪入目的事情。”

在这种高大的新建老人大厦下面所隐含的世代骄傲情绪与在越战及创建“伟大社会”期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如果说大兵一代的一个理想世界曾经是单轨电车与人在月球上行走，那么他们的理想现在已经变为重病特别护理中心的太空时代医学。作为美国第一批自称为“老公民”的老人，大多数大兵一代成员相信他们的集体选择对所有世代来说一定有益，他们为改善自己的老年生活做的各种努力也会改善以后几代人的晚年生活，前提是青年

人有耐心，并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然而在觉醒期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兵一代坚持以前的社会习惯，不像以前那样关注社会的未来。老年补贴飞速提高的同时，工人的收入却出现了难以维持、不断下滑的趋势。70年代老年贫困人口的比率大幅下降，而儿童贫困人口急剧上升。大兵一代从父辈那里继承的经济具有极大的潜力，等待青年人去挖掘。而他们移交儿女一代的却是一个财政支出过多、难以开展新社会项目的经济。

即使在大兵一代开始放手不管时，仍给人们留下了积极能干、成绩斐然的印象。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们在那时就年老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还是在崇尚体力的高涨时期，大多数保健专家就相信，由于老年人体力下降，与青年人相比，他们的生产能力也随之下降，因而具有自己的特征。这种观点促使大兵一代采取措施，加快了老年迷惘一代退休的速度。在觉醒期，大兵一代心理分析学家艾利克·弗里旦提议，老年人担当的角色应该是生产，仿佛老年是一个创造（甚至是生育繁殖的）的人生阶段。后来贝蒂·弗里旦将这个人生阶段称为“年龄之泉”。《现代成熟》一书主张社会应该关心老人问题，努力实现老有所为，并反对暗示老人体力下降的广告。罗伯特·巴特勒率先对那些将老年与体力下降联系在一起、有“歧视老人思想”的雇佣者发起了攻击。

在觉醒期临近结束时，大兵一代已经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对老年的看法：在人们的记忆中，以前的老人从未像这一代老人那样获得如此高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但同时又在文化与价值观念方面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尽管大兵一代中的老人继续在行政决策与财政管理方面大权在握，但已经在后来被乔治·布什称为的“幻想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们在青年人的成长阶段产生的影响几乎是零，最多是对过去的重演（如同中波电台播放的单调的音乐）。几乎没有几位老年人为青年观众拍摄电影、撰写小品文、谱写音

乐或者讲经布道。在大兵一代晚年，即使当国家在无数次二战周年纪念活动中庆祝他们的英雄业绩之时，他们与新的价值观念辩论毫不等人——这促使《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用大号黑体字质问道："谁会听参加过二战的那一代人的话？"

虽然他们不很富余的儿女在社会上苦苦挣扎，大兵一代在家庭中继续扮演他们的习惯角色——经济后盾。随着大兵一代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向年青人支付的现金数额（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几乎翻了三翻，在今天大约占膨胀一代所有资产的10%。孩子们长大后经常向他们寻求具体帮助，而很少就某些基本生活方向征求他们的意见。迪奇瓦德认为，由于"得不到尊重"，许多老年人感到很难过。而在以前，他们这一代对自己传教士一代的父母可谓倍加尊敬。勒莎恩说，"在我们小时候，祖父祖母是我们的老师和顾问。"但她的大兵一代同龄人却被完全剥夺了扮演"这类角色"的权力。艾利克·埃利克松的妻子琼指出："我们在40多岁时，经常向老年人请教。"而大兵这一代步入晚年后，她悲叹道："许多老年人变得一点也不明智。"

经过深入思考，大兵一代中的著名人物如乔治·凯南、莉莲·海尔曼、艾利克·萨夫雷德以及西奥多·怀特对美国人集体意识日益淡薄的事实深感不安。在高涨时期，他们这一代人操纵着"一般问题性"文化这一杠杆时，似乎一切都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现在，在觉醒运动的高峰期，这一现象再也不会出现了。

在《美好生活》中，吉米·斯蒂沃特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丧失感到绝望，直到最后一位天使提醒他：如果他根本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他所在的城镇现在早已陷入寻欢作乐、腐朽乏味的深渊。返回家乡后，斯蒂沃特将政府发给的补助积攒起来，向送给他礼物的青年人与老年人表示感谢。他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报偿。与吉米·斯蒂沃特一样，觉醒时代的

大兵一代获得了大众的奖赏。然而与他不同的是，他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社会正在沿着与他们的希望相悖的方向发展。大兵一代在70年代做过一场交易，当时看起来很成功。但随着80年代的到来，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开始显露出来。勒莎恩承认说，“失望对我们来说是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生中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然而恰恰在觉醒期临近结束时，在青年人赞助修建的五彩缤纷的太阳城中，许多在高尔夫球场打球、在医院中疗养的大兵一代的成员开始感到失望。

沉默一代进入中年：举棋不定的牧师

在为约翰·肯尼迪举行葬礼期间，西奥多·怀特注意到：“无论你在华盛顿何处参加悼念活动，都会遇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这一悲剧对沉默一代的影响比对其他任何一代都要深刻。3个月之前，25万美国人，大多数为青年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林肯纪念堂旁，聆听34岁的马丁·路德·金的精彩演说。许多青年人也做着金在演说中描述的那些梦。与肯尼迪一样，金用自己的魅力迷住了一代人：他们中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以前默认的制度发出质问。

肯尼迪总统的逝世促使沉默一代对他们当时所称的“现有的权力”提出更多要求。从麦德加·艾弗斯领导的非暴力主义活动到琼·贝茨的民歌与金士顿三重唱，所谓的“民权一代”开始牵动这个国家的良心。受到激发的数以百万计的沉默一代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技能对大兵一代的大厦进行扩建，并对正在兴起的青年运动给予同情与支持。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两出悲剧，让这一代人再次陷入悲伤之中。这次陨落的两个领导者本身就是沉默一代的成员，他们是马丁·路德·金与罗伯特·肯尼迪。当时许多人

认为这两人是他们那一代人中的精英（现在也是）。此后，人们残存的希望越来越少，而且平添了许多遗憾。自此以后，大众生活再也无法打动这代人的心灵。

在觉醒时期，沉默一代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经济问题。他们在中青年时代的收入有增无减，因为政府与企业急需有一技之长、一心追求名利与地位的人。到70年代末期，沉默一代已经到了可以安全度过经济滞胀、而几乎不会遇到任何损失的年龄。由中小金融联合会资助的提高房价活动使他们中许多人获益匪浅。除了离婚后未再婚的妇女之外，所有沉默一代的成员都是获益者，他们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旅游次数最多的一代。然而在外部世界的好运无法掩盖内心的斗争、对精神宣泄的寻求以及因为不像前几代人那样在人生各阶段遇到种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缺憾。

在觉醒时期，共有三代人，就像一个三明治面包：沉默一代夹在中间，两边是比他们年长、非常能干的大兵一代与比他们年青、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一代。当沉默一代仰望年龄之梯时，越发感到与大兵一代的超人相比，自己只是一个面孔模糊的技术统治论者。与尼尔·阿姆斯特朗一样，他们之所以在事业中迈出"一小步"，那要归功于上一代人迈出的"巨大的一步"。当他们从年龄之梯向下俯瞰时，发现自己（援引霍华德·詹克尔的话）"长大成人后，周围全是十多岁的小孩"。两个吵吵嚷嚷的邻居有着相互矛盾的世界观，沉默一代被夹在中间，处境非常尴尬。瓦德·格林回忆说，"在以代沟而著称、动荡不安的60年代，我们就站在那个深沟之中，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由于缺乏独立的观点，中年时期的沉默一代采取了仲裁者的道德相对主义态度，在矛盾双方之间进行调停，并将注意力转向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收入、不同年龄段的人们，甚至也包括残疾人。他们对种种紧张关系的体验使他们成为美国历史上在

歌曲创作、喜剧演出与临床医学方面成就最高的一代。

当觉醒时期的性革命到来时，沉默一代正处在一个让他们感到非常狼狈的年龄段——他们已经结婚成家，并有了自己的孩子。性革命使他们转变为像《鲍勃与卡罗尔、泰德与爱利丝》(电影名）中罗斯·弗兰兹布洛所谓的“充满嫉妒与角色颠倒的一代”，沉默一代的男子感到患了幽闭恐怖症，而沉默一代的妇女则感到愤愤不平。在提出了被本尼塔称为标志了所有婚姻都要终结的问题——“难道这就是一切吗”——之后，沉默一代的男人和女人找到了一些获取自由的方法。从1969年到1975年，随着沉默一代大量进入各州立法机构，制定了默许无故离婚的法律的州从零猛增到45个。随着各代人都加入了离婚大潮，沉默一代在各年龄段中离婚人数最多，但心灵中留下的歉疚也最深。

沉默一代在青年时与性爱无缘，因而当步入中年的他们发现了性爱时便表现出极度的狂热。40多岁的男人开始学习如何成为高级的性伙伴，而“思想解放了的”男性则追求约翰·厄普代克所称的“后避孕药天堂”。排除了各种障碍的剧团经理们在百老汇创立了花花公子俱乐部、少儿不宜电影及脱衣表演。沉默一代的男性在年龄之梯上上下张望以寻求暗示。他们将各种观点汇总起来，形成了一个有关阳性的复合式定义。这样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模范大杂烩：有的将大兵一代的自信与膨胀一代的敏感（莫林·伊斯特伍德、卡尔·萨甘）结合起来；有的将大兵一代男子汉的高傲与膨胀一代的批判思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查尔斯·布伦森）结合在一起，或者神经质地将两者混合在一块（阿兰·埃尔达、伍迪·艾伦）。还有一些人成为美国第一批“公开的”搞同性恋的政客（哈维·米尔克、巴尼·弗兰克）以及某些喜欢男扮女装的名流（克里斯丁娜·约根逊、里奈·理查兹）。许多沉默一代成员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的感觉就像盖尔·希伊笔下的人物：

他们希望“有人会让我保持现在的样子，有时很温柔，而且对别人有依赖感，但是也很虚伪、贪婪、嫉妒而且争强好胜。”

许多沉默一代的妇女沦落为“斯德普的妻子”（小说名），整天忙于家务与照看孩子，而他们的丈夫却在事业方面突飞猛进。在一个中年已婚男子成为追求性解放的青年女性追逐对象的时代，男女结婚前的山盟海誓显得苍白无力，十分可疑。作为美国历史上结婚年龄最小的一代妇女，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用格劳丽娅·斯泰纳姆提出的那个用来掩盖身份的“Ms.”（女士）一词来称呼自己，40岁左右的离异妇女开始成为媒体的关注对象。她们要求男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在中年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追求。沉默一代中的女权主义者，如凯特·米莉埃特、苏珊·布朗米勒与提—格雷斯·阿特金森采用年青的膨胀一代所使用的语言抨击男性是“压迫者”，是为“超自然的食人欲望”所驱策的“天然野兽”。以前曾让中年大兵一代非常满意的性别与社会角色的搭配关系现在变得混乱不堪。

随着中年男女突破传统观念，从事更多的事业，在家庭生活中冒更多的险——交换配偶、更换职业、涉足医疗科学，“中年过渡期”一词成为一个大众常用语。自从沉默一代中的作家丹尼尔·列维森与盖尔·希伊发现了被后者称为“令人欢欣的”人生循环事件之后，几乎所有描写这一主题的作者都被归为同一代人。在觉醒高峰期，许多沉默一代的成员在回顾高涨期时感慨道（引用鲍勃·迪兰的诗句）：“啊，我那时老气横秋，/现在却有重现青春之感。”正如威廉·斯泰伦在1968年所讲的那样，“我认为我这一代人中的精英——那些35岁以上，40岁左右的人——把传统的游戏规则对调了一下，他们年龄越大，思想越激进，这是一种不协调而又有益的现象。”在《未来的打击》一书中，阿尔文·托夫勒提出了一种新的“无常指数”，将人类各种关系的破裂进行

量化处理。在托夫勒同代人的努力下，该指数在觉醒后期急剧升高。在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与乔伊斯主张多发现一些秘密之时，菲尔·多纳胡与卢斯·威斯特海默则主张百家争鸣，他们的共同希望是通过发现更多的数据，进行更多的对话，美国将变得更加美好。

作为摇滚歌星，大学生与兵役律师①，沉默一代指导着觉醒时期的文化走向，并创建了一些后来被膨胀一代发扬光大的不同政见团体。如同劝说务农的父亲将在伍德斯托克的家产出租给一个青年音乐节组委会的律师撒姆·亚斯古一样，沉默一代犹如一辆魔术汽车的司机，而儿童时代的膨胀一代则是在上面玩要的孩子。尽管沉默一代对青年一代充满了同情，愤怒的青年文化从未向他们表示真心的欢迎。“绝不要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这句话是由一个名为杰克·温伯格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发明的。当时他本人也已经接近而立之年。朱迪斯·维厄斯特在为一度认为自己出生日期太晚、现在又觉得太早的一代谱写颂诗时，这样写到：“过了而立之年，再想当嬉皮士很难。”

仍在努力赢得老年大兵一代尊敬的沉默一代试图让膨胀一代相信，他们了解年青一代，可以帮助他们排解内心的愤懑。从斯托克利·卡麦克尔与马尔考姆·爱克斯的劝告词、西蒙与戈方克尔的抒情诗到彼德·马科斯的幻觉艺术与贝利·戈尔迪的莫顿摇滚乐制作公司推出的摇滚乐作品，沉默一代中的活动家与艺术家都对青年人的愤怒进行了描述。由于埃比·霍夫曼与杰里·鲁宾成为反抗运动的花衣吹笛人（霍夫曼说，“我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阿切·邦克的支持，所以来争取他的子女。”），沉默一代开始为自己在

① 本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在国内大量征兵。许多青年人不愿意到战场送死，于是纷纷想方设法逃避兵役。兵役律师专门向这些年轻人提供逃兵役方面的咨询服务。

青年时丧失的许多机会而悲叹，并重新思考自己对大兵一代文化的屈服。学术界的新星听到自己被乔治·华莱士讥讽为“不会骑自行车的尖头顶教授们”，而斯皮罗·亚格纽则嘲讽他们是“靠胡说八道、否定一切起家的小富豪”与“随风倒专家”。然而，如果说沉默一代缺乏大兵一代的勇气与力量，他们却知道如何按一下程序按钮就可以将大兵一代权威打倒在地。芝加哥7人案、哈里斯堡7人案、加姆登17人案、西雅图7人案、堪萨斯城4人案、埃文斯顿4人案、盖恩斯维尔8人案与五角大楼秘密档案曝光4人案：大多数沉默一代的辩护律师在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首先从学术角度不断对现有制度进行抨击，然后再进行法庭辩论。

到70年代中期，许多以前充当助手的中年人开始用拉塞尔·贝克所谓的“一次强烈而进步性的停电”对大兵一代建立的公共秩序进行破坏。拉尔夫·纳达尔抨击美国制造的汽车“不管快慢，都不安全”，而且导致了“千百万人的死伤与无比的悲痛”，由此掀起了公众对大兵一代提倡的大规模生产口诛笔伐的运动。由于沉默一代成员在各地立法机构掌握实权，于是纷纷颁布新的法律法规。而沉默一代的律师可以利用对这些法律法规对违法的新解释将某些公司或政府机构推上法庭。从1969年到1975年，美国公共利益法律中心的数目增加了五倍。与此同时，沉默一代成为陪审团的主要成员，做出了许多涉及巨额痛苦与损失赔偿的判决，使大兵一代创建的陈旧的保险模式陷入混乱。无论审判结果如何，总会出现上诉。在沉默一代中年人的观念中，什么事情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任何结果都值得怀疑，都可以进行重新解释。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年沉默一代想让生活变得像美式橄榄球比赛中新推出的即刻重放技术。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呆在家中对任何决策过程进行回顾，对任何合同进行重新谈判。

以前曾操纵着最后一个明显的体育王朝（帕克斯、杨基老、凯尔特人）的一代人中现在出现了孤独的挑战者（约翰·麦凯、库尔特·弗拉德）及一些指导年轻运动员如何为争取自己的权力而反对年长的俱乐部老板的律师代理人。

当沉默一代到大兵一代以前执掌大权的年龄时，开始反对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或者应该采取大兵一代领导风格的观念。相反，他们对工作进行了低调处理，在保持膨胀一代所缺乏的社会义务感的同时，还对人的内心动机进行探测。他们的解决方案——公正、公开与适当程序——说明他们对人类缺乏宏大社会计划或者理想道德标准的原因及现象有着深刻的了解。托夫勒说美国陷入一种“历史性变动危机之中”，呼吁人们“将精确的科学知识应用于社会管理中的关键与最敏感环节中”，从而实现“变化的适中性与节制性”。沉默一代之所以呼唤变革，原因并非源于像大兵一代的世俗权力或者膨胀一代的精神激奋，而是一种自觉人性与社会良知。

在政治方面，由于缺乏主见，保罗·特桑加斯认为，与前代人相比，这一代人“有更多的疑问”。随着沉默一代中的立法者在觉醒时代的后期取代了大兵一代，他们创造了（威廉·史耐德说）“一种尊重专业技能与能力、极富理智的政治文化”。在1974年水门事件之后的选举中，沉默一代纷纷涌入政府机构就职。在蒂姆·威尔斯的记忆中，那年是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以及“人类资本”时代的标志，当时各州（而非全国）成为“民主的实验室”。在（1977年）获得大多数美国国会中的议员席位及州长职务之后，这一代人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各大机构做不利于普通大众的事情上。为此，他们起草各种有影响的声明，对市场外因素进行总结，绘制流通图标，举行听证会，设立监督委员会，揭露政府内幕。在商业领域，沉默一代同样对大

兵一代风格的金字塔式体制发起了挑战，提出了一种新型权力分散式 M 型体制。

如果说中年的大兵一代不喜欢多样化的话，那么沉默一代则能对“不同民族的不同声音”产生共鸣。在新世界历史上移民人数最少的这一代人看来，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大熔炉，毋宁说是一种由各种难以混合在一起的作料做成的“色拉”。多边主义与相互依赖成为对外政策争论中的主流观点。推行反对沙文主义的高跷原则（“我们遇到了敌人，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新学术精英断定，美国要从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也许比这些国家向美国学习的东西还要多。同时，生活变得更加复杂甜美，这让伴随着三个电视网与神奇牌面包① 长大成人的一代人倍感高兴。

由于沉默一代思想矛盾，心态复杂，对任何事情都半信半疑，许多大型工程（如三里岛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工作难以进行或者不可能进行。一旦生产力陷入停滞状态，沉默一代的思想家会认为对此做出的任何反映都存在问题。像《一方欢乐一方愁的社会》中的莱斯特·杜罗一样，上述思想家指出，现在要改善一群人的生活状态必然以牺牲另一群人的利益为基础。正如罗马俱乐部呼吁“发展要有节制”一样，杰里·布朗宣称美国的“外部潜能已经挖掘殆尽了”。廉·史耐德认为有限制的时代是他这代人的“时代思想主题”。

如果说中年大兵一代已经完成了一些大事业并有一种凌驾于历史之上的感觉，年少的膨胀一代满足于自我审视，那么，沉默一代则认为许多大事业是想当然的，并把眼光投往远处，但同时又担心历史正在与自己擦肩而过。他们喜欢围绕个人发展（而非历史发展）的里程碑来确定人生周期的参照点，过渡期的东西与

① 本世纪 60 年代美国生产的一种大众化面包。

宏大的历史发展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同艾尔维斯一样，正值中年的这一代人还不清楚“我是否用了一生的时间/在等待良机的到来”。在努力摆脱早年保守思想的同时，沉默一代想解放自己——既不干大事业，也不讲大道理，只想让自己与别人敞开心扉，坦诚相待，身心放松，畅所欲言，变得直率自然一些。

膨胀一代进入青年：神秘的好战分子

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纠察员在斯普鲁尔礼堂外面贴上这样的标语：“我是一名学生！不要折叠，打眼，否则会把我弄成残废！”这是对学校管理人员为加强考勤工作、要求学生进行电脑打卡这一做法的讽刺。以前的学生运动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参加，而且形式也很温和，但这却是一次集体行动，而且参加者情绪非常激动。言论自由运动参加者对美国“理性与道德荒原”为青年大学生提供的“枯燥的、机械的生活”不屑一顾。当巴里·麦克古勒的《毁灭前夕》荣登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之首时，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生们决定即使“舍生忘死”，也不能让大兵一代这台机器继续运转下去。

几年之内，美国最优秀的几所大学也像美国某些内陆城市与新兵训练营一样陷入了青年暴力活动之中。通常，学生暴动发生在学校管理者试图清理一个公园或者建造一座大楼以方便学生生活之时。大兵一代的学校管理者不仅没有听到学生的赞扬声却听到了像雅各布·布莱克曼那样的吼声：“妈妈，你把它建起来，我们将把它拆除掉。”生活富裕的孩子穿着随便，喜欢穿男女皆宜的服装，并自诩为“畸形人”，以拒绝老一代的奢华与公共秩序。在1962年，沉默一代建立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开展社会“交流”，并认为暴力行为“令人讨厌”。到60年代末期，该

组织突然变得激进起来，大声斥责那些试图维持“秩序”的“猪猡”，而青年暴动则已成为莱普·布朗所谓的“像苹果馅饼之于美国人那样普遍”。1970年，44%的大学生相信暴力应该能够带来变革。紧握的拳头成为学生运动的标志，T恤衫与牛仔服则是统一服装，而社团自由主义则是他们的敌人。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丹尼尔·莫尼罕问道：“这是些什么人？我认为他们是生活在二世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

在《你相信魔术吗？》一书中，安妮·高特利普宣布膨胀一代是“一个扎根于一段时间而非地点或种族的部落”。对她的同龄人来说，那段时间是60年代，即觉醒时代。以大兵一代继承人的身份来到人世的膨胀一代成年后成为迈克尔·哈灵顿所谓的“神秘的好战分子”。他们的任务不是建设与改善公共机构，而是用正义之火来净化它们。艾利克·埃利克松指出，美国的新青年潜心“追求二次圣化”。沉默一代青年进入成年后渴望对社会制度进行微调，而思想激进的膨胀一代则想让它“燃烧起来，孩子，燃烧起来”。他们生来就能提出一些本质性问题，就能推行某些根本性原则。金斯敦发现，在这些年青的激进分子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尽管相对而言他们在童年时代不信教，但成年后却自发产生了一种宗教情感，而且大有日趋强烈之势。”这种对完美精神的追求往往要借助于可以产生幻觉的毒品。《宝瓶座时代的阴谋》中的玛丽琏·弗格森称，对“情感自然、极富想像力、思想端正的青年人”来说，这是“通向世外桃源之路”。

膨胀一代想努力成为一个“团结”的群体——不是大兵一代在30年代服装统一的地方资源养护队那种团结，而是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同步的“优美的震动”。膨胀一代认为各成员之间

的亲密关系就像是约纳森·考特所谓的“湿婆① 项链上的珠宝相互辉映”。沉默一代中的垮掉派在诗歌中表达了一种焦虑，他们认真地寻求自己的读者，而膨胀一代中的嬉皮士则用扩音器大声宣布他们“没有商量余地的要求”，根本不在乎有没有人在听。在新的青年文化中，道德立场的纯洁性是最重要的，而“口头上的恐怖主义”则让那些妄图进行二次背叛的人放弃了希望。组织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金斯敦注意到，60 年代末的年轻激进分子在长大成人之前“有一种孤独和与世隔绝感”，他们凭借自我努力走向了成熟，但在社交方面仍稚气未脱。

沉默一代中持不同观点的人害怕自己的历史受到玷污，而膨胀一代却无所畏惧。通常情况下，罢课学生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政府特赦，这种要求一般都能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非常活跃的经济为所有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大多数校园暴乱分子认为，他们一旦想屈尊去工作，会重新陷入美国梦那台大机器之中。为未来打算并不很重要。膨胀一代想不想找一份比父母一代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住在更漂亮的房子中呢？“当然想。”罗伯特·赖克在回忆自己投身学生运动的岁月时说。也就是说，无论膨胀一代有没有这种愿望，都会这样回答。如果大部分人的生活富裕了，阶级斗争也就不是那样重要了。与老一代左倾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膨胀一代中的新左派极力倡导发展道德与文化（而非政治与经济）事业。正如欧文·豪所指出的那样，膨胀一代激进分子与 30 年代大兵一代中的激进分子不同的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个人如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而不是如何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改变社会。”由于这次青年运动与经济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许多激进活动的领导者本人都来自名门世家——这种“帕蒂·赫

① 湿婆，印度教中的毁灭之神。

斯特综合症”让年长的大兵一代惊骇不已。并非只有学生精英与激进的左派有这种好战的欲望。在常青藤大学联盟成员占领大学行政大楼、黑人青年在城市中纵火的同时，与他们同龄的警察在用警棍殴打他们，同龄的国民警卫队员向他们开枪射击。在1968年的大选中，来自大学以外的膨胀一代中的白人青年投票支持乔治·华莱士的人数可能是老年选民的两倍。

从本质上讲，代沟是膨胀一代对作为父亲的大兵一代的反抗。研究觉醒时期学生激进分子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对这些人对母亲的依赖、对男性权威的“矛盾心理”（金斯敦）、“俄底普斯王式的反抗”（马尔考姆）或“弑父”思想（刘易斯·佛尔）倍感兴趣。青年运动给人印象最深的几件事包括：公开谴责大兵一代的建设成果——从对用双指表示和平这一手势（大兵一代用V表示胜利）的嘲弄到拒绝穿卡其布服装（大兵一代在集体合作所穿服装）以及对美国国旗的亵渎。可以说，膨胀一代的观点与典型的大兵一代在高涨期所强调的截然相反，而且这是有意所为：宗教与科学，满足与耐心，倔强与顺从，怨愤与友好，否定与肯定，尤其是个人与集体。欧文·克里斯托尔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人们希望青年人有理想，甚至也许有些激进，可能还夹杂着一些火药味——但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

导致青年人疯狂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越战。一般来说，对那些积极寻求出路的人来说，这种来自战争的威胁是可以避免的。每16个膨胀一代男性中，只有1人目睹过战争的场面，因逃兵役而被判重罪的人数（大多数情况是没有去登记）是越战伤亡士兵人数的10倍。由于有人可以通过逃兵役来避免参战，在那些参战的膨胀一代成员与没有参战的人之间形成了某种日见激化的阶级与种族矛盾。战争几乎没有为年轻士兵带来任何光荣。最受人们称赞的战争英雄是大兵一代中的战俘，如杰莱米亚·登

顿，而为人们所熟知的膨胀一代战士是杀人不眨眼的威廉·盖利。在电影界，约翰·威恩的《格林之死》反映了大兵一代对越战的幻想，而西尔维斯特·斯塔龙的《兰波》则适合于膨胀一代的口味。回家后，这些青年士兵受到的责骂与羞辱超过了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代出国打仗的士兵。然而在1970年5月4名肯特州学生被枪杀之前，大多数膨胀一代成员并不相信越战是错误的，只是战争的指挥者的表现太差强人意了。在肯特州事件之后，全国的青年人突然爆发起来，史称愤怒的日子，几百所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校园骚乱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大权在握的老一代领导者开始对膨胀一代的观点给予关注：在1972年大选之前，18周岁的公民获得了选举权，在两大政党的政治会议上，年龄在30岁以下的代表人数增加了三倍。

在将林顿·约翰逊赶下台并破坏了约翰逊选中的接班人胡伯特·汉弗雷的选举之后，膨胀一代中的狂热分子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了理查德·尼克松。即使那些事先获得青年人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也会发现自己的竞选工作总是在这代人软弱的政治本能的浅滩上遇难。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对既定程序选举的斗争中，膨胀一代的兴趣开始时非常浓厚，但随着选举的临近却旋即烟消云散了。1972年，差不多有2500万膨胀一代成员首次获得选举资格，于是人们认为他们可能会左右选举的发展，然而他们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有一半人未能参加投票，而在参加选举的膨胀一代成员的投票中，尼克松所得选票超过了麦克加文。那时，战争行将结束，新的兵役制度即将出台，而膨胀一代也开始倾听甲壳虫乐队的“简洁而充满智慧的一句话：随它去吧。”此后，70年代出现了几位成功的候选人（如罗纳德·里根与学者早川一会），他们都是以反对青年文化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的。

随着反战情绪的落潮，膨胀一代第一次开始关注经济问题。

在1973年经济不景气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初级工作比较难找，而觉醒时代早期欢欣鼓舞的景象在校园中性爱、毒品、不充分就业以及兰辛·拉蒙特所谓的“迷失的礼仪”的围攻下消失了。现在与越战高峰时期一样，大兵一代缔造的世界不适应膨胀一代，而且，随着经济的腾飞，反战勇士时代过后的许多膨胀一代成员找到了自己不想挣钱的新借口。一位在达特默斯发表告别演讲者在同龄人的欢呼声中宣称：“我没有制定任何计划，因为我发现所有计划都不值得去实施。”与在领导一场旨在改善无家可归者生活状况的改革运动之前抛弃自己儿女的米奇·斯乃德一样，许多膨胀一代成员在整个70年代都相信：“即使我不工作，照样可以生活下去。”这种观点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许多人突然坚决反对与配偶、子女以及工作签定永久性契约。如《毕业生》中的凯瑟琳·罗斯一样，膨胀一代走进神坛（或者社会阶梯）后听到里面发出了一个声音，“站住！”在排除了沉默时代各种单调乏味的工作机会之后，膨胀一代走到一旁，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

专注于自我的青年膨胀一代，无论男女，都有一种两性融合的特点。在《不同寻常的一代》一书中，万达·乌巴恩斯卡对他们的“同性”特征大加赞扬。在膨胀一代的成长过程中，男女之别发展到了巅峰，于是他们决定努力缩小这种差异。膨胀一代的男性开始接受高涨时期属于大兵一代的母亲与教师的价值观念，而女性则对以前只有大兵一代父亲与养家活口者才能扮演的职业发起了冲击。这降低了膨胀一代对社会契约的依赖性，但同时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感情隔绝与经济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与沉默一代的女性不同的是，许多膨胀一代女性从一开始就担心早婚可能会真地影响未来的家庭生活质量。

在觉醒时代后半期，膨胀一代积极编制各种“个人宗教”的

新思想。世俗论者欢呼新时代的到来，并维护“自我发现的主权”。在被称为“对工业化与机械化思想的叛逆”的人类潜能运动中，许多膨胀一代成员都多少涉猎过各种精神现象，并进行公社生活实验。同时，出现了一批新的“耶稣畸形人”与再生者。通过他们的努力，恢复了加尔文有关神的召唤的观点的原来面目：强调灵感再生。从新时代的交友会到南方浸礼教会，信徒不必再用毕生时间去从事大兵一代那样的工作，就能获得拯救。

在日常生活中，青年时期的膨胀一代开始将他们强大的内心思想拿到外部世界中进行实验。当他们通过坚持用有意义的（或者非大兵式的）工作与产品，来重组美国经济，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停了下来。膨胀一代不希望生产或购买与邻居家东西相似的汽车或家具。在职业体育中，以卡里姆·阿布杜拉—贾巴尔、莱吉·杰克逊与乔·纳马斯为首的喜欢自由的运动员首次提出“精神运动员”——从此开始了一个运动员、运动队、城市与体育迷不忠实的时代。从追求跑步最好成绩的体育迷到注重脑波或节律的减肥爱好者，膨胀一代无论有什么业余爱好都会全神贯注地去追求，别人认为他们容易着迷。在市场中，人们对名牌消费品的兴趣有所下降，在鉴赏家看来，“美国制造”这四个字已经过时。在80年代早期，《时代周刊》明镜调查栏目推出了一个新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时尚”项目，以帮助广告商了解并瞄准膨胀一代中诸如“我是我”的新消费群体。觉醒期行将结束时，即膨胀一代开始进入更高一层的管理机构之时，他们突然提出了一种新的内心世界议程。汉密尔顿·乔丹与乔迪·鲍威尔帮助吉米·卡特了解了宗教复活主义，而大卫·斯托克曼——罗纳德·里根政府中讲究原则的预算执行官——则是在神学院度过一段节减生活之后进入大众生活的许多膨胀一代成员中的第一人。

摇滚乐的倡导者比尔·格拉汉姆曾经回忆说，在他那个时代

的青年激进分子中，“实干者很少”。与在他们这个年龄投身于国家建设或改善人民生活的大兵一代与沉默一代不同，膨胀一代更加注重对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议程的追求。如同希拉里·克林顿在威尔斯利大学的告别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他们专心于“选择一种可以展示我们的情感与认知形式的生活方式”。或者如同甲壳虫乐队成员所说的那样，膨胀一代喜欢“说”他们“想发动一场革命”。他们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当觉醒时代的风暴渐趋平息之时，膨胀一代一度认为精神空虚的生活诸方面——消费、追名逐利、家庭结构——现在已经变得充实而有吸引力。在新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他们觉得生活重新披上神圣的外衣。老年人和青年人嘲笑他们吹毛求疵的理想主义，但是膨胀一代因为过于专注于自己的思想，而没有注意到别人对他们持什么看法。如果说爱管闲事者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参加者曾对青年人的内心生活进行过探索，那么现在人们给他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买人寿保险，值！”① 托德·吉特林回忆了觉醒期临近结束时，“我们应该立即从大麻过渡到白葡萄酒，从嬉皮士公社过渡到科德角之夏”的情况。膨胀一代不可能永远在一种悬而未决的激动情绪中滞留下去。现在，这代人已经开始相信《地球总目录》中的信条：“如果要我们扮演诸神，也许干得很好。”

第13代进入童年：鲁丝玛丽的孩子

在1964年日益加重的混乱之中，人们不再想生儿育女。那年春天，美国妇女的生育率还是一个历史记录。但是在随后几个

① 这是本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城市人寿保险公司在一则电视广告中的用语。

月中，生育率急剧下降。到1965年中期，美国的生育率达到了二战后生育高峰期以来的最低点。一次全国性的生育研究表明，有三分之一的母亲现在承认至少多生了一个孩子。呆在家中的家庭主妇开始在衣扣上写上“一个就够了”、“没有孩子是一件乐事”以及“耶稣就是一个独生子”。突然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包括：避孕药物的发明、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始及全社会对儿童充满了敌意。

美国新出现的这种反儿童态度在媒体中表现得最明显。到60年代中期，以聪明儿童为主角的家庭连续剧以及以创造性儿童为主角的迪斯尼电影的制作量减少到可怜的地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主题，其中的儿童角色多是没人要、让人讨厌、甚至有些可怕的儿童。《鲁丝玛丽的孩子》这部电影讲述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一位妇女怀了一个恶魔。此后20年中，好莱坞拍摄了一部接一部的坏孩子电影（《驱魔者》、《它还活着》、《凶兆》与《万圣节前夕》等）。大多数电影都有续集，因为观众似乎对这类银屏恶魔百看不厌。许多人为了看这样的电影不怕排队买票。这些电影中的孩子有的变成了野人（《蝇王》），有的变成了小商贩（《纸月亮》），有的沦落为妓女（《出租车司机》），有的变成了脾气暴躁的不合适宜者（《普通人》），有的被宠坏（《威利·王卡》），而有的则成为成年人实现自我的绊脚石（《克莱默夫妇》）。同时，好莱坞为儿童专门拍摄的电影可谓微乎其微。老少皆宜影片的比例从41%跌到只有13%，而新出现的儿童不宜电影很快就成为好莱坞盈利最多的电影类型。在这期间，迪斯尼也破天荒地解雇动画制作人员。

在第13代的儿童时代，成年人控制的媒体对他们的集体名声大加破坏，后来还认为这一代人已经接受了这种消极信息。在《巴格茜·玛龙》中，那些不满13岁的儿童杀手唱道：“我们从骨

子里就是坏孩子。我们是最最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很低贱，都受到过批评，挨过别人的辱骂。”进入80年代之后，电影中的儿童形象仍是这个模式。在《河边》中，一位学生用嘲讽的口气对他的朋友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对所有圣灵，甚至对植物来说，都是一种耻辱。人们宁愿与一棵仙人掌呆在一个房间中，也不愿看到你们。”

美国的新意识运动赞美儿童时代是一种理想，却忽略了儿童时代也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经历。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从莱斯利·菲德勒所谓的“崇拜儿童”的50年代到兰顿·琼斯所称的“崇拜成人”的70年代的转折。最年长的大兵一代人仍未从下一代人对他们的攻击所带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沉默一代正在重新思考他们在高涨时期的家庭选择，而生育能力极强的膨胀一代正在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想到要许多孩子，就顿生忧虑。如果父母带着孩子去餐馆或去剧院，别人在他们面前会躲躲闪闪。许多出租公寓开始禁止儿童顾客。当时正值高潮的人口零增长运动宣称多生孩子是“污染”，是对稀少的自然资源的一种负担。

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业或者夫妻幸福的现象已经成为过去。即使根据那时的观点，这样做对孩子也不好。在此期间，涌现了一批描写妇女们在生育、抚养第13代儿童的过程中所经受的怨恨、失望及身体不适的畅销书。由于抚养孩子的费用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许多成年人在家庭发展计划中将购买汽车排在了生儿育女的前面，认为这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所在。堕胎率急剧上升。到70年代末期，那些快要成为母亲的女性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堕过胎。在《我们与我们的孩子》一书中，一群沉默一代的作家将“为自己考虑”放在“为孩子着想”之前，并认为这是一条生儿育女的良性原则。父母对孩子的指导更多地强调为

什么要做某事，而不是要做什么事。当时畅销的《高效儿童教育法》一书敦促成年人要向孩子点明利害，而不是讲明是非。正如玛丽·威恩所说，一种“儿童早期决定论”使父母们认为他们的孩子可以应付以后的大灾大难，“因为他们在婴儿时期受到了精心照顾。”有了这种思想以后，觉醒时代的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比高涨时期的父母少了40%。

觉醒时代不严肃的性生活、背离传统的家庭生活以及可以产生幻觉的毒品在这一代儿童中造成了深刻影响，这一影响在今天许多第13代创作的音乐与散文中可见一斑。在60年代末期，苏珊·维尔纳在歌中唱到，“有人在吸毒，有人在跑步/我当时却在大吃葡萄干。”阿德利恩·杰尼克回忆说，“我记得用《花花公子》杂志中间的插页来为弟弟的房间贴墙纸。我记得父母收集了许多手工艺品，如锣、笛子、美术作品与音乐，我母亲还有一部按摩摇摆机，还记得阅读我父亲向‘小棚屋论坛’提交的稿子。”小说家伊安·威廉斯写到，“我们可以说谎，或者对父母的性生活发起挑战，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到70年代末期，第13代开始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之后，成年人开始对孩子们的服装与说话方式感到习惯了，就像是广告中的布鲁克·希尔兹或者电影中的乔迪·福斯特。

随着媒体有关美国典型家庭的标准从《我的三个儿子》转变为《我的两个爸爸》，离婚事件对第13代的打击比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代儿童都要大。如果说膨胀一代的父母为了孩子甘愿做出牺牲，继续维持并不幸福的婚姻，而第13代则没有膨胀一代那样幸运了。在高涨期临近结束之时，有一半成年妇女相信婚后关系不和谐的父母应该为了孩子继续呆在一起，但是在觉醒期行将结束时，五个妇女中只有一个还有这种想法。深受青年人喜欢的畅销书《这不是世界末日》，努力阐明父母离婚并不是一件很

糟糕的事情，但给孩子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任何家庭随时都会破裂。在《养父：共享完美人生之路》中，基尔·普鲁埃特发誓说，家庭的解体"解放了"父母与孩子，使他们都可以获得"更好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到1980年，只有56%的13代儿童与结过一次婚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今天这一代人的小说与剧本中许多地方都提到了意志不坚强的父母，而且都充满了敌意。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与老一代美国人相比，第13代更倾向于认为现有的离婚法太不严格了。

在家庭、学校与法庭中，美国的儿童抚养风格在20年中完成了从《父亲无所不知》向比尔·柯斯比的《父亲的身份》的过渡："我当时犯错误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9763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艾伦·古德曼后来承认说，"如果在上一代人中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明显不知所措的"父母间的"信任腐蚀"。阿尔文·普森特注意到，父母在媒体中的主要形象是：作为好朋友，他们"总是善解人意；他们从不生气。没有任何禁忌。作为父母，他们却总是把事情办糟，也无法主事，像小孩子一样容易出错。"

《我们与我们的孩子》向人们保证，那些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都称不上完美"的父母"可以让孩子们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获得一个更为现实的答案。"模范父母最多会像柯斯比笔下的克利夫·哈克斯塔布那样温和而善与人沟通；最差的情况是，孩子们寻求指导时，他们表现得犹豫不决，从而降低了自己的威信。就像《第三类遭遇》中的父与子，成年人天真如儿童，而儿童却成熟如大人。

这种反权威式的抚养方式与美国觉醒期的打碎偶像的时代精神非常吻合。老一代特意告诉孩子（用《疯狂》中的阿尔·费尔德斯坦的话说）说"世界上有许多垃圾，你必须小心"。想到自

己在危机时期度过的极为封闭的儿童时代时，作为父母的沉默一代特别渴望让自己的孩子多了解一下世界。朱迪·布鲁姆鼓励父母让孩子们去认识人类可能遇到的各种灾难。她坚持认为，“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她和其他沉默一代作家为孩子们创作了一批新现实主义作品，主要描写上代人在儿童时期从未接触过的问题（如堕胎、少年同居、虐待儿童、家庭或朋友之间的强奸案与自杀）。在吸收觉醒时代的文化为他们提供的这些书籍、电影与电视节目之后，以及在仔细观察并效仿成人的言谈举止之后，许多第 13 代中的成员开始变得如同《纸月亮》中的塔图姆·奥尼尔，即那种很难讨人喜欢的小大人。

觉醒时代发生的许多事件更加深了这样一种印象：成年人既不强大也缺乏美德。在儿童看来，成年人一点也控制不了自己的个人生活，更控制不了（在越战期间、水门事件期间以及煤气管道事件期间）外面的大世界。成年人不保护孩子或者以身作则地教育孩子，而是倾向于指导孩子们要自己关心自己，相当于告诉孩子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应该学会自己来应付各种情况。正如尼尔·帕思曼在《失去的儿童时代》中所指出的那样，成年人在回答第 13 代儿童的问题时“答非所问”。那是一个必须解放所有人与所有事物的时代，无论这种解放对他们来说是好是坏。在《逃避儿童时代》中，约翰·赫尔特主张将儿童从成人压迫的老虎钳中解放出来，而希拉里·克林顿则发表文章谈论儿童的权益问题。

现在高涨时期的教育受到了指责，说它不把膨胀一代的儿童当人看待。因此，第 13 代在觉醒时代的学校教育中所获得的解放比任何时期都要彻底。开放式教育的倡导者 A·S·尼尔敦促说，应该让每个孩子“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成年人的任何提示”。他建议用“工具、黄泥、体育、戏院、美术与自由”取代事实、

规章与学分。这些改革者努力通过强调情感而忽略理性、注重经验而轻视逻辑推理的“个人中心”教育来加强儿童的自尊。老师们不是让学生们对一本书的普遍特点进行评论，而是开始探索学生们通过做阅读练习有些什么感想。人们不再注重语法，不再喜欢语音学，而且用新数学中的相对主义参数取代了算术中的十进位规则。教科书强调敏感性与可理解性。根据改革者罗兰·巴特的理论——“不存在所有人必须学习的最少知识量的问题”，学习标准受到了影响。孩子们用在做家庭作业上的平均时间只有高涨时期的一半，而乱给学分的现象愈演愈烈。随着觉醒运动的发展，认为自己的毕业成绩为 A 的中学毕业生比例几乎增长了两倍。

在高涨时期，作为一个成年人意味着婚姻稳定、为孩子提供一种健康的文化与友好的社会环境。而现在，作为成年人则意味着在孩子的世界中挂满具有自尊寓意的纽扣，而儿童生活的本质（与媒体形象）却变得麻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孩子的母亲是一些未婚的女孩。各州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难以推行收养孤儿家庭制度，于是媒体开始谈论自己照顾自己、被遗弃或者从家中出逃的孩子之类的问题。在 70 年代中期，美国最贫困的年龄段从（老年时代的）迷惘一代直接过渡到（儿童时代的）第 13 代，丝毫没有波及介于这两代人之间的另外三代人。到 70 年代末期，儿童的自杀率打破了迷惘一代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创下的纪录。在整个觉醒时期，婴幼儿被杀害的比率增长一半，而有关虐待儿童的报道更是增加了四倍。

觉醒时期，反抗权力、权威与秘密活动的运动对追求新世界观的 45 岁左右的人以及正在努力构造自己的梦想、年龄在 10 岁左右的人群来说，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对沉默一代而言，在危机时期（儿童时代）大人教导他们要有雄心大志，而在中年时期则

学会了面对现实。还没进入青春期的第13代从未有机会雄心勃勃地思考未来，他们听到的是一种新信息：美国的大好时代已经结束。如同生活在离婚大潮中的儿童，这一代人不知道自己在年长者开始埋怨整个美国都在土崩瓦解之时来到人世是否仅是一种巧合。

如果问一下今天的年轻人父母是怎样把他们抚养成人的，许多人会告诉你他们是自己把自己抚养成人的——他们自己做饭、洗衣，自己决定放学后是做家庭作业还是去挣钱，并自行决定与母亲还是父亲在一起过周末（或者在法庭上站在父亲一边，还是母亲一边）。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团结和睦的家庭成员长大成人，盼望着加入到成年人的队伍中去，而是以自由代理人的身份长大，盼望到充满种种选择的人生长河中遨游。在他们的童年记忆中，个人总是要胜过团体。在意识革命期间，随着老一代扫除了先前可以保护儿童的各种障碍，第13代也就被剥夺了积极向上的未来观——同时再也不会相信美国的未来属于所有人的观点。

走向第三次转折

1983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纪念马丁·路德·金逝世20周年的游行活动吸引人数之多可与当年在高涨期行将结束之际前来倾听这位伟人发表那篇著名讲演时的人数相比。然而以前的那种渴望与激情被一种新的团结意识所取代－－－仿佛现在应该兴建一个大型博物馆来纪念那个梦想与那次运动。举行大型社会运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在同一年，警告人们艾滋病病毒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钟声敲得更响了。

美国再也不会看到人们在理想国与非理想国之间游移不决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觉醒运动已经偃旗息鼓，而是因为它已经获

得了胜利。到80年代早期，那些来自黑什伯里①、吸大麻的嬉皮士的反社会的喊声，现在在华尔街自由市场的闲谈之中以及大街上商人们的谈话中也能听到。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中心到郊区，美国人都在倾听《心灵的习惯》一书两作者之一斯蒂文·迪普敦所谓的“他们各自心目中的小教堂的钟声”。

在第一届里根政府快要结束时，觉醒运动走完了自己的路程。一种新议程已经制定，旧的热情不会长存。每一代人都已走完20年前各自进入的人生阶段，并将进入下一个新阶段。与1963年的情况相同，每个世代原型都与上一代人在上一阶段的原型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沉默一代怎么能与建设伟大社会、争取自己权利的刚愎自用的老一代征服者相同呢？膨胀一代怎么会扮演一位中年调停人并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呢？第13代怎么会在长大成人后鼓吹什么道德完善呢？美国的父母怎么会不关心、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呢？所有这些都不会重演。

在任何觉醒期行将结束之际，都会出现代际关系紧张的情况：

·老年英雄仍是各大公共机构的领导者，但正逐步从文化界淡出。他们现在为一个他们认为有些陌生的社会担忧。

·中年艺术家在感到旧秩序已经被人抛弃的同时，开始计划逃脱社会纪律的束缚并扩大个人选择的范围。

·年轻的预言家，在发现个人真理之后，现在想彻底改变社会。

·童年游牧者是一群生在软弱无能的成人世界中的愤世嫉俗的青年。他们对规章制度失去了信心，开始准备走自己的路。

① 美国旧金山市的一个区，60年代嬉皮士多聚集于此。

到80年代早期，这些世代原型都已经为新的发展方向做好了准备。当沉默一代开始进入老年之时，膨胀一代正在进入中年，而第13代则在进入青年。他们以前的社会角色无法再继续下去。

觉醒时期已经结束。正如罗兰·斯特罗姆伯格在70年代中期所预测的那样，那个时代的精神“将显现为另一种发展到尽头的选择，因此人们必将发明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第二次转折必将为第三次转折让路。

第八章 第三次转折：文化战争（1984－2005?）

“现在，美利坚正值一天中的早晨，”里根总统在 1984 年 1 月 15 日所作的国情咨文中说道，“美国回来了，昂然屹立，满怀勇气、信心与希望地面对八十年代。”在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期间，里根曾坚决反对意识革命，成为既有体制至上的象征。现在既有体制已经沦陷，他也随之成为个人至上主义思想的象征。里根厌恶自己以前操纵的那种体制下的规章、税务与惩罚措施。但当时美国经济从表面上看形势一片大好，人们非常喜欢那时的体制。从《向领袖欢呼》到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生在美利坚》，国民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觉醒时期结束了，人们发现自己对于美利坚的变化感到惬意。

在里根发表上述演讲三天之前，电视观众在收看美式橄榄球超级杯赛时，看到一则苹果电脑的广告：一名妙龄女郎捶打大屏幕上一些 50 年代表情麻木的男人。“一九八四年不像 1984，”广告词如是说，宣告在个人电脑业上它已经超过了深蓝（IBM）。这四位数字使人想起了乔治·奥威尔在高涨时期所做的著名预言，在面目狰狞的“老大哥”面前，整个现代社会都会坐卧不宁。恰恰相反，美国在“老大哥”的高压面前却表现得轻松自如，一脸微笑。

在社会的最底层，觉醒一代取得了胜利。新的价值体系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认识到旧的公共秩序已经过时后，美国人发现，就个人而言，他们仍过着内心很充实的生活。在觉醒时期，当反叛者们进攻堡垒时，人们都期望胜利者能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不管是“乌托邦”（如果正义的一方获胜）还是“反乌托邦”（如果邪恶的一方得逞）。现在，反叛者已登门入室，而防卫者落败而逃，没有人知道如何操纵旧城堡。没有人统治管理国家，至于到底哪方得胜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意识到这点后，人们不再以为，任何城堡，特别是落在前反叛者们手中之后，还能有什么作为。

民众的心态已走向高涨期的反面。在经历了芭芭拉·怀特海德所称的“丰足的经济和贫瘠的精神”之后，美国现在面临的是“贫瘠的经济和丰足的精神”。尽管总统还有总统的名望，但公众的信任度已降到了历史最低点；5 名美国人中只有 1 人指望总统或国会有很强的责任感。同时，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他们不再信任政府，只相信个人，这从市场、文化多样性、交互式技术、“新时代”精神和福音传道等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国家政策与计划，但由此形成的真空正逐步为一种新的政治所填补，即个人己见、内在价值和决然姿态。

从电视访谈节目（脱口秀）、靠他人或社会救济生活的群体到教堂的地下室，对个人生活意义的寻找开始于个人的直接体验。具有相同体验的个人相互吸引，形成一个个小团体，使上述个人发现得到认可。这些小团体的形成标准可涉及性、种族、宗教、职业、收入，甚至一种业余爱好，比如拥有枪支。随着小团体的强化，他们开始抛弃旧（广泛）的世界观，创立新（特殊）的世界观。任何来自团体以外的观点和意见都会受到怀疑，因为

它缺乏纯正信仰的号召力。这样，每种行为都具有一种含义，每个含义又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每个错误都会导致一个受害者，每个受害者后面必有一个加害者。从一个小团体到另一个团体，这种逻辑引出种种不同的错误、受害者与加害者。与高涨时期不同的是，那时不存在“正常”舆论这种东西。

美国就这样丧失了标准，国家的内核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正如参议员莫伊尼汉所说的那样，美国人不断重复着离经叛道之举。在觉醒期占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大多数的“沉默一代”，现在有一种身陷无序和分歧之中的感觉。比如，有关种族问题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大都高估了少数民族和小团体的规模和不满情绪，而低估了主导民族的规模和富裕程度。公众话语充斥着妄想和偏执，诚意越来越缺乏，而部落性却日见鲜明。甚至主流美国人也像《倒塌》中的麦克尔·道格拉斯那样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心怀怨恨的少数民族。美国各个政党受到削弱，任职者受到讥讽，相互攻击漫骂的广告愈演愈烈。猜疑开始溜进陌生人间的交往之中，十人中只有三人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赖”，而有八人认为“美国人的文明程度在过去的10年中下降了”。随着80年代的结束，私人保安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到90年代初，美国的小团体冲突开始被人冠以文化战争的称呼。欧文·克里斯托尔将文化战争定义为：“在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及如何理解‘美国生活方式三个问题上所产生的巨大分歧”。在文化战争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基本战场：多元文化主义者与传统主义者（谢尔登·哈克尼斯对威廉·贝内特），媒体世俗主义者对福音派教徒（莫非·布朗斯与丹·奎尔）以及公共计划者对自由意识论者（罗伯特·赖希对查理斯·莫里斯）。文化战争勇士多如美国的小团体，从“伊斯兰国家”到因特网。每个团体在极力称颂自己真实性的同时，将对立团体

的观点界定为粗鄙、愚蠢、淫秽或邪恶（一个突然变得非常时髦的词）。

文化战争创造的许多新词汇使美国在觉醒期之后的各种观念上升为意识形态。在1994年的大选中，选民在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之大，创下了自实行选举以来的一个记录。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既不宣布自己是无党派人士，也不投票。美国公民因性别、种族、宗教和年龄不同及（特别是）有无子女而在投票行为上表现出很大的反差。有些领导者试图促成小团体之间的联盟，但鲜有成效。旧的政治同盟已经化为历史废墟。

随着这种“有意义政治”的发展，每个小团体中的美国人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公共机构秩序不再发挥作用，也不值得捍卫。没有人，即使是领袖，觉得应该对现在的事情负责。掌管美国政府的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宣称“大政府时代结束了”。那时的高级政府官员承认他们的机构已退化成一场官僚政治的恶梦。从法院到校园，从医院到新闻媒体，美国的公共机构沉浸于自我批评之中。这进一步验证了对前一个时代的客观批判。

美国人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认为每项社会计划都经不起长期考验，只能在短期内为个人所利用。这种态度感染了高级主管阶层与一般工人，老人与少年，白人与黑人，一家之主与单身贵族，信仰复兴者与同性恋者，乡下民兵与城市陪审员。阴谋层出不穷，如联邦调查局的直升飞机在爱达荷州上空盘旋、中央情报局在内陆城市传播艾滋病。人们关于社会腐败衰亡的想法日渐激烈；由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受到了人们的置疑，其他方面看上去也失去了正常的机能。在公共机构适应了这种情绪变化之后，变得更加迎合个人的需要，而拙于满足（即使是装作满足）公众的需求。在辛普森审讯以及耗费了数百万元巨资的咖啡价格暴跌裁决案之后，司法制度开始让人觉得与其说它代表了正义，毋宁

说它仅仅是一种制度。在觉醒期，这种制度是在外面看上去腐败，而现在是彻底腐败了。

社会生活缺少一种主导方向，美国人却在更为狭窄的范围内寻找它。美国人对克内尔·韦斯特所谓的“一个正在周详衰落的文明”令人麻木的复杂性感到失望。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论全社会合作的新理想，并小规模地开始尝试。对许多人来说，这些理想大都打着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社会信仰”或“公民共和国”运动的旗帜，致力于社会生活的彻底重建。对其他人来说，它们则源于宗教宇宙论，从福音派对天使的排序到“新时代”对黄道宫的编排。美国人都被这种宇宙道德秩序的幻想所蛊惑，对这种秩序的含义他们在信中都很清楚。同时，十分之九的人同意“这个国家的人们曾经认为，他们比现在的美国人拥有更多共同的东西，更多相同的信念”。

到9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指出，美国已深深陷入一个丧失了目标、无法达成一致的新时期。罗伯特·塞缪尔森称其为“裂化”；《评论》称其为“巴尔干化”；托马斯·伯恩·埃德索尔称其为“心乱如麻的年代”；威廉·拉斯伯利则称其为“解体”。

现在“解体”时期已经过半，它以任何人都未预料到的方式暗淡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回头看一看，美国人可以发现1984年是一个标志。在那年，几种新潮涌现，确定了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基调。起先，它们看上去无非是一些时兴的新奇玩意。然而，到90年代中期，它们已经演变为绝对的、不可磨灭的美国生活中的特色。

1984年，美国选民们批准了一项经济政策：高赤字、无限制加大政府津贴开支、降低存款利率及大量从国外贷款。当时人们认为，这种“游艇赌博”式的政策要么能改善美国经济，要么

会迫使决策者掉转船头。十年过去了，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而经济生活则面临着生产率徘徊不前的事实。

1984年，马里奥·科莫关于“两个美国”的演讲和查理斯·墨里的《正在丧失的土地》使公众第一次了解到贫富差距在增大。10年之后，这一差距变得会更大，然而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对此都无计可施。

1984年，杰西·杰克逊创立了“彩虹联盟”，宣称美国是“一条由诸多色彩与质地不同的补丁及布条组成的被子”。十年之后，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席卷各地，美国看上去不再像一条被子，而更像一块条条绺绺拼成的碎呢地毯。

1984年，美国人发现传统家庭不再是人们学习的模范，青少年婚前性行为不再稀奇。十年之后，已婚夫妇生儿育女率降至26%（1970年为40%），而有性行为的15岁少女增至26%（1970年为5%）。

1984年，当好莱坞刚发明出高科技暴力动作影片时，自动武器在内地各城市还很少见到。十年后，一般的儿童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18岁少年暴力案件，而被枪杀的18岁以下少年人数增加了两倍。

1984年，彼得·尤伯罗斯使美国从主办洛杉矶奥运会中获利，一些运动员年收入超过了美国总统，而迈克尔·杰克逊为美国创造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超级巨星风格。十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完全职业化，美国总统一年的薪水还不抵一些橄榄球运动员一场比赛的收入，而加藤·卡埃林界定了何为名人滑稽表演。

1984年，资本刚开始大量跨越国界，大多数公司仍对负债累累的资产负债表诚惶诚恐，投资银行业务是一种新兴行业。十年之后，跨国资本震撼着整个美国经济，数额高达十多亿美元企

业兼并使这个国家的所有公司完成了重组。似乎如果一个公司的长期合同工下岗的时间越长，其股票反而涨得越猛。

1984年，在洛杉矶的小流氓中开始风行一种新的廉价高质海洛因，《芝加哥论坛报》的专栏撰稿人造出一个新词NIMBY（不要在我的后院），专指公众反对公共工程的活动。十年后，Crips和Bloods在犹他州和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已很普遍，而参加反对公共工程运动的不只是为高楼大厦包围中的城郊居民，还有中小城镇中嗜迷电子游戏的阿飞和民兵。

1984年，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数量激增，迫使地方政府建立起专门的收容所。十年之后，按照"同情疲倦"的说法，许多地方把流浪汉从公共设施中赶走，并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营造拘留所。

1984年，各州开始试营合法赌博，17个州出售彩票，2个州开有赌场，但没有一个州允许用交子机和印地安人的土地赌博。一年之后，上面四个数字分别变成36，10，6和24。截至到90年代中期，去过合法赌场的美国人超过了观看"大联盟"棒球比赛、全国橄榄球联盟比赛、音乐会和百老汇演出人数的总和。

1984年，自助运动在美国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时代周刊》和《镜报》联合进行的调查表明"积极向上者"与"道德说教者"在人数上大体持平（约占美国人口的10%）。十年之后，整个国家沉浸于精神运动，《时代周刊》和《镜报》的调查结果显示，说教主义者的人数翻了一番，而积极向上者已很少，这一词汇已被废弃。

在解体时期初期，人们往往把"后"和"新"之类的前缀加在各种新潮前面，如生活的后现代复杂性对于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来说是令人兴奋的新挑战。80年代的书名也反应了当时美国的状况：《做得不错，感觉很糟》。到90年代中期，在

经济繁荣之时，四分之三的成年人认为美国“处于道德和精神的衰落中”。日常生活一片黑暗，黑色成为最新的体育标识和豪华轿车的颜色。日常记忆中的政治措辞极其龌龊，而罪恶和死亡的喻语溜入日常对话中。丹·奎尔诊断到“一种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道德癌症”。希拉里·克林顿为这种困扰全国上下的“灵魂肿瘤”痛心不已。

一系列突发事件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新的国民情绪的产生。1987年的股市狂跌和紧随其后的华尔街丑闻打断了关于主张“贪婪并不是一件坏事”的嬉皮士的愉快谈论。冷战和“沙漠风暴”的胜利带来一种短暂而不安定的“世界新秩序”。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失败坚定了美国人不再相信大制度办法能解决公众问题的想法。1992至1996年间拉锯式的竞选加快了国家政治联盟的解体。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表明，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涌动着一种狂乱的激情。辛普森案件和百万人游行引发了一种源自愠怒的新种族主义。随着上述事件的发生，旧秩序的方方面面被搞得声名狼藉，人们不再尊重其活动，不再容忍其指挥，再也无法预见其成就。

90年代出现了了许多在其他时代可能算是好消息的现象：经济复苏，股市牛劲十足。教育成果突出，犯罪率下降。美国成为多边世界中君临天下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文化传播到全球各地。一些原子能科学家设计的世界末日大钟上的指针，在1984年距子时仅3分钟时缩了回去。美国人却从未如此悲观。他们总是认为，任何好消息（比如牛气冲天的股市）总伴随着坏的一面（大量失业），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

新衰落主义思想已变得不可动摇。如果说在觉醒时期人们偶尔谈及天启表现了那一时期欣然的迫切性，那么新衰落主义思想则更加沮丧——仿佛历史不是奔向高潮，而是步履蹒跚地步向枯

竭。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关于对最近几十年的民意测验表明，最受人们喜爱的年代是距今最远的那个——90年代最不受欢迎。1995年《美国周末》举办了一项读者评论90年代的竞赛。绝大多数参赛者持低调观点，像“消极的九十年代”、“焦躁的九十年代”、“否定的十年”、“下滑的十年”和“绝望的十年”。保罗·肯迪尼在《强权的兴衰》中概括道，截至到90年代中期共出版了二十多本《…的终结》之类的书，包括《影响的终结》、《科学的终结》、《文化的终结》、《婚姻的终结》、《进化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和《世界的终结》等。

尽管公众生活消散了，但个人生活却巩固了。这两方面自从高涨时期以来恰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发展。1960年，人们在展望1984年时，想到了仁善的“明日之国”，邪恶的“老大哥”，但没有想到公共秩序混乱和个人主义泛滥。这说明了如下事实：上了年纪、能回想起高涨时期的美国人对解体时期感到如此惊恐，而年轻一些、没有经历高涨时期的人认为觉醒之前的美国历史几乎毫无意义可言。

解体时期国民情绪的转变是今天人生循环发生转折的自然结果。自信而富有合作精神的大兵一代的作用正在减小。缺乏主见、妥协的沉默一代正从中年步入老年。膨胀一代在经历了自我发现、争论和新的社会疾病之后，正在告别青年时期。告别了孩童时代的第13代让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都奇怪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新的千年一代儿童正在出世。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原型星座，届时内在（个人）力量将达到最高点，而外部（公共）力量达到了最低点。

像其他时代一样，解体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自然阶段。

现在是一个社会清除公共机构瓦砾的时候。觉醒时期已结束，而危机时期尚未到来，解体时期使人们能够最充实地生活，吸收过去，追求个人目标。如果每个百年周期都缺乏这样一个拓展自我实现领域的机会，即使它带来的是一种社会悲观情绪，人类文明将变得更加可悲。从许多方面讲，第三次转折都可称为百年周期中个人尽情享受的季节。

同样，解体时期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在巩固觉醒时期的理想后，它为随后的危机时期制定了日程。

第三次转折和原型

自15世纪以来共经历了七次第三次转折（或解体时期）。

- **从法国撤军（1435－1459），中世纪晚期百年周期**
- **偏狭与殉道（1542－1569），宗教改革百年周期**
- **反抗与复辟（1649－1675），新世界百年周期**
- **法印战争（1746－1773），革命百年周期**
- **墨西哥战争和地方主义（1844－1860），内战百年周期**
-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禁酒时期（1908－1929），强国百年周期**
- **文化战争（1984－2005?），千年期百年周期**

上述七次第三次转折都经历了社会熵和瓦解的相同过程。觉醒时期结束了，人们现在完全投身于他们自己的目标中。社会的首要目标现在是分裂，而不是聚集，人们在收获，而不是播种。这一切的后面，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成长壮大。随着大的官僚机制的削弱，小的非官方实体（家庭、居民区、小企业、自愿团体、文化小群体）得到复兴。

解体时期是一个秋分时节，白昼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社会秩序的需求和供应在下降。这是百年周期中的秋季，藤木繁

茂，果实硕硕，树叶飘落，人们开始重新注重各种生命要素。这正是理查德·威尔伯所谓的“炎热的夏季疲乏了她的心思……像一封再无任何意义的情书”。提前收获的人们在想，如何处理这些种子。(吃掉？存起来？还是任凭它们自己在风中飘零?)“对人来说，”埃德温·韦·蒂尔宣称，“秋季是收获的季节，聚集的季节。对自然而言，秋季是播种的节气，散布的时候。”收获的喜悦搀杂着面对即将来临的脆弱的战栗。“一切事物在古老的十月都会心系自己的家，”托马斯·伍尔夫写道，“旅行者想着家中的围墙和篱笆，猎人念着田野、山谷和犬吠，多情人恋起自己抛弃过的爱人。”

正如高涨时期始于一个终结危机时期的政治条约，解体时期始于一个终结觉醒时期的文化条约。社会解决了引发动乱的中心问题：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战胜了旧的团体中心观念。生活现在可以继续了——没有了动乱，也没有空想，更没有任何综合性的社会指导。解体期初期往往带有乐观和重新恢复的自信，但这种心态总会改变。人们对私人（精神）依然非常满足，而对公共（现世）生活的信任却在下降，这进而侵蚀了觉醒时期就被视为非法的习惯、规则和礼仪。这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熵。随着旧秩序的层层剥落，剩余物看上去更加腐败和无用。这招致了更多的犬儒主义，号召人们去摧毁剩余的一切。这一时期临近结束时，人们产生了一种严酷的希望——个人自治和推翻制度的趋势无限期地存在下去。

最有名的解体年代（16世纪50年代、17世纪60年代、18世纪60年代、19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令人想起冒险、无礼和节制的社会心态。这些年代很少诞生铁腕领袖，鲜有长期的公共工程，却有众多久负盛名的艺术家、道德家和不拘小节的名人，他们让我们想起的是他们的个人而非团体的成就。解

体时代反映了一种追求个人、实际但缺乏稳定性的新的社会心态。这些时代属于冒险家和演说家，属于暗藏杀机的阴谋和背信弃义的联盟，属于社会不安定和繁荣与萧条相互交替的市场。差别无所不在——富有与贫穷，炫耀与稳重，神圣与亵渎。人们用行为来发泄，欢迎争端，蔑视一致。似乎所有的关系都在变更，没有不容置疑的忠诚，没有不投机的成果。社会分崩离析，沉沦、混乱的文明中忠贞所剩无几。生活节奏加快，时间界限缩短。而新增的现世问题或被延期，或被认为无法解决。

像其他转折期一样，解体期心态的形成来自于世代原型的逐渐老化：艺术家一代进入老年，预言家一代步入中年，游牧者一代成长起来，而英雄刚刚诞生。下面讲述的就是整个生命循环过程中发生的情况。

·当决然的艺术家一代在老年时代替了英雄一代，他们加快了社会变革的进程，避开旧秩序的复杂和敏感。

进入老年的艺术家一代仍像以前那样缺少自主性——制度灵活、文化敏感、坚信程序与专家。他们中很少有坚强、果断的领袖。参照老一代英雄的做法，他们现在采纳了比他们年轻的预言家一代的议程，希望自己作为合作伙伴能被新的价值体系完全接受。能够接纳多样化的老年艺术家一代一般接受（甚至欢迎）离心的社会力量。不急于妄作判断，他们喜欢让事情自由发展——有时会对结果后悔。老年艺术家经历过挫折但仍有活力，依然感情用事，拥有社会良知以及对第二次机会的无限信任。

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时期的启蒙运动老年一代是美国殖民地史上最具反省意识与最缺乏指导才能的一代，他们“无休止地怀疑、踌躇、不确定与困惑的思想”（塞缪尔·约翰逊）和

“不偏不倚但和和气气、坚定而又怀柔的”行为（纳桑尼尔·阿普顿）。一个世纪之后，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地方主义时期，扎卡里·泰勒的同辈人临终之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仍寻求“能够协调冲突利益的怀柔措施”。“生活本身即妥协，”老亨利·克雷这样坚持认为。他悲叹自己所属的妥协一代没能够阻止废奴主义与南方种植园之间的对抗。一战过后，伍德罗·威尔逊推行他的“十四点措施”，但没有成功。他所属的正在走向老年的一代人对现实世界的结果并不太关心，他们更注重相对抗的理想能以公平的方式实现以妥协与和解。“如果我的观点还有一点作用的话，”他宣称，“舆论将最终左右整个世界。”历史学家马克·沙利文注意到，在20世纪20年，“与习惯相反……老人竭力效仿自己的的子女，在许多情况下是模仿自己的孙子女。”

·当喜欢评判他人的预言家一代在中年取替艺术家一代，他们主张的是一种低调的、价值观念固定的道德信仰和伦理规范。

步入中年的预言家一代，在一个以前以宽容著称的生命阶段，首先展示的是思考的深度，进而逐渐表现出一种冷静与严肃。在他们的眼中，他们是严正的支柱。而在别人看来，他们是冷漠的伪善者——尽管他们因为能够专注于是非根本问题而受到了他人难得的尊敬。中年的预言家将自己在以前的个人生活中培养出来的洞察力转移到公众生活中，开始由里及表地改造公共机构。他们以沉稳但坚定的方式获取了政权。他们中的第一批领导者能力较弱，能宽容同辈人的各种自我冲动。当他们没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规范重新恢复公共机构的神圣性时，道德观点相左的派别之间产生了分歧。

当第一代新英格兰清教徒定居者进入中年时，他们最初的爱

人的法则转变为对法的热爱——特别是那些未皈依的年轻人。约翰·温思罗普规劝他的追随者们“服从于你之上的权势，”它只给予“美好、正义及诚实以自由”。一个世纪之后，山姆·亚当斯、约纳森·爱德沃兹和约翰·威瑟斯庞的中年同辈人对日益加重的道德沦丧表示恐慌，他们呼唤历史学家米歇尔·坎曼所称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在19世纪50年代，外国来访者对美国“当前繁忙的一代”这样评论道，“严肃”但“缺乏对权势的尊敬”，即先验主义。一战后，传教士一代中的改革者加入了旨在争取妇女选举权和禁酒，由平民主义、基要主义和女权主义组成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运动。当年轻作家们嘲讽他们是浮夸的市侩时，中年人却制定了针对电影的《正派法》，关闭移民的大门，对犯罪者实施重罚，并竭力把一种严格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强加给行将失控的社会。

·受到冷落的游牧者一代在年轻时代替了预言家一代，成为无所畏忌的自由人，向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灌输自己的实用主义和独立性。

游牧者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长大成人的：它擅长选择和判断，但难以为青年人提供生活的结构、指导和任何集体使命感。这一代人缺乏一种存在的核心，其特点是他们迥然的社会与文化分歧。他们知道年长的领导不会对自己所在的团体寄予厚望，所以他们缺乏集体使命感或权力欲望。但是在与现实世界的不断接触中，他们获得了极强的生存技巧，同时对个人的成功充满了信心。就个人而言，他们在企业经营上敢于冒风险，并以成败论英雄。他们的文化形成了一种狂热、顽固的特点，受到比他们年长的预言家一代的指责——说他们缺乏有原则的内在生活。但年轻

的游牧者置这些批评于不顾，专心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

“顽劣、乖张的一代”，年轻的教友派成员乔赛亚·科尔在评述17世纪50年代的新英格兰反叛青年时如是说。关于年老的移民者，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这样写道，“第二代人看上去更粗鲁、缺乏教养和野蛮”。在法印战争中，乔治·华盛顿的同辈人在饮酒、赌博、犯罪、乞讨和破产等方面发生了巨变。历史学家威廉·潘凯克形容自由一代时说：“（这些）年轻人无所事事、无处可去”。一个世纪之后，在一个大学入学率下降的年代，老年批评家们的目标是马克·吐温笔下的淘金汉，而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认为“如此稀薄的的文化难以补偿如此巨大的浪费”。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评论道，镀金一代成长为“美国贪欲与占有欲极强的一代”。一战后，斯蒂芬·卡特承认，“报刊中充斥着对年轻一代的悲观描述”。伦道夫·伯恩在年长的道德说教者面前捍卫自己的“迷惘的一代”同辈，指出他们是对不管不顾的父母的“逻辑反应”。“同时，我们的确不会烦扰和惹恼自己的灵魂，”他解释道，“从少年时代我们就具有这样的特质：看透本质、直言不讳、一针见血。”

·英雄在少年时代替游牧者。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他们受到了思想日益悲观的成年人的爱护。

英雄原型是人造，而非天生的。这一塑造过程开始于少年时期，由精神自信但对现世充满焦虑的父母一手主持。人们最近认识到少年的生活环境充满了危险，于是重新给予他们更多的爱护，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大人们鼓励孩子们成为遵纪守法的成功者与合作者。他们与父亲之间的联系（与社会行为之间的主要联系）要比与母亲的联系（与个人价值观念之间的主要联

系）明显得多。对扮演老年预言家角色的父母来说，英雄一代的子女是他们实现内心幻想的工具。对于较年轻的游牧者父母来说，他们是为重新发现和找回一种和睦的家庭生活而付出艰苦努力的受益者。

在光荣一代的孩童时代，殖民地时期的父母因为英克里斯·马瑟所称的“虐待”和“忽视”（儿童）而受到抨击。不久之后，议会开始建造小学校，教堂宣扬善行和“救世准备”而不是被动的皈依。在法印战争时期，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对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巨变——不再像以前那样不管不顾，而是采取新的爱护措施，这使当时出生的“共和一代”大受其益。“在1750年之前，”历史学家杰伊·弗里格曼指出，“不负责任的父母成为国家的替罪羊。”后来，历史学家肯尼思·林恩评论道，“在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我们都不会发现美国社会的最高领导者在谈起自己所接受的父爱时像这些爱国者这样感激涕零。”同样，进步党一代的成年人成功地清洁了儿童世界。按照社会学家莱昂纳德·凯恩的说法，这使1900年成为一个“世代分水岭”：这一年之后出生的孩子比以前出生的孩子更受到偏爱，他们尊敬父亲，如宾·克罗斯比所唱，“无论老人们走到哪里，（他们都将）紧紧跟随”。

美国现在进入解体期已超过10年，该时期大约还要持续10年。在未来的10年左右的时间内，通常的线性预测仍将得到证实：进入一个新的千年时期后，除形式有些夸张（略老）外，现在的各代人仍将展现出同今天一样的人格面具。但同时，他们将走向下一次转折，其性质与后果却是时间线性论者所无法预测的。

沉默一代步入老年：高流动性新老人

在1984年竞选临近之时，大卫·布罗德宣称他所属的“健康的五十岁”一代已做好了接手新政府的准备。美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代在如此一大把年纪仍未赢得多数党的总统提名。是的，那一年，沉默一代最终看到了沃尔特·蒙代尔和杰拉尔丁·费拉罗赢得了一个州。四年过后，一名沉默一代的老兵与一名大兵一代的老兵竞选总统，但当米歇尔·杜卡基斯坐在坦克上以期改变自己在公众中的懦弱形象时，人们都觉得他非常可笑。失败的竞选者名单如下：拉马尔·亚历山大、布鲁斯·巴比特、帕特·布坎南、杰里·布朗、鲍博·多尔曼、皮特·杜邦、迪克·格普哈特、菲尔·格拉姆、汤姆·哈金、格雷·哈特、杰西·杰克逊、杰克·坎普、理查德·拉姆、罗斯·佩罗、帕特·罗伯特森、帕特·施罗德、保罗·西蒙、阿伦·斯佩克特、保罗·特松加斯和皮特·威尔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评论家们谈论的是缺乏“庄严”的“侏儒们”。到了90年代，布罗德描述了一种“破裂的一代”，他们总是“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迎合特殊的选民，价值观念令人怀疑或看起来莫名其妙”。从1980年到1996年的五届总统竞选本应是沉默一代主导美国政坛的大好时期，他们却只赢得了20个多数党选票中的4张。

沉默一代正在成为美国历史上从未产生过总统的第一代人。他们甚至没有一名副总统。但他们却是卓越的助手一代，出现了三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迪尼、罗莎琳·卡特和芭芭拉·布什），并史无前例地连续40年充当白宫幕僚（从20世纪60年代的皮埃尔·塞林格、乔·卡利法诺和比尔·莫耶斯到90年代的戴卫·格根、麦克·麦克拉蒂和利昂·潘纳塔）。

在觉醒时期，沉默一代协助老一辈治理国家，并扶持小字辈向老一代发起挑战。在解体时期，沉默一代本应扶正，他们却帮助大兵一代在政坛拖延下去，让膨胀一代趁机超过了自己。在80年代，评论家造了一个新词“气度沟”以区分沉默一代的竞争者和年老的大兵一代的政治家，像里根和蒂普·奥尼尔。公众仍指望里根和奥尼尔找回舵手的信心。十年后，沉默一代展示出一个新的“情感沟”，更多的膨胀一代专一而热情。如同《华盛顿邮报》对理查德·卢加尔的描述那样，这一代人呈现给大众的与其说是领导者身份，毋宁说是“一份追求华丽辞藻的团体履历表”。沉默一代成员一生都在无私地追求，当轮到他们出任领导职务时，却发现其他人已经把注意力从他们身上移开。

他们老年的成就——增加了公平的含义、程序的层次、提高了专业技能新水平和扩展了多样化的范畴——的确让人感到非常高兴，却很少涉及国家面临的各种重大挑战。就像被许多沉默一代认为是他们最大成就的《残疾法》，他们只是在最大程度上帮助了某些人，却同时使其他人陷入了困境。现在，随着解体时期的深入和权力的丧失，这代人已经体会到中年过后是个什么滋味儿，就像丹尼尔·列文森所描述的“一种对（自己）的无关紧要的地位感到一种无言的绝望、逼人的恐怖”。

“最令我们迷惑不解的是，国会议员的素质在提高，其表现却在下降。”大卫·格根在1991年这样说道。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其他一代人在步入老年后要处理大众如此多的要求与怨言，而且收效如此甚微。在80年代中期，当沉默一代占据国会中三分之二以上的立法席位时，召开的听证会要比60年代的大兵一代多出一倍，而且雇佣的工作人员也多出了三倍，向选区发出了多出五倍的信函，而制定的法律却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在沉默一

代统治国会的二十年（1977－1996）中，预算从未实现收支平衡，而增加的债务却是以往所有债务总和的八倍。在1965年大兵一代拥有“伟大的第89届国会”，而沉默一代却以“‘无能为力的’政府”形象出现在1989年某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在他们手中，美国变成米歇尔·桑德尔所称的“程序化的共和国”。从《预算法案》和《战争电力法案》开始，沉默一代国会制订了多如牛毛的预算及和平计划，这往往使公共机构在处理问题时变得更加公平、待人更加和善和效率更高，却从未除旧立新。“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又来了，”柯林·鲍威尔说道，“程序总是重要的。”在别人看来，这一代人的工作重点并没有触及如何使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核心问题。就像哈维·西尔弗盖特谈到史蒂芬·布雷耶法官的法律文件时所说的那样，沉默一代政府使人想到“一只经过精心调节的手表，运转平稳而富有逻辑性，的确是一个机械奇观。但问题在于，在现实世界中，它无法准确报时。”如布什谈到杜卡基斯时所讲的那样，这使得沉默一代在其他人眼中就像是“一名技术专家，能做出精准的齿轮，却不晓得机械运转的原理”。

在解体时期，美国老年领导的风格由“壮汉”变为“艺术大师”（援引《财富》杂志的说法）。就像杜卡基斯在1988年演讲中所讲的那样，沉默一代把大兵一代的红、白、蓝重新染为鲜橙色、灰色和浅紫色。他们提出了一种略有不同、总是具有探求心的观点。梅格·格林菲尔德称赞这种观点是“对我们所继承的历史事实进行的接连不断的重复检验……当这一切运转正常，我们的理解将得到扩展、精炼；一切含混不清、复杂或令人怀疑的因素将变得一目了然。”沉默一代一如既往地缺乏自主性，他们反对那些看上去思想僵化、性情暴躁的同辈人（比如罗伯特·博克、帕特·布坎南和约塞林·埃尔德斯），而拥护那些认为自己的信仰

在解决诸如堕胎等分歧性问题方面“毫无作用”的人（如大卫·苏特）。

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在走向老年的沉默一代努力寻求通过相互对话解决问题的办法——从周末“谈论小组”到团体敏感研讨会，从特德·科佩尔的全国城镇会议到谢尔登·哈克尼的全国对话活动。在最后一种办法中，“所有参与者都尊重别人发表的观点”。“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什么早已练就的问听能力，”报人韦德·格林极力称赞他这一代人“在一个变化异常、难以预料、颇多争议的时代（所具有的）弥合裂痕”的能力。沉默一代领导的政府鼓励所有个人与团体参政议政。在加利福尼亚，选民通过投票提出了许多动议，乃至加州政府在 1991 年的投票选举中不得不编写了一本 230 页的选民手册，而新教科书需要争得四个委员会的同意才能发行，每个委员会有 90 名委员。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多边主义和尊重国际法的新时期——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称之为“软力量，互相依赖的复杂机器”。在沉默一代的指挥下，甚至计算机也开始相互对话：宇宙飞船开始携带三名宇航员，他们在解决相互间的分歧时采取 2 对 1 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

大兵一代临近老年时致力于大事业，而当沉默一代步入老年时做的却是大量诸如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在 80 年代中期，国际协会联盟列出了亟待解决的一万个世界性问题。“他们不是在素描广阔的风景，”威廉·科恩这样评论他的同辈参议员，“而是采用点画手法——描绘世界的方方面面”——而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即高涨期，这个世界看上去却非常简单。威廉·拉斯伯利哀叹道，除了数不清的“枝节问题”之外，“说起国家利益，几乎没有人能令人信服”。

“自由主义者”一词曾指极力倡导一项涉及推土机和工厂的

统一建设性议程的大兵一代成员，而沉默一代改变了该词的含义，用来指那些禁止推土机和工厂伤人的人。加里·哈特吹嘘道，“我们可不是一小撮胡伯特·汉弗雷”。同时，关于陈旧的保守主义的定义，也从迷惘一代在高涨时期小心翼翼的管理服务者形象转变为沉默一代供应经济学政策提倡者们充满解体时期激情和狂妄的、嬉皮士式的、挥金如土的乐观主义。像菲尔·格拉姆（而不像膨胀一代），他们“不是在寻找传道者”，不喜欢“简单的说教”。沉默一代跨越意识形态，找到了大卫·奥斯本所描述的一种新进步主义的“合题”：“如果命题是政府是解决的办法，而反题是政府是存在的问题，那末合题就是，政府是合作伙伴。”不管是何种意识形态，沉默一代一般赞成最好由专家们做出决策的方法。在捍卫自己的同代的过程中，为反对膨胀一代发起的任期限制运动，汤姆·弗利不惜雇佣专家级律师来保住某些在职专家的职务。

从文化界到经济界，正在走向暮年的沉默一代在努力清除各种在他们青年时代就已存在的令人窒息的社会羁绊。在老一辈美国公民自由权同盟式的公民自由权主义者的帮助下，他们抵制宵禁、校服和反乞讨法。他们主张举债式收购，国家批准经营赌场，发行无息债券和执行“动态计划”，从而加大了美国经济的风险系数。他们打开了所有可以打开的文化大门，打破所有禁忌，提供所有的西洋景。如果说在高涨时期沉默一代中追求时髦者在玩弄新奇，那么解体时期的公司老总们则在“九寸钉”（Nine Inch Nail）的公开亵渎前面挂上了“时代－华纳”的标识语。“在网络上是没有看门人的，”这是广告时代的宣言。“除脏话和说爱德威尔① 比阿斯匹林强的话以外，你现在可以做任何

① 一种止疼消炎药品的名字。

事。”对于任何需要社会纪律或非正式限制才能得以进行的社会安排，老年沉默一代往往采取破坏措施。从流行音乐到时装，从新闻到文学，以迪克·克拉克、卡尔文·克莱恩、亨特·汤姆森和戈尔·维达尔为代表的灰色一代都装出对他们控制的各个领域的规则不屑一顾的样子。

与以前的大兵老一代不同的是，沉默一代相信选择权、协商、多样化、活动性和复杂性——即帕特·乔特所称的“高流动性社会”。在觉醒时期，沉默一代的微观经济学家捍卫市场选择，反对大兵一代的宏观经济思想。现在，在总统的经济顾问中，年长者维护市场，而年轻者则持反对态度。在解体时期，大兵一代的工业家们被沉默一代的技术专家们所代替。这些经营控股公司的技术专家灵活性强，但不善于保持产品的一致性及工人对公司的忠诚，他们听从诸如汤姆·彼得的《解放式管理：纳秒九十年代必要的瓦解》之类的书。旧的垂直式命令结构已让位于水平乃至分裂式结构。随着工会、体育联盟和寡头垄断的削弱，反托拉斯政策不再是公众关心的头等大事，因为没人希望沉默一代中的杰里·琼斯们再像大兵一代那样勾结起来。只要每个人避免技术犯规，沉默一代的董事会就假定他们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可以接受的——不管是鼓励高级主管阶层拥有大量优先认股权还是把雇员裁到大街上去。

为引导自己和国家找到正确答案，这代人认为“情感”高于一切，即约翰·利奥所谓的“主要以情感为基础的一种镇静的相对主义思想”。大量采用约翰·纳斯比特的“高技术/深动情”策略的后果表现为马里奥·科莫的“富于同情心的”自由主义、杰克·坎普的“假装同情的保守主义者”或罗斯·佩罗“设计”改革的偏斜计划——通过更多、更好的民意测验来看每一个人认为应该做什么。在沉默一代的手中，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侧重点从大型

公共建设转到为了“促进宽容和社会理解”和保证“参与及平等”的特殊项目。当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国外的情景而感到难受时，在海外执行任务的美国军队目标却极不明确，无非是遵循多边协议和保护每个人不受伤害。在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和约翰·沙利卡什维里将军的领导下，军事战术转向远程战略武器，这种武器可以减少作战人员的伤亡，但是制造费用极高，而且还无法确定其成效。在沉默一代的将军任期内，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在训练中牺牲的士兵人数超过军事行动中阵亡士兵人数的情况。

沉默一代应该为自己在争取民权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他们推选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国会议员人数超过了以前的总和。种族理解可能是这一代人最珍贵的遗产，就像罗素·米恩斯谈起他自己时所说的那样，“（我逐渐）认识到生命的本质不在于种族、文化、色素或骨骼结构——而在于感情。这才是人类的根本”。但在推行这一遗产的最后阶段，在大学宿舍、公立学校和国会选区又出现了新的种族隔离——及一种源自新的社会问题的冷漠与混乱，它使得各种族的年轻人不像沉默一代年轻时那样相互信任、对种族进步满怀希望。

在年轻一代在解体时期遇到的经济困难面前，正在进入老年的沉默一代表现得缩手缩脚。作为年老的继承者一代，他们对自己预想的命运感到一丝隐约的不满。他们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老人，完成了由老年乞丐向老年富翁的巨变。高涨时期的迷惘一代曾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子孙在经济上芝麻开花节节高；沉默一代的生活水平却远远高于自己的下一代。1955 年，与 60 岁的父母相比，大多数 35 岁左右的人一般都拥有宽敞的住房与比较名贵的汽车。现在情况却正好相反。在年轻人的初级工资及福利出现下滑时，年长的老板的最高工资却在飞涨：大兵

代高级主管阶层的工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41倍，而沉默一代高级主管阶层则是224倍。“在1940年，”罗素·贝克回忆道，“只有吸大麻的人才能幻想到我们今天所沉迷的舒适与豪华的未来。”但是，这种繁荣也带来了各种丑闻。从鲍勃·帕克伍德充满性描写的日记到“联合之路”① 对威廉·阿拉莫尼“对理解缺乏敏感”的道歉，对于特氟隆式的大兵一代轻易摆脱掉的，沉默一代付出了代价。

今天，沉默一代虽已成为“既有体制”的一部分，但仍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查尔斯·赖克写了一本《反对制度》，好像他所痛恨的那个制度掌握在陌生人手中。沉默一代的立法者们制订了阳光法律，使整个国家淹没在数据之中，而目的却是让每个人对它们做出事后评价。然而，一个人可以提出《信息自由法》申请，阅读大量的专家证明，但仍弄不清是谁做出的选择及由谁来负责任。在这代人逃避责任的背后，有这样一层含义：与杜鲁门式高涨时期不同，责任并不在于他们。作为在强大制度的阴影中蓬勃而起的不起眼的一代，沉默一代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尝到失败的滋味，好像他们人数不多、势单力薄，不足以造成任何影响。像《回忆丹尼》中卡尔文·特里林的英雄一受害者一样，他们摆脱不了一种欺诈情结，对于未经奋斗而获得的成功感到痛苦。

好比大卫·布罗德年终时开出一个承认自己过失的专栏，沉默一代也正以反思与补救错误来结束自己的奋斗生涯。退休的公务员毫不保留地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但听到他们以宽容、怜悯为准则、根据正当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受到较年轻政治家们的猛烈抨击仍非常恼怒，所以，这一代彬彬有礼的礼貌小姐们继续维护优雅，博学的保罗·富塞尔们仍在抗议《美国的无言》，明智的

① 美国一家民间慈善募捐阴织。

威廉·科恩们仍不同意如下观点："那些寻求妥协和一致的人"是"愚蠢的中间派"，他们"软弱无力、毫无原则"。"不幸的是，"帕特·施罗德在宣告退休时哀叹道，"在我即将离开华盛顿时发现，它比我刚来时卑俗多了。""我们已经让新清教徒接管，"罗素·贝克说道，"到处都是不祥之兆。"

让以丹尼尔·莫伊尼汉为代表的老年自由主义者胆战心惊的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年轻时，"老家伙是保守派。而现在，年轻人正成为保守主义者，而我们成了老家伙。"随着越来越多的沉默一代在职者的退休，他们这代人组成的专家核心力量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甚至我们的许多生活用语也面临着消亡的命运，"贝克很绝望，但明白了一句话的含义，"'苏联'这个词很快就会听起来像二战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那样遥远"。后来，很多人体会到了一种凯文·菲力蒲所谓的"帝国失败的结束"和一种对由几十年的经济与文化冒险所换来的浅薄的繁荣产生的焦虑。当沉默一代开始把自己的生活故事变成诸如朝鲜战争纪念碑和摇滚乐博物馆之类的陈列馆时，他们建造的是艺术品而不是里程碑，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多于社会或道德方面的体验。此外，他们担心自己毕生取得的成就可能变成杰奎琳·昂纳西斯的收藏品：这些物品对他们自己来说是珍贵的，但对他人来说则是无法理喻的（或许还是无法承受的）。

"在大部分时间中，我们都处在眩晕之中，承受着令人头晕目眩的文化与技术，耳中回荡着帕蒂·佩奇和滚石乐队的声音，我们失去了平衡，"理查德·科恩这样描述他那一代人在后半生遇到的困惑。"我们在一个时代长大，却要在另一个时代生活。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全被打了折扣，像某个失落的文明和狄更斯笔下的小蒂姆一样被遗忘了。我想，有人指责我们一无所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还在治疗之中。"

进入新的千年：兔子，睡了

“好奇怪！”盖尔·希伊在《新通道》中惊呼，这本书把50岁以后的人生岁月描述为一系列的之字形道路。一位书评者将之比作一个微型高尔夫球场。“生命的后半段并非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滞沌、抑郁、日薄西山，”希伊说道。在他们的“第二个成人期”，沉默一代能够“毫无限制”地做出“各种选择”。快要退休的人可以学习交流技巧，政治家学习和平之道，将军学习大声叫嚷，商人尽情表演——年老的女权主义者更是精神倍增。老年时代如乐园，是一个毫无羁绊的美学敏感期，并在希伊所谓的“无拘无束的八十岁”达到高潮。她那一代中年龄最大者将在2005年达到这个年龄。希伊的同辈人不仅要否定年龄不饶人这种说法，还要寻求一种“迟做总比不做好”的心理宣泄。他们将继续努力在思想、行动与面貌上向青春看齐，让自己的穿着打扮与时代同步，不厌其烦地做消除面部皱纹及腹部整容手术，并且时不时因自己放任于性嬉戏和实验性冲动而让子女大为恼火。正如伍迪·艾伦谈及与其同居妻子的养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时所讲的那样，“所想即所需”。

沉默一代也许认为自己正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老年，但文化的更替与发展却是显而易见的。《怪事，你看上去不像奶奶》是洛伊·怀斯描述同辈人生活的一本书的名字；的确，美国正出现一批追求新奇的老人，他们不符合（或不喜欢）大家熟悉的大兵一代老年公民的形象。沉默一代更喜欢自己变成高流动性新老人和不承旧习的艺术鉴赏家，尽情品味玄妙、亚文本与唯美主义——他们是老练的相对主义者，把自己的思想与“另一方面”系在一

起，能够从各个视角欣赏事物。卡迪拉克车主、打桥牌者、友爱互助会会员、共济会会员和老年权力集团成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老年网”冲浪者（自诩为“60多岁的玩童”）、同道会会员、属于和平军团“老年志愿者”、博物馆讲师、戏院接待员及社会工作者与公园护林员的无偿副手。在幼儿读物《我的奶奶有一头黑发》中，奶奶进行有氧运动锻炼，驾驶红色跑车四处飞奔，与青年人进行跨文化交谈。黄金时代的美国老年网络让位于“诺曼·李尔第三幕通讯网”，豪华大汽车让位于世界级轻巧型轿车，声势浩大的乐队音乐让位于伤感的老歌金曲。一类描述成老年人生活的新影片（如《乖戾的老人，如何缝制一条防水棉被》）把老年生活描述一幅由性生活趣事与家庭误解混合而成的拼贴画。

“我刚发现我是某人的祖父，某人的父亲，此外，还是某人的朋友，”这是保罗·纽曼在影片《谁也不是傻瓜》中的一句台词。这部1994年拍摄的电影反映了解体时期年老的祖父们的敏感和自嘲。许多沉默一代老人发现他们与孙辈之间的密切关系被自己的（及儿女的）离婚事件所冲淡了，但他们现在正努力寻回那份已经破碎的亲情。90年代之前，支持祖父母的美国团体很少；但现已经超过150个。自觉醒期晚期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回到独自生活在宽敞温暖的大房子中、生活富裕的妈咪或老爸身旁，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增加了40%。

在解体期余下的时间里，沉默一代将使美国所谓的老年人重现。由于沉默一代的时尚主导者偏爱上了与年轻人云集的饭店、剧院和体育场仅有几步之遥的连栋房屋，休闲世界和阳光城市不再像往常那样充满魅力。在第13代的主卧室政变之后，如同一个澳洲人投出的飞镖仍将返回远处一样，美国人的家庭也将发展成子孙满堂的大家庭。家庭彻底分裂的老年人将尝试非传统的生

活方式。许多人将成为老“傻瓜”，比自己的孙子孙女还天真；而有的老人会重新拾起年轻时的爱好，进而成为这些方面的行家。长期的包租旅行将失去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时间短、花费更多的历险假日及“祖孙同游”。沉默一代年轻时曾做过五美元一天的欧洲之旅，如今这些“老客栈旅客”将故地重游，但现在的日费用涨到了500美元。他们许多人将自己想作的各种事情记录在册，然后尝试各种冒险活动：爬山、乘坐城市高速客车和在极地冰原上滑雪。他们身着工作服，头戴贝雷帽，手拿画板和颜料，畅游各大国家公园。他们会自掏腰包，前往肖托奈文化讲习学会和迪斯尼学院去听名人的演讲。他们将把自己的地下室改造成摄影实验室、录音室或电脑工作室。

“你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机会，”詹姆斯·厄尔·琼斯在为AT&T所做的广告中这么说道。退休曾是对大兵一代味同嚼蜡的公共奖赏，但对沉默一代来说，它充满了选择，包括可以选择‘非’退休和‘反’退休，因为沉默一代渴望参与别人正在做的一切。他们追求时尚，增加了老年医疗保险的开支。“摩登派得到了医疗保险”，《华盛顿邮报》这样说，因为乔伊斯·布拉泽斯医生督促其同辈人做“专家病人”。他们中许多人将记载下大量关于医疗保险选择权与特殊福利的材料，向大夫们建议他们偏爱的药物，还要求得到可能得到的最复杂的医护与救治。在他们的健康状况下降后，沉默一代会变得比大兵一代更讨厌，他们介入各种团体生活安排，掀起个性化家庭护理的高潮。所有这些将大大增加联邦政府在老年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

在90年代早期，当沉默一代刚开始领取医疗保险金和社会保险金时，这些项目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开始受到人们的抨击。抨击者主要是沉默一代。被老年医学家称为“年轻老年”中的许多人带有负疚感，因为他们领的钱来自生活艰辛的年轻工人——这

种集体负疚感是大兵一代从未有过的。当关于纵容老年人的文章开始出现于全国性报刊上时，年老的精英们也开始反思人口统计学家弗朗西丝·戈德沙伊德的观点："与年轻人的贫困相对的是老年人的富足"。一些沉默一代参议员，如沃伦·拉德曼、约翰·丹福思和阿兰·辛普森，退休后纷纷表示自己内心的苦恼：他们在掌权期间任凭政府提高特殊津贴，是他们这代人使老年人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而将年轻人推向极度的困境之中。理查德·拉姆感到"总受到这样的折磨：我是美国政府最不负责任的一代财政官员中的一个"，同时，保罗·特松加斯在普通的沉默一代公民中发动了一场把钱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争取实现"代际公正"的运动（在老大兵一代的议程中情况恰好相反）。

最近几年中，沉默一代开始改变一度坚如磐石的老人议员游说集团，降低其稳定性、自主性和工作效率。到90年代中期，当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号召会员支持有利于老年人的福利法律改革时，一些国会议员在收到的60多岁的选民寄来的信中发现，反对者首次超过了支持者。不像其前一届，1995年的白宫老年会议强调了代际关系主题，并通过了许多内容庞杂而冗长的决议，却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主办的《现代老年》杂志采用了新封面，带有高雅的文化品味，开始刊登关于年轻人趋势的文章，并开辟了各抒己见专栏。

在即将到来的10年中，沉默一代会发现，美国人的老年公共赡养观将发生一场巨变。在21世纪前10年，随着美国对沉默一代老年人格面具认识的加深，今天的各种的老年福利将被逐一被取消。不像大兵一代、沉默一代有一种特权感。他们是在事业至上的50年代而非英雄无用武之地的30年代或爆发世界大战的40年代长大成人。他们以前的业绩不会激发他们（或其他人）为争取大量的老年回报去游说。此外，年轻人会质问，既然在解

体时期有如此多的金色老人能在华丽的乐园中过得如此充实而富有情趣，政府为什么还要把老年人当作永远的赡养对象？本来低福利的普通工人与退休老人的收入差距就很大，如果再看到根据《联邦保险捐款法》征收的税款用来支付《普罗旺斯的一年》或主卧室里的冲浪浴费用，许多年轻人将感到无比愤怒。

假如不是因沉默一代秉性谦虚和不同于大兵一代的魅力使得年轻人乐于和他们交往，他们将很容易成为代际战争的靶子。为转移不可避免的来自年轻人的批评，沉默一代将诚心诚意地执行公务，提议代际合作，将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互惠义务个人化。他们的负疚感和妥协的本性将驱使他们做出一些让步，降低他们对年轻人的要求，切断社会保障政治这台电动机车输电轨道的电源。当沉默一代主动接受一项适度但重要的牺牲措施时，他们将在有生之年不会与另一代人发生大的纠纷，同时提高了他们是那个时代最缺乏自主性的一代的名声。

在约翰·厄普代克讲述“兔子”哈里·埃斯特伦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兔子，睡了》中，哈里死后变成了一堆乱糟糟的试管和电线。哈里意识到他的过去“充满了破碎的情感”，为“下一代”留下的只有“一桌子破烂”。他回忆起自己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同。在厄普代克的高涨期作品《兔子，跑吧》中，哈里对自己婚后充满志向的生活提出了疑问，他感到自己非常愚蠢、荒谬。在觉醒期，哈里振作起来（《兔子，回来了》），然后发迹（《兔子，富了》）。在这些经历中，厄普代克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内心漂泊不定感，当他们“寻找美好的性、最终的性和绝对的性时。性却使他们浑浑而睡”。在美国这样一个给予他们许多许多但却许诺给予他们子孙们很少很少的国家中，他们看不清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了 21 世纪前 10 年，残留的沉默一代世界将让人想到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曾多次讨论过、但与大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没有什么

关系的国际组织缩写词。不管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沉默一代总要提出一个更好的程序（一个新的预算修订案、一个新的鼓励性税率、一个新的考察委员会，或拉斯伯利所称的有关堕胎的“密苏里妥协”），而不是其前任偏好的“有付出就有收获”的原则。年老的专栏作家和负责节目安排工作的新闻播音员会哀叹西奥多·罗斯扎克现在所称的“对和善的战争”，同时向少之又少的听众辩解说，这世界太复杂了，除了缓慢的变化，容不下任何东西。

作为长期以来可信赖的捐助者，沉默一代在晚年将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慈善家。这是为修正一切所做的最后努力，就像俱乐部把会员的社会保障支票转给生活贫困的年轻人，或者像拉尔夫·纳达尔重新点燃起其普林斯顿同学发动的那些“受到压制的改革运动”。1995 年，向美国自由事业捐助者的平均年龄为 68 岁（比保守事业捐助者的平均年龄大 12 岁），这些捐助者中有 43% 将在 2005 去世。沉默一代的慷慨馈赠为许多美国交响乐团、艺术博物馆、舞蹈团、爵士乐队和歌剧院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民意测验表明，这一代中较年轻者是国家主要的捐助者和票友。美国美术界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在沉默一代过世后，一切将会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默一代在世者的人数日见稀少，甚至他们的去世都会变得不同寻常、极“不”沉默。埃伦·古德曼想像到一位神志清醒的医生的“死亡过程”和列出“死亡方式及死亡原因”的讣告。她问道，“那又会有什么区别?”非传统的葬礼呈上升趋势，死者的家属往往预约主持人、诗人和乐队，让逝者在人间的最后一段旅程少一点严肃，多一点温暖。不管葬礼多么悲伤，不管社会生活多么平庸，马克·罗素和比尔·柯斯比所属的这一代将最终发现反讽的意义所在，完成毕生对轻松一面的追求。

进入 21 世纪前 10 年后，老年沉默一代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

努力使破碎的家庭复原，让愤怒的政治空想家彼此倾听对方的观点，使生活变得更加公平，在乏味的生活中提炼优美。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他们将一直希望帮助他人摆脱困境——当然前提是要避免过多的批判。直到他们生命最后的时日，年老的沉默一代将始终相信芭芭拉·史翠珊歌中的那句话，“需要他人的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

膨胀一代进入中年：文化精英

1984 年 3 月 25 日的《纽约时报》宣布该年为“雅皮士年”，表明觉醒期的嬉皮士发生了惊人的转变。那时的美国充斥着狂热、节食和像毕雷牌饮料一抢而空的笑话，《新闻周刊》称之为“一种超验式的认购”。“雅皮士（Yuppie）”一词源于“少壮城市职业者（young urban professional）”。这一代中只有 5% 达到这一统计标准，更多的人符合其主观定义：自我陶醉、文化完美主义论和缺乏公民意识。

雅皮士的吃、喝、开（车）、看和听的一切都包含着对大兵一代高涨时期“神奇牌面包”文化的一种责难。他们对三美元巧克力饼干的偏好，被讥讽为伪善，但他们并不介意，因是他们制定新的文化规范，所谓什么伪善当然也必须用新的规范来衡量。对内心世界改造后，他们以自己的步调（慢步跑）着手外部世界的改革。1984 年加里·哈特试图鼓动雅皮士参与政治活动，但没有成功。他误认为他们还保持着觉醒期的心态。其实恰恰相反，雅皮士满足于浅尝辄止，让一位能够精明地迎合自己新态度的大兵一代老总统来处理国家大事。

雅皮士热持续了不到四年。1987 年的股市危机减弱了新闻媒体的兴趣，两年后其文化装备也消失了。当时这一代正在向另

一个更能反映其中年人格真貌的领域迁移。10年过后，《华尔街日报》指出，“延迟的满足突然变得时髦起来”，广播中充斥着有关家庭观念的讨论，新教堂（还有监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90年代中期的三次极具世代色彩的选举引发了一场关于上帝与孩子的大讨论，同时涌现了一大批媒体评论家所谓的“信仰政治家”、“带个人见解的预言家”、“雄辩的罗伯斯庇尔”等等。

在解体时代中期之前，美国沉迷于一幅中年拼贴画中。画中人物包括由“天赐的”第一号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来解释《万物之道》；一位美国总统在主持一次以性格为题的白宫会议中坚持认为自己从不吸烟；一名白宫发言人因为其“多嘴多舌、兴奋、弥赛亚式”的人格而受到了指责；一名举办关于“隐喻作用”夜间研讨会的副总统指控对手破坏环境；极力在学术界主张正确政治导向的人惩罚那些“不怀好意的笑”；由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激进分子转变而来的文化战士，其《美德宝典》极力鼓吹“道德教育”；前黑豹党成员不仅能做赫赫有名的被告，还能在法庭中充当评判每个人的陪审员；而“营救行动”的组织者宣布憎恨是神圣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美国参议院中一位年轻有为的议员（沉默一代）批评家抱怨道，“批评一切、无法满意、漠不关心、从不妥协。他们取笑完美，认为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却奇怪地在自己山上发现了这种特质。”克林顿总统是他们中的“典型”。人口统计学家威廉·邓恩评论他时说：“有一点自我放任，深信他和他那一代人比任何人都聪明。”

美国刚刚进入中年的公民还是心烦意乱的完美主义者。他们在面对新的人生阶段时，仍采取以往的方式：开始轻描淡写，然后（一旦开始重视）挥毫泼墨。在认为应该减小饭量之前，他们却零食不断，之后却会做出各种忏悔的姿态——并希望他人也照

他们的样子去做。

“我们不杀害婴儿，”密执安民兵运动的领袖宣称，“我们生在人口膨胀时期。”

当大兵一代的劳埃德·本特森告诉丹·奎尔“你不是杰克·肯迪尼”时，这种羞辱带有某种代际偏见：中年的膨胀一代不是大兵一代。他们并不想采取约翰·肯迪尼式的“大步前进”或“让美国再动起来”，他们将想得更远，或者让美国照顾到自己的灵魂。膨胀一代自诩为美国道德观念的中年管理员，并积极捍卫其他几代人很难想到与他们有关的价值观（一夫一妻、节俭、克制）。

当膨胀一代站在权力堡垒之外，用力敲打城门，并在入主城堡后第一次从向城外观望时，他们中年时是非鲜明的评判思想显露无遗。但是，一旦他们的征服目标不再是新闻，一旦他们必须亲自管理这个堡垒，他们严厉的人格面具将被一种荒谬的超然哲学所替代。他们中的许多知名政治家应付社会职责的方式无异于大卫·莱特曼的待客之道，蜻蜓点水般做出姿态，从不许诺太多，只要不符合他们的高标准，就概不接受。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讨论权力影响而不是实际工作上。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他们表现得缩手缩脚，仿佛尚未做好全面接手整个国家领导工作的心理准备。在90年代中期，《新闻周刊》指出“一群喜欢评头论足的膨胀一代沉浸于人生午后的冥思之中”——谁也不会对前两代人的中年生活做出如上的评论。

在整个解体时期，膨胀一代一直忙于美国文化的二度精神化及美国制度的再度神圣化。甚至在他们摧毁关于合作、忠实及友爱的旧观念时（罗伯特·普特南斥之为“独自打保龄球”），膨胀一代也在尽力恢复公共道德的新基础。许多膨胀一代的新杂志和

新闻通讯中出现诸如“共产主义信仰者、公民和公共道德”等新词汇（或重新规范“标准和范例”等术语）。“有趣的是，”埃文·托马斯写道，“看上去不顾一切创造一种新民治社会的人就是膨胀一代。这一代人的主要责任就是抛弃陈旧的东西。”“60年代的年轻人真不错，那时每人都把责任抛进风里，”约翰·利奥说道，“而更妙的是，正是这些人在90年代进入中年时，却使之成为最乏味的10年。”

今天膨胀一代的价值观念源于觉醒期。膨胀一代主导的国会的气质与60年代身穿牛仔服四处张扬的年轻人有着某种明显可辨的联系。对于纽特·金格里奇来说，“价值观念”首先是“一种区分美国的方式”。约翰·卡西奇视国债“如越战”。《新闻周刊》所称的“新粗野”反映了在激进的觉醒时期大学校园中发生了些什么。一如既往，谁叫得最响、谁能说到最后谁就拥有优势。一切都被过分地渲染了：一种碰撞便是袭击，是强暴，是谋杀、是灭绝种族。在膨胀一代的符号战中，分化容易，和解难。

1992年，当美国人选举出他们的第一位膨胀一代总统时，他的竞选口号（“笨蛋，是经济”）和统治手段表现出明显的世代特征。比尔·克林顿聪明但不专注，处理事务和问题习惯于慢半拍，而事后他会强调“快如激光”。凭借口手共用的煽情天赋，克林顿能够自我渲染，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是一般的民意测验表明，他在老年选民中并不受欢迎。像米歇尔·巴伦纳所评论的那样，克林顿能够引诱同辈的膨胀一代，却不会与他们联姻；在与其有着相同生活圈的许多人中，他的道德说教并不令人信服。作为一名成功当选总统的候选人，克林顿令许多人（包括他的同辈人）想起他这一代具有的最优秀与最低劣的的品质。

1994年共和党的冲击是膨胀一代选民们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首次选举，也是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世代山崩。在各州，膨胀一

代的州长数从 18 增至 28，这使这场为同辈人所驱动的运动可以把权力下放到各州。在众议院中，膨胀一代取得了发言人的职位，并获得了稳固的多数派的地位。只有美国参议院，作为一个礼貌和适度的小岛，还保留在沉默一代的手中。在膨胀一代控制了舆论之后，他们的首届国会赶走了寻求一致意见者，开始公开谈论盗用公款，并要求政府要么改革要么关掉。就这样，美国政府从大兵一代、沉默一代到膨胀一代依次经历了人类登月、交通堵塞到火车失事。

到 1996 年，克林顿与多尔（说客与实干家、“回头浪子”对“东山再起”）的竞选组合更新了以前的膨胀一代与大兵一代之间的代沟。本特森的讽讥已过去八年了，这两代人在生活中共同前进：鲍勃·多尔并不是丹·奎尔。在“吾辈最后一项使命上”，他是标准的“大兵”——并非身受钦命的文化斗士，也不是以当前膨胀一代口气大谈价值观念之人。多尔的同辈们过早地把领导权移交给自己的子女；现在，艾尔·戈尔说，“再把缰绳收回来是不公平的。”仅有多尔一人得到任用，这无疑是对这代人的一记耳光，表明他们缺乏尽职尽责行使权力的性格。在提名大会发言中，多尔抨击了膨胀一代精英“从未长大，从未做过实事，从未经历过痛苦，从未受过教育。”

在 1996 年的选举中，旧的代沟在解体时期又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尽管膨胀一代常常颂扬大兵一代是多么伟大的治国者。中年大兵一代入主华盛顿后全力确定一种万能的经济学，希望根除贫困、兴建发电厂（如新闻片《时代在前进》），而中年的膨胀一代则希望改革文化的方方面面，决意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安抚人们的精神（像斯蒂夫·马丁对《大峡谷》所做的深思）。

中年大兵一代认为公共资金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巨大能源，而中年膨胀一代却视其为一种麻醉剂，只能把问题弄得更

糟。1995年的一份全国纳税者联盟的报告显示，国会中最节俭的50名议员中有三分之二是膨胀一代（六人为民主党），而在最奢侈的50名议员中，只为三分之一是膨胀一代。

大兵一代相信“意识形态的终结”和专家政治论的力量，而膨胀一代又重新找回了意识形态和精神性的力量。前者并不是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他们只想尽快让“戴夫”或“福雷斯特·冈普”来统治。而后者，正在创建一个基督教联盟而非新政联盟。大兵一代的名声是行优于言，而膨胀一代正相反，言优于行。

中年大兵一代的权力精英包括精于发明和重新组合的科学家和制造者，而膨胀一代的精英是《新闻周刊》所称的“文化精英”，一种点缀着“会谈头脑”与“象征性分析家”的新“超级阶级”，他们擅长于提出和重新构造思想。

大兵一代“注重肯定”，而膨胀一代则不断“进行否定”。面对进攻只是单纯防守，证明是无效的；一直持肯定态度的政治家只会一败涂地。大兵一代的政治对手不久就会变为朋友，而膨胀一代的敌人却不会。

大兵一代选民一直忠诚于自己的政党，而膨胀一代在逐渐拥护候选人后，又会很快将其抛弃，如果不动员，他们懒得连票都不想投。在投票站，他们偏向于说教者（如杰西·杰克逊和帕特·罗伯特森）和板起面孔的倡导者（如杰里·布朗、保罗·特松加斯和帕特·布坎南），这些人从大兵一代选民那里得到的选票却少得可怜。

在90年代初之前，当膨胀一代最终从大兵一代手中夺过国家大权时，许多希望彻底改变现状的人与（大部分都投它的票）的民主党展开了争论；自那以后，他们中的革命者却与共和党争论起来（大部分都投它的票）。从1987至1994年，《时代周刊》与《镜报》进行的联合调查表明，所有选民中“说教者”翻了一

翻，而新增者中有三分之二来自膨胀一代。在90年代中期之前，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膨胀一代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两倍多。这种变化主要反映的不是他们的政治观念而是个人观——它已经完全确立并有一种自我安全感，非舆论、法令及社会关系所能动摇。

“他找到了新的行走方式……他正在返回自己的根基。”阿兰·杰克逊这么唱道，他属于“回家”的膨胀一代。在觉醒时期，膨胀一代的政治家几乎全部来自沿海、城市和世俗阶层。在解体时期，克林顿、戈尔、金格里奇和许多新兴共和党人表现出一种南方、农村和福音新教的倾向。“价值观”不是“附加条件”，贝内特坚持认为，“它们就是实业。”在增加了一种对家庭的新关注之后，“家庭价值观念”六个字成为推行所有中年膨胀一代新议程的百宝箱。在促进社会心态转变的过程中，膨胀一代深信随之而来的将是公共机构的新生。“关键在于主导文化，而不是领导政府，”金格里奇说道，“因为如果你改变了对话的大方向，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种在中年时期对价值观念的关注使福音新教和新时代的信徒人数陡增。在膨胀一代成员中，三人中就会有两人说，他们感受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老年膨胀一代中有这种体会的人还不足一半）。还是在高涨时期，属于大兵一代的无神论者马达林·默里·奥海尔曾取消公立学校的祈祷；现在她的儿子，作为一名信仰复兴者，却在努力恢复这种宗教仪式。只有1%的膨胀一代说，他们确实不信上帝，但80%的人认为没有必要非去教堂不可。就在这些谈论进行之时，膨胀一代去教堂的次数正在减少，而大兵一代和沉默一代的人数却很稳定。中年美国人纷纷脱离主流教堂，转信正统派基督教派、神授教派和分离出去的救世主教派。他们穿着随便但不乏民族特色，颂歌生动活泼，布道富有情

趣和激情，掌声井然有序，其他仪式都源自复兴运动。膨胀一代还为某些旧词汇，如神圣、精神、灵魂、罪恶、羞耻和撒旦，增添了一些新含义。论述天堂、地狱和身外体验的书成为畅销书。1993年仅关于天使的书就售出500万册。在90年代中期之前，《厄特尼读者》①讲述了“撒满教历程”适合于30、40和50岁的人，而摇滚音乐会则适合于十来岁的青少年。慢慢地，两大阵营开始走向汇合：福音教转向“虔诚”疗法，而新时代在发觉家庭价值观念。

中年的唯心论者们正在重组美国的商业文化。在90年代中期之前，半数的小商人宣称自己获得了新生，而大公司老板则开始追求所谓的“文化革命而非产品革命”。“价值”（传统工艺、耐久的品质、正确的政治）已成为90年代的营销口号。膨胀一代领导的公司正在将政治与产品混合在一起，采用《成功的七条精神法则》并趋向于托马斯·查佩尔所称的《商业灵魂》。“要想生意兴隆，必须多行善事，”斯蒂芬·科维建议道，“要想事业成功，必须首先从做人开始。”随着膨胀一代企业家们读《耶稣：高级主管阶层》和积聚《思想财富》，他们的同辈人认为他们所追求的产品是好的，因为它们是由善男善女制造的。一家信誉良好的公司的名字可以出现在《牧羊人指南》的宗教黄页中，而一家声名狼藉的公司最终会被列入《全国抵制新闻》的124页名单之中，成为众矢之的。

许多美国的大公司不再是《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人》，而换成膨胀一代的装束，成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称的“穿斜纹织棉便服的人”。让这些新公司总裁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培养了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并通过共享的价值观念进行管理。即便如

① 一种美国期刊的名称

此，解体期还是对职员对公司的忠诚有所破坏，这使得许多中年“开领”工人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职业远比对自己的老板忠诚。失业者往往变为自经营承包商或顾问，以便掩饰自己的失业者身份。不管表面上如何，膨胀一代正在寻找简单一些、可在家从事的工作，以便能多抽出一些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让自己轻松一些。

解体时期膨胀一代主导的家庭预计将会经历一次新生，同时性别的角色将会融合在一起。中年妇女在回忆自己大兵一代的母亲时，认为她们不够自信；而中年男子认为自己的父亲不够周到。现在他们正在采取措施，纠正自己和别人的弱点。

中年膨胀一代妇女羡慕克拉丽莎·平克拉·埃斯蒂斯所称的“野性妇女”，她们“挺身而出，努力奋争”。这包括反媒体改革运动的“母狮”、女同性恋和生态女权主义者；拥有枪支和打猎的女性越来越多；中心地带的夫妇约占激进民兵成员的三分之一；无数书写更年期、女神和“女圣贤”主题的作者。妇女研究项目的新维多利亚派对解放的兴趣少于惩罚及色情审查。凯瑟琳·麦金农将后者视为“全部妇女悲哀的根源”。《纽约人》所称的极端女权主义运动已经超越了沉默一代争取男女平等的改革运动，进而相信：妇女更接近于自然，因而比男子优越。中年妇女已作为一种政治主宰的形象出现，为两大政党勾划选票，使州女议员的比例增加了三倍。有时，膨胀一代男性候选人的妻子们让选民们觉得，应该让她们而不是其丈夫来参加竞选。对中年选民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妇女的自由度明显高于男子——但同样对旧的公共秩序不满。

膨胀一代男子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妇女同辈的介入。如果没有第二收入，就生活水平而言，他们大部分家庭将低于中年时期的沉默一代。许多膨胀一代妻子的工作比她们丈夫的工作稳

定、工资也高——这一点令大兵一代的男子苦恼。作为父亲的膨胀一代中有一半人认为自己优于父辈——这种“近乎愤怒的悔意”证明（全国父权运动的唐·埃伯利的话）“膨胀一代与其父亲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膨胀一代男子努力扮演一种既适合于教堂又适合于家庭的后觉醒期男性，从而否决了大兵式的男子气概和沉默一代关于《新闻周刊》所谓的“神圣男子”的新性别定义。他们聚集起来，返回荒野，举行“百万人游行”，参加在橄榄球场举行的手拉手福音教“守信人”集会。这种新男性文学包括卫·巴里的“伙计”文化以及性别精神的神话创造故事。

在种族问题上，膨胀一代正在重新确立一种传统的道德意识，主张一种强烈的新精神。从穆斯林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本杰明·查威斯和克威西·莫夫姆，膨胀一代正在拒绝成为诺托查克·沙恩奇所谓的“白人走过的树木”。斯蒂芬·卡特等价值观自由主义者攻击《非信仰的文化》，而保守主义者如克拉伦斯·托马斯、阿姆斯特朗·威廉斯和阿兰·凯斯等则要求对谢利·斯蒂尔所称的《我们性格的内容》进行新的审查。膨胀一代黑人同意觉醒时期的法律和项目帮助了他们个人的观点，但那同样导致了一种贫困的文化，进而摧毁了他们的社会。比起他们的白人同辈来，他们更趋向于复兴信仰和赞成学校祈祷——同时常常为非洲裔美国人的领导核心已从教堂转到了政府而感到遗憾。当他们逐渐从传统的民权组织中退出时，膨胀一代黑人像沉默一代那样强调多元化或从白人纳税人和私人捐助者手中募捐的可能性不大；相反，像一名穆斯林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心想“还民权运动黑色成员一个完整的头脑”。有关种族问题的新讨论的内容正逐步从争取程序权和机会平等转向强调家庭、制止犯罪和挽救孩子等话题。

如果矫正公民道德需要对儿童的自由加以新的粗暴限制，那

么各地的膨胀一代——从内地城镇到城市居民——已完全准备就绪。迄今为止，儿童世界是这一代中年人的关注焦点。膨胀一代在这方面所采用的严厉、干涉和追求完美的方法明确表明：随着解体时期的继续，社会其他方面将逐渐发生变化。

进入新的千年：美德论者

随着膨胀一代完全步入中年，他们的集体心态将变得更加苛刻、势利和严厉。由于本性和习惯，他们仍将不肯以常规或礼貌来改进社区生活。带着中年人的信仰，他们将变成E·J·迪翁所称的“民务自由主义者”和“民务保守主义者”，一心想恢复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为膨胀一代父母和领袖们在跨越千年时留下一个谜：如果一代人自己都无法实现步调一致，怎么能够指点别人如何如何？正在走向老年的膨胀一代做出的回答是，把其觉醒时期关于个人成长和真实性的信条与新时期所必需的社会利他主义思想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许多人将重新确定自己的工作，以强调其感召和宣传的作用。美国将看到更多的纽特·金格里奇所谓的“说教政治家”，即贝内特所称的“灵魂建筑”的公共工匠。

21世纪前10年到来后，膨胀一代将开始探索政府的新角色。在解体期前半部分，膨胀一代的保守主义思想得以重新确立，而在后半部分，膨胀一代将重新举起反保守主义的大旗。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民主党在维护尚未得到恢复原先崇高形象的臃肿的公共机构方面犹豫不决，共和党便趁机对膨胀一代成员发起强大攻势。同样，执政的共和党也必须捍卫那些相同的制度，而膨胀一代领导的新反对派将支持“职责民主党”联盟的复兴，以对抗基督教同盟。像《平等的终结》中的米奇·考斯那样，膨胀一代中的自由主义者将计划扫除“伟大社会”的

残余，换之以在物质上不很乐观但道德上非常严格的某种东西。但不管谁赢得高位，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获胜方的许多支持者将会问，在这样一个思想动荡和政府工作举步维艰的时代，高位是否是他们真正所需要的？难道战术上的失误不能导致战略上的成功？对于失去权力的膨胀一代信徒来说，解体期后期将成为一个重组和谋求长期优势的大好机会。

在文化战争前线，膨胀一代中的共产主义信徒——思想自由的和保守的——在文化战争中将逐步胜过自由意识论者。“脑袋尖尖的”的拉什·林博们的听众将转向羞耻治疗专家劳拉·施莱辛格们，主张自由企业的斯蒂夫·福布斯们将不敌具有家庭观念的格里·鲍尔斯们，后者坚持“没有道德影响的市场”将只生产“垃圾”。膨胀一代的新生力量将把矛头对准马塔·贝尔斯所称的《我们灵魂的漏洞》及美国解体期的“文化剧”中“美丽和意义的迷失”。约翰·利奥所称的“上紧弦的清教徒”将抨击不轨行为，因为他们认为整个社区受到了目的不正确的个人愉乐的威胁。为提醒社区拯救自己，抵御人类的罪恶，膨胀一代将继续提倡某些具有净化作用的灾难事件，如“地球变化”运动所预言的生之痛苦。远在觉醒时期，任何反常天气都促使膨胀一代预测新“冰期”即将到来；在今天，它会促使他们预测全球气候即将变暖。查理斯·克劳塔默问道，“有没有一种原始宗教可与‘环境保护主义’相匹配，把自然灾害归于人类的过失？”

持各种意识形态的膨胀一代美德论者将越来越不相信任何没有伤害的道路。他们的处方不会是一粒糖衣胶囊，而是一剂通便的补药。在对付美国尚未满足的需要时，膨胀一代将坚持（卡尔·津斯马斯特）“我们轻易地放弃了舒适与温柔的应对措施”，以及（用德克萨斯州州长小乔治·布什的话说）“纪律和爱携手前进”。从身戴手铐脚镣的囚犯到“减肥面包”似的监狱伙食，以

及受害者面对罪犯的法庭，膨胀一代将再次让罪犯受辱，强调以罪量刑的“表达式公正”。据《经济学家》报道，“膨胀一代中有许多人曾为争取和平和爱情游行示威，而现在希望看到谋杀者被注射毒药、被枪毙或被油煎。”他们届时将宁肯赶走穷人，而不想安抚他们，采取约翰·凯斯特所建议的“生硬的工具”和“粗鲁的解决方式”。“截肢是一种粗暴的疗法，”他说道，“它却能去除坏疽。”

膨胀一代的华丽辞藻会带来许多分歧与争论，却几乎不会导致大的制度变革。国家政治将变为一个论坛，就那些即使是最顽固的信徒也明白是无法颁布或执行的新提议展开激烈争论。当“超级阶级”为统一税制而争论时（强调简洁的优点和道德功过），将受到来自认为自己不打算追求一种富裕生活的不服权威者的阻碍。同样，膨胀一代国会将设法区分关于联邦预算和关于预算本身的争论。然而这是一种徒劳，不会导致任何根本性改变。由于无法确定富人与穷人谁更坏，膨胀一代将对双方一起开刀，并对他们做出象征性（较小的）惩罚：一方面，对一些被认为是过高的收入进行征税，另一方面，一些没有价值的福利将被取消。结果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大量陈旧腐朽的公共部门被剥夺了生存根基，但尚未出现任何替代物。

影响这些政策性争论的将是一些普通人物：流浪的哲学家兼职业者，他们从事过各种职业，只有通过复杂的个性曲线才能将他们集合在一起。流行观点将由诸如艾尔·戈尔、威廉·贝内特和比尔·布雷德利的作家－政治家提出，他们把宗教精神与基层行动主义融合在一起。为了寻找基本、原始和简朴，有钱的膨胀一代将前往寺庙庵院，乘坐爱斯基摩人的皮划子，背上行囊走入猩猩保护区。没钱的膨胀一代将返回农场，或者利用安息日时间在内地小城镇辅导孩子。回来之后，他们会宣布恢复了精力与体

力，并极力呼唤国民的良心。许多宣扬诚实和牺牲的膨胀一代的个人生活仍将以自我为中心。像比尔·盖茨（他那座生态友好式大厦有一个大车库，可以盛得下20辆轿车），文化精英们一方面花钱大手大脚，另一方面却装出生活节俭的样子。

在因特网和其他媒体发明的协助下，膨胀一代将在精神和道德领域而非物质和制度范围内挖掘新概念。在富足的城市中，膨胀一代在家中就可以办公，联系日托合作公寓，办理食品送货，进行电话购物，接触其他生活基本设施。这是一种普通人无法想像的新生活。生活远离父母和子女的人将努力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正社区。调查表明，无论与比自己年龄大的人相比，还是与年龄小的人相比，今天的膨胀一代不很重视整洁。在21世纪前10年，他们将偏向于有机、真实和无序的生活风格。他们将拒绝老式汽车、人行道、正面车库、大草坪、四四方方的城郊规划、碎石车道、前厅走廊、成片的橡树和乡下村落（一些人称为“旧式新城”）。他们任凭自己的家与城市带上一种苍老的面容，他们将让大兵一代披荆斩棘清理出来的公用场地再度长出鲜花和野草。

膨胀一代对美国现代生活深恶痛绝。这种态度正日益驱动他们的价值观念。大兵一代喜欢自己的周围充满有规则、合理和进步的事物，而膨胀一代则偏爱独特、神圣和传统的东西。由于膨胀一代正在重新界定进步的含义，今天的卢德派① 式国会将在某些方面对21世纪前10年的美国国会产生影响。而且他们已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阵地开始抨击大兵一代的旧标准，称后者测定的净收入额（将离婚律师和工业污染也算入GDP）比实际数额要高，而对某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保护物种和儿童德育算作零）的测算却降低了。为取而代之，贝内特制定了“主要

① 指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自发工人运动参加者。

文化指数”；克林顿政府的商业部采取了“国民福利总额”措施；自由主义智囊团推出了“实际进步指数”，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自70年代以来下降了40%。

从物质上讲，大多数膨胀一代承认他们的中年生活比不上他们的父母。40岁时，普通的大兵一代工人（在高涨时期）比前代人在同年龄段所拿的工资实际上涨了三分之一，而一般的膨胀一代工人的工资并未出现实际增长。他们的自负情绪却丝毫未减：在90年代，五分之一的膨胀一代认为自己的事业优于其父母，九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在21世纪前10年之前，上述观点只会变得更坚定。走下坡路的膨胀一代将“带着一份优雅与自尊面对着生活现实。”凯蒂·巴特勒写道，“如果让自己选择，而不是效仿大多数人，没有钱可能会成为一种更深入了解自己生活的方式。”膨胀一代在选择时不受世间标准的影响，而且取得了成功，他们不服从权威者，都要对信息时代技术进行重新考虑。在《简单生活》和《吝啬鬼公报》等杂志以及“小气妈咪”和“少用东西”等运动的推动下，膨胀一代将在《幸福》所称的“非主义”中发现精神，颂扬他们将来不会消费的任何东西，从不含硝酸盐肉到无色汽油。对很多人来说，21世纪前10年将是摆脱技术玩具、抛弃工作迷和“减速”的时候。

在家庭和财政事务上，解体时期后期将是一个镇定阶段。膨胀一代将不得不向他们的大兵一代父母说再见，而这常常发生在自觉醒时期就开始的地区分离和笨拙的和解企图之后。这种和解努力显露了双方的复杂动机。父母的去世将使膨胀一代面临一种让他们这个年龄段人感到尴尬的现实：他们的生存依靠离去了，而剩下的（遗产）却与他们想像的有一点距离。由于膨胀一代大力提倡将全部收入转为公有基金的做法，“节俭”将成为解体期后期中的一个重要口号。然而在执行上述做法的过程中，这一代

人仍将遇到麻烦。一些人将抵制为获取利益而约束自我的观点，而也有一些人，看到在中年同辈人的操纵下，股票与债券价格飞涨，会认为市场繁荣将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他们将减少自己的存款。膨胀一代将继续支持有利于他们父母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同时相信自己退休时，这两项福利项目必将破产。在21世纪前10年，关于他们的老年物质保障将会受到上述威胁的事情，他们中的领导者会不停地谈论，但提出的实际解决措施却很少。

这种陈旧的扭曲的超然态度将逐步让位于一种新的不和谐的焦点问题。膨胀一代将最终同意自己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及国家面临的各种艰难选择负全部责任。走向老年的膨胀一代将不断地“振作起来，重新使自己成为利他主义者和苦行主义者”，就像《滚石》杂志在1990年所劝导的那样。“不过，我们不要作假。”该杂志告诫读者道，雅皮士的人格面具仍在它的后视镜中。或是至少像希拉里·克林顿建议的那样，“成功之后再伪造。”在21世纪前10年之前，这一代将没有心思伪造任何东西。“无法逃避即将到来的对抗。”《天主教之眼》在1992年宣布，“系紧你的安全带——这将是一段艰苦的旅程。”

第13代进入年轻时代：壮志凌云

美国各大学1983年入学的学生有一个新标签，这是第一次对这代正在步入成年的一代人做出的正式欢迎。在他们毕业时，美国教育办公室出版了《危险中的国家》一书，把国家的学生人口描写为“涌起的平庸之辈”，他们的学识“将不会超过、不会赶上、甚至不会接近他们的父母”。这种责难一阵风似地扑来（以阿兰·布卢姆的《美国思想的终结》为基调），许多报告、研

究和论著指责美国的新青年缺乏思想、精神空虚、愚蠢。在他们的《十七岁能知道什么?》中，黛安娜·拉维奇和切斯特·芬恩回答道，“知道的不多”。在29个学科上分别给年轻人打分，他们的成绩是20个“不及格”、2个“差”和一个“中”。

在解体期早期，刚毕业的年轻人听到老作家和专栏撰稿人称他们为“一无是处的一代”、“疲惫的一代”、“野兽的一代”、“眼高手低的一代”和“一支巴特·辛普森军队，装备精良但有危险”。罗素·贝克指责他们“思想毫无定性”、“（他们）对于地球上令人感兴趣、恼火、愤恨、愉快、着迷、发笑和疯狂的所有事情都无动于衷。”某些以年轻人为主题的影片（《早餐俱乐部》、《圣埃尔莫的大火》、《费里斯·比勒尔的假日》及《里奇蒙高速公路上的夏令时》）所描写的青少年符合这些大人们所做的判断。在《调大音量》中，克里斯琴·斯莱特的哈德·哈里称自己的同辈人是“为什么要麻烦的多数一代”。就像小说作家大卫·莱维特所说的那样，“我这一代完全愿意承认自己可鄙的品质。”

在90年代初，当韦恩和格特唱“我们毫无价值!”、贝克唱“我是一个失败者，宝贝”时，美国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牢骚满腹地称自己为“X代”。像很多青年新文化一样，这一称呼是流行衍生物：有人写了一本关于60年代英国摩登青少年一代的书，比利·埃道尔用这本书命名自己的乐队，这一称呼随后又变成加拿大年轻人的标记，接着杜格·科普兰对这个名字做了界定。在1992年上映的电影《马尔科姆·爱克斯（X)》的影响下，“X”标记出现在黑人青少年的帽子和T恤衫上，之后，南方的白人青少年也开始效仿（“你穿你的X，我穿我的X”），不久这一标记便随处可见。

抓住这一新发现，媒体的炮火开始把带有X的所有东西描述为狂热和垃圾。而在年轻人自己的歌曲和影片中，他们保持着

儿童时就形成的自贬的面孔，并带有些许恶意的讽刺。“我们大概是自新教改革以来最差的一代，”《大都市》中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是这么说的。当苏巴鲁矫揉造作地出售自认为的朋客轿车时，广告失败了。别人要他们去购买根据自己的文化制造的车时，他们回绝了。“他们靠近时，你怎么办？”这是《警察》的主题曲。“坏小子！坏小子！”罗德曼在《我行我素》插言道。

“还没有人搞清楚，”阿兰尼斯·莫里塞特在她的专辑《浑醉的小皮尔》中这样唱道。的确，她的许多同辈人拒绝对自己一代做出界定。今天的年轻人常常认为自己的朋友圈富于多样化，无法用集体概念加以概括。对他们来说，X代表着无、一切或（如库尔特·科贝恩所唱的）“那么好吧，随便什么，无所谓。”与本世纪诞生的其他几代人相比，这代人缺乏凝聚力，经历广泛，种族多样，文化更加解体。这才是他们集体人格的中心。从音乐、政治、学术到收入，今天的成年人只以分歧来定义自己，对这代人的认识无法通过其核心而应借助琐碎的细节。

随着90年代的前进，年轻人越来越想控制自己的形象。他们把“X”从华丽的《贝弗利希尔斯90210》中转移到分裂的《麦尔罗斯地》和《朋友》的虚构社区，其演员活像收看其他节目的观众。大部分情节描写年轻人不负责任、独来独往、对待性和工作无所谓、总是为鸡毛蒜皮小事纠缠不休、与老人和儿童的世界格格不入。在电影中，年轻的导演探索了在充满了性剥削（《小子》、《我自己的爱达荷》）和冷酷暴力（《天生杀手》、《黄色故事》、《威胁II社会》、《注定的一代》）这样一个文化分崩离析的世界（《男孩与强盗》、《墨西哥流浪乐队》、《地铁里的另一个女孩》）中，在一种令人失望的年轻人的经济状况（《小职员》、《现实之痛》）下及看上去没有出路的生活（《懒鬼》、《单身汉》、《晕眩与迷惑》）中，同辈人的杂乱与异化（《性、谎言和录像

带》、《身体、休息和动作》)。这些影片常常没有开头或结尾，没有任何“正”事可作，也没有不是动画的良师益友，没有一种不像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所称的“多余和强横的”的环境。他们有的只是多多的毒品、酗酒、暴力、漂泊、无聊、滥交、社会动乱和个人的无所适从。

大多数老一代人不看这些电影，所以他们对“X”的印象主要来自密切注意年轻人心理动态的主流媒体（《新闻周刊》和福克斯的体育广播），特别是广告。市场商人关注年轻人，不是因为他们有可花的钱——在所有年龄段中，他们平均数最少——而是因为他们填补了产品选择的一项空白。今天的年轻人忠诚意识不强，科普兰称之为“显微忠贞”。“他们的兴头一过，就完了。”一位谢尔伦-力曼气垫运动鞋分析家说。在广告商们寻找正确的新潮公式时，原本已经受到打击的老年人不断看见30秒的新闻，运动亢奋、口齿不清、崇拜肉体的年轻人为寻求原始的乐趣而去翻越蒂顿山脉。年轻人可能买啤酒，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烂醉如泥。

“‘X’进入了超级市场，”科普兰在1995年宣称，“我要说‘X’结束了。”民意测验表明，年轻人中只有10%愿意拥有这一字母标记。从科普兰到普尔·加姆的埃迪·维德，被公认的青年文化领袖们声称没有兴趣为任何人作代言人，不过也许同意作家詹尼弗·林奇的观点：“或许，我确实无话可说。”整个X代的人格面具看来是混杂的，没有人想与之等同，就像与一名失败者彻底切断联系。

膨胀一代主导的媒体组织的X代论坛往往演变为狂妄的讨伐，因为他们更热衷于确定自己在觉醒期的青年时代更具真实性。1994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复兴，使膨胀一代大谈特谈以前的音乐节是如何如何的高雅、不像现在这样商业气十足。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年的自恋主义者的夸大其词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很好的把柄。“膨胀一代终于长大了，”凯特·菲利翁说道，“并不是我们抓住不放，而是被逼无奈之举。”听到许多第13代成员说，跟随膨胀一代进入青年就像进入这样一个主题乐园：在他们之前，这个乐园已经遭受过暴徒的洗劫，每个商业标识中融入了一些身在远处的公司总裁的设想。“要爱情，不要战争/在我听来如此荒谬。”“极端”乐队这样唱到，确认了美国最近的代沟。

为了给今天的年轻一代定位，要忘掉X，超越流行媒体，忘掉膨胀一代，关注他们在美国历史上的位置——第13——以及第13代在这一年龄段与抚养他们长大成人的沉默一代有什么不同。

沉默一代年轻人觉得有必要摆脱守旧思想的困扰，而第13代觉得有必要在动乱中确立自己。沉默一代是美国移民最少的一代，他们渴望多样化；而第13代则是20世纪移民人数最多的一代，渴望更多的共识。沉默一代继承了记忆中大部分主张统一的年轻文化，而第13代则生活在极具多样化的小文化群中。

沉默一代是美国历史上结婚最早的一代，其婚前性行为、流产和性病的发生率很低，而第13代则是美国历史上结婚最晚的一代，青少年性行为、流产和性病（包括艾滋病）发生率最高。

沉默一代上中学时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嚼口香糖和加塞儿，而陷入困境的第13代的形象参见电影《小子》。在这部影片中，成人世界消隐了，思想麻木的青年人寻找暴力、毒品、性和金钱。沉默一代青年时期的年被捕率是13：1000，而第13代则是117：1000。第13代中每六人就有一人认识某某被枪杀的人。

沉默一代成年时相信甜蜜的卿卿我我，如猫王所唱的，“只

想成为你的玩具熊”，而第13代成年时相信残酷的现实，像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写的那样，想成为“地地道道的赢家……汤姆·克鲁斯所演的英雄人物”。沉默一代年轻人所想的是《伤心客栈》，而第13代所想的是《壮志凌云》。

“像我们这样优秀的父母怎么会生出如此糟糕的子女?”威廉·拉斯伯利问道。我们不妨这样看这个问题：沉默一代出生在危机时期，成熟于高涨时期，而第13代出生于觉醒期，在解体期步入成年。

在沉默一代长大之时，饥饿的社会希望投资，而当第13代成人时，满足了的社会希望花钱。在沉默一代成熟的年代，个人主义受到压制、经济发展得到确保，而在第13代进入成年时，个人主义大受欢迎、经济成功垂手可得。沉默一代年轻人在公司里一步步往上爬，纷纷前往华盛顿任职于“新边境”和“大社会”，而希望拥有私人企业的第13代是愿意成为公司高层主管的沉默一代的两倍，乐意成为企业家的第13代是愿意在政府中就高位沉默一代的四倍。沉默一代年轻时，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程度逐渐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使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去影响他人，去说教。而对第13代来说，情况恰恰相反，自己的期望被人出卖。沉默一代成熟时，正值《不需真正努力就可获得商业成功》一书出版，而第13代面临着《房租》所象征的严重衰落，他们被钉在了生活最底层。

世代经济学验证了这点。解体时期的第13代，特别是男子，遭到了经济萧条的打击。从1973年到1992年，年轻人的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了28个百分点，超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情况。(在这20年中，年轻人收入狂降的同时，老年人的人均实际收入却上涨了26%。)在1969年，25岁以下的全日制工人的平均收入是全日制老工人的74%；而自1986年以来，这一数字从未高于55%。在

觉醒期，有工作的年轻家庭之主中只有8%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是18%。尽管年轻人的经济状况堪忧，《贝弗利希尔斯90210》式的富足形象（小轿车、彩电、唱盘机和名牌皮衣）却紧紧包围着第13代。社会学家杰拉尔德·巴克曼所称的这种“早熟的影响”弊大于利：使年轻人习惯了接受父母资助的奢侈生活，而他们自己却负担不起；老一代认为，如果年轻人不好好干，只能是他们自己的过失。“穷人还是穷人，富人仍旧发财，”康科里特·布朗德在歌中唱道，“就是这样，人人都知道。”

对于在经济和公共生活中努力奋斗的一代来说，宿命论是一种生存技巧，它使落破者得到安慰。他们用它把生活分隔起来——工作、家庭、朋友、文化、娱乐——把其他一切圈在外边，让任何损害无法扩散。不像膨胀一代，第13代无法节省精力成为“合群”的人，将一举一动与某种核心自我联系在一起。相反，他们一般以标准人的形象出现，自行处理每件事。第13代的宿命思想在其犯罪观中表现得最充分。解体时期年轻人的犯罪率已经低于觉醒期（膨胀一代）的高峰，但公众对犯罪的容忍程度却大大下降。膨胀一代是美国历史上最能辩解和逃脱犯罪的一代，第13代则是受到监禁人数最多的一代。大约三分之一的第13代黑人男子进过监狱、受到缓刑或法庭监督。今天的罪犯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无法挽救的、只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从杖笞到严酷的死刑。但在所有解体期的各代人中，第13代对待罪犯的态度最为严厉。如果你犯了罪并被逮捕，顺理成章的是，不要埋怨你将遭受的一切。

冒险对于美国历史上最踊跃的赌徒一代来说非常自然。作为网上体育打赌者、定期购买赌博彩票者和狂热的酒吧赌博游戏者，现在的第13代正处在大多数人喜欢赌博年龄。由于无法保证稳扎稳打、循规蹈矩，相信未来的做法定会有所收获，第13

代往往认为世界为彩票市场所驱动，一个人要么大赚一把，要么什么都不是。他们营造出一股自我作主的固执风气，富有或者贫困跟美德无关，主要取决于能否把握时机、是否具有说服力和运气。人所得到的就是所得到的，与应得或不应得没有必然联系。

他们的约会和婚配方式同样反映了在衰落中寻求冒险、在混乱中寻找模块作用，在老年人不断的是非评判中寻求从事有效的事情。沉默一代年轻人认为性生活是欢欣的，婚姻是浪漫的，女权主义是惊人的创举，而第13代则人造性是危险的，婚姻是电影《圣埃尔莫纵火案》中人物所称的“全是为了钱”，男女平等是一种在一个求爱仪式遭受破坏、家庭分裂和丈夫不可靠的世界中的必要生存工具。以前的女权主义者辩论递埃娜·勒克斯所称的“富足与成功问题，而非某些严重问题”，她们的第13代继承者们更关心眼前的正当防卫（针对艾滋病、约会强奸和街头犯罪）和长远的正当防卫（针对那些可能变得不可靠的家庭靠山或可能抛弃家庭的潜在配偶）。

作为有性行为年龄最小和结婚最晚的一代，第13代经历了长期具有性行为的单身生活，面临着艾滋病的威胁。他们一直是有关堕胎问题争论的焦点——首先作为美国历史上堕胎次数最多的一代所生的婴儿，后来是作为面临着“选择”究竟是否堕胎的未婚已孕妇女。难怪第13代对意识革命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幻想着六七十年代提供给膨胀一代没有后顾之忧、轻松愉快的性行为，同时痛恨那个年代造成的经久难忘的伤害——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年代的大人们最不想来到世间的婴儿。

对严酷现实的相似警觉以及对待危险的不安构成了第13代的种族观。他们在解体时期进入成年，但此时的社会只允许制度，但不准许个人有种族歧视行为，这恰恰与沉默一代在高涨时期遇到的情形相反。对于沉默一代年轻人来说，在上中小学、大

学和择业方面的积极行为是他们追求的一个良心方面的目标。他们自己并没有面临这种抉择，后来却宣布这适合他们的孩子去做。对于许多第13代成员来说，种族配额只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制度赌场中玩的另一种游戏：如果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喜欢它；否则就不会喜欢它。第13代至多把这种配额作为一种血统规则来维护。"错上加错不会纠正它，"索拉加修女说，"但肯定会使双方变得势力均等。"

尽管常常被指控为种族歧视上升和攻击性犯罪，包括90年代中期的多次黑人教堂爆炸案的凶手，第13代仍是今天各代人中种族主义言行最少的一代。当然，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在对待其他种族的问题上能比得上第13代：支持他种族，选举他们，与他们为邻，与他们的成员约会、结婚或者收养他们。一代过后，美国的黑人与白人的婚姻数量增加了三倍。但第13代的"色盲"不足以团结为一个整体。他们真正面临的多样化问题不在于种族或民族，而在于经济和家庭：年轻的黑人职业者同其白人同辈们过得差不多一样好，而未受过教育的第13代黑人的情况要比一两代人之前差。内地城市中将近一半的年轻黑人没有全日制工作。

政治调查表明，比较而言，第13代有些保守，不很自由，比老一辈或与他们在相同年龄时相比更有独立性。"巨变后，"詹姆斯·格拉斯曼写道，"年轻人现在构成了共和党人的大多数，而民主党已变成老人政党。"除制度衰退之外对其他一概不知的第13代对那些宏大的政治发展计划持极度的怀疑态度，并认为它们只会增加美国的赤字和社会混乱。从刑法到民法，从公立学校到联邦政府机构，在许多第13代成员的眼中，政府是一片沼泽，过于复杂，过于依赖于特殊利益，意识形态思想过深，无法简单地处理事情。在一个政治犬儒主义与日俱增的时代长大的伊安·

威廉斯指出“我们目前正在从犬儒主义转向无动于衷”。当电视上播放 MTV《好像我们在乎似的》无力表现塔比萨·索仑的同辈也发挥一些作用这一主题时，数百万被该广播方称为“不通电”——完完全全不参加公共生活——的人到了选举年龄。对许多人来说，不选举已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选择。

第 13 代中每四人就有三人不相信政府能够照顾他们的基本利益。就像他们看到的，他人得到福利，而他们交钱。在加利福尼亚，根据“第 13 条议案”，年轻的新户主比起拥有相同房屋的老邻居来，要多交几倍的财产税。在弗吉尼亚，一对月收入 3 万美元、拥有一座价值 10 万美元房子的 30 岁的年轻夫妇所交的各种主要地方税、州级税和联邦税高达八千多美元，而条件相同的 60 岁老夫妇一般一分钱都不用掏。解体时期的几乎每一项有关税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政策提案都提议把更多的钱从年轻人手中转向老年人。与膨胀一代相比，第 13 代更不相信，当他们年老时，现在交的钱将对他们有所裨益。

对下一个千年期的调查表明，更多的第 13 代认为，当他们退休时，UFO（不明飞行物，飞碟）仍会出现而社会保障却不会再有。这样他们公民利益将出现下滑：他们不管不顾，所以他们不投票，所以他们的利益遭到践踏，所以他们不管不顾，所以……

在表现集体精神方面，许多第 13 代不喜欢表决，而是亲自动手参加志愿活动。他们相信，社会的变革不是通过总统令或“百万人游行”而是借助老百姓的日常活动实现的。第 13 代读报（在这方面他们只有沉默一代在相同年龄阶段时的三分之一）时，许多人跳过国家新闻，直接读地方和个人版。当被问道，是否认为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而不仅仅是他们所居住的城镇时，30 岁以下的美国人中只有 38%明确表明同意，而 40 岁以上

的人则高达54%。今天的年轻自愿捐助者更多的是通过小型地方慈善团体，而不是大型慈善机构，他们中间既没有推行改革运动的领袖，也没有牟取暴利的中间商。比起老一辈们，第13代更相信个人的小小善行，而不管有没有人喝彩或注意。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曾把他们这代人的社会态度比作“孤胆骑警”：作一件好事，留下一颗银弹，然后离开。

进入新的千年：疲惫的一代

《韦恩的世界》中的麦克·迈尔斯说，他在21世纪的“伟大目标”是“玩得开心，而不是不开心”。只要能继续回避金钱问题和老年人的批评，他这一代会玩得开心的。

经济学将继续讲述第13代的故事。在21世纪初期，年轻人的收入将下滑，贫困人口比例上升，社会保障网变得更单薄，就像80年代的膨胀一代。这使第13代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有的（镀金时代除外）一生都遭受经济滑坡之苦的一代。许多人将失去福利。为缓和自己的生活状况，也有人会干多种工作，生活在有多种收入来源的家庭中，或搬回家与父母住在一起。

解体时期开始时对初级的求职者是不友好的，同样，它在结束时对希望晋升者也不利。从职业合作到店铺经营，第13代将发现自己的前进道路已被不再扩展的制度和不肯离去的老一代堵住。在职业的保障程度上，一代人比不上前一辈，这在本世纪还是第一次。在21世纪前10年，许多40岁的人将仍旧是永久的临时雇员、没有福利的承包商、第二类职业者和报酬很低的替补者。自觉醒期以来，年轻人所遭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一直呈上升趋势（同时老年人的实际收入变得更加平等）。享受各种福利——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养老金计划和集体谈判政策——的年

轻工人比例在下降（而老年人的公共和私人福利预备金却在大增）。

进入21世纪前10年后，第13代的名声不会改变。30至40岁的人的行为将受到老年人的批评——不仅是因为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还因为给孩子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一代将使美国所不喜欢的正在加大的贫富差距人格化。他们的失败将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而成功则不然。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将被贬斥为经济猛兽和多税收的目标，而粗鄙之人又被责骂为不可救药、不应该得到公共援助。在解体期末期，名声最好的美国社会阶层将是年轻人很少的一个：中产阶级。

第13代富于冒险的精神特质使国家的苦难之源受到攻击。高风险企业家们忙于套利交易和购买美国资产，以寻求在国外的利益。他们将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与均衡性，减少风险，加大借方和贷方间的距离和不明确性，让美国流行文化传播全世界。在电脑时代，他们将做黑客的勾当，破译密码和逃税。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都将受到严厉的批评，进而使人进一步呼吁政府加强管理。

同时，《华尔街日报》所称的“高科技游牧者”将成为解体时期全球化经济的替代工人。他们将在商业界游说，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将自己的有时发挥殆尽。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工作而非事业，强调的是一天结束之前能够解决什么，而不是在工作以后能干些什么。沉默一代相信成功需要积累，生活在一个工资与福利稳定的企业世界中，而第13代相信的是快速发迹，生活在一个工资无法保证、没有福利和不讲忠诚的经济社会中。沉默一代让别人为自己谈判，而第13代自己拍板决定，强调短期性鼓励措施，如计件工作和佣金。一般的沉默一代成员希望自己第一份职业能干上几十年，而第13代一般希望迅速调换老板和工作环境。

第13代少出力、重功效的工作方式——在每个企业都干一回——使美国的收益报其有利。经济学家早就说过这种工人正是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所需要的，但一旦美国需要整整一代这样的人，年老的经理们就会不高兴。问题不在于第13代工作是否卖力，他们的确能胜任，而在于他们与企业文化之间的距离。年轻工人将遵守合同：该工作时，他们会专心致志；但是到了休息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干。某些组合式社会协议（通常是一群朋友）将为他们提供生活帮助，而他们的父母则依赖于公司老板。

许多第13代成员将彻底摆脱公共经济，与朋友在一起干，超过老年对手，并通过某些高科技手段嘲笑或反对老年人缔造的制度。萨伦·樱井所称的“反商业”将从强大的公司对手手中窃得市场，逐渐破坏受国家保护的国有企业（邮政、教育、保障），向文凭职业（法律、保险、金融）发起灰市挑战。不论何时政府进行私有化或大企业重组，第13代都会受益。在军队，第13代将炫耀一种斯巴达式的斗士气质。在学校，他们简明的自由意识论将与年老的终身教授的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发生冲突。

在21世纪前10年之前，40来岁的小说家、电影摄制者和流行艺术界的明星们将把各个小群体、各种奢侈方式、每项极端化运动、各项技术、与各种震惊（性、暴力、亵渎、冷淡、自残）推向顶点，使得膨胀一代呼吁对此进行联合抵制和审查。当年轻人在国家公园、名胜古迹、博物馆和古典音乐会上萎靡不振时，第13代的娱乐文化与膨胀一代的“古典”文化之间的界限将日益明朗化。体育和名人娱乐业将要求一种厚颜无耻的品质，更像是格斗而不是文明的仪式。运动员和娱乐者将把体育和媒体推到浮华的商业新高度。明星的收入将一升再升，而熟练工人将丢掉饭碗。他们的个人成就将赢得鼓掌，而他们的合作精神将受到谴责。追星族并不像以前那样真忠诚，因为父母督促子女们学习其

他领域的榜样。最后，如同库尔特·科巴恩在自杀前所说的那样，第13代的青年文化将会逐步让人感到“陈旧而乏味”。

在解体期邻近结束时，第13代将开始讨厌所有行动和选择。感觉自己不是X一代，而是疲惫的一代，他们想掉转生活的方向。

他们对待冒险的态度将改变。那些干得不错的将表现出一种年轻而保守的受围心态，这种心态将成为他们继续冒险的阻碍。有所成就的已婚第13代成员将把家庭生活推向一种社会保守主义与实用主义。恢复一个家庭只有一名养家糊口者的传统将成为男子的首要任务；而女权主义将把恢复婚姻的可靠性放在首位。出生时间较晚的第13代成员将开始较早地结婚生子，这一方面可以避免性行为无度与工作烦扰，另一方面可以集中心思于攒钱和持家上。在解体时期行将结束之前，首次婚姻的平均年龄将比今天小。

即使没有好工作的第13代成员也会自慰于自己追求美国梦的足迹。整体来说，他们会庆幸于已取得的财富的价值和获得的机遇，同时也担心：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些，他们会落到什么地步。许多人的个人生活将变得小心翼翼，以避免冒险。即使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也不愿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下太大的赌注。他们将非常节俭，对亲友真诚，对配偶忠贞，对孩子倍加爱护。他们不会认为一个亲密、对自己有所支持的家庭是相当然的；组成这样一个家庭将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一项成就。“在那儿，做那个”是他们的父母对性的态度，而他们将努力保护子女，避开这种危险。当第13代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封闭起来时，老年评论家们将会挑刺，说他们的家庭生活过于家庭化而缺乏足够的价值观。具有模数化思想的年轻父母将在傍晚时去看昆丁·塔兰提诺的电影，然后回家哄着咂咂学语的孩子入睡。这让老年人大为不满。

在21世纪前10年之前，第13代将非常惬意地生活在一个多样化程度空前的世界中。几乎没人再会有高涨时期的观点，即美国的种族只是黑人跟白人的问题。亚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将使第13代的种族问题成为一个多元方程。当这些种族进入文化主流中时，欢迎他们的是要求对移民限制的取缔。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年轻人（包括白人）将被吸引到调查种族、民族分离主义的组织中去。从贫困、犯罪到复兴家庭，第13代将在无关种族的情况下对旧的公民权力进行重新定义。许多人将把“公民权力”与老年部长、教师和官僚联系在一起，不希望这些人干涉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目标将是终止所有种族游戏，同时他们也怀疑这种解决方法只能让人们相互理解。

随着越来越多的第13代成员成家立业，他们将以可观的人数参加投票选举。在1998年之前，他们将成为美国潜在投票人数最多的一代，到解体期结束之前成为实际投票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一旦找到了投票箱，以前的那种派性超然将变成他们的优势。进入21世纪前10年后，第13代将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可以决定谁赢谁败。他们将运用自己“流行与政治”的因特网技巧使一些人获益，即那些从不大肆宣扬、真正做实事和许诺不把他们的问题搞杂的候选人。

第13代涌现的首批著名政治家将把地位与原则区分开来，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让争论切入正题。在他们看来，没有不可开展的项目，没有不可违背的诺言，没有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的预算。他们不久将提出大胆的新的措施，打击那些在解体期最模糊的目标——从法庭律师、富裕老人到处于公众信誉很差的公司企业。他们的首批政治目标将是，取消无责任离婚和种族配额。他们不胡说八道的实用主义思想将受到批评——沉默一代说他们无知，而膨胀一代则说他们不讲原则。

在解体时期快结束时，一副破烂不堪的公共形象将与一代疲惫不堪、解体者的形象混杂在一起。在21世纪前10年之前，不仅非常老的一代，还有非常年轻的一代，都将把第13代的人格面具抛在一边，在继续前进和做自己必须做的事之前。对此，第13代仍会耸耸肩，付之一笑，因为他们知道：作为一代人，他们正在走向老年。当这些40岁的人购买和收集70年代（他们寄托的儿童年代）以来的流行文化垃圾时，将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景况颇有反讽意味。

不管老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美国的第13代将会走完自己应该走的一段路程。“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应爱他们。”马里奥·科莫说道，“即使我们不爱他们，我们也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千年一代进入儿童：巴尼娃娃的朋友

在1983年的圣诞节期间，成年的美国爱上了一个珍贵的新洋娃娃，她天生丽质，生性俏皮，让人爱不释手。新的千年一代孩子的护栏上点缀着成百上千幅菜园娃娃的图画。一年前，《新闻周刊》的标题文章称这些蹒跚学步的婴儿是膨胀一代姗姗来迟的后代。膨胀一代在此前的20年中一直主张不要孩子。现在膨胀一代为了要孩子，对人生循环的选择特别在意。

当明亮的黄色标记在车窗上显示“小心，车上有孩子”时，好莱坞马上对其大肆宣扬。80年代早期，关于魔鬼儿童电影（《引火者》、《玉米之子》）的票房骤然下跌，但很快就被人们喜欢的婴儿故事片取而代之，像《抚养亚利桑那》、《三个男人和一个婴儿》和《生育高峰期》等。到80年代末，通俗文化家庭中仍有朋客式少年，但现在六至八岁的儿童就像巴特·辛普森的小

妹妹一样善良听话，他们的父母正在关注着《致命的诱惑》中对觉醒期家庭行为提出的警告。在90年代中期之前，电影中10至12岁的孩子简直就是天使（像《钢琴课》中带着翅膀的安娜·帕昆和《田园天使》中的内地孩子），他们的出现激发了老年人的善心。“以前有没有坏孩子——刁钻、倔强、霸道，破坏父母的精神?”一名《时代周刊》评论家在1993年问道，“好莱坞影片中很少出现这种形象。”

在解体期，这些恰逢成年人格外爱护儿童的时期的菜园娃娃成长为“强力骑兵”式的13岁以下少年。在这些孩子上幼儿园时，成年人经历了被哈佛大学学者亚瑟·米勒称作“国家歇斯底里般”虐待儿童时期。民意测验表明，三年之内，“在家里与家人呆在一起”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两倍。当最早的千年一代上小学时，儿童问题被列入1988－1992年的总统竞选议程，而“联合之路”也发起了一项新的大型议程。他们上初中时，有人提议设计V－Chip（视频控制芯片），父母能够用它筛选出暴力节目，全国四分之三的大城市制定了青年宵禁令，而州立法机构并不照顾父母（像觉醒时期一样），追查游手好闲的父亲，为保护儿童利益更改了监护人规章。当千年一代上高中时，90年代成为马里奥·科莫所称的“孩子的年代”。从犯罪到福利，从技术到强制管制，从医疗保险到预算平衡，几乎所有政治问题都按照记者们所称的“幼儿政治”做了修订。两大政党开始围绕拯救儿童（不管来自赤字还是使用削减份额）编制国情咨文。在1996年竞选之前，克林顿对保护儿童问题的关注过于昭然，以至招致沉默一代批评家艾伦·古德曼的讽刺，“要是星期四，肯定是宵禁日。星期五是校服日。星期一是V－Chip日，而星期二则是戒烟日。”

千年一代是以某种世代公共财产的身份出现的。儿童时期的第13代曾是觉醒期纵情玩乐的遗弃物，而千年一代已成为对解

体期的一种象征：美国必须控制住社会大出血，以免毁坏另一代新人。阻止依赖性和犯罪的“唯一出路”，俄亥俄州州长乔治·冯诺维奇警告道，“是找来一代儿童，在地上划一条线，告诉他‘就此打住’。”当乔治·布什说道“杂草与种子”时，他在第13代与千年一代之间划了一道清晰的界线。解体时期许多人抨击福利开支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觉醒期腐败的家庭中长大的第13代中有许多人作为父母不称职。法庭有一种明显的趋向，那就是如果孩子有不轨行为，将惩罚他们的父母——或把孩子带走。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把孩子交给孤儿院抚养可以“打破贫困循环”的问题。

成年人关注焦点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觉醒期对儿童世界造成伤害的事实。儿童贫困率仍很高。80年代毒品婴儿长大后，面临着严重的情感残疾。无法正常运行的家庭仍是一个可怕的问题，10岁儿童受害者（或行凶者）仍不时见诸报端与屏幕。电视中的性与暴力画面丝毫没有减少。而在觉醒期，所有这些并没有招致成年人多少埋怨。但在今天的解体期，这令他们感到异常愤慨。

作为道德暴行的受益者，千年儿童已开始使美国解体期对道德标准和精神性的重新发现人格化。自然的儿童代表着绝对的美好，受虐待的儿童则代表着绝对邪恶的受害者。许多膨胀一代福音主义信仰者说，他们相信，复兴时刻将伴随着他们的第一批千年子女的出生而来临。从福音基督教徒、五旬节教徒到穆斯林，许多新的宗教思潮目前都是围绕着教区居民保护儿童的思想展开的。在世俗文化中，正是通过小约拿们提供的魔法使《西雅图不眠夜》中的大人们发现了正确的道路。

在解体时期，成年人达成了共识：千年一代儿童有理由获得比第13代更多的保护。觉醒时期尖锐的生育问题是为避免多生

孩子而服用避孕药或做避孕手术；解体时期在生育医学、早产儿看护和生产绝对想要的孩子的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进步。70年代前后，自然分娩的时尚强调父母要有丰富的经验，而90年代人们强调为了婴儿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一种规模颇大的儿童安全行业在80年代注重“我能看见你”的汽车视镜，而在90年代则开始强调儿童运动伤病预防。解体时期一开始就制定新法律，要求限制儿童在汽车中的行为；而现在，新法律则规定骑自行车要戴头盔。

当膨胀一代开始控制儿童生活的公共机构时，他们将两个褒义词－“家庭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以便抓住养育千年一代的要旨。大卫·布兰肯霍恩所称的“新家庭主义”已开始改变觉醒期离婚率和堕胎率上升的情况。在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家庭中，父母呆在家中又开始成为一种时髦的选择。与觉醒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大部分职业女性说，如果自己“不再需要挣钱”，会“考虑永久放弃工作的可能性”。如在“父亲新角色”运动的鼓动下，留在家中抚养孩子的美国男子人数创记录地增加了不少。如果现在父亲要离婚，男女双方常常要求获得联合（或单独）的儿女抚养权。从黑人的“百万人游行”到白人的“守信者”运动，男人正在想方设法弥补自己过去的过失——疏忽儿童，并宣誓要努力成为孩子们的好榜样。三分之二的父母说，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他们会同意老板削减自己的工资。由于新的工作趋势的出现，像工作分担、远程办公和职业排序，父母正拿走孩子脖子上的钥匙，重新塑造自己在孩子放学后的形象。与1980年的第13代不同的是，处于90年代高科技时代的儿童不再是单独在家的游戏狂，而是在父母的帮助下与网友进行交流。

大人的唠叨又回到了儿童世界。不满于自己刚成年时的行

为，膨胀一代已成为《纽约时报》所称的“按我现在说的做，而学我过去的做法”一代父母。在高涨时期，父母一般会逐渐放松对孩子的管教；现在恰恰相反，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加强了。新近父母又要求孩子养成好习惯，而对他们的不好的言行的容忍程度大不如前了。在一则极尽吹捧之能事的百事可乐广告中，一个小孩的口号是“去拿来尝一尝”，而父母的反应是，“如果你这样要求的话，那你不会得到它。”（功夫白费了。）在少年棒球联合会世界系列赛中，一名来自得克萨斯的12岁的男孩受到了指责，因为他在球队落败时庆祝自己的本垒打。在青年棒球联合会橄榄球赛中，如果在球门区走太空步，就会领到黄牌。

站在文化战争各方的膨胀一代都同意，千年一代必须受到比第13代更多的保护，以免受到媒体中性、暴力和亵渎的侵害。高涨时期时，几乎电视屏幕上的所有一切都适合儿童观看，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膨胀一代中的许多人从《不关我的孩子，你没门》中得到启示，面对解体时期对儿童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文化，他们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家庭。根据《在一个有害社会环境中抚养子女》的观点，给孩子随便租一盘录像带、随便买一张激光唱盘，等于送给他一份文化二氧芑（毒药）。当威廉·贝内特说“毕竟有一些是儿童不宜收看的内容”时，他发布了一条信息：他那一代在《在家中的一切》代表的觉醒时期活得非常幸福。为了响应贝内特，蒂珀·戈尔、米歇尔·梅德韦德和其他膨胀一代电视电影剧本作家正在构思创作一些讲述毒品、酗酒和青少年性行为，但带有很强的道德教益，主题比较明确的影视故事。在现在的电视情景剧中，父母被刻画得更具权威性，孩子更加本分。儿童书籍和杂志正回到简单的故事和传统的主题，同时大人门正逐步取走儿童书架上的新现实主义作品。

膨胀一代正在利用他们对儿童的新态度上演一场讲述他们自

己变得如何放任的心理剧。“借助直觉或设计，”米歇尔·桑德尔写道，“克林顿找到了解决方法：不要在道德方面限制大人；限制的应该是孩子。”

这种新的价值观培养方式正在产生一种稚嫩的社会美德。自从觉醒时期结束以来，儿童储蓄率增长了近两倍。更多的孩子在父母的监督下从事社区活动。儿童体育队以前从未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12个州实行了“同辈人审判”制度，让儿童自己评判自己。在“小子选举美利坚”活动中，儿童模拟了选举中讨论问题、注册、竞选和投票的过程。“在亚利桑那州的小孩中产生了政治巨兽，”“凤凰”项目的领导者说，“我们无法阻止他们”，《新闻周刊》称“同辈团体”为一颗潜在的“促成学术成功的魔弹”。该杂志引用了1996年的一份研究材料，该研究发现，在提高学习成绩方面，“朋友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父母的影响”。

当膨胀一代寻求使这一代孩子的文化和价值观标准化时，发现了统一服装的优点。在华盛顿特区，这一趋势开始于1988年秋天，地点是伯韦尔小学。来自内地的幼儿园小孩子身穿绿黄相间的外套、领带、衬衣和裙子。他们这种水仙色的打扮，与穿戴X帽、文化衫、宽松裤和花里胡哨的运动鞋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形成了鲜明对比。三年之内，特区内有31所学校鼓励学生穿校服；到1995年，这一提议迅速传遍美国。在要求学生穿校服的地区，五分之四的父母表示支持，认为（根据《华盛顿邮报》）穿戴统一服装的孩子“会成为创造性较强和遵纪守法的公民”。1996年，令美国人欢欣鼓舞的是，克林顿总统加大了对实行校服和儿童宵禁制度的支持力度，而这些主张在总统年轻时会激怒大部分同辈人。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尽力关注鲁道夫·吉乌里亚尼提出的要求——学校“重新开始培训公民”。90年代新的教育口号呼吁

“常规”（而不是以能力划分的）学生进行“合作的”（而不是独立的）学习。学校必须教授他们“核心价值观”、做好工作、符合标准、对不端行为不得有半点宽容。初等教育要求的三要素——“R”开头的读［reading］、写［writing］、算术［arithmetic］现在变成了规则［rules］、尊敬［respect］和责任［responsibility］。一些内地学校开始恢复老式的直接教学法，要求学生一起背诵课文。有关要求更加客观的评分、男女分校、只讲授节欲的性教育和学校祈祷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同时人们还希望学校延长教学日、实行全年上课，对逃学者予以更加严厉的处罚。像希拉里·克林顿一样，许多曾相信把孩子从共同团体中解放出来的膨胀一代，正发现《它需要一个村》，他们现在支持一种坚固的、具有保护作用的孩子-团体之间的联系。

调查表明，公立学校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感觉很好，同时工作时间也比解体时期早年要长。自80年代初以来，具有20年以上工龄的教师比例翻了近一倍。与觉醒时期相反，孩子父母大量加入家长-教师协会，并以空前的规模为协会筹资。许多膨胀一代要求公共基金重新转向契约学校和保证人，以便让父母能有选择权，这会促使表现不好的学校自我改善。解体时期后，在家中接受教育的美国儿童数量——大部分是膨胀一代的子女，因为他们认为公立学校已经腐化——已从1．5万增至50万。

父母们在调慢发展时钟，让千年一代在儿童时期多逗留一段时间，这与理查德·赖利所称的觉醒时期的“急急忙忙”相反。从《芝麻大街》到《巴尼和他的朋友们》，最受欢迎的儿童电视节目已也从城市转到田园、从运动到抒情、从怪诞到甜蜜，从发现自我到与别人共享，从赞美与众不同到赞美共同之处。许多刚刚进入成年之人觉得《巴尼》难以理解，也许是因为缺乏大人的经历。《华盛顿邮报》一作者称该节目“如此甜蜜，会引起成年

人的低糖休克”。安娜·昆德伦对于它的简单化表示害怕，“他们所学到的生活是黑和白。”在她看来，那只是“责难的原色”。在一大堆书的帮助下，父母们在强调价值观念的培养。贝内特的《美德宝典》是解体时期最畅销的儿童读物，它的封面具有教育意义但缺乏幽默，书中列出了十一种可教的美德但缺少个性与创造性两条。千年一代的教育不是为了探究内心世界（膨胀一代认为他们可以处理好），而是为了在外部世界中有所成就、出类拔萃。

像其他任何儿童世代一样，千年一代正在他们父母的世代结构中经历一场转变中期的过渡。生于80年代的菜园娃娃们大部分是膨胀一代的后代。父母明显为他们感到自豪，这激怒了沉默一代评论家们。乔森纳·亚德利把他们斥骂为“生育高峰期的战利品”——暗示他们沉默一代自己的孩子（第13代）不是任何人的战利品。生于90年代初期的巴尼小子们处于膨胀一代和第13代之间。其他美国解体时期的婴儿们大部分属于第13代。民意测验表明，有子女的第13代已婚夫妇在文化上远比尚无子女的同辈人保守。对于有关儿童世界的政治言论，较年轻的第13代不像膨胀一代那样感兴趣。

进入新的千年：晚辈公民

从出生到上初中，这些第一批菜园娃娃千年一代一直是全国的关注焦点。解体时期上半阶段的标志是人们对儿童问题越来越关注，而下半阶段的标志是人们对业已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感到满足。同时，最初关注的热点将转向青少年，并随着21世纪前10年的进展，逐步转向大学生和年轻工人。

在即将到来的几年中，千年一代生活的安乐将成为复兴美国

公众文化过程中一个焦点。有组织的公共场所——体育馆、电影院、公园、商业街——将被重新分割，并把有利儿童的地点同其他粗俗之处分隔开来。因特网将开始教授“网络礼节”，并帮助父母们让青少年避开粗鲁的成年人的对话。好莱坞将出品有关好少年为社区做好事的影片。启发性的青少年广告和杂志将招致成年人的谴责，就像膨胀一代以攻击性姿态仔细审查和保护青少年文化一样。

千年一代将成为美国家庭复兴的一个焦点。随着采用远程办公、足不出户的沉默一代祖父母的不断出现，居住区内将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他们对孩子的监督也越来越武断。膨胀一代将遵循希拉里·克林顿的要求——青少年的行为必须受到监督和约束。离婚率将下降，部分原因是一些州的新法律规定将限制有子女夫妇的离婚。法官将不再能够随意命令有子女家庭的分居，并将严厉惩罚好吃懒做的父亲。这种重新强化的家庭不会是 50 年代的复制品。孩子们不再过多地依赖母亲，因为许多母亲要工作。相反，他们将依靠代表社区、不断轮换的代父母（通常是男性）。就像运作良好的基布兹合作农庄一样，千年一代将成为待人友善、富于合作精神的青少年。但同时大人们又觉得他们过于温和，墨守成规，缺乏独立判断力。

这些孩子长大 10 多岁后，其外表与举止将超过任何一代青少年。与觉醒期后期一身黑衣、满脸阴沉的“悲剧式的一年级新生”不同的是，解体时期后期性情友好的新生的衣着将体现欢快明亮的风格。他们积极向上的动力将来自“同辈压力”——这一词在 21 世纪前 10 年之前将带有一种新的积极内涵。千年一代将自我管理，强制规范青少年的行为。早恋中的肉体关系将大大减少，而浪漫与友好的成份将相应增加。当不再“无知”的青少年逐渐退出过早的（和没有防范措施的）性行为时，青少年的堕胎

率将下降，少女怀孕现象将减少，而收养和婚姻将更加普遍。青少年的狂欢、酗酒和赌博行为将减少。今天的12岁少年令专家们大惑不解，因为他们全然没有前一辈第13代的犯罪和吸毒等恶习（青少年杀人案在1995年下降了15%）。

现在有些犯罪学家们一致认为美国正在进入新的青年暴力高潮期，而千年一代将用自己的实际行为来证明这种预言是错误的。相反，年轻人的犯罪率将下降。一些青年帮派将逐步放弃刑事犯罪，将精力转向维护社会秩序。那些不听话的千年一代将很快得到处理。不像对待年长的第13代罪犯（很多将被关进监狱，很快被人忘记），惩罚千年一代的目的将是让他们知道羞耻，让他们重新做人，尽快回到大部队中。

这一代人将因实现和辜负成年人的期望而确立自己的名声。1990年，美国的三年级学生面临三个重大挑战：库普博士认为，属于21世纪的这代人高中毕业时，与前辈们相比，将不吸毒、不吸烟、没有性病；布什总统号召他们毕业时“数学和理科成绩创世界第一”；“非洲裔美国人2000年计划”呼吁学生们长大之后为以后的孩子们树立一个“坚持不懈、积极向上和学识渊博的黑人榜样”。千年一代的孩子们将完成上述使命，而且还会做得更好。在2000年左右，美国各大新闻报刊的标题文章将对美国青年大加赞赏——称赞他们关心时事，能力测试成绩提高，做了许多有利于社区的好事，建立了一种新的、更加健康（和标准）的青少年文化。

在解体时期结束时，成年美国人将认为20岁的年轻人聪明能干，而40岁的中年人腐朽无能——恰恰与觉醒期结束时的情况相反。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人们都无法忍受任何妨碍这代人生活安定的因素。只要看到千年一代的小伙子们可能要在自由市场中落败，大人们将要求社会向他们提供救济。年轻人的贫困将滋

生出一种新的阶级政治。迫于压力，大学将不再提高学费，不再限制学生贷款数额，教职工将把教学放在研究前面，雇主要招收学徒工，老工人要照顾年轻工人。

正在走向老年的膨胀一代将在千年一代身上看到一种希望，认为后者可以帮助他们在21世纪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我的伟大理想是，”《更加远大的前程》作者威廉·达蒙说道，“我们能够真正围绕孩子在这个国家中重建我们的社区。”民主党将以年轻人为由扩大政府，而共和党以年轻人为由清理整顿文化。要求不遗余力地实施全国义务性青年服务项目的呼声越来越高。公共借贷（以及更有利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的拥护者越来越少，但仍将听到别人的指责——滥用新一代晚辈公民的财政。对旧的联邦预算的争论将变得日益迫切。

膨胀一代儿童得出的结论是，成人世界文化不完善但运作良好，而千年一代儿童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成年人对价值观念有着充分的认识，但不知道如何诉诸于公共生活。他们达到投票年龄时将会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有满足这一需要的潜在能力。新的大学行动主义者将联合起来，不是对抗国家领袖，而是督促他们采取更加大胆的措施。以2000年大选为起点，首批千年一代将参加投票选举。只要出现可能妨碍他们未来发展的因素，都会引发激烈的政治辩论。

成年人对这一代所抱的乐观态度将与日俱增。在宇航广告中，千年一代将是建造和运转首批大型空间站的宇航员。在90年中期的全球竞赛中，美国小学生的阅读技能名列第二（美国女孩第一）。希拉里·克林顿称赞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1995年，《全国地理》杂志发起了新的“儿童名人堂”（14岁以下），以“庆祝有关承认和奖励那些了不起的孩子们的好消息”。觉醒时期的第13代很少受到这种表扬。

在21世纪前10年之前，美国人将不断听到关于年轻人的豪言壮语和英雄事迹的谈论。在1996年的一则“科勒尔”水龙头的电视广告中，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膨胀一代父亲把湿漉漉的孩子从浴缸里抱起来，涂上浴波，称其为“国王”。在未来的电视广告中，父亲的胡子将变得花白，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从毕业典礼台上走下，但赞美之辞还是一样。《亚利桑那共和报》最近举行了一次询问小学生希望如何美化这个世界的活动。“我们将从现在开始，”一名11岁的男孩这样说道，“每天种一颗树。大家就会团结成一个集体。”他们能使美国发生改观吗？“我知道。我只是有这种感觉，”一个活泼的小女孩说道，“我相信自己，因为父母和老师都相信我。”

接近第四次转折

在未来的几年中，为庆祝2000年的到来而举行的一次史诗般的盛宴正在筹划之中。一些赴宴者将听到在吉萨金字塔的阴影下有人朗诵法国预言家诺斯特拉达穆斯的经文。其他人将乘坐包租的协和式飞机在午夜过后，在时间轨道中从第三个千年期快速飞回第二个千年期。但是，一旦盛宴结束，解开行李的美国人将会苦恼地意识到：新的千年的开始几天无论看上去还是感觉上都像旧千年的最后几天。

一年过后，在查拉图斯特拉吹响的号角声中，人们迎来了2001年，这才是新的千年时代的开始。接着，随后的日子里又会传来关于文化战争、社会动乱和政治堵塞等内容大同小异的旧新闻。没有太多的改变。

21世纪前10年早期的社会心态与现在非常相似，只是人们的神经更加敏感。那将是审视现实的日子，是人们为国家付出牺

牲的日期逐步临近而忧心忡忡的日子，因为各年龄段的美国人都开始意识到，他们和政府以前为将来所做的准备太少了。人们将不再否认，解体期赋予个人的权力导致了反社会行为和一种可怕的制度腐败。现在才发现，这种破坏（特别是对年轻人）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只有通过真正而彻底的变革才能使国家重返正轨。在今天，除了紧急情况外无法调动全美国人民的观点（又有人称之为“珍珠港综合症”）将成为陈词滥调。更多的人将开始支持大事业或者足以震撼整个社会摆脱其倦怠情绪的坏事情。执政党将发布大量好消息，坚持局势空前大好，而在野党（还有感觉自己正在输掉文化战争的小小团体）则将警告灾难即将来临，并做出一种欢迎的姿态。

解体期后期的社会心态将与美国高涨期后期（“新边疆”）相反。那时，公共机构正处在鼎盛时期。不论是根治贫困还是登陆月球，在这个国家，似乎任何宏伟目标都能实现。但 1960 年左右的美国人，在这种“既有体制”的阴影下，开始对文化的陈腐感到恼火。在 21 世纪前 10 年中期之前，公共机构将陷入低谷，而个人主义将达到巅峰，即使是最简单的公共工作也让人觉得政府无能为力。随着小围墙越升越高，人们将无休止地埋怨其他小团体如何如何地糟糕。贫与富、白人与黑人、移民与本地人、不信教者与信仰复兴者，技术爱好者与技术恐惧者之间的差距增大。美国将觉得自己更像一个部落。确实许多人将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将 50 个州和数十个民族文化揉合为一个国家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的话，这个国家是否还有希望？

在 21 世纪前 10 年，公共机构从表面上看极其复杂、勉勉强强地联系在一起，但核心却是空荡荡的。个人将敏锐地感到自己平时没有了对于自然和公民权力的丰富想像，根本无法抵御受命运支配的各种灾难。在家中的技术中心，只需轻轻地移动手指，

数百万的人们就可以定购比萨饼、筹划金融交易和窃取硬盘秘密。但他们很清楚，解体时期“得到权力的个人”仍存在于基础的最薄弱处——一次海啸就会将整个由小小人类岛屿组成的群岛淹没到社会动乱的海洋之中。经济形势越好，人们越觉得他们注定要失败，国家的精神状况也更差。

同时，解体时期的文化狂欢节将继续举行，变得更加迅速、破碎和疯狂，更多的珠光宝气、坦露炫耀与胡言乱语。公众将更加投入地参加到汤姆·彼得斯所称的“追求轰动”活动中去，直到剩余的热情被概括为两个词：“是的，对的。”

老年人和青年人都不知道，如果让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生活在一个感觉像国家共同体的社会里会有如何感受。他们想重新创造，让美国退回原处，但不知道如何去做。

随着第四次转折的临近，每代人将从其所处的人生周期的角度观察社会。近80岁的沉默一代将深感痛苦。60岁左右的膨胀一代将反思他们在公共机构方面的无能——无法推行一项净化议程。四分五裂的第13代将从个人出发，在一个无序环境寻找使小事情发挥作用的方法。第一批千年一代将在老年人的谄媚中进入成年。对后者来说，他们代表了社会复兴的希望。儿童问题现已得到解决，新一代婴儿将会出生，但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

每一代都将显示出变革的明显迹象。每代人在走近下一个人生阶段的边缘时，一举一动不会与年长的一代相同。膨胀一代没有心思继续一种缺乏主见、自我怀疑的伤感主义。第13代也不想去争论、评判。千年一代真心希望消除青年人身上的孤立与愤世嫉俗。如果一种保护性儿童培养方式现在可以接受，父母们不愿再作任何改变。

在解体时期走向结束的过程中，每一种原型在各个人生阶段

所扮演的角色将达到一个新的紧张点：

·显露出优柔寡断、灵活性不足的老年艺术家，开始阻止预言家一代的价值观念议程。

·充满信仰正义感的中年预言家，对领导社会进行更深的精神转化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

·厌倦了无益的自足的年轻游牧者，渴望安定下来，并支持设置一些社会屏障。

·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心的成年人的保护下，儿童英雄开始在预言家幻想的核心处感觉到一种来自世俗世界的可怕挑战。

在21世纪前10年初期之前，当这四种世代原型完全占据了各自的人生阶段时，他们将做好准备，进入新的社会角色。他们在解体时期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会继续。公众的情绪透着一种陈腐、耗尽，让人觉得是在为别的东西做准备。那时，美国人将对浮华与喧嚣、名人滑稽表演、只注重当前的生活感到厌倦。预感将变得更加强烈，宗教潮流趋于暗淡。不管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我们将迎来一场巨变，把整个社会从自满和腐败中惊醒。

第四次转折即将到来。

1 一种止疼消炎药品的名字。

2 美国一家民间慈善募捐组织

3 一种美国期刊的名称。

4 指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自发工人运动参加者。

第九章　历史上的第四次转折

“那时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美国参议员丹尼尔·井上在1995年对日作战胜利日（V-J）回忆道，“我弄不清它是什么。但它是一种奇怪、神奇的力量，我们的父辈们早在开国之初那些无常的日子里就体验过的。让我们称其为‘美国精神’，一种让我们的人民团结、振作的精神”。他深深怀念着那个年代，那时，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没有不可跨越的障碍、没有不可接受的挑战、没有不可实现的目标、没有无畏的牺牲。半个世纪过去了，那种古老的精神早已消散，只有70岁以上的人才知道它是什么。在二战时盟军在法国北部发动进攻日的那一天，十岁以上的人才知道它是什么。在二战时盟军在法国北部发动进攻日的同一天，乔·道森再次跳伞在诺曼底着陆，他是“为了表明，我们的国家曾经团结一致，奋勇向前。”

从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到对日作战胜利之间的高潮期间，人们忘记了争论，理想得到强化，危机中的制度为了新的紧急目标而得到复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军队，团队合作精神和纪律异常高涨。每个怀疑、埋怨或歪曲规则的人的心中，现在充满着战友、同事和邻居的怒火。人们把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看作是道德的榜样。1943年《历史中的英雄》这样形容当时的年代：充满着可誉为“历史中的伟人”的领袖。同时，人们满怀希望，即使

身处极大的逆境之中。“1940年夏天，法国被击败，而英国岌岌可危。”大卫·格勒尔特这样写道，而一项罗珀（Roper）民意测验发现“相当高的比率，36—43%人对于‘文明的未来’表示乐观。”在远见卓识的领导和满怀希望的跟随者的推动下，美国大获全胜。

那个时代中，人们团结一致，建起一种强大的新公共秩序，新的公共制度、经济秩序、政治联盟和全球性条约，直至今日许多仍在持续。同时，那个年代也严酷地承认，人类的进步必然伴随着毁坏。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战争是为了结；那时，总统能够命令宝贵的年轻一代冲锋陷阵，同时警告他们中间将有三分之一无法生还；那时，美国最具智慧的科学家们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那时，想像的国内敌人在雪中营地中被围捕；那时，敌军被摧毁，敌人的首脑被吊死。的确，当这种深受爱戴的美国精神与半个世纪的温暖回忆相共鸣时，表现出一种生钝、残酷，乃至致命的社会变革形式。

当老兵们高兴地回忆起那个时期时，也有所选择：他们愿意重温当时的团结和无私，而避开血腥屠杀。但那怎么办？他们看见的唯一方法是“很久以前”，鲍勃·多尔所称的一架通往美好过去的“桥梁”——五十年之前，一个家庭破坏、文化腐败和缺乏公共意志等不存在的美国。但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因为现在还是现在。

历史与大自然一样，充满了无法后退的进程。就像熵的规律不允许鸟儿向后飞、落下的水滴无法再会到瀑布中，历史没有倒带的的按钮。如一年四季的更替，历史只向前进。百年周期的熵是无法逆转的。一个解体时期不能退回觉醒时期，或越来危机时期直接进入高涨时期。

美国精神在一个百年周期里只来一次。在历史周期性的危机时期焚烧旧的社会秩序，诞生出新秩序。

第四次转折是极至黑暗的一个冬至期，社会秩序的供给仍在下降，但要求却已开始上升。它是百年周期中的冬眠，考验的时刻。冬天在威廉·卡伦·布赖恩特的笔下是这样，“忧郁的日子来到，一年中最伤心的季节/风在哀号，树木凋零，草地枯萎。”大自然在致命地报复，无情地挑选适者、淘汰劣者。快乐退去，暴风雨肆虐，伪装被揭露，粗野得到奖赏——季节中的所有一切(维克多·雨果说)“变为石头，天之水，人之心”。这是火与冰的时代，极地黑暗与银灰色地平线的时代。没有被毁掉的，令人想起死亡。没有受伤的，令人想起痛苦。在斯温伯恩“雪的季节”里，“光明落败，黑夜取胜。”

像自然的冬季早早的到达了它的冬至点，第四次转折在开始时经过了公共秩序的最低点。冬天最冰冷的日子就是白昼开始变长的日子，同样，危机时期中艰难（希望渺茫）的日子就是公共权力开始复苏的日子。这涉及到社会动力的一个基本转变：在解体时期，每个公共阶层去降后，就要去除更多的阶层；在危机时期，每次行使新的公共权力都会产生增加阶层的要求。

当团体本能再生时，人们决定要做的不仅仅是缓解伤口的症状。他们决心找出根本原因，重新找回团结、合作和社会纪律的价值。人们比以前更加服从权威，接受公共牺牲的要求，抛开团体生存所需以外的任何无关物。这是一个关键的开端：作为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人们既没有联合起来，也没有不可救药和永久的分离。

危机时期的形态机构

第四次转折成为盎格鲁—美国遗产的关键时期。追溯到15世纪，共有6次。每期的第四次转折都产生了自己的危机时期，以及自己的平乱精神，对此，二战老兵们深有体会。从这些时期的相似之中，可构造出一种形态结构：

·危机时期开始对一个催化剂事件——使社会状态产生巨变的惊人事件（或事件的后果）。

·一旦危机被引发，社会将获得一种再生——一种重新统一和振兴公共生活的新反熵。

·再生的社会向高潮推进——确定旧秩序死亡和新秩序诞生的关键时刻。

·高潮的顶点是解决——一种胜利或悲剧的结局，分出胜负、解决公共问题、建立起新秩序。

这种危机形态结构的跨度是一次转折的过程，即在危机引发和解决之间大约15至20年的时间（美国内战例外）。再生通常在危机开始五年后发生，而高潮发生在危机结束前5年。

每期第四次危机都开始于一个催化剂事件，它终止了解体状态，同时引发出危机状态。每四章解释了历史的火花——惊人的突出事件——如何在每次转折中出现。一些火花可能什么也不会点燃。一些火花闪烁几下，然后就熄灭了。一些火花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剩下的火花燃起壮丽的大火。这是那些火花呢？研究历史火花本身并不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们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对它们的反应。这种反应

主要取决于百年周期的季节——换句话说，在于它们所在的转折。高涨时期的火花往往强化安全感；觉醒时期的火花增加争论；解体时期的火花引起不安。第四次转折到来时，历史火花将激发起一种强烈的公共协作的新动力。

催化剂事件可能是一个火花，但往往是一系列火花，像中国人传统的爆竹，它们自我点燃，标志着自己在时间循环中的自我爆发。每一个火花都联系着一个特定的威胁，对这种威胁，社会完全知道但却没有很好地保护自己。这些火花是可以预见的，但却很少被预见。这一事实后来引起一种新的紧迫感，一种对于制度机能障碍和公共缺乏抵御力的紧迫感。这标志着令人眩晕的危机螺旋开始了。

当这种新状态被完全激化，社会开始了再生的过程，团结一致进入一种共同体。在解体时期的残骸之上，一种新的公共特质在形成。在觉醒时期之后的一套理想开始盛行。人们不再容忍制度的无力、文化的分解和日常行为的个人化。人们对精神的兴趣下降，行为举止变得传统化，开始借助文化公开援良好行为。历史告诉我们，在最初的催化剂事件发生一到三年后，人们开始承认公共生活中的这种新协作，并开始授权政府来执行这种协作。集体行为变得对于社会最基本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当公共特质能够产生公共行为时，一种威胁和反应的新动力站住了脚跟。不是对问题视而不见，领袖们开始夸大其词。不是拖延解决，他们在加快进程。不是宽容多样化，他们要求一致性。不是以最小的牺牲哄骗人们，他们在发出号召时出做出了最大牺牲的警告。领袖们尽可能地动员每一个机构，指引他们为团体生存而奋斗。振作起来之后的社会开始以一种新轨迹向前推进，对此，没有人在催化剂事件之前做出预言。在解体时期毫无办法的社会难题，现在有了简单（如果需要）的解决方法。

危机状态不能保证新统治政策一定是完美的设计和如期地运转。恰恰相反：危机时期不乏错误的领导和笨拙的管理——从克林顿总统挑选将军的拙劣记录到罗斯福总统的“字母汤”式机构，陆军审计局（AAA）、海军后备队协会领袖们的领导，即使他们支支吾吾；乐于让当权者具有权威，即使他们犯错误。在这种公共坚固性下，平庸的领袖也能够获得广大的名望；拙劣的政策也能得以实施（或至少感觉是在实施）；还有，像珍珠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失败也不会降低公众的支持。而好的政策选择将很快发挥作用。（但在觉醒时期，即使是最佳的领袖和计划也会失败，而一步走错便会失去公众的信任。）

私人生活也在发生转变，超越了以前认可的尺度。现在，个人不如集体重要，要符合第四次转折的新道德标准。家庭秩序得到加强，个人暴力和物质浪费下降。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行为将面临着不可宽恕的公众耻辱，甚至惩罚。“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分配方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强制性分配机制。解决“由谁来作和该作什么”的问题，将以生存而不是公平为基础。这会导致重新以年龄和性别为标准进行社会分工。在公共活动领域，老人要让位于年轻人，妇女要让位于男人。当威胁逼近时，儿童在父母之前母亲在父亲之前，受到保护。所有社会安排进行重新评价；危机时期之前的许诺和期望没有多少作用。在解体时期，个人生活节奏较快，公共生活处于堵塞状态，而在危机时期，日常生活放慢，政治和社会变革进程加快。

当社会接近危机高潮时，它到达了公共权力的最高点。曾为个人愤怒辩护的新价值体系，现在为公共愤怒辩护。具有功利性和终结性的战争迫在眉睫。革命的威胁逼近——同样还有内战的威胁，因为需要最大限忠诚的团体并不符合政治（或地理）分界线。领袖们更加趋向以道德的标准定义敌人，采用军事手段，拒

绝所有和解，大批调动军队，在战场和国内战线上不惜代价，生产当时最具杀伤性的武器，并使用这些武器，如果为了取得持久的胜利。

人类历史中的危机高潮就像自然界的台风，把周围的所有一切卷入强力的旋涡。所有没被击碎的东西飞上天；所有挡路的东西被扫平。高潮的能量积聚一般在第四次转折的后期，它来自于未被满足的需要、未付清的帐单和未被解决的问题。然后依靠这种能量的积聚，高潮掀起巨变，范围之广超出解体时期的想像。危机高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一个社会，转变了它的制度，重新定向了它的目标，给人们（一代人）留下终生的印迹。高潮结束时可能是胜利、悲剧或两者的混合。不管发生什么和结果如何，社会通过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明的航道。

不久以后，这扇大门被危机时期的“解决”封住，胜利者得到奖赏、敌人受到惩罚；帝国或国家得以缔造或灭亡；签署了条约、重划了边界；接受了和平、遣返了军队，新生活又开始了。

历史的一章结束，又一章开始了。从某种现实的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灭亡——另一个社会诞生。

从解体到危机

为了了解下个世纪可能出现的第四次转折，看一看解体时期如何结束和危机时期如何开始是不无裨益的。

- **玫瑰战争（1459—1487），属于中世纪晚期百年周期**
- **西班牙舰队危机（1569—1594），属于宗教改革百年周期**
- **光荣革命（1675—1704），属于新世界百年周期**
- **美国革命（1773—1794），属于革命百年周期**

·内战（1806—1865），属于内战百年周期

·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46），属于强国百年周期

除了美国内战，每期第四次转折都遵循着相似的形态结构。

强权百年周期

直到1929年的秋天，美国还处在一个所谓的“极其无意义的时代”。经过20年代，美国感到越来越狂热，日常生活被一种令人兴奋的革新技术潮流推动得越来越快，美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失去信任、无关紧要，美国文化越来越绝望地在禁酒主义的“愚民阶级”和疲惫不堪的寻欢作乐之间分化，美国公共被名流和琐碎的“流动的盛宴”（海明威）所迷惑。“表演越来越露骨，楼房越来越高，道德越来越放纵，酒类越来越便宜……但所有这些带不来太多的欢乐。”菲茨杰拉德在1926年评论道。“城市中四处充斥着蛋糕和游乐场，还有一个最流行口头语，‘O’Yeah?’。’在这个年代末，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形容“公众精神”到了“一个低潮”。每个人都知道玩乐嬉戏将不会永远，但是没人相信结束马上就会到来。

催化剂事件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尽管有人事前对这种市场惩罚做出了预测，但公共反应却令每个人吃惊。在历史学家艾伦所称“惊人的迅速”转变中，美国人意识到，“旧的秩序正让位于新秩序”，30年代“将不会重复”20年代，“对于这样一个务实的年代，它的丑闻、精神瘫痪和强作欢颜，将不会再有痛苦的醒悟”。当大出风头的凯利从桅杆上下来时，之前的大肆宣扬看起来却毫不相干、可笑，乃至羞耻。大萧

条造成了艾伦的称的在“行为举止和道德革命中”的“停火”。随着禁酒主义临近末日，“罪恶付出的代价开始稳定于较低的水平……对即将打碎禁忌的那种兴奋感消失了，道德正在转移和毁灭，整套行为准则在变化。”根据《纽约人》，性“就象旧式抵押（Old Mortgage）一样令人讨厌”。在1931年之前，随着现实的生活问题越来越令人烦恼，20年代风格的疏远文学——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分裂——令人感到完全过时。

在1933年春天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百日王朝”之前，危机的再生准备就绪。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人口增长了20%，许多银行倒闭——然而人们还坚持着只会雪上加霜的原则和政策。在低调的首次就职演说中，罗斯福警告他的国人们“我们唯一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这句话在四年之前简直不可理解。美国已准备好建立一个新秩序，一个将激励总统宣布“全国性的思索、全国性的计划和全国性的行动”为公共生活的“三大基本”的秩序。到了30年代中期，美国在深入开展“罗斯福新政”，这一政治革命的伦理根源来自于数十年前的“社会福音”运动。五年过去了，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再度把国内团结转向国外，曾穿着民间护林保士队（CCC）制服的年轻人现在身着戎装、出发讨伐希特勒和东条英机。

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故事与美国人如此密切相关，使他们忘记了国家的突然重组和社会状态的翻天覆地。

内战百年周期

内战爆发之突然，今天的美国人是无法想像的。直到1860年，对联邦战争的预示隐隐约约，没有人想到后来竟会发生如此规模的悲剧。许多年以来，大多数自由美国人依赖立法机构来进

行聪明的交易，拔掉奴隶问题爆发的引信，阻止地方主义的经硬情绪过热。在19世纪50年代初之前，随着伟大的和解一代（三人领袖：克莱、卡尔伯恩和韦伯斯特）开始退出公共生活，这种信任开始减弱。代替和解一代的是尖刻、精神化的公共人物团体，他们不愿苟同融洽共处。“这个年代乏味、鄙俗。人在爬，而不是在走。”19世纪50年代的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悲叹道。但直到这一年代末，除了在激进的废权主义圈，这种状态一直未被煽动起来。堪萨斯内战只是零星战斗，还不是战争。在1857年春天，“德雷斯·斯考特裁决”在人们看来只是关于财产法的枯燥问题——他们丝毫没有想到潜在的战争。

那年夏天，欣顿·赫尔伯，反对奴隶制的一名北卡罗莱纳州人，出版了《南方面临的危机》。这是对未来危险的第一次重要警告，但是它的论点被统计数字所遮掩，而它的预言也不大确切。又过了一年，出现了更加尖锐的观点，威廉·西沃德成为第一位预言“在持久对抗的力量之间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突”的共和党的房屋是站不住的”时，他对“我们往哪里去”问题的回答是，“我不希望联邦解体”。一年之后，1859年，约翰·布朗对哈珀斯费里的袭击（特别是之后对他的审判和处死）引起了废权主义者激情的暴涨。“人们心中的变化是多么大!”温德尔·菲利普斯叫道。尽管如此，布朗的起义并没有像其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使舆论分化。这之后，国家又陷入了闷闷的思考，由此，19世纪50年代声名狼藉。

第二年没有变化。随着19世纪即将结束，埃德蒙·拉芬的《对未来的预料》预言到一场血腥的内战（从武装进攻萨姆特要塞开始），但他同时预言这场战争将到1867年的圣诞前夜才会开始——7年之后；但实际上，一年之后战争就爆发了。历史的火花是11月的总统选举，亚伯拉罕·林肯取得了40%的选票，足以

击败其他党派的几个候选人。最终，惠特曼预想的“救世主总统”当选。国家的两半因此开始准备一场林肯所强调的“人类无法阻止的”战争。

第二年夏天，随着北军在布尔溪的溃败，危机时期到达再生。当时，林肯宣布那天为“黑色的星期一”，并马上命令征兵50万，美国人意识到斗争既不迷人也不是没有痛苦。政府当局（北军和南军）开始征用空前的力量，税收、义务服务、应进行的项目停办、戒严令；这是有组织的屠场中灾难性的螺旋。随着葛底斯堡战役和谢尔曼摧枯朽般的推进，危机高潮迅速、残酷地到来。危机的解决也是同样的迅速和残酷：从阿波马托克到林肯被刺的5年是美国日历上最痛苦的一周。国家得到统一，解决了曾经令它分裂的奴隶制这一核心问题，但是这种解决更像是失败而不是胜利。

在内战百年周期，第三次和第四次转折正好跨越了一代人，没有产生出英雄原型。不同与历史的一般模式，内战危机时期的催化剂事件提前了4至5年发生，危机的解决也提前了接近一代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怒火冷却几年，使危机时期延期至另一届总统选举，并减慢下来，会发生什么？极有可能，还会发生联合和解体的危机。可能仍会有战争。但是世代动力和原型行为将有所不同。超验一代的启示激情随着他们的年老将会冷却下来。而镀金一代将很快发现战争是一种危险而不是冒险。想一想会有什么不同发生，关于南方（被摧毁后），关于种族关系（回到吉姆·克劳时代），关于妇女运动（已经崩溃），关于镀金一代和进步一代（都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失）。这样一种危机场景可能会产生更具建设性的结果。

内战经历得出了两个教训：第一，第四次转折的形态结构可以加速，第二，这种加速能增加结果的悲剧性。

革命百年周期

北美移民者一直没有革命心态，直到1773年冬天至1774年，那时独立的旋风就要到来。退回到1756年，在短短的印花税案的风暴中，火性子的詹姆斯·奥蒂斯警告“没有人，只有反叛者、傻瓜和疯子”会要求从祖国分离出去。1767年出现了紧张局势，议会的“汤森税法案”促使移民们开始组织（表面上的）非暴力反抗，并禁运英国的奢侈商品。但3年过后，议会做出让步，几乎取消了所有的税，只象征性地保留一项茶税。尽管对社会生活的野蛮和堕落（这归咎于“卑鄙的阿尔比恩”的“腐败”）在北美殖民地流行着一种宿命论，许多移民者还是欢迎新的年代，他们认为那时这种不愉快会被淡忘。18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人仍常常地把英格兰称为祖国。到了1773年，北美殖民地领袖们的讲话和文章中表示出，他们对于分离英国没有太大的渴望，而对于即将到来的事件的预言更少。

接着，那年12月发生了波士顿茶党事件，这引起了殖民地状态的巨变。在迅速进行的连锁反应中，一事未竟，一事又起。1774年3月，失去耐心的英国议会批准了惩罚性的《强制法案》。在春天和秋天，移民者起草了联合方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组织起来，并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阿比盖尔·亚当斯在日记（那时还是和解调子）中极端痛苦，是否“以剑矫正”应斩断联系北美殖民地与英王的“税、利益和效忠三重绳索”。顽固派爱国者（亚当斯称其为“受野心感染”的“那些人”）开始暗示，除了彻底分离，没有其他选择。第二年年初，当她的日记中记下“可怕的4月19日”（英国军队袭击康科德和莱克辛顿），所有和解的希望破灭了：“暴政、压迫和谋杀，”她写道，已“把她的剑

插入我们的胸膛。"当界线分明后，殖民地爱国者们着手行动，这在几年之前会被认为是公然的叛逆行为（即使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

1776年，危机时期到达了再生。遍及北美殖民地，慷慨陈词激励着对集体团结和行动的呼唤，同时，如有必要，采取强制手段。看来，代表自由和道德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即使把争争吵吵的各个殖民地合成一个立宪共和国仍是一个遥远的幻想。

新世界百年周期

光荣革命的发生也同样令人吃惊。1675年初春，北美移民者们看到了他们长远未来的先兆。许多人对移民者和土著居民之间对土地不加控制的竞争表示担心：而很少人信任英格兰的复辟王朝。那时，移民者与美洲土著人之间的关系在改善，他们之间贸易繁盛，政治自由得到保护。

接着，历史的致命火花来临：24个月使他们的世界天翻地覆。最初土著与移民者之间出现了几次自发性（但势不两立的）冲突，这些冲突直接引发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叛乱，并促使议会几次试图废除新英格兰的特权。"那是在1676年，距'挨饿的日子'已经过去不少年了，那些日子是欧洲人侵北美大陆的登陆年，英格兰几乎被赶出了大陆，"历史学家斯蒂芬·桑德斯·韦伯写道。"仅仅1676年的战斗——不要算因瘟疫、庄稼低产和牲畜丢失造成的第一代人口损失——造成了大量死亡，它与总人口的比例，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一场战争造成的死亡比率都要高。1676年，整整一代移民者死掉了。

伤亡惨重但仍坚强的移民者们发现，他们世界的社会和政治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已被吸进了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大旋涡之

中。几年过后，危机时期到达了它的再生。移民们们连接起团体纽带，使他们能够经受住斯图亚特王朝后代，约克公爵的专制主义阴谋。危机的高潮随着1689年的政治革命到来，这场革命引起了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全球性战争。但在1676年，北美移民者根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所有考验——同样不知道艰辛过后阳光灿烂的和平。

宗教改革百年周期

16世纪60年代末，英国人民对驱之不散的宗教冲突和内乱的幽灵感到焦虑。已遭受了几十年痛苦的他们担心未来还会更糟。但他们没有理由害怕来自国外的严重威胁，近来国王的前景也从未好过。那时，伊莉莎白一世女王已就位10年，她正在证明自己是都铎王朝中一位受欢迎和能干的君主。她正充实皇室的金库，与苏格兰重修旧好，显示出自己杰出的外交天赋和全方面的管理才能。

1569年秋天，突然传来由最有势力的贵族领导的天主教徒起义的消息。几个月内，女王发现自己与教皇之间断绝了关系，一年之后，又发现西班牙人企图暗杀她。1572年秋天，西班牙加盟的天主教联盟在圣巴尔托罗缪节屠杀了数千名法国新教教徒，而阿尔巴公爵的军队镇压了荷兰的新教起义。从地中海传来消息，西班牙摧毁了土耳其舰队。在地球的任何地方，西班牙的军队、舰艇和黄金都看上去不可战胜。在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的高墙之内，菲利普二世（伊莉莎白前任玛丽女王的丈夫）开始把伊莉莎白看作自己的心病。

感觉到自己被天主教帝国的武装力量所包围，英格兰会议在那一年召开，团结在他们女王的。形势严峻。卑微的政治被忘

记，征缴新税，招募新军，实行新贸易法，制定新的惩罚措施。随着危机再生的发展，英格兰重振旗鼓。在之后的60年中，危机状态将不会再出现高潮和减弱——除非菲利普二世的伟大舰队没有沉入海底。

中世纪后期百年周期

在15世纪50年代，中世纪信仰和习俗的黎明，英格兰人感到沮丧。最近几年，他们的王国几乎全部失去了在法国的广大领地。他们也饱受国王无能之苦，这位时而不时发癫的国王纵容皇室成员、腐败的法庭，无视国家的社会混乱——从大陆退回的服役和退伍老兵更是乱上添乱。即使如此，英格兰在和平时期仍保持着相对富足，没有现成的理由怀疑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能力。

接着1459年秋天发生了一系列焐件。势力强大的两大王朝，约克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争执、冲突和谈判——最终关系恶化，陷入公开的战争。催化剂事件发生在11月，当时兰开斯特王朝为主的“魔鬼会议”判处大多数约克王朝领袖犯有叛国罪。这些领袖们在12月逃离了英格兰，他们发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回去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在其后的18个月，这场战争席卷了整个英格兰。1460年春天，两方都抛工了中世纪开战之前是先谈判的惯例。到了秋天，每天都有落败的骑士被处死。第二年春天，约克派在陶顿战役中击垮了兰开斯特派。这场战役有近4万人死亡，以死亡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计算，它可算得上是英格兰人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过的战役中最为残烈的一次。

随着年轻的爱德华·约克的胜利，危机的再生开始了——但暴力远未结束。在其后的15年中，统治家族为了王冠之争换了

6个首脑，英格兰回到了无政府状态。玫瑰战争目睹了贵族们随意被杀戮，广大地产被没收，王子和国王被谋杀，以及紧急之下对中央权力的实验——什么都没有持续下来，直至1485年的危机高潮，那年，亨利·都铎建立起新的王朝。

危机与哈哈镜

人类历史上事后看上去是符合逻辑的，但事前看上去是一个谜。历史作家把两次战争间的社会描写成一种从战后到战前的进程，好象当时的人们知道转变会何时发生。这是一种有效的描述方法，可以用来看看从中间开始一直到每次第三次转折的初期，大约在其结束前8至10年——换句话说，现在，9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大概处在什么位置？一个人能较合理地预测到什么呢？

在1920年，美国人在冲突的道德阵中分化，一种不管不顾的寻欢作乐的心态形成。人们能够想像出发生在短见、冒险的公众身上的经济崩溃吗？可能。那么，能够预见全球大萧条、政治剧变和又一次更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吗？不能。

在1860年，一项南北双方的和解刚刚达成，而共和党还不存在。人们能够想像出最初的废权主义党后来入主白宫？可能。那么，能够预见一次恐怖的国家大出血，一次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有名的战争都更加血腥的内战吗？不能。

在1764年，英格兰还纵容它的新世界殖民地，并不让这些殖民地上的移民们支付战争和统治的所有费用。人们能够想像出沉重的新税和对民众抵抗的武装镇压？可能。那么，能够预见一场独立战争，争论不休的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国家，还有一个立宪共和国的诞生？不能。

在此之前的三个解体时期也适用相同的模式。在1660年、

1550年和1450年左右，人们能够想像出开始的零星战斗，但却无法预见最终的剧变。

在每一次第四次转折，催化剂事件是可以事先想到的，但危机高潮却无法预见。如果那时的人们应用了以上的形态结构，对于危机的最终方向、解决和会形成怎样的世界，他们将不会说什么。但是他们能够对于如何走出危机发出中肯的警告——将来发生的一切的时间、性质和范围。

第四次转折与原型

如果一个完整的百年周期过后，美国精神又将复兴，那我们会问，为什么？如何？引起社会巨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答案在于催化剂的成分。在化学中，催化剂是能使反应发生的物质，一种能够降低产生连锁反应所需能量临界值的成分。想像一个试管中装满了质量、温度和压力都保持稳定（或逐渐上升）的化学品。不管你怎么把火焰插入其中，它单独是不会产生爆炸的。因为它还需要在化学构成上发生一个小小的变化，这种新成分与其他变量结合在一起，就能降低点燃的能量临界值。

历史是不会给危机的反应促成者留下疑问的：世代原型的第四次转折星群。每一个百年周期，原型会形成一个易燃的组合，大大降低历史火花点燃危机的临界值。

近代世界以来，只有过一次第四次转折星群：老年预言家一代、中年游牧者一代、青年英雄一代和童年艺术家一代。五百年来，这种星群相同地重复出现了五次，而第六次将在时间和后果上略有不同。这种排列一直是盎格鲁—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恒量。

·高涨时期放纵的预言家一代儿童，出生在一次危机时期过后，进入中年管理阶层。

·解体时期受到保护的童年英雄一代儿童将在危机时期成为强大的年轻士兵。

·在危机时期窒息中成长的儿童后来将成为年轻艺术家一代。

前几章解释了危机时期如何塑造各代人；现在你看到了各代人如何塑造危机时期。这说明了历史循环与百年周期节奏之间的内在联系。

所有代间的转变对于第四次转折星群的形成都很重要，而预言家一代的老化是关键。危机催化事件发生紧跟在老年预言家原型到达其社会领导的顶点之后，那时他们的爱好倾向受到他人的限制最小。当预言家一代放弃任何延期或撤退的念头并把社会推向危机的航道时，再生到来了。当预言家一代在迅速从权力上退下来之前爆发最后的激情时，高潮到来了。当游牧者一代，在预言家一代象征性的帮助下，取得了完全控制时，解决到来了。

除了内战时期的游牧者一代和英雄一代，以前的每个危机时期都目睹了每一代原型进入之后的生命阶段：预言家一代进入老年，游牧者一代进入中年，英雄一代进入青年，艺术家一代进入童年。历史告诉我们了四个生命周期（和原型的依次阶段。

·当好幻想的预言家一代在中年时代替艺术家一代，他们继续进行更深的道德选择，为年轻人的世俗目标布置舞台。

随着预言家一代步入中提，对原则的热情使他们必须只进不退。他们的改革运动不再具有象征性；现在他们感觉到最后一次行动的紧急性。随着危机被引发，他们的文化论点将围绕着一种新的团体观点。在更大的社会里，他们为了道德权威而出卖物质

安全，并把他们一生的价值观议程转变为要求他们自己和他人牺牲的戒律。从年轻人那里，他们要求个人服从和尊敬；对于年轻人，他们给予自己年轻时根本没有的英雄主义和成就。

自从16世纪末以来，老年预言家一代向处在考验时期的年代一代提供了信仰的火炬。年老的清教徒一代面对死亡的是历史学家佩里·米勒所称的“宇宙乐观主义”。他们知道自己的世界正走向灾难。但当他们轻蔑他们所认为的自己孩子们的浅薄灵魂时，他们最后的行为就是树立不屈的榜样——面对反叛、国王和（首要的）异教徒。当美国革命爆发时，顽固的觉醒时期老年人即刻投入到政府鼓励英雄主义、诅咒叛逆的号召中。“让我们做……聪明人，”萨姆·亚当斯在1772年宣布。自己在祈祷而其他人在战斗，这一代产生了大陆会议的前两位总统，该大陆会议制定的蓝色法规使“真正的宗教和美德”成为国家的信条。在内战危机中，不论是在里士满还是在华盛顿，超验一代都主导着领导地位。“挑选战争工具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伤害性，”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在督促他的北军“把整个南方变成废墟”时这样吼道。他们这样做了，而在老年阿尔伯特·巴恩斯部长的必然的《正义的和平死亡》中找到了补偿。后来，年轻一点的亨利·亚当斯回忆起老年人的战争号角，挖苦说“往往是好人给世界最多的破坏。”

·当实用主义的游牧者一代在中年时代替预言家一代，他们运用坚韧和决心来捍卫社会，同时保护年轻人的利益。

想取胜但又怕输，游牧者一代步入中年时带着一丝疲惫，仍旧被迫在自己的工作和公共生活中无计划地冒险，他们开始在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小心翼翼。他们还认为阶级、民族、地区和性别作用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别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中间最能干的人是狡猾、实用主义和八面玲珑的公共人物。当危机时期到来，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在新旧秩序之间痛苦地分裂。但他们充满活力

（和富有牺牲精神）地面对现实，能够快速决断，而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视实用性高于理想化，中年游牧者一代与老年预言家一代建立起有效的同盟。但其他年龄的人们对他们多批评而少赞扬。

几个世纪以来，游牧者一代总扮演着中年掠夺者的角色，总能把事情搞定的略显老态、四处漂泊和（有时）可以贿赂的的冒险者：弗朗西斯·德里克与约翰·霍金斯；本杰明·丘奇与雅各布·莱斯勒；罗伯特·罗杰斯与丹尼尔·布恩；尤里塞斯·格兰特与博斯·特威德；休伊·朗与乔治·佩顿。在光荣革命危机中，骑士一代表现出勇气和慷慨。让老年人去谴责，他们发起反叛，并承担着北美殖民地在战争时期的税务，帮助它度过最黑暗的日子。在美国革命时期，如果起义失败，乔治·华盛顿的自由党同辈们会被吊死。他们战斗时是精神的爱国者（被英国人弗朗西斯·马里恩称为“沼泽地的狐狸”），“而不会像一名基督教徒或一名绅士般进行战斗。”他们取得了最艰难的胜利，进行了战争时期最大的变节，后来为新的国家了谨慎的现实主义。安德鲁·卡内基，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和约翰·D·洛克菲勒的镀金一代同辈们，证明了自己是金牌和力量的一代，不管是在危机时期还是之后。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成为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的必然的“志在必得的人”，再此之前，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发了财，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却在荒废的身体、家庭和农场中付出永远不能收回的代价。

·当富有合作精神的英雄一代在年轻时代替游牧者一代，他们向老年人领导的改革运动的政治失败挑战，持续着全社会的世俗危机。

成年的英雄一代具有一种建设性行为的强烈精神特质，本分行为的同辈人执行准则，和一种极其强烈的代间团体感。本能的

行动者和合作者，他们被吸引到明确定义的社会目标和人类关系周围。一旦得到命令，他们便团结一致。在危机高潮，他们的英雄主义看上去对于的有后代的光明或黑暗的未来都有作用。“真金火中炼”，塞尼卡曾说过，“好汉出逆境。”年轻人参战因为，像他们的社会一样，他们感到别无选择。

英雄一代为近代历史最著名的转折提供了支点，不管是年轻的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原野上的冲锋还是年轻的大兵一代在奥马哈海滩上的陷阵。科顿·马瑟称光荣革命为“一次愉快的革命”。历史学家 T. H. 布林 认为，北美殖民地危机“释放了长期压制的代间紧张”，并引发了政治权力从老人到年轻人的巨大转移。“所有游戏、骗局、誓言和谎话/正在过时，”这是美国革命时的一首民谣，“因为当代青年克己献身/所有非法激情都不见。”在老人的眼中，只有壮观才能形容年轻的“恺撒们”，他们签署了伟大的文件、赢得了伟大的战争、促成了伟大的立宪会议。“所有人类的伟大都应在我们身上发现，“年轻的大卫·汉弗来在约克镇胜利后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他们与前一代年轻人，当时辛辛苦苦的将军们之间的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当艺术家一代在童年时代替英雄一代，他们在一个政治巨变和成人自我牺牲的年代受到过分保护。

艺术家一代进入童的卓越，是一个大事件正在决定国家命运的时期，他们处在没有废知的大人的包围之中，后者极力保护着他们。人们希望孩子们听话、不受到伤害，好让大人做重要的事情。他们这么做了，尽管他们并不像前一代获得那样多的表扬。虽然确信自己的集体价值，他们不断被提醒，只要集体在为生存而奋斗，他们的个人需求就放在第二位。这慢慢引起了一种忧虑，他们如何才能不辜负强有力老年人的期望，后者正为他们做出牺牲。

从托马斯·莫尔和德西迪里厄斯·伊拉兹马斯的同辈人开始，给文明增加了最多的精致、微妙和公开的一代人就是那些童年简朴、基本和封闭的人。“在这些事情上，你太小心了，”科顿·马瑟这样谈论光荣革命危机中对“限制你的孩子”的必要性，在那个时期，城镇指定十户长“关注自己管辖下家庭中的每一类混乱。”整个童年都在观看大人们反抗国王，亨利·克莱“在革命的摇篮中受到震撼。”年轻时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着母亲的手，在安全地带观看邦克山战役，而年轻时的威廉·亨利·哈里森看到英国兵把家养牲畜当作靶子。在起草宪法时，教育家们塑造了第一批“国家的孩子”。在内战期间，小孩子的良好举止令一名外国人感慨——与前几十年形成鲜明对比——“在所有的美国学校里，盛行着如此绝对的服从和如此严格的纪律。”这种家庭生活的闭塞反应出年轻历史学家约塞夫·凯特所称“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希望把自己的生活与外面的狂风暴雨完全隔绝开来。”

像这些原型所显示的，第四次转折利用生命的季节带来时间季节的复兴。这样，它提供了经过历史大中止的通道，结束了百年周期的完整循环圈。

第四次转折是美国精神再现的时刻，唤醒人们的勇气和坚韧。另一个危机时期正在——不久就要到来。以历史为鉴，我们可以预见许多可能发生的事情。

第十章　第四次转折预言

大约在2005年左右，美国将进入第四次转折。

在2000-2010年代中期，美国将成为与20世纪20年代上次危机爆发时截然不同的一个社会。国家将更加富足，人民更加健康，技术更加卓越，人口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武器更加强大——但与以前的时期相比，还是具有解体时期社会的相同之处。他们逃脱不了百年循环；我们也不会。

一个火花将点燃起一种新的状态。今天，同一火花会燃烧，然后很快熄灭，它最后的火焰将确立和加深解体时期的社会心态。但这一次，它将引发一次危机。回顾历史，这一火花可能像金融危机一般是不吉的恶兆，可能如一次全国选举一样普普通通，也可能似茶话会般琐碎平常。它可能是一系列不吉、普通和琐碎的小事件混合的迅速后续。

回顾历史，每一次危机的引发显然都涉及到之前8或10年的事件。根据最近解体时期的趋势，以下可能成为2005年左右的情景：

·受到财政危机的困扰，一个州要求拥有其居民的联邦税金。总统宣布这是一种脱离联邦行为，并批准一项联邦强制命令。而州长拒绝让步。联邦法院执行官执行法院命令。相似的税款反叛

在其他州纷起。国库券买卖被取消。民兵暴乱爆发。电脑黑客摧毁了美国国税局数据库。美国特种部队进入警戒状态。要求召开新的制宪大会。

·全球恐怖主义组织炸毁了一架飞机，并宣称掌握着便携式原子武器。美国及其同盟国抢先发动进攻。恐怖主义者威胁对一个美国城市进行报复。国会宣布开战，批准不受限制的挨家挨户的搜查。反对党指责总统制造紧急事件是为了政治目的。全国性的罢工开始。外国资本撤离美国。

·联邦预算陷入僵局。总统和国会双方都拒绝让步，引发政府几乎全部倒台。总统宣布非常权力。国会废除了其权力。美元和债券价格直线下降。总统威胁停止社会保障项目。国会拒绝提高债务最高限度。国家面临着权力空缺。华尔街一片恐慌。

·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宣布一种新传染病在传播。该疾病到达人口聚集地区，一些人死掉。国会颁布强制性隔离措施。总统命令国民警卫队在不安全地区布置预防警戒线。市长进行抵制。郊区力量与城市民兵交战。不断呼吁增加总统宣布戒严令。

·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政治混乱不断，促使俄罗斯在边境驻军训练和演习。立陶宛爆发内战。和谈破裂。美国外交官被抓，受到公开嘲弄。总统空降部队前往营救，并命令军舰驶入黑海。伊朗宣布与俄罗斯结盟。黄金与石油价格飞涨。国会讨论是否恢复征兵。

以上这些情景实际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的是，根据这些情景背后的基本危机动力，将发生催化剂事件：一个最初的火花将引发不断反复和更加紧迫的连锁反应。这些情景的核心要素（债务、公民腐败、全球混乱）远比具体细节重要，因为催化剂事件将把后者以一种不可知的方式进行排列和联系。如果外国社会

也进入了第四次转折，则可能加速连锁反应。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这些事件将反映出，公共结构在其最薄弱点被撕破——而在解体时期，这些问题将被美国疏忽、否定和推迟。对于“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愤怒，将转变成对行动的号召，不管是否增大公共冒险性。催化剂事件不大可能恶化为完全的灾难，因为国家大概会找出转移最初的危险和稳定整个形势的方法。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恐怖主义遭到挫败，财政危机得到防范，疾病得到控制，战争狂热冷静下来。但是即使可怕的后果得到暂时的转移，美国仍将进入第四次转折。

新的状态和突出的新问题将自然成为解体时期公共信任下降的一个终点。在危机时期之前的几年中，潜意识中对于社会契约脆弱性的害怕将越积越多。当危机被引发时，这些害怕将冲出表面，露出峥嵘。有些怀疑的个人将感觉到，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更加怀疑。这种行为将愈演愈烈，成为一种突发性的下螺旋，社会信任从内部破裂。

如果这样，这种破裂将会波及金融市场——以及经济。在一个社会失去可信任性、无法维持市场经济必须依赖的劳动分工和长远诺言之前，咄咄逼人的个人主义、制度败落和长期悲观只能继续下去。经过解体时期，人们将偏向于（或至少，容忍）令人激动但同样令人迷惑的社会复杂性的趋向。但是随着危机状态的冻结，人们将开始意识到他们毫无希望地依赖于一栋颤巍巍的无名交易和纸上保证的大厦。许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的存款在哪里，他们的工作在哪里，他们的养老金在哪里，他们的政府如何工作。这个时期使金融世界被套利和束缚：借方不知道谁拿着他们的钞票，房主们不知道谁掌握着他们的抵押，股东们不知道谁管理着他们的股票——反之亦然。

几乎同时，每一代接近其新的生命阶段时都将触发不小的经

济警报，使人们意识到他们解体时期的国家对未来的准备如此不充分。膨胀一代的老年就要到来，暴露出私人存款的不足和公共承诺的无保证性。第13代将到达他们暴富暴贫的高峰，意识到他们不可能都成为能摆脱原地不动平均收入的幸运儿。千年一代成年后将面临着债务、沉重的税务和双层工资结构，对此老一辈们开始宣布不能容忍。当所有这些代人进入他们的危机星群，解体时期政府的财政在众人的期望面前捉襟见肘，而最初的官方答复将失去可信性。潜意识中的害怕现在变得急迫。解体时期那种隐隐的感觉——人们可能将无法从社会保障中得到太多的回收，将变成一种新的担心——所有一切，从国库券、再抵押凭证到共有基金，都可能成为未知数。

同时，美国短期的危机心理学将赶上长期的解体时期后的基本规律。这可能造成一种“大贬值”，大部分金融和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将大幅度降低。这种贬值可能很短暂，但会引起大恐慌，市场中没有顾客，物价直线下降。或者，它成为一系列向下钩住政治事件的棘齿，连续地把制度中剩余的公共信任抛出去。随着资产的贬值，信任将进一步解体，又会导致资产再贬值，这样恶性循环下去。资产价格、就业和生产上的每一个滑坡将使每一代人更加惊慌。存款的价值越来越小，新的老年人开始更加依赖政府，而政府却越来越无法支付他们的福利。随着纳税额的飞涨，新的中年人的实际收入到了最低点。随着就业的萎缩，新的年轻人的未来面临着更高的障碍。

很快，美国旧的公共秩序就将看起来陷入废墟，无法拯救。人们感到已从社会硬盘驱动器中取走，社会契约作废，旧的交易取消，大量未能兑现的诺言帐簿被清账。经济会到达一个低潮，看上去萧条就要开始。当美国显露出虚弱时，外国威胁虎视眈眈。

面对着低潮和威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和公共秩序将开始形

成。在最初的权宜之时，人们将无权得到什么，只能由政府批准给予一切。这将导致冲突，因为人们会努力弄明白这种批准在哪里、如何和由谁来行使。这种努力可能是和平式的，涉及政治进程——或暴力式的，涉及公共和个人民兵武装。公共需要将采取一种新形式和紧急性。旧的政治联盟将被打破，新的联盟将形成，对剧烈转变个人权利与义务之间平衡的法律的辩论将开始。国家问题将打破解体时期的圈圈框框，而对美国的日常生活投下清晰而紧随的影子。解体时期的文化战士将不再从外部攻击国家制度。第四次转折到来后，他们将完全负责。

紧接着催化剂事件之后，随着一派或联盟利用对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新公共要求，国家选举将产生彻底的政治重新排列。共和党、民主党或某一新党将最终赢得这场党派之间的拉锯战，结束了从觉醒时期到解体时期长达40年的政府分裂状态。胜利者现在有权去进行他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更加有效而非递增主义的议程，而对这些议程，他们的对手们一直发出严重的警告。这种新政权的统治将度过危机时期。不管何种意识形态，新的领袖们将主张公共权力、要求个人的牺牲精神。以往领袖们趋向于缓和社会压力，而现在他们将对其不断强调以争取国家的重视。危机再生在一步步的进行。

在对外事务方面，美国最初的第四次转折本能将是不管其他国家，把全国精力集中于国内一种新秩序的形成。后来，在实际或想像的外部挑衅的挑拨下，社会将重新回复武力。那时，在与其他国家协同事务上，美国是孤立主义者，而当它坚持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绝不能妥协时，它并不是孤立主义者。危机的状态将降低一种期望，即多变外交和推广全球民主能够使世界摆脱麻烦。甚至在每次冲突爆发之前，人们对于伤亡的可能性并不表示担忧。旧的解体时期的战略（灵活性、秘密行动、精英专家技术、远程

战略性武器和精确的目标）将被新的危机时期的战略所代替（大规模、胁迫、广泛征兵、正面进攻和全面胜利），后者更适于公共生存。那时，人们将回忆起解体时期——美国正从战后时期进到战前时期。

经济将及时从早期急剧的转变之中恢复过来。到了危机时期后期，随着信任、希望和急迫性不断上升，它将取得空前的效率和生产。但那时，经济也将发生根本的改变。与现在相比，它对全球的依赖性降低，跨越边境贸易和资本流动将较少。或许是在政府公开的引导下，其商业更加联盟化，工人也更加工会化。它将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储蓄和投资中。第四次转折的美国将开始设计下一百年周期的基本结构框架——收费公路、铁路和高速公路的高科技模拟。政府的经济作用将转向对于生存和未来承诺（国防、公共事业）的更多支出，而减少礼仪和过去的承诺（老年保健、债务偿还）。商业和政府的组织结构将更加简单和集中，管理阶层减少、工作头衔减少、交易商品和服务的类型减少。

同时，美国将通过一种前所未有的选择要求，纠正解体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分裂：无选择负担的选择。随着人们再次开始信任制度权威，他们将希望这种权威能够简化日常生活的选项——在商店里（更多标准统一的商品），在电视上（减少频道），在办公室（一种工资标准和一种福利项目），在投票箱中（一个主要党）。制度将越来越专横，限制个人自由，惩办粗鲁无礼，清洁文化。强有力的公共新组织将做出评判，何种个人权利应得到尊敬，何种不应。刑事司法将变得迅捷、粗犷，一些无辜者将受到践踏以示警告从而保护处于危险之中的令人绝望的社会。流浪者将被集中关起来，精神病人纷纷发作，刑事上诉简化，行刑加快。

大概要 10 年之后才会涌现出新的心态把美国推向第四次转折充满机会和危险的重大时刻：危机的高潮。那会是什么呢？回顾

第九章，高潮形式在25年之前，是完全无法预见的。想像某种国家性（或全球性）的火山爆发，熔岩最初沿着解体时期形成的痛苦隧道流动，然后被催化剂进一步激化。去预测一旦熔岩冲出隧道将在何处爆发，就像预测一场地震发生的确切地层一样。我们提前知道的只是关于高潮中的一些熔化成分，包括：

·经济困难：拖欠的公债，政府津贴信托资金的破产，贫困和失业人口的增加，贸易战，崩溃的金融市场和极度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社会困难：受到阶级、种族、本土主义或宗教支持和武装团伙挑拨的暴力，地下民兵组织和封闭团体的雇佣军；

·文化困难：媒体陷入极度腐化和有利于政府审查制度的强烈反应；

·技术困难：隐蔽的无政府主义，高技术寡头统治和生物遗传混乱；

·生态困难：空气污染，能源、水短缺、和新疾病；

·政治困难：制度崩溃，公开的税制反抗，一党霸权主义，宪法的重大更改，分离主义，独裁主义和国家边界改变；

·军事困难：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或外国政权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武器。

在即将来临的第四次转折，以上一些成分将发挥不了作用；其他的成分将以完全无法预测的方式沿着隧道膨胀、转向和重新接合。最终，美国的所有小问题将合成一个巨大的问题。社会生存将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公共问题将变得简单，脱离不了干脆的是或否选择的圈子。人们将离开小团体而加入相互连锁的集体，每一集体依赖于（并信任）其他集体所做的工作。人们将共享相

同的理想和牺牲——和一种新的社会平等观念。解体时期的分裂、复杂性和犬儒主义将成为遥远的记忆。新黄金时代的曙光出现在远方：只要这一重大问题得到解决。

决定性的事件将发生——如此广泛、强烈和独特超越了今天人们的想像。这些事件将激发伟大的文件和演讲，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构想在形成。人们将发现一股从未有过、从未想像过的迎接战斗和不畏死亡的能量，一股为了共同的事业让他们的孩子迎接战斗和不畏死亡的能量。美国精神将回来，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这样，美国将再次上演伟大的远古神话，ekpyrosis。这样，我们将实现下一次与命运的会面。

这次危机高潮将出现一次大的熵逆转，在人类历史的奇迹中信任将再生。经过第四次转折，旧的秩序将消亡，但之前必须产生新公共秩序的种子。在最危险的时刻，这颗种子将萌发，新的社会契约将生根发芽。在不长的时间内，美国的天空将得到扩展，动摇今天解体时期的社会心态。“每一件事都是新的，都在生长。”本杰明·拉什在美国革命的高潮时这样兴致勃勃地对他的朋友说道。所有一切都会再次发生。

巨大的公共成就——或分裂——的前景很高。新的分离主义运动可能突然冒出来，并以惊人的速度达到其目标。即使国家仍保持完整，它的地理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政党结构被改变，宪法和《人权法案》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历史甚至发出了冷静的警告：武装对抗通常发生在危机的高潮。如果没有对抗，则有可能导致战争。可能是任何形式的战争——阶级战争、局部战争、针对全球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战争、或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如果爆发战争，则可能最终成为全面战争，战斗直至失败的一方被彻底摧毁——领土被占领，领袖被俘虏。如果出现全面战争，

则可能使用上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

不管有没有战争，美国社会都会发生转变。再次出现的社会可能会更好，成为其“缔造者”们所骄傲的新国家。或者，它可能会变成无法形容的糟糕。第四次转折是光荣或毁灭的时代。危机革命将建立起我们的子孙们将在以后几十年中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历史压力下的新生，新的公共秩序将围绕着新的权力、统治、边界、条约、帝国和同盟稳定下来。危机高潮将退入公众的记忆之中——令所有想起它的人砰然心动，它对于之后出生的人极其重要，是后辈们神话和传奇的素材。不论好坏，活下来的每个人将继续与它的结果一起生活。

这些事件的动力是什么？随着百年周期的转变，今天的每一代都将进入新的生命阶段，产生出一个膨胀一代老年、第13代中年、千年一代青年和新沉默一代童年的危机星群。每一代的转变将取决于从解体时期到危机时期的状态转变。

当每一原型发挥自己新的社会作用时，美国社会将到达它力量的顶峰。自然秩序的给予者将是老年预言家一代，自然秩序的接受者将是青年英雄一代。无废话的老板们将是中年游牧者一代，敏感的灵魂将是童年艺术家一代。没有原型星群能够赶得上这种吸引力——这种把人类历史的自然动力凝结为新的公共目标的力量。没有什么能赶得上这种潜在的力量，它能够把无数的争论、不安、玩世不恭和悲观浓缩为一种启示的暴风雨。

想一想你今天认识（或知道）的所有膨胀一代、第13代和千年一代。想一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他们在追寻着前辈们在以前第四次转折中的原型道路。这将是美国的下一个危机星群，将推动美国通过历史的下一扇大门。

膨胀一代进入老年：老年预言家

1886 年，“在这一代让世界基督教化”成为美国内战后年轻人的座右铭。从青年到中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同辈传教一代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化战争中，揭露丑闻，宣扬禁欲的“社会福音”，宣布“人的友爱”，抨击禁酒主义。快进入老年时，他们尊敬老年的进步一代，后者持久的信任正处在专家技术、复杂和路易斯·布兰代斯所称的“考验和错误的过程”。老年进步一代一直反对老年税，斯坦利·霍尔指出，他同辈们“的才能和动力，最初遭到立法者的否定，在进入中年后如何完全爆发出来——假声混杂着男低音，像是奇怪的童声。”

当传教一代在老年时代替进步一代，美国老年人的人格面貌从友善、柔顺转变成为严厉和坚决。随着 1929 年的崩溃，身着黑衣的新的老年人们，在教堂和图书馆四处可见，他们希望通过榜样作用说服年轻人，按照维德尔·林赛的话说，“如果人们的理想能够改变，一个国家在一天内就可诞生。”随着老诗人和老作家们进入政治生活，老年传教一代总统们开始坚信第一原则。年轻人开始向老年人学习智慧和领导而不是温情和理解。身体已衰弱但头脑仍强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年轻人跟随的”领袖，历史学家亚瑟·M· 小谢尔辛格写道，“自从林肯之后，没有美国人受到如此爱戴。”“上帝，上帝，”林登·约翰回忆道，“他怎么能把它当作我们全部。”随着危机进入高潮，这一代开始宣布，如 80 岁的老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伦森在二战结束后所称的“人文社会，在天国、极乐世界、天堂、千年王国的名义下，在近四千年以来一直是所有好人的渴望。”

这是预言家一代最后一次进入第四次转折。

想一想在21世纪前10年末，老兵进行盛大的游行，越南战争50年的各种纪念仪式。觉醒时期的圣地兄弟会几乎被遗忘。解体时期带着“我们也战斗过”的小徽章的朝鲜战争老兵也将离去。代替他们的将是一把胡子、花里胡哨的老年宝瓶座一代，他们走路时故意不合节拍，用道德正直的目光盯着行人。

“你和我正走向一个意想不到的丰收的节日，”克雷格·卡佩尔对他的膨胀一代同辈人说道。在《退休神话》中，他把他这一代面临的老年比作是通向“猫头鹰山”的旅程，那时一个“原始的庇护所……自远古以来就一直保留下来，”使智慧“从不知的村庄穿越千年，传给我们。”

今天大部分老年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肯·达奇瓦尔德的《年龄潮》和谢里尔·罗素的《主流》给人的印象是，膨胀一代将像今天忙忙碌碌的老年退休者——除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外，他们将更加自私和（很容易预料到）多如牛毛。这种预测得出一个结论，在下个世纪初，年轻人数量将被医疗条件良好、四处游说和不服老的老年人超过。为了支持自己老年时消费型的“骗子形象”生活方式，膨胀一代将不得不对年轻人征受没收性税赋。如果如此，这将成为一种巨大的负担。但它不会发生。

膨胀一代会成为怎样的老人，可以从“意识老化”运动中找到线索。新潮的书像《从老化到圣贤》，谈到了新的“灵性老年学院”教授人们进行“寻求梦幻”。这些新的“部落老人”视自己为“智慧监护人”，必须运用“他们隐匿的直觉力量……成为先知，把智慧反馈给社会，并指导着治愈我们被围地球的长期感化项目。”膨胀一代老年学家哈里·穆迪看到了21世纪向“沉思的老年”的一种转变，它将取消今天对行动的关注，而“为了生存，

超越行动。”老年人将被认为在精神上比年轻人有天赋，“忙于培养平静和心性，从中可以得到神秘的体验。”痛苦和身体的衰弱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被看作是一种除去尘世渣滓、获取更深洞察力的必要方式。盖尔·希伊沉默一代的“无拘无束的80岁”令年轻人效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地球的新圣贤们想成为真正的老年人，这是人类文明中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些老年人的指导，年轻人将可能陷入平庸——有了他们的指导，年轻人能创造出老年学家大卫·古特曼所称的“新的神话”。

“新时代”老年学也再度发现了老年妇女的灵性。在《每个女人中的女神》中，琼·博伦描写了更年期后妇女地下岩洞进行的仪式。坐在“营养的黑暗中”，神圣地围成一圈，她们点燃蜡烛，让每一名参与者宣布传统的“智慧女人”是她新的自己。谈话中不能有带有贬义的词语像“干瘪老太婆”和“女巫”，尽管一位干瘪的女尸（像《波卡洪塔斯》中的“柳树奶奶”）是魔力的象征。

膨胀一代的福音教徒将加入寻找灵性的老年队伍中。老年保守的基督教徒将加强他们关于善与恶的布道，在公共生活中灌输上帝和祈祷，并且在公共仪式中要求遵守神的秩序。他们将把许多解体时期认为人工流产合法的新法律视为冒渎，还有遗传工程分娩，非传统式婚姻和安乐死。他们将重新使出生、婚姻和死亡宗教化，用宗教方式证明人生的重要转变。

膨胀一代领导的小团体文化将停止他们在解体时期的争吵，并寻找新的团体基础。民族优越主义论将在种族基本问题上表现出新的公共特点。父权运动将变得家长式（而女权主义将变得女家长式），要求执行家庭和团体标准。这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只占老年膨胀一代的一小部分，但像第二次和第三次转折中的嬉皮士和雅皮士一样，他们将受到关注并为第四次转折定下调子。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会很多——却无法避开，无法不看到和听到

他们的消息。

在老年的开端，膨胀一代将像其他年龄段初期所做的一样：他们将先抵制一段时间，然后开始涉入，最终对其赞美。像老年超验一代（他们留着大胡子作为智慧的象征），膨胀一代将树立雅致的老年象征——炫耀，而不是避开，时光的自然印记。在年轻人的印象中，大兵一代的风格是精力，沉默一代的风格是冷淡，而老年膨胀一代将是禅的宁静，一种显著的时间意识。慢慢地谈话、走路和开车都将成为沉思的象征，而不是衰老。膨胀一代老年的理想，不会是大兵一代的活动和悠闲，也不是沉默一代的移情和精通，而是深深思考的内心世界，想起爱默生的观点“当我们变老……美在内心偷窃。”

“退休”一词将具有新的反面含义，暗示着自私消费和文化上的漠然。老年的目标将不是退休，而是补充、反省或祈祷。任何退休的概念将退化，因为老年人追求新的生命后期的职业生涯，通常是在高名誉、低（或无）薪水的名誉职位上。在学术界，膨胀一代将在大学改造中充当一半教授、一半思想指导的角色。在教堂中，老年人将辛辛苦苦地布道，而年轻人在一边收钱，与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收音机将成为老年反省的阵地。

老年膨胀一代将被古典名著所吸引。他们生命后期的文化追求将不会唤起返老还童（像觉醒时期），而追求价值的保存，这将使其他人把他们视为古旧。膨胀一代将埋怨解体时期遗留下来的流行文化：暴力电影、商业街、便民店和宣传单。在他们的照管之下，好莱坞将确立品味的标准，出品一定的文学、传记和历史电影。老年旅游者将寻找自我发现和智慧，不再喜欢嬉闹的游艇和游戏，而偏爱幽静的寺院和太极。老年人的领地将不再是阳光城市和分套购置的公寓，而是塞多纳和乡下的小村落。老年精英将聚集在这一代长期居住的地区：北卡罗莱纳、西北太平洋沿岸、

新墨西哥和新英格兰。

膨胀一代仍将对年轻人提出很多的要求，但这些要求的性质完全不同于今天老年所提出的要求。觉醒时期的大兵一代给年轻人很重的财政负担，而危机时期的膨胀一代对年轻人的压力是文化上的。他们给人的印象将与觉醒时期截然不同：大兵一代老年人通过放弃道德权力而换来了世俗的奖赏，而膨胀一代恰恰相反。所以，孙子们不要指望他们做出金融建议（像大兵一代）和情感支持（像沉默一代），他们所能给予的是在理想和价值观念方面的指导。在年轻人看来，膨胀一代老年人显得非常古怪。对于膨胀一代认为的内心温暖，别人感到冷淡，而他们认为的伦理完美主义有时被别人看作是伪善。

在第四次转折中，膨胀一代可能处在经济下螺旋的中心。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他们的集体人格面貌。金融专家大卫·巴克评论道，“在 K－Wave 进程中出生的一代，不可避免地被其父母一代创造的财富宠坏，他们缺乏过去衰落的经验，无法产生一种金融和经济上的清醒，他们必将把制度推向悬崖。”出生的高涨时期正如宙斯的羊角般丰饶，成年时觉醒时期的财政杠杆正开足马力，而当膨胀一代步入老年时，国家经济给予他们的只有一副残局。这一代老人终生习惯于鼓吹他们从未表现出来的美德，说的太多，做的太少，因此他们将受到应有的惩罚。膨胀一代喜欢拖延问题，直到他们最终决定集中精力来解决它，但这时他们会突然发现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上；现在他们要对这种一贯的做法付出代价。膨胀一代迟早会明白，没有现成的钞票在他们老年时来支持他们习惯的消费方式。他们以及他们的国家的钱都不够。

突然认识到这一点后，膨胀一代的消费和储蓄习惯临近结束：大贬值。最后，他们将面对残酷的现实，处于危险之中的美国的

确不能（年轻人也不会）把老年人的补助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于是膨胀一代开始神经过敏式地保藏着剩下的资产。某种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物价暴跌，因为以前的投资者要在萎缩的市场里清算自己的财物。主要的国内买方将是第13代，他们的收入和财产远远比不上膨胀一代，也不清楚如何在动荡的市场中冒险。在美国处于财政危机时，外国人将犹豫是否购买更多的资产，特别是他们自己的社会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随后将发生短暂和剧烈的恐慌。多年的积蓄可能在几年——或几小时之内化为乌有。

大贬值可能影响膨胀一代，因为他们中一大批人到了正式退休年龄，而很久之前，社会保障计划就实行官方破产了。确实，这种恐慌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膨胀一代最先开始的金融担心。燃点可能发生在，当新的老年心态（1943年“胜利婴儿”群）与新的人口现状（巨大的1946年“婴儿膨胀”群）混合时，到达了临界质量。这可能发生在2005年左右——或许在2002年（这一年，1943年出生群满59岁，到了个人退休账户（IRA）分配的年龄）与2008年（这一年，1946年出生群满62岁，到了领取社会保障养老金的基本资格年龄，这一年龄以上的美国人中三分之二现在开始领取福利金）之间。

不像其前任，膨胀一代将认为自己的老年财政是私人事务，而不是公共事务。对于大兵一代来说，社会保障是一种通过政府的代间纽带，每月的社会保障养老金支票是退休老人平等权的一种标准象征。对于沉默一代来说，社会保障是符合规则的，混杂着喜悦（庆幸及时躲开了）和内疚（不安于增加孩子的负担）。对于膨胀一代来说，社会保障是宿命论和讽刺的对象。一些人会领取养老金，一些人则不。典型膨胀一代老年人的生活将依靠SEP-IRA（简化雇员养老金-个人退休账户）、基奥计划、401K项目、联邦福利、和其他各种各样多少不一的零散公司养老金。对许多

人来说，这样会多一些；但对其他人说来，几乎没有多少增加。

当市场接近谷底，数以百万计的膨胀一代发现自己的养老储蓄比想像少得多，他们将马上必须应付突然降低的物质消费。许多人被迫公社式地共同生活在一起，或与自己成年子女生活，同时想办法靠着为数不多的钱维持着体面的生活。一些没有亲属的老人将组成“有意家庭”，而其他想避开邻居的人将组成“有意社区”。

大贬值之后，膨胀一代将发现一种新的低消费的道德目的，因为美国处在危机时期，他们别无选择。如果以前危机未被引发，现在也会。加上其他紧急问题，对老年福利的公共开支将有必要降低。解体时期对社会保障的所有旧的承诺，现在知道都是假的，正如膨胀一代所想到的一样。这些承诺的失信将产生一种道德关注。辩论也将开始，哪一个旧的承诺（如果有）还应遵守，以及第二次新政应做出怎样的新承诺。在解体时期，国会争论是增加一个百分点还是两个百分点，而在危机时期，国会将讨论如何大幅度削减。为了维持大兵式的对年轻人的依赖，膨胀一代将不得不对自己成年的千年一代子女发动政治战争。但他们是不会的——即使他们做了，也不会获胜。

膨胀一代与其他代之间不会发生政治上的战斗，而是自己内部开始了道德上的战斗。拥有资产的人将控告没有资产的人不负责任和毫不节俭。没有资产的人将控告有资产的人养肥了腐败的旧秩序。年轻人对这两种控诉都赞成。最后，第二次新政将让膨胀一代，不论贫富，都付出代价。一辈子交纳高额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税的人，在经过资产测试后将被排除在福利之外。那些有资格获得公共援助的人，受到的待遇远远差于他们的大兵一代父母。在觉醒时期由大兵一代建造的退休老年人休息大厅，将被拆除。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复兴要靠自己，由一个老年委

员会提出，那时为后代的需要着想。《现代老年》杂志将改变其沉默一代追求新奇的风格，而转向膨胀一代古典的风格，并改变自己杂志的名字，用更加传统、直接的方式称呼老年。

第二次新政将使膨胀一代的老年医疗保险补助受到严格管理。把必要性变为美德，膨胀一代将把死亡的推迟看作是一种非公共津贴。许多老年人将避开高科技医院，而采用顺势疗法、最低限度的自我治疗和迪帕克·乔普拉称为“量子治疗”的思想－身体技术。大兵一代时期增扩的医疗设施（身体繁忙，思想闲着）将被较便宜的老年庇护所（身体闲着，思想繁忙）代替。尽管膨胀一代人数众多和寿命较长——就可能采用昂贵的药物安乐死技术——他们在第四次转折国家收入中的份额（用于联邦补助的老年医疗保险）可能低于解体时期。

老年膨胀一代将制定关于衰弱与死亡的新的社会伦理，就像他们年轻时，关于性和生育的道德规范。他们年轻时的精神特质依靠自我放纵，而老年的精神特质依靠自我否定。当他们体验着自己的身体在应付衰弱和死亡时，他们将希望政府做同样的事。老年将被看作是一个转变和准备死亡的时期。带着曾探索性爱本能的精神意识能量，他们现在将探讨的是自我毁灭的本能，对这种本能，《作为一种精神历程的老年化》中称为“最后的海上夜航”，给予老年人“具有博大智慧的勇气和洞察力”。他们将不再哀悼远航的朋友们，而是庆祝他们离去的灵魂仍然能够给予年轻人进行死后的教导。殡仪馆将帮助他们在死前准备讣告还有在永恒中与自己后代沟通的光盘。

随着他们进入年龄的顶层，膨胀一代认为自己是如人类学家琼·哈里法克斯所说的老人，“老鞋匠和裁缝，把我们缝回到造物的纤维之中。”他们将感到时间的一种新的变形范围，使他们能制造神话和榜样，使国家的共同体重新获得神圣化，治愈其机能障

碍，赋予下个黄金时代道德权力。膨胀一代对来世的这种高度专注，使年轻人认为他们无能。老年人对现世的蔑视被年轻人视为危险。尽管年轻人这样看待他们这些信使，他们仍将尊敬和信奉自己所送的信。

这样，老年预言家将再跑一趟。

距上一次出现八九十年过去了，美国又迎来了“一个古人的身影……结合了领袖和圣人，表现出他们祖先们的精神。”同样还会出现以下人的后代们：正义的清教徒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安德罗斯总督；在与英格兰分离的美国革命中，旧殖民地的州长们；在使兄弟们相互争斗的内战中，年老的激进分子；还有与命运相会的“新政弥赛亚”们。

老年预言家从何处来？想一想解体时期的膨胀一代超阶级；想一想威廉·贝内特的“后果与对抗”信函；预言环境灾难的艾尔·戈尔；号召对外敌进行“毫不留情、摧枯拉朽般地报复”的詹姆斯·韦伯；支持“7．0级经济复震”的詹姆斯·法洛斯；预算列车失事的“启示达尔曼”和“缺席纽特”；愿意牺牲其他人的生命来保护树木的“地球第一”怠工者；号召绝症患者“用最后的日子焚烧医院”的“上帝之军”反对人工堕胎主义者。想一想这些膨胀一代，越老越苛刻，受到老年人的鼓动，觉得自己的最后充满了力量，感到自己未决的死期，发动他们最后的改革运动——所有一切都在公共危险最大的时候。

当意志坚强、更加信奉福音教的50年代出生群，在公共生活中联合了更为出名的40年代出生群（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社会病态很少）之后，膨胀一代的人格面貌才会全面展现。这种联合将产生这一代的老年牧师－战士的人格面貌，验证彼得·科里尔和大卫·霍罗威茨在解体时期初期做出的警告，膨胀一代是“破坏性的一代，它的工作还没结束。”

随着危机的加深，膨胀一代将面临他们一生吸收价值观念的最终结果。他们将留下解体时期花言巧语的一条长长的轨迹，大部分是象征和手势，但现在有关的是话语。当詹姆斯·雷德菲尔德把他的同辈人描述为“这样一代人，他们的直觉将帮助引导人性向着一个……伟大的转变前进，”他们不再号召精神反思，而呼唤决定性的公共行动。膨胀一代将遵循科内尔·韦斯特的建议，“先知的标志在于，出于对勇气的爱，讲出——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阐述不屈原则的一贯性现在将带有执行的责任。

最后的膨胀一代领袖们——独断专行、严厉和坚强——将需要年轻人的广泛支持，而年轻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想像不到的智慧。在国内事务上，老年膨胀一代将把以往对文化战争的争论变为团体行动的一种新环境。他们将重新定义和鉴别一种公共扩张——这种开张来自于解体时期的某种文化保守主义与公共部门自由主义的混合。在对外事务上，他们将对其他国家的可接受行为进行狭义的定义，而对美国军队的合理使用进行广义的定义。

这些膨胀一代在年轻时是这样唱的，“绝不，我们不走！”，正是他们将成为美国最好战的老年一代。不管危机处于怎样的状态，老年膨胀一代领袖们将把赌注提高到无法撤回和回旋的地步。他们将冒着巨大痛苦和风险，要求年轻人去迎接战斗、不畏死亡，而当他们年轻时，自己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将像西塞罗一样认为，历史的这个时刻指派“年轻人去行动，老年人去指挥。”

老年膨胀一代将在危机高潮中发现超然卓越。当他们与时间和自然斗争以赢得历史对自己的豁免时，他们将觉得这是在几次通过痛苦的门槛，自己在管理国家（或许世界）。可以把老年宝瓶座一代看作是指引通往迦南的火炬——但同样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绑架、引渡亡灵通过冥河到达冥界的冥卫一（Charon）。二者都有可能。

随着危机的化解，老年膨胀一代还没有最后定论。如果他们获胜，他们可以集体地享有温斯顿·丘吉尔给予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颂词："令人钦佩地死"。如果他们失败，他们的罪行将给整个20世纪，或许更长远投下黑影。不管结果如何，后代们会在早已忘却了嬉皮士和雅皮士（除了历史学家）之后，将仍会想起膨胀一代老年预言家的人格面貌。

第13代进入中年：电子游戏迷

"现在皮带又系紧了，当我们回顾虚度的青春时，我们想起了恐惧，"斯考特·菲茨杰拉德在一次事故后这样说道，那次事故在他的同辈人本应最能赚钱的时候给他们当头一棒。"没有第二次的一代人"，他这样称呼迷惘一代的同辈们——但他们证明他错了。他们不再狂热，安定下来，帮助平息美国的心态。他们传教一代的前任在中年时相信广泛的改革运动，而事故后的迷惘一代跳过道德说教，直接回到生活的基础。"道德的就是你感觉好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宣布道，"不道德的就是你感觉不好的。""一切取决于它用在什么地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解释道，他代表着不管忠贞与否只做有用的事情的一代人——传教一代没有选择的角色。

这"没有第二次"的一代给予美国一股刚毅，度过了黑暗的全球紧急时刻，并最终获得胜利。在大萧条中，遭到沉重打击，但他们没有请求公共援助。在二战中，他们控制着征兵局，分发配给卷，策动进攻，派遣轰炸舰队。他们发布的命令杀死数千人但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残酷的将军和"让他们见鬼去吧"的总统，迷惘一代知道如何赢得胜算不大的机会和对付严厉的批评。

这是游牧者原型最后一次进入第四次转折。

最近的电影流派（从《战争游戏》和《回到未来》到《终结者》和《独立日》），都是一个模式的戏剧结构。一位年轻的主人公——单枪匹马、毫无准备、陷入蹩脚的文化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得以决定人类的命运。形势看上去很难确定。主人公成功的机会也微乎其微。但在关键时刻，这位孤胆英雄挑战命运，面对困难，专注于要点，针对要求而动，最终凯旋。最流行的电子游戏也有着相同的故事结构，强调一对一的行动和巧妙地选时：找到宝库，掌握工具，救出公主，拯救王国，杀掉敌人，活着回来。每一件事都是非分明，充满了口令和秘密地点——这种风格被一电视台经理称为"印弟安纳·琼斯遇到了游戏表演。"

"我瞧见了我们的未来。"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影片《说点什么》中警告说，"我要说的是——回去。"这条给她同学的信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游牧者一代——克利斯琴·斯莱特称为"一长串著名的死去的野蛮人的名单"——总是在财富、教育、安全、资历和其他发展方面失利的人们。但是他们一代位于胜利和悲剧之间的支点上，通过危机最黑暗的日子提高自己团体的名声。

第四次转折开始时，第13代在尽力维持着自己不稳的名声，唯一的变化是美国出现麻烦的年龄段将不是二十来岁，而是四十来岁。他们的名声是，在成年时，无论是家里还是学校里，礼貌和公共习惯都得不到重视。他们到来后，中年人将失去道德权威，于是变得强硬。他们的文化将是互不混和风格和多种伦理潮流的大杂烩，这反映出美国人（包括第13代）中渴望逃避的那种离心推力。

在经济中，比起80年代的膨胀一代，第13代的景况将更加悲惨。在金钱和职业出路上，他们将各不相同。一些人将大获成功，

更多的人将会一贫如洗，而大部分人将会失利，但这些人仍会苦苦地支撑。在危机时期，一般的中年工人将是工资不多不少的跳槽者，时刻保持着改变生活方向的灵活性。而典型的中年成功者将是高度狡猾、灵活和具有高科技独创性的企业家。而失败者的例子就是那些不可救药的赌博者，虽然输得精光但仍赌性不改。第13代把剩余的钱全压了上去，解体时期的这些赌场（从彩票、印度赌场到相关的市场）将同这代人一起，被打上耻辱的烙印，然后烂掉。

随着危机的加深，第13代遇到了钱的麻烦，但他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拥有生活”和保护自己家庭免遭经济痛苦的能力。他们的离婚率远比中年的沉默一代和膨胀一代低。他们将对孩子们施加压力。为了获得经济援助，许多人将邀请有钱的父母同自己住在一起。

第13代通过解体时期对危机时期进行分析，而中年沉默一代通过觉醒时期来分析高涨时期，他们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沉默一代感到一种幽闭恐惧，渴望打破紧闭的世界获得自由，而第13代感到一种旷野恐惧，渴望在过于开放的世界中立稳脚跟。沉默一代受到社会需要和个人愿望之间的折磨，而第13代受到了个人需要和社会愿望之间的折磨。

带有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第13代将坚持放松自己生存本能的念头——但将感觉到一种恢复团体感的需要。他们将不断推广技术和文化——但将支持主张改变它的政治家。中年西班牙裔、亚洲裔和阿拉伯裔等美国人将坚持自己的种族和民族特性——但将渴望与公共核心之间的新联系。

解体时期最初的第13代流行精英将失去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同辈人已对老一套厌倦了，开始寻找简朴和较少狂热的东西。那些坚持早已被遗弃的文化剧的人，在崭新、健康的千年一代年轻

文化中将受到惩戒，甚至被隔离起来。一些年老的被驱逐者将在世界各地漂泊，感到自己就像道格·库普朗所称的“一名白俄罗斯贵族，在巴黎咖啡馆中四处游荡，得不到应得的一切。”代替他们的将是《讨厌鬼的报复》式、稳扎稳打、埋头苦干的人（那是他们的道德观），这些人将赶上那些冒险投机的暴发户。

第13代的精神特质将变得切合实际、成熟，现在出于危机时期对安全的需要，他们的冒险性也被软化。中年人将引导青年运动，给困难时期带来新潮流，向新状态注入细致的技巧。他们将受到尊敬，因为他们精通于多媒体和各种各样无法学到的技术，对此沉默一代全然不会，而年轻的千年一代不屑一顾。在经济中，第13代与风险和不义之财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寻求有力的结果而不是内在的真实。“对于我们失去的理想主义，我们并将不会有坏的影响，”《懒鬼》出品人理查德·林克莱特预言道，因为他的一代“从不如此。”像海明威，他们的道德判断将是情景化的，决定于每个人事后感觉如何。

随着危机的加深，第13代将感到旧秩序无关紧要，自己的名字对于社会契约也意义不大。他们将完全成熟，不相信什么美国梦或美国例外论。他们将不知道，美国曾自我感觉良好，美国的公共和文化生活也曾看上去并不腐化。从童年到中年，他们一直感到，国家的核心制度主要是为了服务除了他们以外的其他人。他们同学和朋友中很少人将确立起公共部门的职业，除了老师和警察以外。大部分第13代的生活将导向一种自助网络，这种网络是由朋友和其他与政府无关的人造机构组成的。

“我们一文不值”，第13代这种薄弱的集体自尊感将定义和加强他们新的公共作用。解体时期膨胀一代自我陶醉，而美国却无力要求人们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牺牲；第13代讽刺性的自我贬低将使得他们的要求异常的无私。“我们可能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我

们可能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年轻人在《真色》中唱道，“所以，我们得不到我们应得的。”他们将不顾自己的短期利益，如果有人向他们劝说，团体的长远生存需要如此。沉默一代曾对程序制动机制感到痛苦，膨胀一代对于手势和象征主义争议很大，而第13代的选民们将抛开动机和意识形态，他们只是问，公共项目会不会取得值得的结果。

在第四次转折的“第二次新政”中，第13代将在战略上处于说教的老年膨胀一代和年轻的千年一代宝贝之间。他们占据着政治选择的空白地带，没有他们的支持，将不会达成代间的协议。在《早餐俱乐部》中，一名膨胀一代教师感到绝望，“这种念头会令我在半夜时惊起：当我变老时，是这些孩子照顾我。”当老年福利撞击财政大门时，膨胀一代和第13代将如兄弟般，毫不计较他们以前是怎样对待对方的。将会有人谈起民族代间战争，因为非盎格鲁第13代将抨击膨胀一代的福利制度，像前社会保障执行官多克斯所称的“这种机制使政府剥夺了他们孩子们的美好未来，仅仅是为了维持一群年老的白人。”在民族平民主义者领导下，第13代将与老年人讨价还价，在他们看来，后者是一生的伪君子，假惺惺地不对公共基金提出太多的要求。只要第二次新政触动了膨胀一代，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第13代也不会在意。

随着危机的发展，这一时期全新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将要求第13代确立自己新的适当位置。新的市长和州长们将抛弃旧的标志和同盟，把人们和技术缝合在一起，并重新点燃人们对团体目的的支持。在一种墙被拆除、家庭分解、忠诚被抛弃的状态中长大的第13代权力经纪人将重新建立起产生公共秩序的社会屏障。他们将首先想方设法让人们支持他们，然后利用贿赂（或威胁）让人们去做需要做的事情，接着强化这些安排，使它们运作起来。他们将不会担心显然无法解决的问题，也不会对仅仅烦人的事情

大惊小怪。他们的政治家不会充满激情和无微不至，也不会在意赢得漂亮不漂亮。对他们来说，结果远远比什么民主的仪式和美学重要。随着危机强化了自己的权力，第 13 代将把旧政权程序化法规和承诺清扫一光，不管 80 多岁沉默一代的痛苦。他们将不在意言语讽刺，不管是自己说别人，还是别人骂自己。在评论家看来，新型的第 13 代城市领导缺乏教养、价值观念差，甚至腐败，但能发挥作用。

这一代在制度上的无根性将使其领导和选区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有可能遭到强烈的反对。由于在旧秩序中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第 13 代很容易希望它分崩离析。他们将认为传统的安全对于自己的生活并不重要。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使他们确信，当人们丢掉了工作或失去了钱财时，他们可以想办法对付，解决问题，继续前进。回顾自己的生活，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许多觉醒时期和解体时期的趋势对于老一辈来说可能不错，但是对于他们——或对于国家来说，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危机时期到来后，第 13 代将感到要重新创造出一种安全世界就必须采取紧急行动，而在他们童年时，这种紧急行动是被否定的。

在这种环境中，第 13 代可能成为一种危机时期平民主义的领袖，这种平民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先采取行动以后再证明。具有超凡能力、反理智的煽动政治家会把第三次转折的广告口号变为第四次转折的政治口号："没有理由"、"为什么问为什么"、"就这样做"。开始是一种"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精神特质，信奉纯粹的行动，赞美力量，鼓吹冲动，蔑视弱小和怜悯。然后出现了阶级的绝望、反理性主义，察觉到国家在衰落。这种极端会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美国法西斯主义。

第 13 代生活的核心特点就是危机本身。在危机时期初期，大贬值会毁掉许多中年人的职业，使他们所保护的家庭陷入困境。

像20世纪20年代的迷惘一代，第13代将进入解体时期的市场繁荣——只是为了在不景气时再卖出去。同时，紧急出现的必要性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含义。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受到批评的许多特点——他们的活命主义、现实主义和缺乏情感——现在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国家资源。紧急情况将驱走许多解体时期对于政治正确性的指责。现在第13代不会再听到有人埋怨，什么他们的士兵过于尚武，什么他们的企业家过于苛刻，什么他们的领袖讲话过于唐突。随着危机被引发，他们只想起耶稣·琼斯的老歌，觉得自己“此时，此地/看着世界从历史中苏醒”，同时意识到他们就是受命于危难之中的一代。虽然对于膨胀一代推动的危机，第13代没有能力影响其基础和时间，但他们将成为现场的谋士和幕后的指挥，他们的决策将决定着危机的日常航道。

只有中年第13代能够使膨胀一代的危险倾向偏离。膨胀一代不会自己停下来，千年一代也不会，所以使命就落在了第13代身上；只有他们，将在热度过高时，迫使膨胀一代的牧师－战士们暂停一下，而当做出的牺牲超出了将来的回报时，让他们现实一点。第13代也许的确是英勇无畏的政治家、将军或总统顾问，他阻止了正义的老年宝瓶座一代没有丢掉命运的闪电、没有让世界之光熄灭。

在危机高潮之时和其后，第13代将取代膨胀一代的国家领导地位。历史警告，他们会很快发现自己正在玩现实世界中的“Sim City”游戏，他们必须快速做出选择，决定要牺牲谁，牺牲什么，以及何时牺牲和如何牺牲。他们将需要每一个那些旧的Doom游戏技巧——熟练地选择时机、判断要点的本能感觉、以及从一个问题转移到下一个问题的能力。不管做什么，他们得到的荣誉将少于耻辱。

千年一代进入青年：强力骑士 (POWER RANGERS)

"我宣誓做一名好美国人。"1933 年 10 万名年轻人作成年宣誓时唱道。"我将帮助罗斯福总统找回好时光。"这些年轻的大兵一代被马尔克姆·考利赞誉为"杰出的大学毕业生"，"在他们勾画的未来中，集体计划和社会纪律将使每个人受到保护。"——但是，在同一年代，考利的迷惘一代同辈们，在对自己未来的悲观中，已变得"失望和疲惫"。在迷惘一代成年高峰期，年轻人自杀率上升了 50%，杀人率上升了六倍，而扫盲率和大学入学率的提高幅度却小得可怜。

在 1929 年大萧条的前几年，年轻人取得了空前的积极变化。突然间，年轻人摆脱了愤世嫉俗、自杀和犯罪而转向乐观、教育和公共忠诚。国内开始谈论信任和井然的秩序，"头脑清醒"和"规范的小伙子"，他们"诚实"、"能够胜任"、和可以"信赖"。"在心里，我们真正认为我们不错，"基恩·舒福特回忆道。如果不景气的经济破坏了许多职业和婚姻计划，它只是更加坚定了大兵一代遵循 4H 箴言（头脑［head］、心灵［heart］、双手［hands］和健康［health］）的决心：让最好再好。老年人给予他们指引和帮助。美国"不能总是为年轻人创造未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前讲到，"但我们能够为未来塑造年轻人。"1932 年得到了年轻人 80%的选票、1936 年得到了 85%，富兰克林·罗斯福得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信任，他宣布"年轻人的目标已经改变"，不再是"爬黄金梯的美梦——每个人为自己"，而是"一条宽阔的大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同前进。"不久以后，大路和海上航道上遍是身穿制服的一代被马歇尔将军称为"世界上最棒的小子"——他

们前去征服的世界。“困难，我们现在有，”他们海军修建营的名言，“不可能，还得等一等。”

这是英雄原型最后一次进入第四次转折。

电子游戏中，强力骑士是身穿明亮、红黄兰三色制服、健壮的年轻士兵。跟第13代童年时的变形乌龟没有关系，他们成为解体时期孩子们最主要的偶像。一旦受到召唤，这些普通的年轻人将变成闪电般迅速的魔鬼战士。活泼、自信、充满活力，强力骑士只要有机会就能取胜。不管他们做什么——从表演武功到操作高科技武器——他们都是一个行动有序的队伍。他们的座右铭，“合作的力量战无不胜”，谈到了合作的力量、一致的能量和责任的美德。他们的任务并不由自己选择，而是听从一位无形的老人，他们完全相信他的远见和智慧。第四次转折到来后，成年的千年一代将与这些游戏角色拥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下一次危机中，千年一代将证明在以前觉醒时期和解体时期中产生的一种臆想是错误的，即青年是反叛、分离和愤世嫉俗的年龄。在进入20岁之后，千年一代将习惯于实现和辜负大人们的期望。在称颂声中，他们将复兴普通人的理想，德行的确定不是通过自己而是来自于集体的引力中心。不与老年人争论，千年一代将征求他们的建议——向膨胀一代询问应该做什么，向第13代请教想做什么。但是他们的风格与这二者是不同的。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大多数膨胀一代过于世故，而大多数第13代过于散漫，他们都不值得效仿。

新的流行文化趋向于规模、温和、友好。电影中，年轻的明星们与正面主题相联系，在性和语言的表现上更有适度，并把公共目的针对屏幕暴力。体育中，运动员更加听从裁判，对球队和球迷更加忠诚，减少了脏话、当面扣篮和球门区辱骂。流行音乐

中，千年一代将恢复过去的团体歌唱，从老的营火会风格到旋律简单、歌词向上的新歌曲。不管电影、体育还是音乐，第一批千年一代的名流们将由于为孩子们树立好榜样而赢得赞誉。

每一个年轻人的领域都将变得更加有礼貌、富有公共精神和平静的情绪。在大学，千年一代将领导学生复兴礼貌和外观，使亵渎成为过时。在城市街区，年轻人将开始感觉到，通往繁荣的最佳途径就是跟随自己的同辈，而不是家人。在技术方面，他们将发掘出公共空间的新概念——减少集中交流的途径，利用信息授权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在社会运动方面，他们将（最初）看起来是和平主义者，难以打扰，公共权力还仍使用。新闻媒体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称赞他们善行的机会。

在工作方面，千年一代将是秩序和和谐的探求者。他们的技术、工作习惯和制度忠诚将令老板们高兴。他们将具有组织和等级层次的窍门，而缺乏具有创造性的企业家才能。年轻的工人将重新振兴工会，对待同事更多的是亲情而不是敌对。随着千年一代开始工作和膨胀一代的退出，生产效率会突然提高——而在觉醒时期，当膨胀一代进入、大兵一代退出时，出现的是生产停滞。

大贬值发生之时，可能正是千年一代 20 来岁的时候，那时他们正成为真正的国家一代，老年人的自豪。不管出现怎么样的经济困难，千年一代将不会造反，相反，会为了公共目的而动员起来。老年人看到这些好小伙因为别人的过失而受罪，将会感到痛苦。膨胀一代和第 13 代将急切地联合采取措施，防止下一代再次无法实现美国梦。不管经济破坏程度如何，不管政府的财政面临怎样的困难，还是要为年轻的一代留出空间。为此，年轻工人的地位将被统一，工作头衔减少，工资差距缩小。千年一代的反应将是乐观的耐心等待，令人想起大萧条时期的大兵一代。政府将对他们的生活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所有的人都决心为千年一代

的光明前途扫除一切障碍。

年轻人的快速成长和充沛精力促使老年领袖们把他们提拔上来，参加公共行动，这在解体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的。年轻人将政治视为把团体目的转变为公共进步的一种工具。千年一代选民们中的大量年轻人将把评论家搞得糊里糊涂，他们代表着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像林肯和罗斯福这样的老年人能够把精神决心转变为公共权力。他们将拒绝他们在童年时就目睹的消极论，不会厌烦政治运动的热情。当年轻人遇到支持旧政权的领袖（即使老年福利项目损害预算，这种领袖也仍旧表示支持）时，他们不会退出，这是第13代的风格。相反，他们将积极行动击败对手。他们的胜利将令一些老年评论家在这个年轻一代的身上发现真正的危险，尽管他们还很天真。

出于对纪律和集中权力的渴望，年轻的千年一代可能把自己的主体交给煽动政治家。20%的千年一代童年时是贫困的（50%在内地），当他们在成人时看到自己通往成功的道路被老年人的惯性挡住，就会出现严峻的阶级战争危险。解体时期的成年人现在被统一的校服弄得沮丧，而到了危机时期，他们将会被千年一代的集体主义真正吓倒。像辛克莱尔·刘易斯在30年代警告大兵一代，老年美国人将看到国外秩序僵硬的社会，他们想知道，在自己国内的年轻人中间，那种情况是否也会发生。

不管他们的政治向何处发展，千年一代将加入一种新的美国主流，一个刚刚羽翼丰满的中产阶级正准备着坚持自己的权利。他们冷静的理性主义将惹恼好莱坞的解体时期精英们。他们对性别间一种新奥秘的承认将惹恼女权主义者。他们对贸易壁垒、政府调控、劳动标准和公共工程的要求将惹恼自由市场主义者。

就像解体时期的政治议程围绕着儿童，第二次新政的议程将围绕着年轻人。作为一种交换，老年膨胀一代将制定出义务服兵

役的新责任，尽管自己在年轻时曾抵制过征兵。千年一代将不会反对，因为他们把其看作是通往公共成就的一条途径。如果应征入伍，千年一代将把自己以前的和平主义抛在一边。像强力骑士一样，他们将不会反对军事化的集团暴力，而是反对不加控制的个人暴力——这与觉醒时期年轻的膨胀一代相反。国家领袖们将毫不犹豫，发起动员，把他们组成大军。年轻的膨胀一曾强烈反对责任与纪律，而年老的他们将从千年一代的队伍那里得到这些。

接近危机高潮时，年轻一代将要求自己的权利，这将成为他们的社会向不受控制的世界发号施令的一种高效工具。他们将展现出自己的显著能力，实施集体行为、征服远方的土地、有力地执行下达的命令。觉醒时期膨胀一代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削弱了公众的作战决心，与此相反，千年一代英雄般的牺牲将只会增强国家的信念。当危机时期的总统向社会保证要为光明的未来扫平道路时，千年一代年轻的政治力量将公开支持他们所爱戴的总司令。这一代年轻的英雄们将始终跟随着老年预言家，不管前面是胜利还是灾难。

新的沉默一代进入童年：可爱的纯真

"过分爱护最早是说我们的父母，"贝尼塔·艾斯勒回想起她沉默一代在大萧条时期，那时大人们对孩子的管教十分严厉。退回到大兵一代的童年，没有人会提及什么过分爱护，因为保护儿童的改革运动才刚刚开始。随着《文学文摘》要求"重新维护父母权威"，父母们如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所说的"重新明确地坚持孩子生活中的服从性"。大兵一代就是这样被抚养成人的，他们的童年在健康、人口规模和教育方面，取得了美国历史上一代人中最大的进步——同时年轻人的犯罪和自杀也大量减少。

当沉默一代到了入学年龄，举止文雅是理所当然的。当时主要的养育书籍提出，根据行为规则进行无废话的全情景教育。在电影中，艾尔法尔法或雪莉·坦普勒无论何时碰到大人，她们都必须“留心自己的举止”。在战争年代，美国拥有了或许是历史上最彬彬有礼的青少年，但是慢慢地争论开始了，父亲长年在外打仗是否会使孩子开始对自己不大确信。那种年代对于孩子来说的确可怕，因为每一天都可能传来噩耗。弗兰克·康罗伊回忆起，自己还是一个男孩时，“当没有战争时，报纸上会有什么呢。”

这是艺术家原型最后一次进入第四次转折。

“许多我们认为是黑人问题的社会状况，在一代人过后仅仅是白人问题。”威廉·拉斯伯利曾这样说道。在觉醒时期早期，美国城市中心的孩子是新趋势的预兆，这些趋势在解体时期开始之前折磨了整个社会：四分五裂的家庭、不上班的父亲、少女妈妈、日益上升的犯罪、学习成绩的下降。在今天的解体时期，美国的城市儿童再次成为路标。尽管在许多内地城市中，实际的暴力危险正开始减少，他们还是被整天关在家里，晚上睡在防弹的浴缸里，上学时由担心的父母陪着，后半夜实行警察宵禁，大街上根本见不到他们的身影。第四次转折到来后，各种各样这些90年代内地城市对儿童襁褓式看护的趋势还将在美国各地看到，不论是城市中心、郊区还是小城镇。

想一想这种儿童生活的世界，周围全是水泥墙壁，它们本来是用来避开万一危险的邻居。这种危险已经没有了（现在敌人更远了），但水泥墙还在。大人们不去拆墙，因为他们很忙，同时还发现这样可以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哪里。第四次转折到来后，儿童必须遵守的规则将开始超出最初制定这些规则的理由。想一想，外面的犯罪率已经下降，而上高中的孩子仍被关在墙内。想一想，

成年年轻人的服装新潮不断，而幼儿园还要求统一服装。想一想，一般的青少年听话、顺从，而警察还无处不在。解体时期那种父母和政府的合理保护，到了危机时期，将成为一种沉闷的窒息。

2000－2010年代的婴儿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艺术家原型，新的沉默一代。他们与危机时期的联系将成为社会未来脆弱的种子，在紧急情况缓解后和敌人被击败后，他们必须被保留下来。他们将成为危机时期担惊受怕的观察者、无足轻重的帮助者，和（如果一切顺利）幸运的继承者。被关在家里，他们将做一些帮助性的小事，像废品收回、打字或照看老人，这些2020年左右的情况回到二战时就是种植家庭菜园或捡废铁。新沉默一代将认为成年人能干、可以控制住局势。大人们普通的话语是干脆的对或错，他们希望的反应是毫不犹豫地服从。大人们不鼓励新沉默一代去碰运气和自己做事情。天真烂漫和可爱的纯真被认为是这些儿童们的应有表现。在解体时期开始，偏常将被重新定义。青少年性行为、堕胎和浪费将保持低水平。有子女夫妇的离婚将再次受到谴责，公开谈论私人事务将成为媒体的禁忌。与今天不同的是，大多数家庭分裂将是不情愿的，不是因为个人选择或家庭机能障碍，而是因为危机时期的力量超出家庭的控制。

儿童福利将成为公认的首要任务，无需任何人发起有关的改革运动。保护性教育方式将由自己控制。几乎没有大人会认为，孩子必须通过死记硬背学会集体规范。没有遵守标准的儿童将受到警告，集体有自己记忆的方式，年轻人的声名很容易被败坏，但却很难弥补。良好的儿童举止、爱学习和公共行为将很少受到奖赏，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应该的。

千年一代从未见过的儿童活动，现在都被确定下来。儿童世界的改变只能是为了团体的紧急需要，不会有任何新的儿童需求。在陷入危机的美国，没有人会专门关心青少年文化，只有对冒犯

行为的惩罚。随着本土主义的扩张，新沉默一代将成为移民最少的一代，英语为母语的人最多的一代。新沉默一代将在一个成年人做出牺牲和文化范围缩小的时代成长，他们将具有一种诚恳、多情感的气质，但也会感到自己生活在狭小的社会环境。

新沉默一代受到的这种教育是中年第13代做出的选择——他们将是美国危机时期的主要儿童抚养人。作为父母、教师和团体领袖，第13代将认为自己觉醒时期的童年混乱、匆忙、不安全和缺乏爱护。当他们对于自己即将建起来的坚实、可靠的家庭生活感到骄傲时，新沉默一代的孩子们会最终认为那时一种令人窒息的矫枉过正。后来，新沉默一代回忆起自己在危机时期的童年世界时，会认为过于简朴、过于缓慢、过分爱护、受到太多道德墙壁的包围——所以，像沉默一代一样，他们将放松父母管教子女的权力。

作为历史的另一个继承者或后英雄一代，新沉默一代将不断想起自己所作过的牺牲。随着危机向解决发展，他们将面对不安、恐惧和无力。在他们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感受。

接近第一次转折

当1781年英国军队在约克镇投降时，美国风笛手们演奏着“世界翻了个”。对于附近的爱国者士兵方队来说，这首歌的确唱出了历史——同样，在后来的百年周期中，对于在阿波马托克麦克林庄园集结的队伍，以及“密苏里”号航空母舰甲板上的士兵来说，历史确是如此。这些士兵亲眼目睹了难以置信的历史巨变，他们出席了对一个新历史黎明的最后确认。战争结束了。但他们的社会还在为危机而动员，仍充满了战争物资，尽管现在他们正

在回家的路上，计划着在一个他们希望平静的新时期内，如何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

当起草了最后的条约，确定了赔偿金额，做出了适当惩罚或取得了摄政权时，老年人留下来结束这个时期。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和巴黎，激进的共和党人在里士满和华盛顿，道格拉斯·麦克亚瑟在亚洲，乔治·马歇尔在欧洲。而最大的期望——如果以前的牧师－战士们仍坚持改革运动的话（就像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试图弹劾安德鲁·约翰森一样），却被他们隆重而坚定地推到一边。这是一个老故事：摩西不能陪伴约书亚去迦南。

“没有永远的冬天，”哈尔·博兰写道。“没有春天跳过它的季节。”百年周期的最终季节也是如此。在所有四次转折中，只有危机时期完全耗尽了它的能量，它的结果也最受欢迎。在自然中，寒冷的黑暗怀着一个目的，就是使之能够继续。“寒冷令人愉快，”帕斯卡说道，“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温暖。”

如果危机的催化事件按时来临，大约在2005年，那么高潮将在2020年左右，解决将在2026年左右。

美国退出第四次转折后会是什么样子？

历史不作保证。显然，情况可能非常糟糕——从核战争到无法控制的瘟疫，从恐怖主义混乱到高科技独裁。我们不应假想上天总是让我们国家躲开无法改变的悲剧，这种悲剧已摧毁了许多国家：那不仅仅是暂时的困境，而是一种倾覆性的彻底毁灭。经过越南战争，许多美国人就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大败仗。但是，在下一个第四次转折中的败仗，可能意味着无比地糟糕。它可能意味着持久的失败，从此我们国家的清白——或许还有我们国家——将永远无法恢复。如许多美国人从自己祖先的经历中所了解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一些社会从地图上被抹去，沦陷臣服，或被打回到野蛮中去。

下一个第四次转折的结果将确定我们现在所处解体时期的长远名声。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20年代被指责为一无是处。但当二战胜利后，美国人又开始高兴地回忆起那段喧嚣的好时光。想一想，假如没有大萧条，假如轴心国获胜，1950年又会怎样看待20年代。现在想一想危机前的90年代——所有它的O. J. 辛普森和密歇根民兵组织，它的Beavises and Buttheads和Crips and Bloods，它的低选民投票率和对一点点医疗保险削减的愤怒——假如从2030年的美国来看，又会怎样？

如果那时美国还没有进入一个萧条和暴力的时期，那么当我们回顾20世纪90年代时，将把它看成是一个错误价值、错误选择的时代。如果第四次转折顺利发展，那么对于解体时期的回忆就将带有怀旧的乐趣。更加重要的是，一个美好的结果将可能意味着，美国已把现在视为的个人自由，看作是对社会的腐蚀而把其建设性地插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中。在下一个第四次转折解决了百年周期的历史问题之后，许多今天解体时期的社会问题，将被认为是必须进行纠正的恶化征兆。

在每个百年周期中，觉醒时期产生出各种个人和社会的理想，这些理想在旧的制度秩序中是无法进行相互兼容的。在解体时期，想做与应该做之间的紧张度增大、恶化，并两级化。在危机时期，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在一个潜在较高的新文明水平上，对这些冲突的原则进行和解。在接着的高涨时期，这种契约提供出一个安全的平台，一种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将可在这个平台之上架起。用当时的话说，过去的三个危机时期都解决了恶化的价值观斗争，而这些斗争是在前一百年周期中发展起来的。美国革命解决了18世纪商业与公民权之间的斗争。美国内战解决了19世纪初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斗争。新政则解决了工业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

下一个第四次转折将解决当前哪一种紧张状态呢？很可能是，个人与集体之间长年斗争导致的文化战争——为我们最近的意识革命贴上新标签。这次，个人理想的标题为“选择”：从市场选择到生活方式的选择；从对礼节、外观和交往的选择到对表达和娱乐的选择。社会理想的标题是“团体”，它强调，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坚固的家庭、安全的边界、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健康的环境、和一个可持续文明的其他基本材料，就必须剥夺各种各样的选择。

在今天解体时期的悲观心态下，这两种对立的原则之间的和解看起来（基本上是）不可能，但随着第四次转折的到来，在社会 ekpyrosis 和再生的白热状态中，一种大型解决方法可能突然成形。一旦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得到签署，一种新的公共秩序得到确立，它就能清除（或至少缓解）许多今天看来无法解决的矛盾——比如，无责任离婚与可依赖家庭之间的矛盾，贫困援助与职业道德之间的矛盾，或强制控制与个人防卫之间的矛盾。如果下一个第四次转折成功结束，某一伟大的领袖将受到赞誉，因为他使个人权力与社会责任的较高理想相兼容，从而挽救了个人权力——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推行新政的同时挽救了资本主义，而林肯在重新定义国家地位的同时扩展了自由。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第四次转折如何建立一个新的高涨时期，一个新的黄金时期，一个美国文明的新高度，一个可行的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21世纪的重新定义。

对于危机时期可能发生的不可知事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因为以前第四次转折的记录给予我们乐观的理由。根据以前的五次危机，我们很难想像出这第六次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在内战结束后，美国人恢复了对于进步的信心，并且更加坚定。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在面临挑战时总能做得最好。作为旧世界希望与美德的灯塔，新世界仍在矗立着，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继续矗立下

去。

不管第四次转折的结果如何，不管 ekpyrosis 和新的社会契约会怎样，在结束之前，坚强信念和精神将不可动摇。人们将担心，一旦暴风云过后会发生什么。就像在二战对日作战胜利日过后的几个月里，人们会害怕，他们的社会可能回到危机前的混乱之中——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也可能发生。但是，在新转折的边缘，人们将惊奇地发现，他们新的公共习惯变得如此稳固。

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世代原型将面临新的变化。第四次转折将结束，老年预言家一代将衰弱，游牧者一代厌倦了公共急迫性，而英雄一代狂妄自大。当每一原型处在新的生命阶段的边缘之时，这将会发生：

·在退出制度时仍在主导着文化的老年预言家一代，现在对社会感到不安，因为新唯物主义令他们感到与社会格格不入。

·感觉到旧的改革运动已步入轨道的中年游牧者一代，现在计划着强化团体纪律，同时缩小个人选择的范围。

·在集体行动成功的鼓励下，年轻的英雄一代，现在正从外到内改变社会。

·作为强大成人世界中轻信的年轻人，童年的艺术家一代，学习相信习俗，并为帮助别人做准备。

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随着每一代开始进入新的生命阶段，原型星群将发生变化。

一旦老年预言家退出，成为历史，已对原则的代价厌倦了的年轻人，可能仍会尊敬但不再留意旧的道德要求。如果危机糟糕地结束，很老的膨胀一代可能受到真正地蔑视。如果危机成功地结束，他们在一个新的黄金时期里舒适地享用赞颂之词，这个新

时期与他们童年长大时的那个秩序社会很相似。许多人将隐居于森林或布满灰尘的图书馆，向子孙后代们遗赠他们最后的思想。像“四位老人”（霍姆斯、朗费罗、惠蒂尔和洛威尔）——他们的画像为无数镀金时代的教室增色不少，老年膨胀一代巨人无所不见的眼睛将注视下一个儿童一代。想起年老的苏珊·B·安东尼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运动所做的一切，一些膨胀一代的老古董们将劝告年轻人起来面对危机后的秩序，发起另一个20世纪60年代式的觉醒运动。在2050年左右，令一些仍活着的100来岁的佩花嬉皮士高兴的是，理想国（Pepperland）最后又将再现。

随着下一个高涨时期的到来，在最终摆脱了膨胀一代后，第13代又将成为美国新的一代守旧者，他们是危机时期的遗老，那个时期早已被众人所忘记。如果危机糟糕地结束，将可能出现煽动政治家、独裁主义者，甚至部落军阀来收拾残局。如果危机成功地结束，第13代的将军们则可能成为下一个高涨时期的美国总统。作为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将警告年轻人，不要急于跳入一个布满缺陷的世界中。他们将使国家的生产量高于消费量，很可能通过苛捐杂税和预算节余——这与解体时期——当他们年轻时——老年人所做的选择截然相反。在第13代的领导下，美国将集中于基本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不管文化内涵和精神热情。在高涨时期，对老年人的吝啬将被认为理所当然。尽管自己的老年受到无礼和忽视，但第13代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影响力和教育方面快速地超过自己，从而感到安慰。

在今天各代人中，千年一代大概是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面临最大危险的一代。如果危机糟糕地结束，他们将在其后的成年生活中肩负起所有的负担。如果他们，像内战时的进步一代年轻人，成年时在精神上受到创伤，千年一代，作为艺术家一代的后代，将精心看护、治疗自己的伤口。如果危机成功地结束，千年一代

将赢得美德、英勇和能力的胜利名誉。所有人将给予他们广泛的财政奖赏，并为他们树立丰碑。像中年的大兵一代征服了世界，千年一代将感到自己在科学和品位上极为现代。他们将建造新的大的东西，树立强大的社会政权，和溺爱自己的孩子。当新的觉醒一代后来出现时，千年一代才会第一次发现，有人拒绝赞美他们；而这些人正是他们刚刚成年的孩子。

危机的正面结局将使新沉默一代成为一种新秩序中的浪漫主义者、技术专家和美学家。但感到自己封闭性童年和后英雄青年的情感疲劳，他们将唱起哀伤的歌曲，讲述起笑话讽刺新秩序脆弱的不公平性。尽管无法达到千年一代的标准，他们仍将成为后者的得力助手。如果繁荣的新高涨时期把人类带入更远的太空，新沉默一代将可能乘坐第二代约翰·肯尼迪发射的太空飞船，在第二代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导航下，成为登上另一颗星球的第一人。

如果危机在胜利中结束，新的胜利一代又会怎样？作为孩子，他们将受到溺爱。作为年轻人，他们将反抗千年一代营造起来的世界。在中年时，他们将在公共腐化中保护自己的孩子。而老年时，大约在2100年左右，老年预言家又会在他们中间出现。

历史具有季节性，但其结果却并非注定。许多结果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到来的考验中挺住。除了等待它的到来，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进程将取决于，我们所做的准备，无论现在是作为一个社会还是个人。

第三部分 未雨绸缪

第十一章　为第四次转折做好准备

既然即将到来的百年周期的冬季如此寒冷，你也许会问：难道没有人能采取一些对策吗？

预言家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皆有定时。在人生与自然的四个季节中，每个季节都有一些人们应该做与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时代的行为规范与人生哲理。人生的春天充满了自由与欢乐，而秋天则未必如此。对土地来说也是这样：有耕种的季节，也有收获的季节；有几乎万物都可以生存的时节，也有几乎万物都无法生长的时候。如果你希望橡树果在春天落地、郁金香在秋天开放，一定会大失所望。

这种季节性原则也适用于百年周期。时间的循环往复不仅教会你接受历史的发展节奏，而且指导你去寻找利用这些节奏的方法，尽你所能实现你在这些节奏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对宿命主义者的一剂解药。如果你想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的东西，你有能力做到这点，但是你必须为此做出努力与牺牲。你和你所在的社会有能力去影响历史，但这也需要努力，而且你的努力必须恰到好处。现代人一般都想躲避所有残酷的季节。无论面对老年还是冬天，我们中许多人都想寻找一座桥梁、一堵墙或者一种医治的良方，以阻止你不想遇到的季节妨碍你既定目标的实现。直线时间观的本质就是如此。如果你按照这一战略去办事，你最好一帆风顺；否则，你就会发现自己陷入逆境之中，被

彻底打败。

最近人们担心美国"没有进入正轨"。这说明,直线式思维已经让人感到不安。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一个百年周期中的冬季正在走近。这种直觉是正确的,但在为人熟知的各种解决方法与范例中却很少窥到直觉的影子。人们现在是否需要一种新思想?不。恰恰相反,要为第四次转折做好准备,美国需要的是旧观念。

如同人生或自然一样,对付百年周期的正确方案是顺其自然,而非逆风而行。我们应该:

- **利用当前这次转折,参加到周期性活动中去;**
- **通过放弃各种适用于上次转折的习惯,避免出现亡羊补牢的尴尬局面;**
- **通过努力预测下次转折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可能产生的机会,提前做好准备。**

顺应周期的发展

要保持发展的周期性,美国应该充分利用当前所处的解体期。

无论成功与否,一个人在人生任何阶段都要努力满足该阶段的各种需求并享受期间的各种欢乐。中年可以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也可以让人大失所望。秋天可以是一个收获与美好的季节,也可以是荒凉与腐败的时节。正如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中年或秋天一样,一个人(或者社会)也可以拥有一个成功或失败的解体期。

今天的情况当然也是如此。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90年代的美国之复杂与多变令人吃惊。通俗文化极具创造性。新的

个性化技术极具挑战性，令人兴奋，而且大多在人们的购买能力之内，使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人类知识、文化与经验的机会。到异国他乡旅游比较安全而且大都能获得批准。有才气或市场影响力的人可以赚到许多钱。飞速发展的经济向人们提供了大量有趣的消费品。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及时享乐，因为第四次转折来临之后，我们会失去许多东西，而且也不会有足够的兴致。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你提高警惕。社会的多样化正在衍生新的种族分裂。从最坏的角度来看，通俗文化充满了暴力，而且会让人道德沦丧。新科技正在吞食传统的人类交往、礼仪与社会责任。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让人感到可怕。美国人的消费量超过了其生产量，而且债台高筑。我们现在应该防止并控制这些过度消费现象，同时还要意识到美国社会将在第四次转折到来后更加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努力将目前所处的转折期变为百年周期中一个金色的秋季，但无法将之倒转为春天。目前，我们处在解体期。如果我们不顾实际，奢望消除这一时期的所有恶习，那只能是一种愚蠢的想法。这一点我们根本做不到。

要避免陷入落后于时代的尴尬局面，美国应该停止高涨时期的某些做法。

人到中年后应该放弃青年时期的一些思想观念。有些中年人一举一动与青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应该好好体会一下“你的举止要与你的年龄一致”这句格言的含义。如果一个25岁的人做事不考虑后果，思想天真烂漫，还比较可爱；但如果一个50岁的人这样做就不然了。农民应该在收获季节收玉米，否则时间过后，雨水不再为作物提供营养，而且会让它发霉变质。同样，一个处于解体时期的社会必须放弃20年前有意义但现在却毫无意义可言的旧

习惯。

1997年不是1979年,而且我们也不能这样假设。90年代人们经常说的一个笑话是:人们在70年代拍的照片看上去非常滑稽。除衣着与发型之外,大多数美国人在意识革命之后重新调整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父母、教授或雇主用60年代的方法对待孩子、学生或青年工人,只能给人以古怪的印象,而且会受到激烈的反抗。如果今天的美国国会想学习"伟大的第89届国会",一定会受到大众的讥讽。在今天,除了用来描述一场职业体育比赛的决赛之外,人们很少用"伟大"这个词。

每当某些倍受大众关注的人物做了某些让人们联想到上次转折的事情,都会碰壁——经常是身败名裂。在高涨时期,麦克阿瑟想跨过鸭绿江,扩大朝鲜战争的范围,遭到了总统与大众的反对,因为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时机已经过去。公众在10年前还可忍受不加审判就将日裔美国人当作敌人逮捕入狱的做法,但10年之后,乔·麦卡锡最终受到了大众的谴责。林顿·约翰逊总统在越战时期的智囊团推行一种全球遏制战略,义务兵役制度。在高涨期,美国人支持这一做法,但现在却遭到了拒绝。在50年代早期,一些政客可以通过指责大众对祖国不忠诚而毁掉人们的事业;但在70年代早期,斯皮罗·阿格纽对持不同政见者大肆攻击,却只会对他们的前程有利,同时也加快了斯皮罗自毁前程的步伐。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尼克松:从他不断向"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出的呼吁、秘密亵渎行为到他身穿西服在海滩上散步这一典型形象,他是一个百年周期发展过程中的不合时宜者,他属于第一个转折期,却试图领导一个处于第二次转折中的国家。

在目前的解体时期,许多人已经为不合时宜的行为付出了巨大代价。盖利·哈特的政治仕途因为一场桃色事件而宣告结束。泰德·肯尼迪1969年在查帕奎迪克岛经历的交通事故要比这一事

件严重得多,但是肯尼迪却大难不死。当鲍勃·帕克伍德的批评者运用解体时期的标准去看待他觉醒时代的行为时,他只好从国会辞职。约塞林·埃尔德斯因为自己的见解落后于时代而失去了美国政府外科事务督察长的职务,而她的观点在20年前则会受到人们的称赞。卡尔文·克莱恩不得不撤回暴露青年人性特征的牛仔服装广告,尽管这在70年代可能会被人接受。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关于修建一座大型联邦保健大厦的提议让人们联想到约翰逊在1964年提出的制定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议。林顿·约翰逊的计划符合潮流,得以顺利实现,而克林顿的计划则因不合时宜而流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国应该从现在开始就为第四次转折做准备。

55岁左右的聪明人存钱,并保持良好的健康习惯。由于意识到老年将至,他们便尽其所能地将老年变成一个美好的人生阶段,否则会陷入为贫困与疾病困扰的苦难之中。在秋季,聪明的农民会为可能提前到来的严冬做好准备。他们保护自己的庄稼,收集种子,并储存燃料。同样,一个明智的社会也应该在解体期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各种准备。

即使当人们的思维中不再有周期性这个概念之时,对时间周期性的本能感受也会促使人们在危机之前做好各种有意义的准备工作。在上个百年周期的第三次转折期间,尽管本世纪前10年局势复杂多变,20年代充满了喧闹,传教士一代还是为危机做了准备,为美国对付随后发生的大萧条与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父母、教师、童子军团长恢复了儿童世界的秩序。文化界的领导者对好莱坞与棒球运动进行了重新调整。各种信仰鼓吹者发送各种以反对社会腐败为内容的信件。地方官员尝试新的社会发展项目。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外,美国政府没有借新债。人们在做这些事情

时，并未明确是为困难时期做准备，但是却达到了这种效果，使美国在以后大受其益。

美国内战之前的解体期说明，一个社会也可能做不到未雨绸缪。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50 年代，中年超验派的道德教义不是以改善家庭生活、保护儿童为目标，而是试图复活可以上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的一些旧思想(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情况极为相似)。超验主义观点时东时西，极不稳定，几乎不存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随着奴隶制从密苏里州向西扩展到堪萨斯州，一直到西海岸，政客们追求的是一种直线式妥协道路。同时，唯心论者加快了基督教主张的直线式发展之路，狂热宣称什么基督就要重新降临了。他们在 1844 年也曾这样做过，当时成千上万的米勒派教徒穿上登山装，爬到山顶去迎接上帝。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末期，年长的宗教狂热分子开始将他们在高涨期的热情融入到有关天启的布道之中。超验派在政治与军事方面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些行动将纠正一切社会不正常现象，为耶稣基督的复临俗世做好准备。在上一次觉醒期过时观念的号召下，内战时期的老年预言家早早就踏上了险恶的征程，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落后于时代的做法毫无意义，但未雨绸缪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如果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先见之明，我们会非常羡慕他。确实，美国历史上有几位最著名的总统在就职之前就在行动与言谈中表现出这种远见卓识。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在危机时期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预示了高涨期即将到来，并使这两位将军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领导人。在生活习惯与道德方面，约翰·肯尼迪预示了意识革命的到来。罗纳德·里根在觉醒期行将结束时紧张与慌乱的形势下，预感到一个充满自信与勇气的解体时代即将到来，而后来他成了那个时代的象征。美国历史上最受人们爱戴的两位民族救星都在第四次转折到来之前就对它们有所觉察：林

肯在道格拉斯辩论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就开始了新政实验。

近年来，许多美国人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们的国家再也不能产生激发人们斗志、具有强大号召力的领导者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将那些伟大人物推上最高领导职位的不是国家，而是转折。林肯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两人都不得不等待危机的到来。在解体时期，大多数有才能、有远见、品质高尚的人不想追求高位（当选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在这个时期，人们也不希望领导者带领他们完成什么宏伟大业。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人似乎很少关心领导者是谁，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位领导者不要带领他们沿着一个方向走得太快、太远。假设像林肯那样有勇气的总统候选人生活在当前这个时代，会给人以古怪、不合时宜的感觉。选民也许会羡慕他们，但是投票赞成者不会很多，尤其是在解体时期的大众媒体对这些大人物进行解构之后。

也许这样很好。如果我们在第四次转折就要到来之前选举一位林肯那样的领导者，林肯参加选举时的那种不详的前兆可能会重现。假设某位讲究原则的说教主义者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唤声中于 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可能会加快第四次危机的到来，让膨胀一代与第 13 代去扮演超验一代与镀金一代扮演过的角色。然而，第四次转折到来后，一位林肯似的领导者极有可能就职，而美国需要的也正是这样一位领导者。

美国人最喜欢的业余活动——棒球运动——也在周期性方面提供了同样的教训。在前四个百年周期中的第四次转折中都产生了一位伟大的棒球手。许多人都羡慕他们的生活习惯，但由于超前，还无法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行为标准。格里克在上次危机之前就表现出这一点，乔·迪马乔在高涨期之前，杰克·罗宾逊在觉醒期之前，莱吉·杰克逊在解体期之前。而卡尔·里普肯则是当前的

范例。里普肯所具有的美德与格里克非常相似,显然属于第四次转折期。尽管许多人羡慕他,但这不是在解体时期广受欢迎的那种喜欢制造新闻、目中无人、自由万岁的行为。

正如没有哪一种领导风格可以适用于所有时代一样,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各种政治理论也不能为所有转折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不管反对还是支持某一项具体政策,人们都很少考虑百年周期发生的某些变化。无论人们希望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政府还是要求降低各种税额,是加强管理还是放松管理,他们坚持这些观点时都不考虑时代的因素,仿佛他们的观点是一种可以不受时间限制的万能药方。政界与传媒的精英也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到社会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各种流行思想都缺乏周期性。只要这些思想模式存在,它们就会以美国例外论为基础,以直线方式向前发展。

然而这些思想的魅力也具有周期性。几乎所有政治哲学都是伴随着百年周期沉浮的。公共机构自由主义思想始于上一次危机时期,在高涨期逐步成熟,到觉醒期达到高潮,而在当前的解体期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冷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只是迟到了一个转折期(它始于解体期,在高涨期达到高潮)。利益集团多元化思想与自由市场的自由意志主义则是按照另一种模式发展的。既然这些思想强调权利,忽略义务,它们在上一个百年周期的解体期(20 世纪 20 年代)达到高潮,在危机期(30 年代)受到了冷落,在高涨期(50 年代)重新出现,在觉醒期影响越来越大,并在当前我们所处的解体期(90 年代)又一次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静态思想都有可能在每个百年周期的某个转折期大步前进(它向人们提供的都是些先见性、有益的东西),而在另一个转折期出现倒退(向人们提供的都是些落后于时代的有害的东西)。

在当前所处的解体时期，多元化思想与自由市场理论极为走红。历史发展的周期性规律表明，这两种思想现在正走向高潮。如果美国现在还处在高涨时期，有预见性的思想会建议人们大力提倡这两种思想。但是在今天，预见性思想则建议人们尽可能地放弃它们——因为在第四次转折到来后，美国不会再欢迎小团体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在新的百年周期到来之后，它们还会东山再起，尽管那一天可能要等到 21 世纪中叶。

许多著名活动的支持者由于对周期性规律的无知而吃了不少苦头。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反对堕胎者、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还是美国全国工业复兴总署，供应经济学政策倡导者还是民权法典或者主张集中力量搞好某一方面的改革的人们都坚持以非线性方式达到一种固定的活动目标。在一个周期性发展的世界中，这种努力势必会导致自我欺骗与挫败。在某些时代，这些活动的支持者宣称那些大多数无论如何都会应时出现的进步是由他们努力的结果。而在另一些时代，这些人又会为那些不是因为他们的过错而出现的社会倒退而黯然神伤。在上三个百年周期中，由政教分离主义者发动的社会活动(如女权主义或民权主义)一般是在高涨期播种，觉醒期开花，解体时成熟，然后在危机期走向没落。然而今天，他们中许多人仍在为那些落后于时代的目标而奋斗：他们在愤世嫉俗的解体时期寻求更多的觉醒时期的激情。这就像他们希望单凭自己的意志力来强迫卷旦状植物在 11 月的树林中开放一样。

要打破这些直线式教条，美国人必须重新审视他们对最近几次转折的看法。许多人对记忆中印象不好的年代痛恨不已。有些人痛恨本世纪 50 年代，另一些人则痛恨 60 年代，还有一些人痛恨 80 年代。这些酸楚的记忆(分别)反映了人们对高涨期、觉醒期或解体期的否定——仿佛那些时代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似的。这种观

点有失偏颇。上述各转折期(或者年代)并非必然要成为历史上的那种样子,但都是美国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我们现在记忆中的20世纪60年代也许可以改变——也许变得好些,也许变得坏些。即便有所变化,我们也得经历一个或好或坏的60年代,绝对不会重复50年代或者让80年代提前到来。美国高涨期不需要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但它的确需要一种社会静态平衡。意识革命并不需要一场越南战争或者水门事件,但它的确需要一场青年反抗运动与文化实验运动。今天的解体期不需要亵渎神灵的媒体或者无休止的财政赤字,但它的确需要个人主义与制度腐败。第四次转折不需要经济萧条或内战,但它的确需要大众的牺牲与政治动荡。

美国的两大政党也一直不擅长周期性思维。共和党没有想到觉醒期早期需要做些什么,民主党则没有猜到解体期早期需要干些什么。第四次转折距离现在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两个政党现在才弄懂了一半:民主党抓住百年周期中秋季收获的本能,而共和党人则抓住了剪除与分散的本能。两党都渴望尽快推出某些前瞻性政策:民主党希望缩小贫富差距,遏制中产阶级人口比例下滑的趋势,并多推出一些有关儿童的项目;共和党则想根除由来已久、难以对付的官僚机构存在的经济基础,恢复自我负责的伦理,并提倡某些传统美德。

然而两个政党都有一些有害的过时观念。民主党在寻求更大丰收时想尽可能地把“牺牲”一词从大众的词典中删除。他们想为所有受害者(其中包括整个中产阶级)寻求特权,但不关心这些确保消费的做法能否持续下去。如果民主党得逞,他们会向千年一代少年强加各种高额债务与税收。共和党人在寻求更多自由主义过程中尽可能削减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力。他们想让政府的财政收入出现匮乏,并乐意关闭所有联邦政府机构,以便说服别人,赞成

自己的观点。如果共和党得逞的话，他们将不会让千年一代与政府形成积极的关系，并控制用于关心贫困儿童、帮助他们入学的公用资金。

两个政党都在口头上宣称为千年一代儿童着想，但对百年周期揭示的内容却一无所知。民主党极力推崇大兵一代战时英雄主义，但没有思考应该树立哪些榜样，以便培养新一代人的团队精神；而反对大兵一代公民意识的共和党人也没有思考应该加强政府哪方面的形象，以便向年轻一代灌输社会公德意识。

假设两个政党在解体期剩余的时间内继续沿着自己的直线式道路前进。如果是这样，民主党人将仍对社会权威机构采取一种功利主义态度，它的收获意识过于浓厚，根本不想为重大的公共事业做出牺牲。让我们想像一下他们在危机即将到来时当政的情况：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们必须收回以前做出的各种提高公民消费水平的承诺，并要求选民做出一些牺牲。看上去，他们恰好不是统领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民族的政党。再让我们假设共和党继续沿着老路子前进，仍对个人牺牲采取一种功利主义态度，但是由于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太深，以致无法有效地动员大众从事任何事业。让我们想像一下共和党在危机时期执政的情况：骤然而至的危机急切要恢复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威，以实现一项全国性计划。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共和党看上去恰好也不是领导一个正在不断加强中的政府的政党。

当第四次转折到来之时，美国不仅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而且需要搞好政府机构的工作。哪个政党以更快、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找到一种可以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模式，哪个政党就会得到百年周期的垂青。两个政党应该赋予它们的思想以周期性：民主党需要补充限制收获的公民责任感，而共和党则需要限制分裂的社会权威思想。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些，机会将会让给前来补缺

的第三个政党。如果是那样,今天的两个大党中的一个或全部可能像辉格党那样走向灭亡。

历史告诫人们,当危机行将到来之际,一个此前非常重要的大党(或政府)会发现自己成为人们谴责的对象,因为它犯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导致国家陷入危机之中。无论谁在第四次危机到来时当权,都会成为由 1470 年兰加斯特王朝、1570 年的天主教徒、1680 年的斯图加特王朝、1770 年的托利党人、1860 年的民主党人与 1929 年的共和党人组成的不幸者名单中的一个。这个政党会发现自己在一个时期丧失了权力。与之相关的主要人物将身败名裂,成为人们责骂、羞辱与惩罚的对象,其遭遇可能会更糟。

美国应该如何做好准备

有关公众道德沦丧的牢骚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之初。有关个人为集体(无论是城邦、王国还是一个超级大国)做出牺牲这一理想的最精彩的评述通常出现在人们看到这种理想正在逐渐远去之时。关于这一点,人们都很清楚。但人们不清楚的是:这种牢骚几乎总是表明,最大的损失源于新近的某种原因。让我们读一下历史上最伟大的说教主义者(从西塞罗、老加图到伯克与博林布鲁克)的著作,看一下他们是怎样回忆一个离自己不很久远的伟人时代的。美国有关公众精神正在堕落的悲伤故事,无论讲述者是丹尼尔·韦伯斯特还是罗斯·贝鲁特,在追忆那个失去的天堂时,回顾的历史不会超过自己的童年。

如果人们如此频繁地丧失道德,人们也一定同样频繁地重新获得道德。在第四次转折中就是如此。虽然危机感可以让一个社会重新陷入绝望之中,它同样也可以使之恢复希望。这就是人们对百年周期中的冬季既欢迎又恐惧的原因所在。当今天的美国人

向前看时，他们遇到的挑战将是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季节，汇集新的社会力量，争取获得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毁灭性结果。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的准备工作越充分，我们度过危机并将危机期间的愤怒之情用于开创美好的事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要为第四次转折做好准备，美国可以利用各种周期性教训。在下面的建议中，我们将美国现在可以在解体期从事的活动与在危机到来之前根本不可能从事的行动划分开来。

·价值观念的准备：达成一致，振兴文化，但不要企望在短期内取得任何成绩。

美国的文化勇士不必担心价值观念是否会回到大众生活之中去。在第四次转折期间，人们总会重新接受这些观念。届时，人们的讲演将成为布道词；学校成为公共教堂；艺术成为一种有目的的宣传。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届时将盛行哪些价值观念，美国文化的统一性是否彻底与富有想像力，足以保证美国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避免遭遇毁灭性的多极化现象。无论站在文化战争的哪一方，人们都应该从实际利益出发与持相反观点的小群体结成联盟。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应该努力提高道德与文化标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也许无法结束解体时期的许多狂欢，但是从长远来看可以起到两种关键作用：有助于保护儿童世界，恢复公共机构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并使之重新获得人们期望已久的公众服务意识。一种堕落腐朽或者虚无主义的文化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媒体或者大众现在的自我控制力越差，一种外来的权威实现独裁的可能性就越大。

·公共机构的准备：精简机构，但不要试图进行任何大的建设

项目。

第四次转折将会触发一场超出人们想像的政治大动荡。新的公共权力机构一定会形成,这一过程应该迅速而坚决。如果一些旧政府的陈旧规章与仪式仍然大行其道,要实现上述目标非常不易。我们必须在危机到来之前简化联邦政府机构,方法是缩小其规模与职权范围,但同时又不能危及其核心基础。此外,我们应该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转变为颇具竞争性的政策实验室,就解决一些疑难社会问题的新方法、新策略进行实验。危机到来时,国家应该立即采取何种对策?地方政府进行的上述实验将为此提供经验基础。各级政府应该扫除法律、管理与业务领域妨碍机构改革的各种障碍。它们还应该简化办公程序,提高采取应急措施的效率。法院应该避免为立法活动或者行政法规在宪法方面设置障碍。在形势危机时,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各种障碍。如果法院不尽快采取有效的立法活动,可能会招致权威人士的过激反映。

·政治方面的准备:坦率地面对各种挑战,在权力与义务的关系上强调后者,不要尝试现在无法实现的改革活动。

当第四次转折到来时,许多美国人将会后悔自己在解体期面临的关乎全国的问题太少,因为那时人们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与此同时,人民对我们在今天所取得的任何进步,无论大小,都会感激不尽。为避免社会进一步腐败,政客们在谈及国家未来将要遇到的各种困难时必须诚实,并培养一种强调集体责任感高于个人权力的新的社会事业观。这样做,将有助于遏制犬儒主义、消极选举及冷漠情绪导致的社会退步。这将有助于扩大青年人参加选举的比例,改善媒体的社会态度,并保证大众在最低的程度上参与

大众生活。当危机到来后，无论这些政客在解体期获得的支持多么稀少，都将获得最佳的领导契机，成为伟大的领导者。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不能进行彻底改革，不应该在解体期尝试许多大型的社会工程：即使有人提议，也不会通过；即使通过了，也不会发挥作用。而如果将这些工程强加给公众，只能使公众更加看不起政治。

·社会方面的准备：必须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各种地方性问题，但不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办法。

当第四次转折到来之后，国家要生存，公众必须加强团结，牺牲个人利益，其程度要远远高于美国人现在所做的一切。从城市里的乱写乱画到郊区居民反抗公共设施建筑工程的活动，要么现在就逐一消除今天的各种反社会习惯，要么被明天的历史车轮所碾碎。只要发现社会机能失调行为，就必须予以反对。青年义务兵役制就要开始实行了：尽管我们今天无法推行这种制度，但我们应该进行某些实验，让自由派与保守派就青年人的成长问题达成共识。我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重新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各社团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各自的职能（学校教育、住房、运输、安全、司法与社会服务），不能指望从其他途径获得资助。各城镇应该创建一些公共活动场所，举行各种公众会议，并鼓励公民参加。我们应该积极倡导民族团结，反对小团体主义（从封闭的郊区到单一种族的大学宿舍）。在危机时期，国家的存亡取决于背景各不相同的人们能够形成一种新的团体意识。

·青年人的准备工作：要将儿童问题视为国家的首要问题，但不能越俎代庖。

第四次转折的结果可能取决于届时进入成年的一代人的勇气,也取决于这一代人在童年时期能否养成一种坚强的团队本能,一种积极参与公众活动的意识以及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思想。要把年轻人培养成为有能力、也愿意做社会要求他们做的事情的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地将培养工作做好。联邦政府应该从现在开始将其福利预算的重心从生活并不贫困的老人转到为贫困困扰的青年人身上。地方政府也应该促使广大民众形成一种共识:大力支持学校教育。通过与规范个人与社会行为的青年团体及教会合作,地方教育委员会应该制定较高的学习成绩与操行标准,推行仪表与言行约束制度,向学生传授各种团体观念,并通过让成绩好和成绩差的学生与朋友在一起来加强学生会工作。各级政府应该增加向为贫困学生设立的保险网与社会服务活动的投入,但重点必须放在儿童福利上。不负责任的父母必须受到严惩。千年一代是解体期美国最重要的投资对象,他们也应该得到这一待遇。

·老年人的准备工作:要告诉未来的老年人将来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但是不要大量削减当前老年人的福利。

进入第四次危机后不久,今天有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与其他老年福利项目的长期计划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经济将不会像保险业务员所认为的那样平稳发展,各种重大事件将迫使政府调整其支出项目。那时,谁也不会拥有特权。那些有困难的人只会得到一点“权力”。一些政界要人应该提醒今天有工作的美国人他们有许多弱点。应该鼓励人们将他们当前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储蓄,并允许他们将一部分联邦社会保险捐款投向某些资金充足、其债务不会给未来纳税人带来负担的计划。就雇员的养老金问

题,各级政府(包括军队)应该从明确的福利计划转化为明确的捐助计划,从而避免因缺乏资金而致的债务积累。有些公众福利(尤其是在保健领域)必须在危机到来之前予以削减。已经步入老年的大兵一代的福利待遇不应该受到影响。但是青年人(包括还没有退休的沉默一代)应该准备好度过一个自立程度较高的晚年,因为贫穷的年轻工人无法向他们提供生活补助。

·经济方面的准备:纠正一些根本性问题,但不要微调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

在危机期间,美国经济将在资产价值、生产、就业、物价水平与工业结构等方面受到巨大冲击。在一段时期内,为生产挽救国家所必须的工具,为下一个百年周期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美国经济可能会被推到崩溃的边缘。在解体期的剩余时间内,我们应该鼓励高科技创新与竞争,以便开发出可以实现终极配置的最佳技术。现在还不是配置上述技术或者推行优胜劣汰产业政策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努力提高全国的储蓄率。由于在当前这个被许多人口统计学家称为"财政小阳春"的时期盲目消费,美国正逐步进入这样一个时期:随着危机临近,在经济最困难时,社会没有资金兑现工人退休后应该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要提高私有机构的储蓄额,我们应该将税收重点由收入转向消费,批准为每个工人设立固定的或可转移养老金计划。要提高公有机构的储蓄率,我们不仅要把目标放在联邦预算平衡上,还要尽快实现财政盈余。如果美国在第三次转折时期经历一次经济不景气可以减少第四次危机时期经济萧条的危险(或者至少降低其严重性),那不失为一件好事。

·国防准备:要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动员全国人民,但切忌鲁

莽行事。

在解体期,一个社会对战争的威胁持乐观态度并希望通过孤立、外交、绝对优势及简单的善意行为可以使本社会(以及整个世界)免受极度的痛苦,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美国现在奉行的军事信条是在吸取了越战教训之后总结出来的,前述各种观点正是这种信条的前提。然而在第四次转折到来之前,美国应该还要在其他方面做好准备:可能发生一场大的战争,其规模之大、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多、动用武器之先进、死伤之惨重以及后方人们作出的牺牲之大要远远超过美国人现在所能忍受的程度。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型考验中,我们将几乎不会获得任何跨国机构的帮助,主要的支援来自身利益与我们相同的同盟国。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外交工作的重点(与对外援助)做相应调整。我们应该增加对军事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以预防未来各种危险,尽管人们现在对这种危险还不是很清楚;保持各种国防设施处于良好状态(根据紧急需要可以迅速扩大其规模);保留重新征用各种富余国内财产以及海外军事基地的能力。我们不应该将人力过于专业化,也不应该在某些战略部署上投入过多(如机器人武器与花费很高的信息技术),因为当危机到达高潮时,这些部署与技术就像当年法国的马奇诺防线那样很快就会过时。假设美国在本世纪 20 年代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与空军,这种做法可能会削弱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创建更新更先进军队的能力,从而使全国的备战工作陷入困境之中。

考虑到美国将要面临的各种巨大挑战,上述某些建议可能显得有些过于简单。但是在当前这个时期,你能做的只有这些。要想在解体期全面吹响全国总动员的号角,这毫无意义(甚至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我们有责任为我们自己,也是为子孙后代,

竭尽全力做好现在这个阶段所赋予的那些不是特别伟大的任务。这种工作我们做得越少,第四次转折期或危机期带来的灾难就越多越严重。

我们这个国家可能不会做好准备。这样一来,我们每个人就更应该从自我做起了。

你应该如何准备

让我们考虑一下一场冬季大风雪袭来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听过天气预报,但还是未能根据预报做好准备。天空暗了下来,然后风雪呼啸而来,如白色的恶魔在天空中肆虐。机器时代的一切都失去了效用。停了电,无法再收看电视节目。电池用完了,无法再收听广播。电话断了。道路不能通行。汽车陷入雪堆中。食品供应越来越少。现代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痕迹——银行办公机械、互助基金、大型零售店、计算机、卫星、飞机与各级政府——都形同虚设。大风雪把你弄得倾家荡产,把你的世界缩小到只有少数自然力量——有好有坏。坏的是自然因素。好的是你经历这场灾难后所发现的社会凝聚力:从你们全家人临危不惧、想方设法生活下来的各种技巧到同甘共苦的邻居,到一家人因为你以前在困难时帮助过他们而借给你一个可以安装在卡车上的耕犁。

想像一下你和你的亲人在呼啸的大风雪中度过好几年的情景。思考一下那时你需要什么,谁会帮助你,为什么有人把你的命运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这就是为百年周期做计划的方法。

不要以为你可以像今天逃离新闻、国家政治以及你讨厌的税收那样躲过第四次转折。历史告诫人们,一场危机会改变你现在想当然的基本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第四次转折必然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死亡与复活。这是整个民族度过难关的一种终极仪式,需要

一种彻底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混乱状态。谁也无法预测这种状态的特征与持续时间。它会引发社会混乱(以及强迫性迁移)、全民动员(以及青年人应征入伍)、经济崩溃(与大众失业)、通讯中断(家庭隔绝)或者社会(以及公共安全委员会)崩溃。它有可能同时引发上述几种景象。

如同在一场大风雪中,一些简单而根本的真理将会重现。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传说与神话内容。这些真理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人们在危险期需要这种东西。一些在解体时期未必会行得通的传统美德(如信任、可依赖性、耐心、坚忍不拔、节俭与无私)在危机时期将受到重视。如果历史发展不呈周期性,作为一种对人类无用的东西,这些美德可能早就衰退,进而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它们仍然保留在我们的传统之中,这是因为在每个百年周期,它们都会重现往日的光彩,得到人们的肯定,拥有这些美德的人将会受到人们的奖赏,而缺乏这些美德者将会受到惩罚。在讲述社会危机的英雄史诗(从《贝尔伍夫》到《海上胜利》)中,看一下谁获得了最终胜利,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当危机到来时,这些就是你所要模仿的神话,这些就是你要展示的价值观念。

要使自己为第四次转折做好准备,接受如下周期性的教训,一定会受益匪浅。

· 矫正:向古老的美德回归

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可靠者与不可靠者将水落石出,泾渭分明。你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善于自我克制,重视家庭生活,提高文化修养,相互信任。在你所在的城镇做一个好公民,在你所在的街道做一名好邻居,在工作中做一名优秀的合作者。待人有礼貌,坚持公共行为准则。希望提高自己所在社团的名声。第四次

转折对那些不讲信用、出尔反尔、自私自利的个人(或组织)自由主义者不会客气。你越是将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别人(你所在社团)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别人在紧急时刻给你的帮助就越多。人们会根据你所在的团体的名声来对待你。尽管你在目前这种制度下享有某些优势,但是如果一旦你的业务被发现具有掠夺性质,你的职业具有寄生性或者你的影响具有破坏性,那么你将陷入危险之中。

·融合:注意正在出现的团体标准

在第四次转折期间,美国这个民族的核心气质要比其表面多样性重要得多。团队、标牌与标准将成为新的时髦用语。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任何人与任何事物都会受到人们的冷落——情况可能还要糟糕。不要在集体中孤立自己。在一个你应该知道各级政府为满足你的最基本需要而努力工作的时代,如果你依然我行我素,可能会受到惩罚。人的外表非常重要。由于社会需要更多的秩序而又苦于没有足够的财力与时间来采取相应的措施,因而在司法方面表现得有些粗暴。在一些技术性细节消失之后,无辜者将会受难。如果你不想被错判,就不要招惹危机时期的权力机构。如果你属于一个少数种族,要提防一个过度自信的(可能还会有些独断专行)大种族本土主义思想卷土重来。在危机的高潮期,你也许必须在效忠于国家还是忠实于自己的团体之间做出选择。把自己与其他种族的人群隔离开来非常危险,因为你也许在危机时刻需要这些人的帮助,尽管现在不需要。

·结盟:建立各种个人关系

当危机到来时,不透露姓名的诡秘行为将与解体时期各种令人可疑的恶行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害怕的对象。人们重新重视直接的个人关系。要知道谁能够帮助你。在第四次转折期间,有几位非常要好的朋友非常重要。高层(公共机构)的腐败可能有所改观,但是由于人们希望得到官方的好处,以便满足自己最基本与最急切的需求,下层(私人)交易也会繁荣起来。市场也将推行同样的规则。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邻里、老板、雇员、顾客、供应商、债权人、债务人、政府官员、警察)将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要做好暴露个人隐私的准备。第四次转折对自由精神来说可能是一个黑暗时期:正如一种官员可以利用新权力为你做一些事情一样,还有另一种官员———一些被临时委托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人——也可能会利用新的权力来做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

· 团结:让你自己(以及你的儿女)做好协作的准备

在第四次转折期间,那些以接受主管机构的领导并能与他们友好协作而著称的人将会获得更多的奖赏。将你的技能、工作和娱乐与他人融合在一起。不要强调你与众不同之处,而要强调你与他人的共同点。在工作中,要接近那些将团队与等级观念结合起来的机构,以技术(包括计算机)为工具将人们集结在一起。要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不要将孩子隔离在主流文化之外。如果公立学校能正常运行的话,你应该让孩子在那里受教育,以便让他们在来自不同背景、能力各不相同的同龄人中学会一些与人相处的技巧。要希望孩子们与政府形成一种密切关系。你的孩子在进入成年的过程中,也许会被引入一种真正的危险环境。这当然会让你担心,但是考虑到青年人地位的上升,也会让你感到骄傲,看到希望。

· **根基:向你的家庭寻求支持**

当第四次转折到来时,你的家庭将成为你的最终安全网。要与你的家庭有亲缘关系的成员,如祖父祖母、孙子孙女,姻亲与远亲保持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当其他支持受到影响后,如果你的家族几代同堂,老幼相互帮助,它将为你提供最大的帮助。在危机高潮期,如果年龄还不很大就提前退休(或者居住的地方与其他家庭成员较远)将会产生一些新的困难。一个生活富裕的老人在解体期会考虑将尽可能多的财产留给自己的继承人,以免以后地产税猛增到几乎相当于充公的地步。如果你没有配偶或子女,就应该在朋友、邻居与同事之间建立一个类似家庭的救助网络。在第四次转折时期,社会陷入困境之中,因而决不是一个生活美满、感觉良好的时代。

· **振作:为公众救助机制能力下降或瘫痪做好准备**

在第四次转折时期,今天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大量福利(现金、保健、住房与社会服务)可能会急剧下降。那时,青年人而非老年人将成为社会活动与奖励的目标。只要你想获得高收入与增加财产,不满足于仅仅通过(针对失业者或残疾者,确定调查对象是否需要救济的)经济情况调查的水平线,就不应该完全相信美国政府有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甚至还包括公务员退休金可以信赖的允诺。因为这些都可能变得像大陆会议时期印制的美元与南北战争期间南方联邦印制的货币那样不可靠。你应该立即开始建立自己的金融保险。你应该储存许多钱,即使那意味着你要减少当前的生活支出。确保老年身体健康的最好办法是从现在

开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只能希望根据实际需要形成新的保健规则,不要指望他人为你在解体时期形成的一些不良习惯负责。与家人讨论一下这样的问题:如果或者当无法获得公共救助时,如何承受老年时的各种负担。反思一下你的生命(或死亡)将来一天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为可能在第四次转折时期遇到的各种痛苦选择做好准备。

· **减少损失:努力成为一名多面手**

危机一旦到来,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你现在刚开始干一项工作,就应该意识到那些掌握了许多生活技巧的多面手要比那些只能在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专家有优势。要尽可能地多学一门外语,多了解一些外国的文化,多掌握一门技术。你经营的企业可能会遇到市场状况急转直下的情况:国家补助减少时,条件与环境变化迅速,并会出现新的贸易壁垒。要避免进行大型投资或长期负债,其中包括大量学生债务。假设你所有的外部安全网(退休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会彻底崩溃,要在解体期剩余的时间中向有价证券投资,以便获利,但要时刻关注公众的情绪。要记住我们离第四次危机越近,出现大规模贬值的可能性就越大。收起你的钱包,把资产转往国外,因为那里的百年周期的发展节奏与美国有所不同。进入危机时要有数量可靠的流动资金,各种储蓄以及一定数量的流动资产。真正了解自己的钱投往何处。努力确保无论发生什么严重后果(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市场倒闭、银行恐慌以及国债的拖欠),都不会毁掉自己的全部资产基础。

如果你吸取这些教训,就会少冒一些险。如果你非常走运,危

机可能对你的影响不大。通过自己的准备之后,你也许仍会失去一些短期收入或快乐,但不会失去任何重要的东西。假设你不走运,没有提前做好准备,你将有许多东西陷人危险之中。历史告诫人们,百年周期的冬季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能是一种煎熬,对那些毫无心理准备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无论你的年龄、性别、收入、种族、家庭地位和工作类型,今天的明智抉择将会帮助你避免在第四次转折期间陷入真正的困境。

世代传记

在古罗马,人们认为,大多数人在一生中只能亲眼目睹一次百年体育盛会。不同人经历这次盛会的年龄也各不相同,有人在老年,有人在中年,有人在青年,也有人在童年。人们经历这次盛会的人生阶段会在罗马的史册上留下永久的一笔。

世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每个原型都要走过百年周期中的四个阶段,这与自然界中一年都要经历四个季节非常相似。既然各个原型在不同年龄段经历冬季,那么冬季也分别与以每个年龄阶段为内容的世代传记相对应。因此,第四次转折为每个原型提供的传记也各不相同。

在这些传记中,每种原型都在危机时期面对自己的阴影,而且都会发现自己可以向社会展现一种在儿童时期所缺乏的特性。出生在高涨期的预言家寻找梦幻;出生在觉醒期的游牧者则面对现实;出生在解体期的英雄追求权势;出生在危机之前或危机期间的艺术家则寻求同感或共鸣。

在进人以及在整个下一次第四次转折过程中,美国的世代星座将发生巨大变化。生活在今天的各代人中,在人口统计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将发生在2005年与2026年之间。到那时,美国大

兵一代中的大部分成员将离开了人世,开始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祖先。大兵一代成员 8 个人中将只有 1 个人能看到危机时期的到来,而看到它结束的 250 人中才有 1 个。沉默一代的机遇非常不好,只能作为成年时经历的那场伟大事件的不完全见证人。沉默一代成员 5 个人中有 3 个将能看到第四次转折的开端,只有 1 人能看到其结束。大约六分之五的膨胀一代将能活到危机爆发时,三分之二能活到危机结束。第 13 代中的绝大多数将能亲眼目睹第四次转折的结束,他们在进入危机时将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代人,但在危机过后却被另外两代人超过。到危机结束时,千年一代将成为参加选举人数最多的一代。

如果今天的世代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走下去,那么国家领导层将发生如下变化:在危机开始阶段,沉默一代会丧失权威地位,而膨胀一代将达到权力的巅峰,第 13 代将以很快的速度上升,千年一代则将成长为年轻的选民与士兵。在危机结束后,沉默一代将失去所有的权力,膨胀一代即将走入深渊,而第 13 代正向巅峰迈进,千年一代迅速上升,新的沉默一代将获得选举权并开始服兵役。

作为个人,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帮助美国度过危机。但是作为各个世代的成员,我们的能力要大得多。请记住百年周期的核心动力:历史塑造了各个世代,而各个世代也创造了历史。

大兵一代的传记

英雄不希望在解体期——一个他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陷入分裂与崩溃的时代去世。英雄在晚年发现社会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而年轻一代又毫无解决办法,那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英雄必须承认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次危机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

道它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只知道危机到来时,英雄的阴影(预言家)会让社会陷入一个非常时期,这和英雄本人当年成名的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两样,英雄本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但实际不然。他们发现青年预言家的个人中心主义思想过于严重,不明白这样的性格怎么能培养出能力与德行可以与自己相比的儿童英雄一代呢?

大兵一代应该抛弃前嫌与膨胀一代讲和。大兵一代应该在膨胀一代身上发现先人的一种精神——并在千年一代身上发现一种自己在孩童时代曾经拥有过的童子军式的美德。大兵一代应该认为,膨胀一代的风格是培养孩子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这些孩子将来有一天可能在危机时期应征入伍,就像他们在二战时英勇参战一样。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大兵一代必须允许膨胀一代在公共生活中为千年一代保留一个位置。这进而又要求大兵一代接受这样的观点:保障千年一代(而非他们个人)生活的幸福是解体时期美国政府的头等大事。

在各类成年原型中,大兵一代拥有美国要在第四次转折中取得胜利所必需的公共美德。他们比任何一代人更清楚公众应该做出多大程度的牺牲。然而,他们在觉醒过后与膨胀一代主导的文化产生的隔阂影响了大兵一代无私无畏的名声,也影响了他们年轻时英勇作战的历史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同样也为他们推卸责任与牺牲提供了借口。为了让美国为第四次危机做好准备,大兵一代必须重新树立他们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形象,方法是恢复他们在大萧条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公共美德(集体第一的态度),并抛弃后来形成的错误态度(我们第一的态度)。年轻一代永远都不会逼迫大兵一代放弃他们的英雄业绩。然而,通过放弃其中一部分不受人们注意的东西,大兵一代可以将自己从老年公民变为公民中受人尊敬的长者,与青年人谈话时又可以恢复往日的权威性,告诉他们必须遏制住公共道德行为恶化的趋势。

如果大兵一代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曾经挽救过的美国将会走向衰落。缺粮少米,受人冷落的千年一代儿童长大后可能不会拥有在第四次转折中取得胜利的传奇般的“资本”。日本投降以后放下刀枪的大兵一代整整等了四代人,才盼到一代可以重新抽出入匣刀剑的儿童的到来。如果大兵一代看到这一点并认真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将死而无憾,正如托马斯·马洛里爵士描写亚瑟王时写的那样:这里躺的是亚瑟,以前他当过国王,将来还要成为国王。

沉默一代的传记

在忧虑重重的儿童时代经历过上一次危机的艺术家将在同样充满忧虑的老年时期走向下一次危机。他们将看到危机的激化,感觉到其情绪的变化,但是可能在尚未弄清具体情况之前就离开人世。因此,在第四次转折期间,艺术家必须克制自己,不能像其他原型那样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解体期,老年艺术家在游牧者身上几乎看不到自己的优秀品质,(担心)他们将愚蠢地毁掉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艺术家甚至还会担心,优雅与敏感将与他们一同消失。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游牧者的抚养下,一个新的艺术家原型不久就会在第四次转折期间得以复活,他们所具备的品质正是老一代艺术家所希望保留的。

在第四次转折期间,沉默一代将逐步退出政坛,实干的机会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否决(或者总是扰乱)别人的行动。他们剩余的权力主要在法庭上。如果他们阻止下一次新政,沉默一代中的法理学家将步 19 世纪 50 年代罗杰·塔尼和 20 世纪 30 年代“九位老人”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之后尘。他们应该避免与膨胀一代立法中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也不要利用细节、复杂性与拖延等手段来

扼杀公共权威机构的复兴。危机时期的各种冲突不是轻易就能化解的,矛盾双方将拒绝第三方的调停。增加新程序并不会提高决策的质量,而人们也没有时间去好好研究迫在眉睫的问题。沉默一代应该尊重第13代的观点——专家可能会犯大错误,职业精英也会在一些问题上栽跟头,良好的愿望未必产生好的效果。随着危机的深化,第13代的生存思想将胜过沉默一代所主张的程序方面的民主。

然而,在解体期的剩余时间中,沉默一代提供的一种药剂——被进步党一代中的艾拉·威勒·威尔考克斯称为"热情的艺术"——对美国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大有裨益。沉默一代借助于自己的沉稳、节制与平衡,可以非常巧妙地消解膨胀一代的怒气,并对第13代的冷漠发起挑战,从而避免这两代人在第四次转折到来之前使美国陷入危险的深潭。在千年转折之际,选举一位能与别人产生共鸣的沉默一代成员做总统,也许可以延长一下解体期,使膨胀一代与第13代无法发展其最恶劣的本能,直到两者进一步成熟起来。然而,危机一旦到来,沉默一代的领导使命也将结束了。

沉默一代渴望成为年轻一代的良师益友,但是他们也应该意识到千年一代不像第13代,更不像膨胀一代。正在成长中的这代人不倡导个人主义与内省。他们所需要的恰好相反——团结与建设。这代儿童生活的世界现在正从由沉默一代父母、教育者与通俗文化领导者在觉醒时期开展的改革运动中恢复过来。千年一代就是在这种不断变化中逐渐长大的。沉默一代能为千年一代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是成为他们的助手。如同在老年时的经历一样,随着沉默一代成员逐渐离开人世,他们也许能够偷偷摸摸地获得一种社会奖赏,就像大兵一代在老年时一样。然而通过以优雅的方式放弃他们在晚年所得到的奖赏,沉默一代可以向人们证明良好的愿望可能产生一些积极的变化,好人可以改变历史。

如果沉默一代把自己的角色演砸了,他们将会像韦伯斯特、克雷与卡尔霍恩那样离开人世时,还担心前辈在他们的童年时代所铸造的辉煌将毁在他们手中。然而,如果他们演得非常出色,将会安然进入历史的平安夜,就像那些大萧条时期的80多岁的老人以及像刘易斯·布伦德斯与约翰·杜威那样的老一代进步党人。用杜威的话说,他们一直“致力于一个既持久又灵活的目标”。

膨胀一代的传记

对预言家来说,第四次转折具有一层特殊含义,因为百年周期的各个阶段恰好与他们生命中的各个阶段相吻合。从春季到冬季,历史发展的周期同样也是他的人生周期。如果说预言家的阴影(英雄)青年时代接受了最严峻的考验,那么预言家将在老年时期经历磨难。要取得晚年生活的辉煌,预言家必须充分利用老年英雄(他们奖赏但不尊重的)与儿童英雄(其性格与气质是他们培养起来的,但他们却并不理解)的公共责任感与工作技巧。在目前的解体期,预言家正在破坏老年英雄所创建的公共文化,从而使儿童英雄寻求发展与履行其使命的旅程变得更为艰难。既要面对自己的阴影,尊重与奖赏老年英雄,又要将老年英雄所具有的美德传授给自己的儿女,预言家肩上的担子一点也不轻松。

作为下一位老年预言家,膨胀一代将在一个极度危机同时也是充满机遇的时刻领导整个美国。从现在开始,膨胀一代将面临一种来自自我约束的挑战。膨胀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大兵一代会出面解决。因此,他们在追求自己的改革活动时表现得漫不经心。在第四次转折时期,作为台柱的大兵一代将离开人世,而年少的千年一代将跟随老年预言家一起跳下悬崖。如果膨胀一代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历史将不会原谅他们。

膨胀一代的不断成熟是危机以胜利而告终的一个关键。膨胀一代曾是青春的崇拜者。因此在他们要求千年一代具有自己在觉醒时期并不具有的公共美德之前,应首先抛弃上述旧思想。这要求他们做事必须正直,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有些虚伪,但这无非是预言家人生角色的一种自然演变。当危机到来时,膨胀一代必须立即停止文化战争。他们中支持人生选择论的非教徒与崇尚人生的福音派教徒必须抛弃在解体时期形成的各种小纠纷,同心协力为国家的生存而奋斗。这与老年传教士在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境遇非常相似。

膨胀一代也必须表现出一种别人想不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从性格上来说,他们在个人生活中总是倾向于自我陶醉。但是如果他们将这种思想带到公共生活中,并要求大众向他们提供许多福利,他们将会毁掉自己孩子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会使他们道德沦丧。与沉默一代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偷偷溜过去。更加糟糕的是,如果膨胀一代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争论,并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孤立,他们现在在谈话节目中所说的关于歼灭敌人的大话可能会演变为号召部下采用可以毁灭世界的武器的命令。

危机到来之后,膨胀一代将面临一种与雅皮士角色完全不同的任务:主持一个倡导公共权威与个人牺牲的时代的领导工作。这一代人必须勇敢面对其艰韧不拔的道德观念可能对其子女、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构成的威胁。历史学家大卫·麦克莱兰告诫人们说:"当人们重复'要爱情,不要战争'这句口号时,他们应该意识到,爱人这一过程经常会以战争爆发而结束。"但是如果年长的膨胀一代可以控制他们集体角色中的黑暗面,他们可以像当年年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回顾自己以前扮演的角色那样回顾自己在第四次转折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别人问这位老人美国政府的大印

上应该有什么图像时,他回答说:可以激发人们精神的摩西的图像,他张开双臂,面向苍穹,把海水分开,让他的臣民通过。

第 13 代的传记

生存技巧是一个社会在第四次转折中最需要的,而倍受人们批评的原型——游牧者却拥有许多这种技巧。通过自然界百年周期所具有的自然修正力,游牧者生来就练就了历史在其中年即社会处于真正危机之时要求他们应该具有的那种生存技巧。他们的任务是不再将这些技巧用于某些零散的目的,而是应该开始将它们集中起来干一番大事业。在整个解体期,游牧者可以从社会生活中隐退,但危机一旦到来,他们就没有这种机会了。他的职责是无论社会作出何种选择都应确保这些选择达到预期的目标。在公共生活中,游牧者必须冲破他的阴影即老年艺术家留下的后遗症。在个人生活中,他必须重建曾被老年艺术家所抛弃的家庭与社团仪式。这样,游牧者就可以将新的儿童艺术家抚养成人了。

第四次转折到来时,其他各代要么大多已经作古,要么还没有出生,但是第 13 代那时正处在人生的大好时代,即恰好在他们的成年阶段中期。他们必须走出来担当起百年周期赋予他们这一代的职责,即拨乱反正,清除别人留下的历史碎片。第 13 代在艰苦的童年与崇尚个人主义的青年时期所掌握的各种技巧都将接受最严峻的考验。如果第 13 代将这些技巧用于社会目的,它们将成为医治他们在觉醒期童年时代所得各种病症(包括离婚、自带房门钥匙的儿童到公债与文化腐朽)的药方。

第 13 代在第四次转折时期最大的责任也就是他们所处社会最重要的预备性工作:确保的确可以迎来一个新的高涨期,即一个充满希望与繁荣的新的金色时代。为了使危机获得一个好结果,

第13代必须防止膨胀一代进行一些毫无必要的破坏，并防止千年一代在老一代的旗帜指引下不加思考地向前走。他们会发现，让认为自己比他们还高明许多的老一代以及认为自己更应该属于这个时代的青年一代约束自己的活动非常困难。为此，第13代需要有一双慧眼、一个机智灵活的头脑，并勇于否定年轻时盲目冲动的思想。

从现在到第四次转折结束，第13代所掌握的权力将越来越大。从1998年至危机高潮期，他们将成为美国参加选举人数最多的一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社会贡献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如果他们想遏制住膨胀一代的狂热情绪，必须有更多的人参加选举，参加竞选。他们将会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们中当选的官员将在危机到来时大批涌入国会，从而在危机达到高潮时遮掩住膨胀一代的光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控制住他们。

随着第13代成员逐一进入历史角色，应该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希望他们去完成的各种艰苦任务。如果第13代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方面不很成功，将难以实现迎来一个新的金色时代的伟大目标。随着年龄的增长，第13代应该记住海明威的一句话："老年人不是变得更加明智，而是变得更加小心了。"

千年一代的传记

对少年英雄来说，第四次转折将成为他们进入成年过程中的一次巨大考验。与危机抗争的战斗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雄的团结、能力与勇气。英雄一直以其勇敢与荣耀而著称，第四次转折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今天的千年一代儿童应该沉醉于成年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之中，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抛弃解体时期环绕在他们周围的犬儒主

义思想。他们应该保持自己的天真,切忌过早地走向成熟。他们应该从点滴做起,同时又不失鸿鹄之志。通过将同龄人的精力用于某些积极的目的,他们恢复了美国青少年的良好名声。当老一代宣讲他们小时候(这种现象在成人世界中并不常见)也没有掌握的传统价值观念时,千年一代不会理睬他们的虚伪,而去聆听其中的教训。今天的孩子表现出这些美德的时间越早,老一代就会更加慷慨地对待他们(支付校税,减少老年奖金),进而使他们为即将到来的巨大考验作好准备。

在大萧条开始之际,赫伯特·胡佛曾极力为美国青年人争取"一个平等的机会"。他预言说:"如果我们有一代人出生正派、受过良好的训练与教育、身体健康,政府就不会遇到如此多的问题。"后来的历史以及青年大兵一代验证了这一点。千年一代的时机已经临近。如果他们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们会站在一起合唱,就像 1776 年青年爱国者所做的那样,"正在蓬勃向上发展的世界将在一千年后为我们歌唱,并告诉我们孩子的孩子我们所铸造的辉煌。"

这些原型传记让人们联想到某些古代民族的遗嘱,如拉伸莫尔山上的巨型雕像:如果四种气质和谐相处,社会将获得最大的益处。

历史上有一些大的中断现象,它们不同于某些大事件,即四种不同个性的随意冲突。相反,由于每种原型通过面对自己的阴影做出自己的贡献,百年周期中的冬季将沿着一个相互补充的自然之路行进。从这一点上看,第四次转折允许一个社会具有生存的本能。它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原型的力量,使社会解决某些本可以毁灭它的问题。

在第四次转折过程中,在每代人不断重演祖先的传说与神话

同时,我们也可以共同创立一些新的传说与神话,进而影响、教育后人。

第十二章 永久的回归

纳瓦霍人在他们圆形泥顶的木屋里筛选各种彩色的砂砾来描述人生与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他们的祖先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这样做了。他们按照逆时针方向在这些沙子上画了许多圆圈，每次画四分之一，并在上面描一些代表每个时代与季节所遇到的各种挑战的图标。当他们快要画到第四个季节的结尾时，却停了下来，在圆的顶端留下一段很小的空缺。这象征着死亡与再生的时刻或者古希腊人所谓的 ekpyrosis。根据纳瓦霍人的习惯，只有上帝才能填充这一空缺，有生有死的人类没有这个能力。艺术家所能做的一切只是按周期发展的相反方向将这幅画擦掉，然后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因此，根据纳瓦霍人的传统，周期性发展的时间可以不断重复。

如同大多数古老的民族一样，纳瓦霍人不仅接受人生的循环性，而且也承认人生的永恒性。每代人都知道自己的先辈曾在沙子上画过同样的圆圈，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继承人继续画下去。纳瓦霍人通过宗教仪式重演过去，同时也预测未来。他们就是这样超越了时间。

现代社会经常抛弃圆圈，追求连接开始与结束的直线。作为直线时间论的信徒，我们认为必须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越想战胜自然，越会受到其深层规律的束缚。与纳瓦霍人不同的是，我们无法抵御以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尝试将那个圆圈画完的诱惑。

我们不能回避历史这个圆圈的最后一个象限（四分之一周期）。我们无法回避第四次转折，也无法躲避它所带来的 ekpyrosis。无论我们欢迎与否，老年预言家将成为我们的领导，并在危急时刻作出牺牲。无论我们的准备是否明智，都将走完这个具有千年意义的百年周期。这个始于日本投降日的时代届时将自然发展到一个高潮，然后走向结局。

什么样的结局？

下一个第四次转折可能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总结。它可能成为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阿米吉多顿，这场战争将毁掉一切。如果人类可以毁灭自己的话，这可能发生在其占主导地位的文明触发一场以恐怖而告终的第四次转折之时。这种结局虽有可能，但概率很低。人类生活不是这样轻易就可以被毁灭的。直线时间论中有这样一种过于骄傲的看法，即我们只要轻轻一按电钮，就可以将自然界化为乌有，毁掉我们的种子，使我们成为地球上的最后一代人。文明人（新石器时代以后）已经历了大约 500 代，史前（用火的）人则可能经历了 5000 代，而直立行走的人猿所经历的世代可能还要多 10 倍。下一个第四次转折要结束所有这一切，必须将社会灾难、人类的邪恶、科技的完善以及不好的运气以极不现实的形式叠加在一起。只有最悲观的人才会这样想。

第四次转折可能标志着现代历史的结束。西方百年周期这一随着文艺复兴在 15 世纪中叶出现的历史发展节奏可能突然停止。现代历史上的第七个百年周期可能会成为最后一个百年周期。这也会源于一场可怕但不是最后的全面战争的爆发。科技、文化、政治与社会可能全面崩溃。正如前人所预言的那样，汤因比的西方文明与施本格勒的浮士德式文化的结局将会非常残酷。一个新的黑时代将会到来，直到最后几种新的文明经过修补之后在废墟

中重新站立起来。世代的循环也会结束，并将被一种由来已久、不允许任何进步的传统循环（每个人生阶段的角色都相对固定）所取代。正如一场大规模的杀戮一样，这种可怕的后果也许只有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今天的美国）让一场第四次危机的 ekpyrosis 波及了整个地球之时才会发生。然而，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及人类邪恶的升级，完全有可能产生这种结果。

第四次转折可能不会结束现代历史，却会标志着我们这个国家的灭亡。它可能会合上那本论述美国这个词所代表的政治宪法、通俗文化与道德立场的书。这个国家已经存在了 3 个百年周期；罗马经历了 12 个，伊特鲁里亚经历了 10 个，苏联（也许）只有一个。第四次转折是涉及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美国此前的三次危机曾出现过极度危险的时刻：在美国革命期间，合众国差一点就在几场战役中流产。在内战期间，北方联盟差一点就没有赢得那场长达 4 年之久的杀戮，当时，人们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到那时为止最残酷的一场战争。在二战期间，美国摧毁了一个一度得逞的民主敌人。如果敌人胜利了，美国也许早已被灭绝。总之，即将到来的危机极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同样大的威胁与同样严重的后果。

也许第四次转折仅仅标志着千年百年周期的结束。人类、现代性与美国都将继续存在下去。此后，将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情绪、一个新的高涨期以及一个新的百年周期。美国将会得到再生。再生之后的美国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新的百年周期可能会发现美国是个糟糕透顶的地方。正如保罗·肯尼迪以前告诫人们的那样，它也许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它在全球的地位也许会被几个竞争对手所遮蔽。其国土可能会缩小，其文化不再像现在这样占主导地位，其军事力量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其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倡导民主，其宪法也不再像以

往那样激动人心。从千年蚕茧中挣脱出来之后，它也许再也无法让人们联想到在“伟大的美国世纪”美国曾经拥有过的希望与高贵。在国外，一些善意者与高雅者也许认为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危险之国，或者认为它是一个腐朽变质的老化的新世界，对人类进步的作用不再像现在这样重要了。从百年周期的自然转折来看，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发生。

作为另一种可能，在新的百年周期到来后，美国与整个世界也许会变得比以前更好。如同处于宗教改革百年周期中的英格兰，千年百年周期中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许只是进入更高文明阶段的一个前奏。新的公共生活也许更接近于殖民地时期的祖先所渴望的“山丘上那座光彩耀人的城市”。美国的生态情况也许会受到治理，重新变得可以保持，经济得到振兴，政治变得公正而充满活力，媒体在宣传中也增添了信心，文化变得乐观而富有创造性，性别与种族关系得以改善，共同性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不同性也为人们所接受，机构不再受今天看来根深蒂固、无法根除的腐败之困扰。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在新领域取得的成功也许能给人们增添不少乐趣。美国的边疆可能要重新划定，但只能变得更加合理。其对世界和平的影响力可能更大，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更具启发性。所有这些通过努力也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第四次转折以胜利而告终，现代世界的许多方面也许仍将延续与以前相同的百年周期性节奏并共享相同的百年周期性胜利。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许多人也许会希望世界实现“历史的总结”。这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弗朗西斯·福山（略带嘲讽地）将之描述为“战争与血腥革命的终结”，达到这一目标后，“人们在许多目标上可以达成一致，不再存在值得争斗的伟大事业”。出现这种结果，有可能吗？也许没有。如果第四次转折取

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极有可能带来一个非同凡响但同时也不会长久的第一次转折。百年周期将继续下去。的确，高涨期越是辉煌，由此带来的世代结构也会变得越强大。千年一代将会取得辉煌的成就，成为创造世界的英雄，变得更加刚愎自用。青年预言家将在以后引发一场觉醒与之抗衡，这样循环就会继续下去。

第四次转折的 ekpyrosis 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后果，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变得缩手缩脚，而应该倍受鼓舞。百年周期使人生与时间变得条理清晰，同时也使人类历史变得更富目的性。相信周期可预见，节奏可觉察，可以激发一个社会或者个人去干一些原本看上去毫无意义的大事业。从伦理的角度看，任何东西都不会影响如下观点：从某种根本的意义上讲，我们的行为是对过去的重演。相反，古人认为，要参与到循环性时间中去，就应为参与结果的好坏负责。

如果历史处于一种纯粹的混沌状态之中，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取消人类意志的各种表达方式。如果在过去的打算与将来的结果之间没有任何可以理喻的关系，我们将无法帮助自己的子女或后代。我们也许会将金库中的钱财用光，破坏大气层，践踏文化，把文明的种苗吃光。

如果历史的发展纯粹是直线式的，人类也会发现自己走向堕落。即使是最高尚的社会也会沦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简单手段。那些生活在历史终结之前的各个世代只能成为铺路石，它们的成员则是摆在进步神坛上的祭品。在历史发展这条康庄大道上，任何事物都是短暂的，不存在永恒的东西。人类的唯一自由选择是加快或者延缓一个预先设定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到来。由于直线式历史关于完美的标准越来越严格，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任何一代人一定会认为自己（或者被别人认为是）是孬种，对人类发展有百弊而无一利。个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最近西方对极权主义制

度进行了某些试验，向人们提供了一些教训：一般情况下，那些神化历史目标的社会根本不尊重走这段路程的人的道德自治权。

相反，如果认为历史是周期性的，每代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跨越时间之路，并与祖先及继承人建立一种有意义的联系。无论我们是谁，大兵一代也好，沉默一代也好，膨胀一代、第13代与千年一代也好，都可以找到与命运的约会地点，抓住自己的角色，尽我们所能去演好它，并参照传说中的神话与传统文明标准来衡量自己。时间的周期不向任何人打保票。就各种现代社会生活来说，也是如此，具有转变意义的变革往往是非连续性的。仿佛历史已经实现永恒，走向终结，变得走投无路，然后突然将我们抛向一片极度的混乱之中。在这种混乱之中，人类根本不知道应该往何处去。第四次转折将是对我们心灵的一次考验，而百年周期则告诉我们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面对这种考验。百年周期并不揭示它是否会以喜剧结尾，但是它会告诉我们，我们的选择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

在上个世纪，人类对进步的信仰受到多次冲击，也许哪一次都比不上弗雷德里希·尼采早期那些言辞犀利的批判具有杀伤力。尼采相信，关于人类永无止境地向一种无法企及的标准迈进的幻想已经成为西方精神世界的一种痼疾。他认为这种痼疾已经成为一种残酷的自我憎恶的工具，一种虚伪的诞生地，一种套在人类真正精神上的枷锁。他所杜撰出来的预言家查拉图斯特拉认为问题在于“精神对时间与曾经存在的报复”，意思是对历史本身的痛恨，对一种单程旅程的痛恨，因为该旅程的远大目标不断证明人类的真正境况——可悲而渺小。作为一种选择，查拉图斯特拉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每个事件总是被重演，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以前曾被做过，将来也会永远被重复下去。因此活动不仅是达

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本身。查拉图斯特拉将此称为“永久的回归”，即每个人有可以获得的一个充分分享人生意义的机会。

百年周期也提供了相同的机会。无论你属于哪一代，只要能活到老年，都能分别经历人生的四个周期以及历史发展中的四次转折。这两组四位一体的相互交叉不仅使我们这一代人与众不同，还使我们与以前的第四代人及将来的第四代人连接在一起。我们重复祖先的传说，而我们的后人将来也会重演我们的。这样，深厚宽广的人类精神得以表现，并长久存续下去。

直线时间论诱使我们现代人相信，我们要么比祖先优秀多少倍，要么低劣许多。通过呼唤我们的骄傲或失望，单向发展的历史免去了证明我们与榜样相比毫不逊色这一挑战。没有了这一挑战，我们也就不必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了。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托在评论罗马帝国早期礼仪时不同意一些道德说教家的观点：一个伟大社会的公共美德只能按单一方向变化。他在书中写道：“人类活动可能有一种循环，道德的变化与季节一样不断相互交替。古代并非总是比现在美好：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创造了许多高贵而文明的行为榜样，供后人效仿。人必须希望这种与先人展开的值得称赞的竞争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在塔西托说这番话20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怀有这种希望。

我们每个人跨越广阔的时间及自我与他人交流。回想一下你的童年。回忆一下那影响你一生的老人——也许是你的祖父，也许是你的一位老邻居。自那人的出生日期到现在这段时间构成了你的回顾式记忆内容。现在让我们再沿着另一个方向看一下。让我们计划一下你将来可能影响到的年龄最小者的寿命——最有可能是你最小的孙子或孙女。如果你还年轻，让我们假设你在35

岁生最后一个孩子，他（她）也将在35岁生最后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又将活到85岁。那么，从现代到你最后一个孙子或孙女去世这段时间构成了你的前瞻式记忆距离。

将这两个时间段相加就可以算出总的记忆距离。这样就把影响你的人们的生命与那些受你所影响的人们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就本书的作者而言，这一记忆距离分别是从1881年到2104年（施特劳斯）与1888年到2114年（豪）：223年与226年。这比美国建国的历史还要长。镀金时代中长寿命的成员（约翰·D·洛克菲勒、马瑟·琼斯与奥利夫·温德尔·霍尔姆斯）的记忆距离从美国革命之前一直延伸到现在。一个在1997年出生的小孩的记忆距离大约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遥远的22世纪50年代。

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根据周期性与转折来思考时间，这些漫长的记忆距离就变得可以理解、有意义了，进而成为人类的一个共有特性。不管你处在什么年龄与世代，你以前知道或者将要知道的那些你所爱的人的生命将跨越了几乎整整三个百年周期。总之，你将经历三次第四次转折、三次危机与三次 ekpyroses。这样漫长的记忆距离构成了你认识历史的一个独特优势。你将与以前的美国人及将来的美国人共享这一优势。它将作为个人的你与人们记忆中的祖先的生命之流联系在一起。它让你熟悉了儿孙的生活。

如果百年周期继续下去，今天出生的女孩将在第四次转折的危机高潮期进入成年，在随后的高涨期进入中年，在觉醒期步入老年。她极有可能看到另一次解体期的开始阶段。如果她身体健康而且比较幸运，她可能在22世纪前夕目睹另一场危机的到来。这样她就有许多故事对自己年龄最小的孙子讲，而后者如果安全度过了2100年左右的危机，就可以将百年周期的各种教训告诉

自己的孙子。他的孙子年老后又会成为一个由来已久的老年预言家。

也许上述最后那个人将成为22世纪末期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将编写一部长达10个百年周期的美国文明编年全史。正如我们今天觉得乔治·华盛顿执政时代非常遥远一样，在22世纪90年代，他也会觉得20世纪90年代非常遥远。随着第四次转折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所有的小学生都将知道从本世纪末到21世纪20年代之间会发生什么。但是学者们一定会就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及过程争论不休。今天那位女婴的曾孙将在其历史著作中思考第四次转折对他所处的时代与那一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的历史著作还没有写。它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务皆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
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
拥抱有时，逃避拥抱有时；
获得有时，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

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三章1-8条

致 谢

第四次转折与每个人都有利害关系，我们两人也不例外。我们两家有六个孩子，三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与我们呆在一起的父母，还有两位父母住在别的地方。我们的孩子年龄从 2 岁到 19 岁不等，我们的父母则从 69 岁到 87 岁不等。我们儿女未来的生活，我们父母的未来记忆，以及我们与妻子所要面临的老年——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写这本书时都考虑到了。儿子出生或者女儿高中毕业会让父母就未来是个什么样子、能为未来做些什么等问题思考很久。我们要感谢家人给予我们的的灵感以及他们表现出的极大耐心，而且还要感谢西蒙娜·豪、詹妮、米兰妮及苏茜·斯特劳斯，为她们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

许多为这本书出过力的人与我们是同代人。我们出生于 1947 年（斯特劳斯）与 1951 年（豪）。我们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观察我们的同龄人重复先人原型所走过的人生之路的。我们要感谢本书的校对人员吉姆·考恩、彼得·D·埃皮罗、理查德·杰克逊、比尔·莱恩与里克·塞米亚丁；迈克·蒂尔福德优美的声音为本书的有声版本增色不少；埃丽娜·纽波特及其他在卡皮特尔—斯台普斯歌舞表演餐馆的同事，他们诙谐与幽默，向我们提供某些有关美国当代情况的真知灼见。我们的顾问、本书写作计划的倡导者拉夫·萨加林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百老汇图书公司的编辑与出版者约翰·施特林与比尔·辛克尔赞同我们的观点，并帮助我们将它们转化为文字。

不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前景有多么暗淡，有关第四次转折

的预言对青年一代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有可能度过这一难关。我们要感谢文字校对员阿林达·波尔，斯格特与苏姗·德夫以及安妮·埃肯；感谢大卫·达特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罕见的材料；还要感谢理查德·索尔，网络专家纳比尔·海亚特以及我们的研究助手迈特·莫尔，他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并提供了许多帮助。

几年来，许多长者从某些重要方面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灵感，他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查尔斯·古德尔、查尔斯·坡西、彼特·皮特森与保罗·威夫尔，还有我们的父母阿瑟与苏茜·斯特劳斯和波特与马格特·豪，我们的岳父母霍华德与玛丽·坎普斯和乔吉奥与卡尔拉·马索布里奥；我们的孩子也给我们以帮助，他们是米兰妮、维多利亚、艾利克、丽蓓卡·斯特劳斯、乔治亚与纳桑尼尔·豪。尤其需要感谢的是我们两人的妻子詹妮与西蒙娜，她们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

德国著名学者列奥普德·冯·兰克在研究了旧世界的编年史之后指出：“在上帝面前，人生代代生存的理由都是平等的。”同时他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任何一代身上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也同样存在于其他世代之中……。”我们衷心希望曾经打动我们心灵并被写入本书的各代人在有生之年生活得自由自在，事业有成，并给后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我们必须向循环理论的先导者们致敬。他们往往置别人的冷嘲热讽于不顾，发现了世代与百年周期性节奏的重要性。我们要对以下诸位学界名人表示感谢，是他们这些开拓者给予我们莫大的启发：阿诺德·汤因比、昆西·莱特、乔塞波·费拉里与萨缪尔·亨廷顿、彼得·哈利斯与乔治·莫德尔斯基、弗兰克·克林伯格以及大小阿瑟·史勒辛格等等。

我们还应该相互致谢。没有对方，我们谁都不会想到或写出《第四次转折》一书。我们的循环理论是十多年合作的结果。这

种合作始于80年代，当时我们合写的是《世代论》。我们对这一话题的兴趣源于斯特劳斯以前几本论及越战时期的征兵与军事活动的书和豪几本论述美国长期财政问题的书。在《世代论》中，我们想阐释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比如60年代代沟问题的解决是如何引发了80年代的权力道德思想。当时我们假设我们这个世代的发展动力不同于以往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们越是深入研究美国历史，就越发意识到只有具体细节是新的，潜在的节奏却是一成不变的。

尽管我们当时的打算是想把《世代论》写成一本历史书，我们也发现了世代按照由四种类型组成的周期循环发展的现象。在该书最后一章，我们利用这一循环对美国不远的将来进行了预测。我们认为，虽然当时人们大谈信息时代与新的世界秩序，古人发现的周期发展模式可能已经嵌入现代社会的内在本质之中。在90年代的实际情况验证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觉得必须尽快提醒人们第四次转折即将到来了。

最后，我们要感谢读者能抽出时间来听我们两个人说长论短，并感谢他们正在为美好的未来做各种努力。对那些在将来某个时间碰巧看到这本书的读者，我们将在当前这个百年周期向他们问候，预祝他们万事如意。你将全面目睹第四次转折。你将在严酷的考验时期，围绕今天美国人所做的一切编写出一些伟大神话与传说。我们衷心希望你们能带着一种骄傲的心情去从事这项工作。

——威廉·斯特劳斯与尼尔·豪